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 上

莊練著



中華書局

72237

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 上

莊練著

20042626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中華書局

本書據臺灣四季出版事業有限公司一九八零年七月五日第三版影印。

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

（全三册）

莊 練 著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 華 書 店 北 京 發 行 所 發 行

中國民航總局印刷廠台湖分廠印刷

*

850×1168毫米1/32 · 29 5/8 印張16插頁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1－5,000册

統一書號：11018·1504　　定價17.50元

ISBN 7－101－00232－3/K·99



(1)曾國藩

（西元1811—1872），是一位崇尚經世致用的學者，他編練湘軍是平定太平天國之亂的主要功臣，經由他一手拯救得生的滿清皇朝，在同治、光緒年間一度出現振衰起敝的中興景象。



(2)胡林翼

（西元1812—1861），與曾國藩、左宗棠並稱咸同中興三大名臣。他知人善任，海內交推，才具過人，謙退爲懷，處處推功讓賢，調和將帥，是故人心歸附，士樂爲用，是位成功的政治領袖。



(3)左宗棠

（西元1812—1885），光緒初年，新疆回亂幸賴左宗棠得以敉平，舉西北數百萬方里已失之疆土還之滿清，得了「自唐太宗後，對國家主權、領土功勞最大之第一人」的雅稱。



(4)張之洞

（西元1837—1909），於光緒宣統年間，在滿清中央有舉足輕重的關鍵地位，但闇於知人，又應付無策，終不能使他的聲望與地位在實際政治上發生制衡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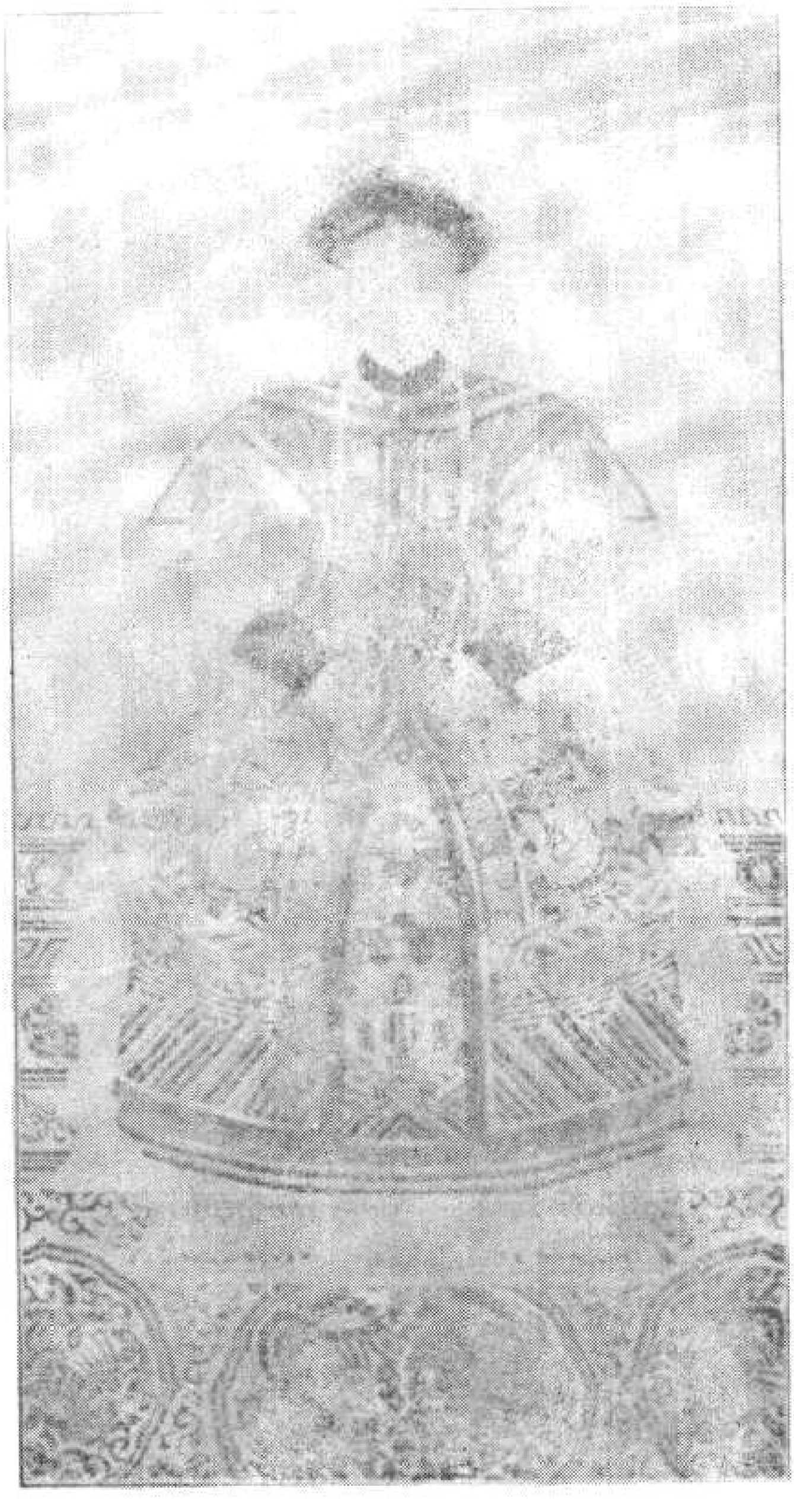
(5)劉銘傳

（西元1836—1896），清朝末年缺乏有遠見有魄力的政治家和軍事家，而劉銘傳正是少有的這種人才，曾出任台灣第一任巡撫，在財政、經濟、交通各方面均有衆多建樹，奠定了台灣的自立基礎。



(6)清文宗（咸豐）

即位不久就因內憂外患之交相煎迫而變得消極頹廢，因躭於酒色而致早戕其生，卅一歲就崩駕了，又因猜忌而使他的親弟奕訢不能輔政，把一片殘破江山交給六歲的兒子，終讓野心勃勃的慈禧製造了竊柄弄權的機會。



(7) 孝欽顯皇后（慈禧）

晚清五十年的中國歷史，始終是在慈禧支配下的。她極有才幹、也極有手段，但却是一個未嘗學問而權力慾望極強的無識女流。在她的統治下，中國由一度頗有希望的中興局面日益走向衰破沒落，終且淪爲西方列強的次殖民地。



(8) 恭親王奕訢

是道光皇帝之第六子，在清末有「賢王」之稱，不但才具開展，而且思想明敏，勤於國事。爲慈禧所利用而替她爭奪權柄，最後又被削奪政權，逐出軍機。

序

歷史是人事活動的積累。手握國家軍政大權的領導人物，他們的思想言行，更直接與國家命運的休戚榮辱息息相關。所以，爲歷史人物作傳記及撰寫評傳，早就成了歷史研究工作的一個項目。準此而言，爲某一特定時期的當政人物分別作傳，藉以覘見此一時期的歷史演變道路，當然也是可做的事了。

十九世紀時的中國，正當西方勢力劇烈衝擊，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其影響及于今日者，尙且十分重大。咸豐、同治之間，內則有太平天國及捻、回之亂，外則有英法聯軍之入侵，當時不但東南半壁糜爛不堪，卽是廣大的華北平原亦充滿了寇亂，而自新疆甘肅陝西以至雲南，又復爲叛回所據，所謂完善之區，充其量不過全國省區的二分之一。此時幸有恭親王奕訢及軍機大臣文祥主持於內，曾、胡、左、李等一班中興將帥效命於外，同心匡濟，竭力搘拄，卒能內靖大難，外拒强敵，弼成同治光緒之間的小康局面。這一些重要人物的文治武功，拯救中華民族的國運於至危垂絕之時，他們的功勳，必將在歷史上永著聲光。但不幸的是國家最上層的領導人物接二連三的發生變故，咸豐不壽，同治夭折，慈安暴崩，光緒柔懦，這一切的一切，都只造成了慈禧太

后以一介女流而獨攬國家政柄達數十年。到了後來，她的好尚貨賄與就於享樂，更導致清末政治日益走向貪汚腐化的道路。清政之不綱，從此遂如江河之日下，而同光中興的小康局面，從此亦永成歷史之陳迹矣。看了這些與衰變化與賢不肖人物之進退情形，怎不令人瞿然瞭悟人事因素在歷史上的重要影響。所以，要瞭解晚清末年的歷史何以如此災晦否塞，國事蜩螗，研究其時當政人物的言行思想與他們的實際行事施爲，來顯示晚清歷史上許多重大事件之肇生，其原因究竟爲何？坊間所刊行的中國近代史佳作如林。但這些著作因體裁所限，其敍述總是全書性，詳於此必略於彼，對於當時若干重要人物的言行思想與他們的實際影響，反而不能詳爲敍述。對於渴欲知道清末歷史演變何以如此而不能如彼原因的讀者，總未能破其疑團而饜其所欲。本書之作，即是希望以人事活動的經緯來補足通史敍述的缺略，從而使讀者得以深一層窺見歷史演變的趨向。有關中國近代史的資料，汗牛充棟，本書亦不過酌取若干，管鼎一臠而已。由于人事方面的活動總比較富于趣味，所以也比較能引起讀者的興味。假如能藉此而能使讀者諸君對近代歷史的研究發生興趣，那就是更好不過的估計，够得上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稱爲關鍵人物的帝王君臣，爲數不過二十人左右，如果把這些重要人物每一人都以三、四萬字的篇幅勾畫出一幅大致的輪廓，就其關鍵性的言

行思想作一簡單而明白的交待，對於近代史的研究瞭解必定可有相當的幫助。一年以來。寫成的已有十一人，三十二萬餘字，預計待寫的不過只有七、八人，再寫三十萬字左右，便可完篇。只因四季出版公司的負責人亟欲將已寫成的刊印單行本問世，所以只好以未完稿的形式呈獻於讀者之前。所賸餘的部份，一俟明年寫成後，再行出版，先此向讀者諸君聲明，並致歉意。

收在這本書中的文字，都曾在青年戰士報新文藝副刊上發表。承蒙主編胡秀先生的厚愛及讀者諸君的歡迎，使筆者得以有勇氣繼續在該報撰寫。惟因筆者學識譾陋窒漏及錯誤之處，在所難免，尚希望高明的讀者不吝指正，以便在以後撰寫時得以有所改進，不勝企盼之至。

當此初集刊印成書之日，略述緣起，以當序言。最後，對於四季出版公司負責人願使我這本譾陋的小書得以出版問世之厚意，尤當申致感謝之忱。

莊練 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八日 於南港寓廬

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

上册目錄

序 一
曾國藩 三九
胡林翼 八一
左宗棠 一三二
張之洞 一八九
劉銘傳 二二七
咸豐、慈禧與恭王

曾國藩

在中國近百年的歷史上，曾國藩是一個極其重要的關鍵人物。假如沒有曾國藩出來力任艱巨，則太平天國之亂事必難平定，滿清皇朝的命運，也不必等到辛亥革命，就會提早五十年結束。也因爲他善於識拔人才，引用賢能，更時時以轉移社會風氣及建立廉能政治爲己任，所以經由他一手拯救得生的滿清皇朝，纔會在同治光緒之間，一度出現振衰起敝的中興氣象。這一個在中國近百年史上居有如此重要地位的人物，自清末以至民國，自中國以至外國，凡是對他有所瞭解的人，幾乎無不深致欽仰景佩之誠。惟一的例外，只是清末革命運動纔起之時，革命黨人對他所加的苛刻評論。

勃興於清末的革命運動，首先揭櫫其排滿反清的民族主義革命思想。基於此一革命主張，爲滿族所建立的清皇朝當然是必需推翻的革命對象。至於那些在滿清皇朝中做官的漢人，如果他們曾經出力鎭壓過漢人的革命運動，亦必被視爲替異族效勞的功狗，詆之爲漢奸，斥之爲民賊。曾國藩生當滿清末年，適逢太平天國的反清革命之會，而他又是在平定太平天國之亂中出力最多的人，於是也就不免被置爲幫助滿清政府鎭壓漢人革命的劊子手，與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同被詈丐

人首獸身的畜類，口誅筆伐，至於無所不用其極。實在說來，自明朝亡國，經過滿清皇朝一百多年來的高壓統治與懷柔收買，中國人固有的民族思想，大都已經泯滅無存。曾國藩生當此一時代，他所接受的教育，使他的倫理道德觀念與政治思想局限在一定的範疇之內——除了忠君愛國之外，就只知道如何砥礪品德，進修學問，以及一旦得官入仕，如何爲社會民生謀求福祉。這種倫理道德觀念與政治思想，在他的家書中可以很明白的看得出來。曾國藩家書卷一，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致弟書云：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生，不愧爲天地之完人。故其爲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爲憂也，以德不修學不講爲憂也。是故頑民梗化則憂之，蠻夷猾夏則憂之，小人在位、賢才否閉則憂之，匹夫匹婦不被已澤則憂之，所謂悲天命而憫人窮，此君子之所憂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饑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

這正是中國的標準儒家思想——只有以社會民生爲重的天下思想，而沒有狹隘的種族主義觀念。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如果責備曾國藩何以在太平天國革命時不知贊助革命，以便乘機恢復漢人的政權，反而要爲滿清皇朝出力鎮壓此一民族革命運動，就未免昧於時代環境，對曾國藩過苛了。所以自革命成功以後，自政府首要以至政論家、歷史家，都已另外以新的觀點來看曾國藩的一生事業，便會覺得，曾國藩不但在他所生存的時代

中是一個出類拔萃的人物，即在今日，他的思想、言行與功業，也依然是我們所不能企及的。偉大人物之所以成其偉大，只有在這些地方可以明白地看得出來。

曾國藩雖然是清代末年的偉大人物，但他不是天才。他的成功，得力於他的勤學不懈與終生無實履踐。他的朋輩與僚屬受到他的感化，人人以進德修業及負責盡職自期，所以纔能團結衆心，羣策羣力，夷平大難，轉移風氣。除此之外，則他的命運在他的一生事業中也曾有過重大的關係。清人朱克敬所撰的瞑菴雜識中有一條說：

「曾文正公嘗語吳敏樹郭嵩燾曰：我身後碑銘，必屬兩君。他任捃飾，銘辭結句，吾自有之。曰：不信書，信運氣。公之言，告萬世。」

這所謂「不信書，信運氣」之說，並非空言泛論，而確實係有感而發之言。試綜觀曾國藩之一生，如果不是命運之神有意要成全他的話，即使他終生砥礪品德，篤實履踐，始終不懈，恐怕充其量也只能成爲一個硜硜自守的君子，決不能在國家民族面臨極大危難的重要關頭讓他出來領袖羣倫，創下如此驚天動地的不朽大業。凡此種種，在他的一生傳記之中，都有明顯的事蹟可以稽考，不能斥之爲無稽謰言。

曾國藩是湖南湘鄉縣人。他家世代業農，到他父親麟書時，方纔因讀書而成爲縣學中的一名「生員」——秀才。曾國藩在六歲時開始從師入學，十四歲開始到長沙省城應童子試，先後考過七次，直到道光十三年，亦即曾國藩二十三歲的那一年，方纔進學成爲生員。翌年，領鄉薦，中

式湖南鄉試第三十六名舉人。道光十八年，亦即曾國藩二十八歲的那一年，會試亦捷，中第三甲第四十二名進士。照一般情形來說，讀書人能够在一連串的科舉考試中先後得捷，已經取得了做官入仕的資格，從此功名得遂，衣食無憂，應該可以算得上是躊躇滿志的了。但若就事實而言，則又不盡然。因爲在進士之上，還有更高一層，即俗語所說的「點翰林」。中了進士，不一定能做大官；點了翰林，那才眞正具備了做大官的資格——不但是資格好，而且陞遷也快。但點翰林必須進士的名次考得高。一甲進士三名，俗稱狀元、榜眼、探花，榜發之後即授職翰林院的修撰、編修等官，立刻成爲名實相符的「翰林」。至於二、三甲的進士要想成爲翰林，還得經過一次朝考，被取中庶吉士之後在翰林院教習三年，期滿後再經過一次散館考試，成績優良的，二甲進士授編修，三甲進士授檢討，正式成爲翰林院中的一員，其或改官部屬，或授職知縣，從此與翰林絕緣。而進士參加朝考，取中的又以二甲爲多，三甲者寥寥無幾。所以，曾國藩如果不是運氣好，他在中了三甲進士之後就很難被點爲庶吉士。點不了庶吉士，當然更成不了翰林，這對于他以後的官職陞遷，影響就大了。

曾國藩在取中進士之後參加朝考，成績非常好，列一等第三名。試卷進呈御覽之後，道光皇帝又特別將他拔置爲一等第二名。就這樣，曾國藩纔幸運地被點中了庶吉士。到了道光二十年庶吉士散館，曾國藩考列二等第十九名，名次仍然很高。因此他被授職檢討，留在翰林院供職。曾國藩能够先中進士再成翰林，對於他的一生事業前途，關係甚大。曾國藩家書卷二，載有道光二

十四年五月十二日的致弟書云：

「吾謂六弟今年入泮固佳，萬一不入，則當盡棄前功，一志從事于先輩大家之文。年過二十，不爲少矣，若再扶墻摩壁，役役於考卷截搭卜題之中，將來時過而業仍不精，必有悔恨于失計者，不可不早圖也。余當日實見不到此，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向使至今未嘗入泮，則數十年從事於吊渡映帶之間，豈不靦顏也哉？此中誤人終身多矣！」

所謂「入泮」，即是中秀才之意。而由秀才至翰林，路還遠得很。由他所說「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及「此中誤人終身多矣」的話，可以知道曾國藩假如不是早中進士入翰林，此時必然仍在無用的八股時藝之中奮鬪掙扎，決無如許閒暇可以容他讀有用之書，儲備學問，以爲他日救時匡難之用。這是他自己所說「不信書，信運氣」的第一步徵驗。至於第二步的徵驗，則是他在做了翰林院檢討之後的歷次考試情形。

清代的翰林院官，有所謂不定時舉行的「大考」，到時由皇帝命題考試詩文策論，以爲陞遷降黜的依據。大考成績好的，陞遷特別快，否則立予降黜，絕不容情。故而清代俗語，有所謂「秀才怕歲考，翰林怕大考」的話，正是針對那些僥倖得售而不肯努力上進的讀書人而說的。曾國藩在翰林七年，由于他向來用功不懈，歷次考試的成績都很好，因此矇蒙超擢，不過七年的功夫，就由從七品的翰林院檢討一直陞到從二品的內閣學士，具備了他此後出當大任的官階與資

格。若非命運的安排，他怎能有如此良好的機遇呢？清人王定安所撰的曾文正公大事記敍此，云：

「道光二十年庚子，散館二等第十九名，授檢討，旋派順天鄉試磨勘。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大考翰詹，列二等第一名，奉旨以翰林院侍講陞用。六月，詔以公爲四川正考官，趙楫副之。七月，補翰林院侍講。十一月回京，充文淵閣校理。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充翰林院教習庶吉士。十二月，轉翰林院侍讀。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升授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九月，擢翰林院侍講學士。道光二十七年大考翰詹，列二等，奉旨記名，遇缺題奏。六月，陞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翰林院的侍講與侍讀，秩從五品；詹事府左右庶子，秩正五品；翰林院侍講學士，秩從四品；至于內閣學士，則從二品。清代官制，滿漢並用。翰林院官的陞遷途徑有二，一是考試，二是考績，而考試成績優良者，較考績的陞遷尤快。至于翰詹以外的京官與外官，則陞遷之途只有三年一次的考績。清代末年，仕途冗濫，參加考績，須先佔得實缺。而進士出身以部屬官及知縣用者，往往數年不能補得一官。既不能補官，自更不能由考績陞官。所以，即使同是一科考中的進士，由于翰林與非翰林及大考成績優劣不同的關係，很可能在短時間之內就菀枯各異，雲泥有別。如曾國藩在中進士之後的第二年，還不過只是一個從七品的翰林院檢討，三年之後就陞爲從五品的翰林院侍講學士，又過二年，就再陞爲從二品的內閣學

士了。像這樣每隔二、三年就超陞一、二階的情形，在翰林中雖是常有的事，若是翰林院以外的一般京官，就沒有這麼好的機遇了。京官以外的外省官員，陞遷較京官更難，自更不能有這麼好的運道了。他不必論，即以同爲翰林出身的胡林翼而言，情形就大不一樣。

胡林翼是道光十六年的二甲進士，科第要比曾國藩早二年，名次也比曾國藩高。朝考入選之後，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道光十九年大考翰詹，列二等。在這一段經歷上，他的資格與成績和曾國藩一樣。只是他在道光二十年的江南鄉試副主考任內出了毛病，被降一級外調，從此蹭蹬仕途，直到咸豐三年，曾國藩已經做到了正二品的侍郎，胡林翼還在貴州黎平府做從四品的知府。後來雖然由於胡林翼自己的幹練，聲譽日起，也還需要曾國藩的全力推薦，纔能使他有機會到湖北戰場上去大展身手，由按察使、布政使，而一直陞到巡撫，官位與曾國藩相等。在這一段經歷上，胡林翼的陞遷，足足比曾國藩遲了七年。而論到出身，胡林翼還是曾國藩的翰林前輩呢！曾國藩的宦途得意，對于天平天國的成敗得失及滿清皇朝的存亡，關係甚大。假如曾國藩在咸豐初年還只是一個沒有功名的讀書人，縱使他有通天的本領，他也沒有出頭的機會。又假如曾國藩與胡林翼一樣，在那時還只是一個地位不高的中級官員，那也輪不到由他出來領導羣倫，成就他此後的廻天事業。所以說，曾國藩能夠在太平天國幅起之後　以一個在籍的侍郎出來組織湘軍，夷平大難，其中實在雜有很多機緣湊合的因素。曾國藩平生，不信書而信運氣，在這裡就有了很明顯的徵驗。至於他之能夠在翰林院中讀書進修，當然更是再好不過的機遇了。明清時代

的翰林院，乃是新科進士「讀書養望」的好地方。能夠進得了翰林院的進士，既不必爲實際政務所勞擾，又可以從容閱讀翰林院中的豐富典籍，儘量在經史，文學、政經、軍事等方面充實自己的學問。曾國藩家書卷二，收有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的致弟書，云：

「兄少年天分不甚低，厥後日與庸鄙者處，全無所聞，竅被茅塞久矣。及乙未到京後，始有志學詩古文並作字之法，亦苦無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謂經學者、經濟者、有所謂躬行實踐者，始知范、韓可學而至也，馬遷、韓愈亦可學而至也。喟然思盡滌前日之汚，以爲更生之人，以爲父母之肖子，以爲諸弟之先導。」

所謂「范、韓」，卽宋朝有名的賢相范仲淹與韓琦；所謂「馬遷、韓愈」，則是有名的史學大家司馬遷與古文名家韓愈。由此可知，曾國藩在未進翰林院之前，不但對學問之道未得門徑，而且卑無大志，只是一個碌碌庸庸的陋儒而已。而在他中進士做翰林之後，日與良朋益友相往還，於是方得窺學問之門徑，而有志於聖賢之學。黎庶昌撰曾文正公年譜，亦說：

「公少時器宇卓犖，不隨流俗。既入詞垣，遂毅然有效法前賢，澄清天下之志。讀書自爲課程，編摩紀注，分爲五門，曰茶餘偶談，曰過隙影，曰饋貧糧，曰詩文鈔，曰詩文草。」

由此可知，曾國藩一生伙以成功的志行與學問，都是在此時奠定其基礎的。所以然之故，一方面固然是因爲得有良好的讀書環境，二方面亦因得有良朋益友的切磋。他在此一時期內所交的朋友，計有倭仁、吳廷棟、何桂珍、竇垿、邵懿辰、陳源兗等，逐日相與討論問難，得益極多。

至於他在治學方法上的導師，則是時任太常寺卿的唐鑑。由于唐鑑邃於義理之學，亦即宋史所謂之道學，曾國藩常向請益，遂以朱子之近思錄及濂洛關閩諸子之書爲日課，肆力於宋儒之學。這對於他的倫理道德思想及克己省復功夫，影響尤大。後來從事於對太平天國的戰爭，經常在困難拂逆的環境中艱苦支撐，若不是靠着堅忍强毅的意志力量周旋到底，恐怕也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而這種堅忍强毅的意志力量，就得力於他此一時期中的陶鎔範鑄。至于他在做翰林時期用力方面的學問都大有所得，而在此後的對內因致力於經世實用之學而對政治、軍事、經濟等等，必多所資述。

書劄的政治風氣，在嘉慶道光以後日見泄沓，人才亦日見寥落。這與皇帝的好尚及執政者之逢迎諂諛，都有密切的關係。暝菴雜識中曾有一條說：

「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聲名俱泰。門生某請其故，曹曰：『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道光以來，世風柔靡，實本於此。近更加以浮滑，稍質直，即不容矣。有無名子賦一劄梅云：仕途鑽刺喫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豐。莫談時事逞英雄，一味圓融，一味謙恭。其二云：八方大臣經濟在從容，莫顯奇功，莫說精忠。萬般人事要朦朧，駁也無庸，議也無庸。其三云：八方無事歲年豐，國運方隆，官運方通。大家贊襄要和衷，好也彌縫，歹也彌縫。其四曰：無災無難，子陰郎中。流芳身後更無窮，不謚文忠，也謚文恭。」

曹文正即曹振鏞，是道光一朝最得皇帝倚信的宰相。曹振鏞之庸鄙無能，養成了道光一朝政

治風氣之柔靡泄沓，所以他實際上乃是道光皇帝的罪人。在他所養成的風氣之下，官吏以不負責任之圓滑彌縫爲做官之能事，不但有用的人才因之而銷磨殆盡，國事亦因之而不堪聞問。太平天國之亂，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民生凋敝，災變相乘，而貪污官吏之侵漁迫害，亦是造成官逼民反的重要原因。等到太平天國軍在廣西起事之後，滿清政府調兵遣將，竭力企圖將之迅速撲滅。不料兵不能戰，官不能守，前方傳來的軍報，但見潰敗相繼，多年訓練的幾十萬大軍，竟然抵敵不了一些初起的草茅之寇！道光皇帝這時恰好在危疑震撼的動亂時代中崩了駕，咸豐皇帝繼位，派大學士賽尚阿到廣西去督師，也仍然阻遏不了太平軍的燎原之勢。曾國藩這時已由內閣學士陞爲禮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目睹時局危急而政風頹靡，遂因皇帝之下詔求言而先後上了幾道條陳時務的奏疏。第一道是「應詔陳言疏」，謂：「今日所當講求者，惟在用人。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揚之，則賴皇上之妙用。」接着他提出激厲振作之法，「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在這一道奏疏中，我們可以看出，曾國藩對于人才之何以銷沉泊沒，有其透澈的認識，而對于人才之培養作育，更有其獨到之看法。

其餘各疏，如「條陳日講事宜疏」，「議汰兵疏」，「備陳民間疾苦疏」，「平銀價疏」，對於當前的政治、軍事、社會、經濟等切要的問題，也都能詳細指出受病之因及治理之方，足可看出他對當前的時弊，都有全面深入的瞭解。在這些奏疏之中，最具有重要性的，還是他在咸豐元年四月間所上的一道「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率直指出如要轉移政治風氣，培養有用

人才，全在皇帝個人的態度。這一道奏疏，不但足以看出曾國藩忠君愛國及有作爲、有擔當的硬直風格，也對他此後的平亂事業，發生了重大的影響。正因爲此疏的重要性如此之大，所以我們有必要加以重視。

曾國藩在「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中所指出的皇帝「聖德」，一是敬愼。祀之時，「對越肅雍，跬步必謹。而尋常蒞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愼之美德也。而流弊爲瑣碎，是不可不預防。」瑣碎之弊，在見小而遺大，謹其所不必謹，而於者，反略而不問。「誠使我皇上豁達遠觀，罔苛細節，則爲大臣者不敢以小廉曲謹尋行數墨自取媿譬，必且穆然深思求所以弘濟於艱難者。」這對於當時自皇帝以至宰相百僚之避重就輕，塗飾細行，以求容悅取寵的作風，不啻是無情的棒喝，可謂痛切之至。至於皇帝的第二樣「聖德」，則是好古。謂皇帝於「萬幾之暇，頤情典籍，游藝之末，亦法前賢，此好古之美德也。而辨之不細，其弊徒尚文飾，亦不可不預防。」文飾之弊，在尚虛文而不務實際。「自道光中葉以來，朝士風氣，專尚浮華。小楷則工益求工，詩律則巧益求巧。翰詹最優之途，莫如軍機處行走。而保薦之時，但求工於小楷者。閣部最優之途，莫如兩書房行走。而保薦之時，但求工於小楷者。今日之翰詹，即異日之督撫司道也。甫脫乎小楷詩律之間，即與以兵刑錢穀之任。又豈可觀其舉止便捷，語言圓妙，而不深究其眞學眞識乎？」道光咸豐以來的所謂「人才」如此，加之何不使政風敗壞，盜賊縱橫呢？至於曾國藩疏中的第三項「聖德」，則是「廣大」。謂

皇帝「娛神淡遠，恭己自怡，曠然若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此廣大之美德也。然辨之不精，恐厭薄恆俗，而長驕矜之氣，尤不可以不防。」廣大之弊，在自以爲公正開明而不自知已蹈拒諫飾非之誤。以致「軍務警報，運籌於一人，取決於俄頃，皇上獨任其勞，而臣等莫分其憂。使廣西而不遽平，固中外所同慮也。然使廣西遽平，而皇上意中，或遂謂天下無難辦之事，眼前無助我之人，此則一念驕矜之萌，尤徵臣區區所大懼也。」專制政治的最大弊病，莫如皇帝予智自雄，視天下臣民如無物。其最後所至，必將是「直言日覺其可憎，佞諛日覺其可親，流弊將靡所底止。」然而這些話却不是自矜才智的專制皇帝所樂意聽聞的。而且在積威之下，大多數的人爲了自保功名富貴，也決不肯把這種逆耳之言向皇帝直說，以免皇帝一旦發怒，自己將頓罹不測之禍。即以曾國藩當時的情形來說，除了曾國藩，也不曾有人上過這樣激切伉直的諫疏。曾國藩之風骨勁稜，在這裏也就充份可以看出他之不同凡響。

曾國藩在他所上的「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對當時的政治風尚及皇帝個性，可說是痛下針砭。如果皇帝果眞因此發怒，曾國藩的命運，眞在不可知之數。據說咸豐皇帝在初次見到此疏時，確曾大爲震怒，將原疏擲之地，並欲將曾國藩重加懲治。但在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之後，他終於爲曾國藩忠君愛國的本意所感動，不僅不予加罪，且降旨褒獎曾國藩之敢言，命兼署刑部侍郎。曾國藩家書中有此時所寫的致弟書云：

「余受恩深重，若於此時再不盡忠直言，更待何時乃可進言？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將此驕

矜之機關說破。使聖心日就虛驕，而絕自是之萌，此尒區區之本意也。現在人才不振，皆謹於小而忽於大，人人皆習脂韋唯阿之風，欲以此疏稍挽風氣，冀在廷皆趨於骨鯁而遇事不敢退縮，此余區區之餘意也。……」

政治家的遠見和抱負，在這一些話中已經透露得很是清楚明白了。曾國藩之必能成就其偉大不朽的事業，於此亦可窺見其端倪。金梁所撰的四朝佚聞敍此，謂：

「曾文正公國藩，以上聖德疏爲文宗所特知，諭祁雋藻曰：敢言必能負重。故其後遂倚以平亂。」

由此說來，曾國藩在此疏中固然表現了他的耿耿忠忱，而咸豐皇帝也在此疏中看出了曾國藩之有擔當、有抱負，可委以重任。太平天國亂事之平，在這裏已經伏下了契機。此一奏疏在曾國藩個人前途以至滿清皇朝的前途居有何等的重要性，也就可以不言而喻。

清咸豐二年三月，賽尙阿在廣西討剿太平軍失利，大股太平軍由永安撲攻桂林，旋陷全州，由此入湖南省境，大掠民船，將浮湘江而北出長江。其時曾國藩被派充江西鄉試正考官，七月二十五日行至安徽太和縣境，接得家中計聞，知生母江太夫人已於六月十二日病逝，立即改服奔喪，由黃梅縣渡江至九江，僱船至湖南。尙未到達長沙，得知太平軍已至長沙城外，遂由岳州取道湘陰抵家。其年十月，太平軍以長沙無法攻克，解圍北去，陷岳州、陷漢陽，從此日見其燎原莫救。就在這年的十一月，湖南巡撫張亮基奉到皇帝的上諭，云：

「前任丁憂侍郎曾國藩籍隸湘鄉，聞其在籍，其於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著該撫傳旨令其幫同辦理本省團練鄉民，搜查土匪諸事務，伊必盡力不負委任。」

由於皇帝的這一道上諭，曾國藩就以丁憂在籍的侍郎身份在湖南開始辦起團練來了。這以後的事情，就是他以所訓練的本地鄉兵——湘軍，東征鄂贛皖蘇諸省，轉戰十年，終於底定全局的往事了。關於這一段歷史，清史曾國藩本傳及曾國藩年譜等書記述甚詳，可以不需在此複述，以免浪費篇幅。值得在這裏加以討論的，倒是曾國藩所賴以成功的練兵方法，與他那種不畏困難、不避艱危、努力堅持到底，終於克成大功的強毅精神。

咸豐皇帝在咸豐四年降旨命曾國藩在籍辦理團練，這並不是湖南所特有的事。自太平天國起，大江南北的十數個省分都先後被兵，政府的經制官兵——綠營兵征討無功，戰禍遷延不解，各地的土寇盜匪亦乘機蠭起。爲了確保後方地區的安全，於是各省都先後辦理了團練——訓練本地的鄉勇民兵，協助官兵維持本地的治安。但各省所辦的團練雖多，却只有湖南一省所辦的成績特別好；不僅如此，經由曾國藩所創辦的湖南鄉勇——湘軍，最後並且成爲平定太平天國之亂的主力部隊，這其中的差別所在，便與主事者的練兵方法有密切關係了。關於這方面的情形，可以先看看清人王定安所撰湘軍記水陸營制篇中對清代經制官兵的批評：

「國家養綠營兵五十餘萬，歲糜二千萬金。迺寇發，征調四出，率用本轄營弁統之。其部卒衆寡不齊，少或百人，多至千餘人，綰以提督鎮將，而皆斃於專征之欽差、將軍、都統、督撫。

將不必由帥選，一營士卒，視調發多少無定額。二百年來，行之久矣。自洪楊倡亂，大吏不習兵，綠營皆窳驕惰，聞羽檄征調，則舉室驚號，以爲趨死地無生還理。比至前敵，秦越楚燕之士，雜糅並進，將不相習，兵與兵不相知，勝則相妒，敗不相救，欽差疆帥復時相齟齬，號令歧出，徧裨各分畛域。徵兵日繁，迄不得一兵之用。」

綠營官兵不能用於作戰，曾國藩書札中亦言之。如書札卷四致李少荃書曰：

「今日兵事最堪痛哭者，莫大於敗不相救四字。當其調兵之時，東抽一百，西撥五十，或此奔北，或楚弁而轄以黔鎮。雖此軍大敗，流血成淵，彼軍袖手而旁觀，咈口而微笑。兵而管以彼弁，兵不能戰，不但由于戰力薄弱，更重要的原因，還是上面所說的那種毫無團結之心。曾國藩目擊綠營之弊在此，所以他心目中的軍隊，一方面固然要戰鬪力强靱，二方面更需團結一心，萬象一氣，而後可以言戰。而以今日營伍之習氣，與今日將欲滅賊，必先諸將一心一氣。自非別樹一幟，改絃更張，斷不能辦此賊也。鄙意欲練鄉勇萬人，概求吾黨質直而曉軍事之君子將之，以忠義之氣爲主，而補之以訓練之勤，以庶幾於所謂諸將一心，萬衆一氣者。或可馳驅中原，漸望澄清。」

如之何而可以使諸將一心，萬衆一氣呢？由將領而言，是需要他們也與曾國藩自己一樣地具

有服務桑梓，救民水火的仁愛精神與愛國情操。具備這些條件而兼有治軍作戰之才，斯爲將材之選。曾國藩書札卷三，與曾香海彭筱房書云：

「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則諸勇必不悅服。不勤則營務細鉅，皆廢弛不治。故第一要務在此。不怕死則臨陣當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爲名利而出者，保舉稍遲則怨，稍不如意則怨，與同輩爭薪水，與士卒爭毫釐，故又次之。身體羸弱者，過勞則病，精神乏短者，久用則散，故又次之。四者似過於求備……大抵有忠義血性則四者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

由士兵而言，則需要爲將領之人視之如子弟，感之以恩信，如此必可使上下之間感情融洽，親如家人。這在曾國藩日記及書札中亦屢屢言之。如日記己未八月三日云：

「帶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禮。仁者，卽所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也。待弁勇如符子弟之心，常望其成立，望其發達，則人知恩矣。禮者，卽所謂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泰而不驕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臨之以莊，無形無聲之際，常有懍然難犯之象，則人知威矣。守斯二者，雖蠻貊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

又，書札卷十七，與朱雲崖書云：

「吾輩帶兵勇，如父兄帶子弟一般。無銀錢，無保舉尙是小事，切不可使他因擾民而壞品行

，因嫖賭洋煙而壞身體。個個學好，人人成材，則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亦感恩矣。」

由於曾國藩帶兵簡直是以父兄教導子弟一般地誠信感乎，恩禮有加，湘軍士兵，自然亦視長官如父兄，充份做到了上下一心，同仇敵愾的精神。王定安湘軍記說：

「於是隴畝愚氓，人人樂從軍。聞招募則爭出效命，無復綠營征調離別可憐之色。其後湘軍戰功徧天下，從戎者日益衆。或募千人，則萬人應之；勢不能盡收，甚至丐書干請而後得入。其隨營待補客死他鄉者，不可勝數，而湘人士迄無怨心。所謂有勇知方者耶？」

士氣民心高旺如此，可以知道這必然是一枝戰必勝而攻必克的好部隊。然而其成功的契機則元全屬於人爲之因素。這都是曾國藩以儒家的精神教育灌輸進去之後所發生的效果。其他各省雖然也辦團練，也募鄉兵，但因他們並不知道注重教育與訓練，而長官與士兵之間又缺乏親愛誠的感情基礎，所以終歸仍是無用的贅疣而已。明瞭了這一點之後，我們當可知道，湘軍之成，實應歸功於曾國藩的精誠感召與正確領導。後人推崇他軍事學方面的學養，亦卽是由此而的。

曾國藩雖然成功地創立了湘軍，但他却並不是一個成功的指揮官。王闓運撰湘軍志，說他「以懦教士，以懼行軍，用將則勝，自將則敗。」意思說曾國藩雖然以戒愼戒懼的心情領導湘軍從事訓練及作戰，但他自己並不適於直接領兵打仗，他的成功，完全得力於善於識拔將才並給予充

中央人民政府社会主义学校
图书馆
藏书

分的信任。這些話確是事實。湘軍在平定太平天國之亂中所打的幾次敗仗，差不多都是曾國已擔任指揮官時的成績。如咸豐四年四月靖港之敗，同年十二月水師湖口之敗，以及咸豐十年六月祁門之困等，皆是。只因他知人善任及善於識拔人才，遂能彌補他這方面的缺失而有餘。薛福成庸菴文集中載有他代替李鴻章所撰的「奏陳督臣忠勤事實疏」，在縷陳曾國藩的生平事功外，曾說：

「自昔多事之秋，無不以賢才之衆寡，判功效之廣狹。曾國藩知人之鑒，超軼古今。或遜近於風塵之中，一見以爲偉器；或物色於形迹之表，確然許爲異材。平日持議，常謂天下至大，事變至殷，決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維持，故其振拔幽滯，宏奬人傑，尤屬不遺餘力。嘗閒江忠源未達時，以公車入都謁見，款語移時，曾國藩目送之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當以節烈稱。』後乃專疏保薦，以應求賢之詔。胡林翼以臬司濟兵，隸曾國藩部下，即奏稱其才勝己十倍。二人皆不次擢用，卓著忠勤，曾國藩經營軍事，卒賴其助。其在籍辦團之始，若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李續宜、王鑫、楊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諸生，或拔自隴畝，或招自營伍，均以至誠相與，俾內而幕僚，外而臺局，均極一時之選。其餘部下將士，或立功既久而寖至大顯，或以血戰成名，臨敵死綏者，尤未易以悉數。……」

曰「未易以悉數」，當然是爲數甚多，這話不錯。湘軍將士及幕僚人才之中，由於曾國藩之拔擢，後來寖假而成爲封疆大吏及專閫大帥者，多至難以悉數，前述塔、羅、李、王、楊、彭等

人，不過是最著名的而已。其他如李鴻章自己，亦出自曾國藩的幕府，因曾國藩之保薦而出任江蘇巡撫，最後其勛業與名位且與曾國藩相埒，即是最顯著的事例。這篇文章由薛福成代筆而以李鴻章的名義出奏，以這二人與曾國藩關係之深，經由他們所說出來的這一番話，自更具有特別的意義。而曾國藩在太平軍作戰的軍事貢獻方面，除此之外，尚有更重要的兩點。其一是他在湘軍訓練規制等方面的擘畫經營，其二是他對于當前作戰情勢的正確判斷，都是值得特別推崇的。

湘軍之興，是由於曾國藩深切了解綠營軍隊兵將不相習，及將不知兵，兵不用命等積弊，所以要以招募鄉農加以訓練的辦法來代替不可用的綠營兵。他所規定的湘軍營制，大致倣效明朝平倭名將戚繼光的成法，募兵必須挑選樸實誠篤的鄉農，不用市井浮滑之人。凡大帥欲新立一軍，則先摠定統領數人，檄令自行召募若干營。其營官即由統領挑選，一營分四哨，哨官由營官挑補。哨轄八隊，每隊十人，其隊長亦即由哨官挑補。在這種制度之下，勇丁由隊長挑選，隊長由哨官挑選，哨官由營官挑選，營官由統領挑選，兵由將招，彼此之間都有著同鄉同里或相同的宗族關係，自必能團結一致，樂於接受其主將之領導統馭，臨敵爭先，雖死不相棄。他所定的營規，一是重紀律，二是培養士兵的良好人格，三是嚴訓練，四是熟技藝，其辦法簡單扼要而切實有效。經由這種方法訓練出來的軍隊，言忠勇則慷慨赴戰，矢死靡他，其英風浩氣，迥非尋常意度可及。言勤儉，則士兵於戰守的餘暇尚且利用時間養豬種菜，一方面增加收入，一方面不脫鄉間農夫的本色。言樸誠，則菲衣惡食，屏絕浮華，但講實際而不事虛文。古來名

將之治軍，大都只做到精操練，明節制，倡勇敢等等能事而已；很少能像曾國藩那樣，既把士兵訓練成一個善戰的勇士，更把他們養成一個堂堂正正的人。就這些方面而言，曾國藩的成就，就足以超越常人了。

以上所說，乃是曾國藩在湘軍營制、訓練等方面的卓越貢獻；至於他在作戰情勢方面的正確判斷，有時往往足以使卓越的軍事大家亦自嘆弗如。例如他在太平天國之亂時所部署的戰略原則，就是十分令人心折的。

清文宗咸豐十年閏三月。太平軍的忠王李秀成以圍魏救趙之法，由寧國廣德疾趨浙西，突然攻佔了清軍江南大營的後路糧餉重地杭州，江南大營的督師欽差大臣和春急命提督張玉良分兵前往救援。甫抵杭州，迅速攻抵江南大營的後路。此時南京城中的太平軍亦以全力出兵夾擊李秀成已以全師取道湖州，在東西夾攻之下，江南大營頓時崩潰，圍困南京數年的三百餘營清兵，全部瓦解，蘇常精華之地亦盡皆失陷於太平軍之手，戰局頓時逆轉。曾國藩於此時奉皇帝之命，受任爲兩江總督，責令務必不避艱險，迅速前進，以收復失陷地方，重整軍威。於是，曾國藩奏上「通籌全局，並辦理大概情形」一摺，提出了他對挽回局勢的全面戰略部署。他說：

「竊以爲蘇常未失，卽宜提兵赴援，冀保完善之區；蘇常旣失，則須通籌各路全局，擇下手之要著，求立脚之根本。自古平江南之賊，必踞上源之勢，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自咸豐三年金陵被陷，向榮和春皆督軍由東面進攻，原欲屏蔽蘇浙，因時制宜。而屢進屢挫，迄不能克金陵而

轉失蘇常，非兵力之尚單，實形勢之未得也。今東南決裂，賊燄益張，欲復蘇常，南軍須從浙而入，北軍須從金陵而入。欲復金陵，北岸則須先克安慶和州，南岸則須先克池州蕪湖，庶上制下之勢。若仍從東路入手，內外主客，形勢全失，必至仍蹈覆轍，終無了期。」

自從曾國藩受任爲兩江總督，奉命總統蘇皖浙贛四省軍務之後，平定太平天國之亂的大職，就開始落在他的頭上。而他從這一時期起，著著展開十道分進，對太平天國實行全面圍剿的大包圍戰略，即是此一奏疏之引伸。他能够在受任主帥之初，便確定了全面圍剿的戰略原則，已經很不容易。而太平天國方面的領軍主帥忠王李秀成與英王陳玉成二人亦非弱者，他們在知悉了曾國藩所部署的此一戰略原則之後，立即採取大規模的迂迴進擊，以求打破曾國藩策劃的戰略部署。於是，一方面是力求保持合圍形勢之完整，一方面則力求牽制突破，自咸豐十年至十一年，雙方的戰事十分激烈。太平軍憑藉了他們的人數衆多，分路向清兵猛攻，著著獲勝。身爲總制四省軍務的主帥，自然有責任及時救援。但成問題的是，曾國藩所賴以向太平天國進攻的湘軍兵力，不過只有數萬之衆，而且大部分都被放在對安慶城的圍攻及牽制的位置上。如果安慶之圍一撤，分進合圍的戰略部署立將瓦解；但如不撤安慶之圍，對於流突各省的太平軍又將如何應付？這就是極大的難題了。也正因爲此時的局勢，面臨禍機四伏的嚴重關頭，何去何從，取捨爲難，在這裏乃顯出了曾國藩的非凡睿智與毅力。

薛福成庸菴文編「書陳玉成苗沛霖伏誅事」記蘇常既陷之後，雙方的軍事情勢云：

「蘇常諸郡皆陷，於是道員今戚毅伯宮保曾桐城禦援賊，至金陵，李勇毅公續宜以萬人駐青草塘爲兩水師將楊岳斌扼駐濱江要隘，並助守圍軍內外長掃境而至，與多公李公鏖戰於挂車河，大敗，進薄圍軍，不克。玉成私念：湖北江西乃楚軍根本，衝其腹心，必撤圍自救。乃從英霍間道入犯湖北，連陷黃州、德安、隨州，武漢襄樊皆大震。嗾悍酋李世賢黃文金各挾其全部，躪徽饒信古安瑞州，以逼南昌九江，皆援安慶也。曾公胡公分遣諸軍，且防且戰，竟不撤圍軍。玉成乃分黨踞所陷城，自率悍賊東援安慶。多公潛擊於高河舖，於挂車河，皆大敗之。玉成之黨入自集賢關，築壘菱湖赤岡嶺以圍我圍軍。曾公憑濠拒賊，與鮑公軍夾擊，破賊四壘。賊將劉瑞林跳而逸，水師擒磔之。復展外濠，環賊十八壘於圍內，俘斬無脫者。瑢林，玉成部下驍將也。既失之，軍勢遂不振，告急金陵。金陵賊益縱，玉成復率楊輔清等三僞王分援安慶桐城，晝夜疾鬬，屢進屢北，賊衆崩潰。其江西賊則左文襄（左宗棠）公以一軍突起，鮑公亦以全軍馳往，遄與賊遇，大敗之於樂平，於景德鎮，於豐城，於河口。蔡賊失勢東遁，官軍遂拔安慶桐城，徇瀕江郡縣，皆下之。」

這一段文字，概述咸豐十、十一年之間，太平軍與清軍兩方爲解安慶之圍及堅圍不去而激烈進行的包圍與反包圍戰，雖稱簡明扼要，而對於當時曾國藩自己所處的情勢如何，則並未述及，

仍須參看薛福成代李鴻章所擬的「奏陳督臣忠勳事實」一疏中所述的這方面情形，以爲補充。薛文敍此，云：

「當此之時，賊勢如飄風疾雨，蹂躪大江南北，幾無完土，蘇皖二省，糜爛尤甚。曾國藩於無可籌措之時，多方布置，奏薦左宗棠襄助軍務，募勇湖南，徵鮑超於皖北，調蔣益澧於廣西，自率所部萬人，馳入祁門。甫接皖防，而徽寧復陷，諸路悍賊，麕集祁門左右，疊進環攻，幾有應接不暇之勢。曾國藩示以鎭靜，激厲諸將，晝夜苦戰，相持數月之久，賊望風授馘，喪膽亡魂，自是軍威大振，而時局遂有轉機矣。」

這所云曾國藩「定計不撤安慶之圍」，及「自率所部萬人，馳入祁門」，就是他在祁門受困的那一段事了。祁門之困，最足看出曾國藩臨危不亂與堅忍強毅的性格。江蘇巡撫何璟於曾國藩逝世後奏陳其生平功績，其中曾經述及曾國藩受困祁門時的情形說：

「逮咸豐十年，初膺江督，進駐祁門。正值蘇常新陷，浙省再淪，皖南皖北，十室九空，人煙稀少。軍糧則半菽難求，轉運則一夫難雇。自金陵以至徽州八百餘里，無處無賊，無日無戰。徽州之方陷也，休祁大震，江鄂皆駭。或勸移營江西省城，以保餉源，或勸移營江干州縣，以通糧路，而仍不出江西，不進兵，遇險卽退，後事何可言？吾去此一步無死所也！」羣賊既至，晝夜環攻，飛砲雨集。曾國藩手書遺囑，帳懸佩刀，猶復從容布置，不改常度。死守彌旬，直待鮑超率霆軍自山外來，始以一戰驅賊出嶺。」

曾國藩以祁門爲統帥大營的所在地，本是極大的錯誤。因爲祁門不但位於羣山之中，糧運不便，而且其地形如處釜底，極爲不利。曾國藩在此受困而居然不曾被太平軍所破，實在是一項奇蹟。若說此戰之所以終能扭轉局勢，便是由於曾國藩之堅守不屈，未免跡涉誇張。此時若不是有鮑超一軍適時來援，曾國藩的大營是否終能免於太平軍的毒手，誰也沒有這個把握。於此，我們除了佩服曾國藩堅忍不拔的强毅精神外，還得再度贊同曾國藩自己所說的話——不信書，信運氣。而曾國藩在如此重要的危急存亡關頭，不但堅守不屈，而且神定氣閒，不改常度，這種迥出尋常的定性與耐力，便不能不使人由衷的敬佩了。

曾國藩在祁門被困，亦正是曾國荃圍攻安慶之役受到嚴重考驗的時候。兄弟二人同處危地，彼此懸念，在曾國藩手書日記及家信中時常可以看見這方面的記載。由於曾國荃之一再勸請移營以策安全，曾國藩亦覺得必需抽調鮑超一軍前往增援安慶方面的圍師，因此方於咸豐十一年的三月二十六日，將大營由祁門移駐東流，鮑超一軍，亦因之而渡江北調，協助曾國荃攻剿的英王陳玉成。鮑超與多隆阿，乃是當時清軍中最著名的戰將，素有「多龍鮑虎」之稱。多隆阿守在廬州牽制陳玉成的行動，已使陳玉成頭痛萬分，如今再加上這支驍悍驁猛的「鮑癩頭狗」，自然更使陳玉成無所施其手足。在遭遇了一連串的敗衄之後，陳玉成所部的數十萬太平軍崩潰瓦解，安慶亦於咸豐十一年的八月間爲清軍所攻克。一場驚心動魄的包圍與反包圍之戰，總算在曾家兄弟堅守戰略部署，絕不因情勢危急而動搖決心的情況之下，得到了最後的勝利。安慶既克，

清軍分水陸兩途沿長江而下，直抵南京城外的雨花臺，開始另一場圍攻南京之戰。這一場戰爭的艱險困難，比之圍攻安慶之役，有過之而無不及。江蘇巡撫何環疏中敘此，云：

「咸豐十一年八月，克復安慶。同治元年，水陸兩軍，並江而下，沿江三千里名城要隘，皆為我有。其弟國荃統得勝之師，直抵雨花臺以瞰金陵。左宗棠統楚軍以達浙境，李鴻章統淮軍以達滬上，皆深入虎穴，捷報頻聞。夏秋之間，兵機遂大順矣。乃攻剿甫利，而疾疫流行。上自藩湖，下至上海，無營不病，不但守壘無勇，幾於炊爨無夫。楊岳斌曾國荃鮑超諸統將，各抱重病。昔之勁兵，皆變羸卒。蘇浙賊酋方以此時大舉以援金陵，圍攻雨花臺四十六晝夜，更番不歇。南岸則寧國旌德同時吃緊，北岸則潁宿蒙亳捻匪出巢，正陽壽州苗捻復叛，髮賊又由湖滁和巢含亦復岌岌可危。數年以來，辛苦戰爭之土地，由尺寸而擴至數百里者，深恐一旦潰裂，盡隳全功，援浙救蘇保江三者又復衆顧，時危勢亟，軍情反覆，異議環生。有謂金陵進兵太早，必致師老餉竭者；有謂宜撤金陵之圍，以退各路援賊者。曾國藩於羣言淆亂之際，有三軍不奪之志，枕戈臥薪，堅忍卓絕，卒能以寡禦衆，出死入生……」

自安慶克復，及左宗棠李鴻章分別在浙江江蘇二省連獲勝捷，曾國荃又在南京城下紮下大營之後，清軍對太平天國的三路合圍形勢，實際上已經完成，太平天國大小兵將，並沒有人甘心坐以待斃。在太平天國後期名將忠王李秀成的統率之下，仍有戰兵數十萬可供最後的生死搏鬪。於是就出現了何環盡頭了。但話雖如此，自天王洪秀全以下的太平天國

疏中所說的情形——李秀成調集了江浙各地的勁兵勇將，大舉圍攻紮營於雨花臺的曾國荃軍，歷時四十六日不休。此時的情況，各路情勢同時告急，與上一年間太平軍英王陳玉成爲解安慶之圍而發動的全面攻勢，差相彷彿。曾國荃在雨花臺憑壘而守，浴血抵擋太平軍的猛烈進攻，無論在局中人或局外人來看，這都是一場慘烈無比的大屠殺。曾國藩身爲曾國荃的親兄，兼爲統率四省軍務的主帥，公誼私情，都分外關切，自必更爲圍城之師的安危問題感到焦心憂慮。最後，李秀成的攻勢雖然失敗，曾國荃軍亦傷亡慘重，筋疲力盡。而南京城大而堅，曾國荃一時難以攻克。頓兵堅城，師老無功，大爲兵家之忌，曾國藩因此而更感憂心忡忡。近年所發現的曾國藩未刊家書原件中，有此時寫與曾國荃的三封信，主張將業已攻克蘇常而頓兵不進的李鴻章所部淮軍，調到南京來與曾國荃協同進攻。這是因爲曾國藩知道曾國荃軍中缺乏攻城用的西洋大砲，徒恃圍困及開地道之法，一時決難收功，所以打算將擁有西洋大砲甚多的淮軍調來協助，以期一舉而克。但如此一來，勢必要令淮軍分享攻克金陵的大功，這是曾國荃所極不願意的。而李鴻章在蘇常大勝之後，氣燄甚高，如再分享克復南京之功，勢必使曾國荃的聲名受到挫抑。爲了顧及這方面的種種關係，他必須先徵得曾國荃的同意之後，方纔可將淮軍調來。在這幾封信中，我們乃可看出曾國藩爲了協調雙方關係所費的苦心。如同治三年五月十六日信云：

「夜來細思，少泉會剿金陵，好處甚多，其不好處不過分佔美名而已。後之論者曰，潤（胡潤芝，卽胡林翼）克鄂省，迪（李迪菴，卽李續賓）克九江，沅（曾沅甫，卽曾國荃）克安慶，

少泉（李鴻章）克蘇州；季高（左宗棠）克杭州，金陵一城，沅與泉各克其半而後爲美名哉？人又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名哉？如弟必不求助於人，遷延日久，肝愈燥，脾愈弱，必成內傷，兄弟二人皆將後悔。不如及今決計，不著痕跡。

由此信可以知道，曾國荃因南京久攻不下之故，此時已因急躁而致肝病。曾國藩一方面顧及其弟之病勢或致增劇，一方面又因輿論之責難而必須設法早日收功。於是乃多方勸譬，希望曾國荃能够接納他的意見，同意將淮軍調來協攻。就當時情勢而言，蘇常既下，南京已無勁敵，則以械精兵强的淮軍調來協攻南京，一方面可以使曾國荃的疲憊之師得以少紓責任，二方面亦可提早結束曠日持久的南京圍城之戰，實爲事理之當然。但曾國荃是他親弟，李鴻章是他的門生，如果未經雙方同意，遽以統帥的名義下達命令，一旦造成嫌隙，其後果亦甚嚴重。所以他要以私信諄諄勸說，譬之以兄弟感情，務期曾國荃不以個人功名爲重，其立場之公正與籌劃之明白，十分令人佩服。此事雖因曾國荃之堅決反對，以及我們若回溯曾國藩自創辦團練以來時刻縈繞在念的戒愼戒懼心理，便可以對曾國藩與曾國荃之不同，得到更多的瞭解。

曾國藩年譜卷一，敍曾國藩在咸豐二年於湖南湘鄉原籍接奉上諭，令與巡撫張亮基同辦本省團練事宜時的情形，說：

「公奉到寄諭，草疏懇請在家終制，並具呈請巡撫張公代奏。繕就未發，適張公以專弁函致公，告武漢失守，人心惶恐，懇公一出。郭公嵩燾至公家，力勸出保桑梓。公乃燬前疏，於十七日啓行，二十一日抵長沙，與張公亮基籌商，一以查辦匪徒爲急務。」

咸豐二年十二月，曾國藩奏上「遵旨籌辦團練查匪事務，敬陳現辦大概規模」一疏，另附「辦團稍有規模即乞守制片」，中云：

「今回籍未滿四月，遽棄庭闈而出涖事，不特臣心萬分不忍，即臣父亦慈愛難離。而以武昌警急，宵旰憂勞之時，又不敢不出而分任其責。再四思維，以墨絰而保護桑梓則可，若遂因此而奪情出仕，或因此而仰邀恩敍則萬不可。區區愚衷，不得不預陳於聖主之前。一俟賊氛稍息，團防之事辦有頭緒，即當專摺陳請回籍守制。烏鳥之情，伏乞聖上矜全。」

由這兩條記載可以知道，曾國藩之所以出山，實在是爲了保護桑梓起見。所以他不但事先奏明不肯接受恩敍，並且希望在事情稍有頭緒之後，仍能回籍爲亡母守喪終制。其後曾國藩在靖港兵敗，被革去侍郎之職。湘潭之捷，再奉旨賞給三品頂戴。曾國藩於此時上奏謝恩，順便再申前請：「嗣後湖南一軍或得克復城池，再立功績，無論何項褒榮，何項議敍，微臣概不敢受。伏求皇上俯鑒愚忱，使居憂之人與在任者顯示區別，不得一例希榮，是即聖朝敎孝之意，而皇上所以成全微臣者更大也。」此奏所奉的皇帝硃批，是：

「知道了，殊不必如此固執。汝能國爾忘家，鞠躬盡瘁，正可慰汝亡親之志，盡孝之道，莫

大於是。酬庸恩續，國家政令所在，斷不能因汝之請，稍有參差。汝之隱衷，朕知之，天下無不知也。」

這是說皇帝並不接受他的請求，同意即有功績亦不予以恩敍。所以到了武漢克復，皇帝降旨令曾國藩署理湖北巡撫之後，旋又降旨撤回前旨，改命以兵部侍郎銜督師東下。然而曾國藩已有請辭署撫之奏，皇帝批曰：

「朕料汝必辭，又念及整師東下，署撫空有其名，故又降旨令汝署湖北巡撫，賞給兵部侍郎銜。汝此奏雖不盡屬固執，然官銜竟不書署撫，好名之過尚小，違旨之罪甚大，着嚴行申飭。」

儘管皇帝責備他存有「好名」之心，在曾國藩自己，仍然有我行我素的決心。咸豐七年正月，曾國藩方在江西南昌軍次，他的父親麟書亦在湘鄉原籍病故了。他接到這一信息之後，立即報請丁憂，並且不待奏准，拜疏即行。旋奉皇帝上諭，云：

「該侍郎現在江西督師，軍務正當吃緊。古人墨絰從戎，原可奪情不令回籍。惟念該侍郎素性拘謹，前因母喪未終，授以官職，具疏力辭。今丁父憂，若不令其奔喪回籍，非所以遂其孝思。曾國藩着賞假三個月回籍治喪，俟假滿後再赴江西督辦軍務，以示體恤。」

雖然皇帝只准他請三個月的喪假而不准他在家中守制終喪，曾國藩仍然堅持前請，不肯在三個月假滿之後仍舊回到江西去督師。皇帝素知國藩拘謹，竟亦不能強。直到咸豐八年五月，因浙江軍務緊急，皇帝再降諭旨，令曾國藩前往督辦浙江軍務。諭旨中說：

「該侍郎前此墨絰從戎，不辭勞瘁，朕所深悉。現當浙省軍務吃緊之時，諒能仰體朕意，毋負委任。」

在這種情形之下，曾國藩不得不勉遵諭旨，出任浙江軍務。皇帝之所以一再不允令曾國藩在籍終制，在咸豐八年，則浙江江西方面的前敵將領均是曾國藩的部屬，若無曾國藩的統率，勢難收同心協力之效。至咸豐十年閏三月江南大營兵潰，南京以東，已無可用之兵，曾國藩出來擔任進討太平天國的主帥不可了。由這些地方可以知道，曾國藩之所以兵之大任，又被皇帝特任爲兼轄四省的領軍大帥兼兩江總督，完全是由于當前的情勢迫得滿清皇帝非把四省的兵權、財政權、和行政權完全交付給他不行。而在曾國藩自己，則非但對這樣的高官顯宦並無希慕之心，對于自己的權位日隆，反而頻添戒愼戒懼之心。這在曾國藩的家書中多有記載，可以明顯的看得出來。凡此俱可以使我們瞭解曾國藩曾國荃兄弟之不同，亦之所以爲曾國藩。如同治元年六月廿日致沅甫弟書云：

「阿兄忝竊高位，又竊虛名，時時有顚墜之虞。吾通閱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權勢，能保全善終者極少。深恐吾全盛之時，不克蔭庇弟等；吾顚隮之際，或致連累弟等。惟於無事時常以危詞苦語互相勸誡，庶幾免於大戾耳。」

又同治二年正月十七日致沅弟書云：

「處大位大權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減去幾成，則晚節可以漸漸收場耳。」

又同月十八日致沅弟書云：

「弟之志事，頗近春夏發舒之氣；余之志事，乃厚。平日最好昔人『花未全開月未圓』七字，以爲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余意以收斂而生機乃旺，精于此。曾屢次以此七字教誡春霆，不知與弟道及否？」

又同治二年四月廿七日致沅弟書云：

「來信『亂世功名之際頗爲難處』十字，實獲我心。本日余有一片，亦請將欽篆督篆二者分出一席，另簡大員來遇有機緣，即便抽身引退，庶幾善始善終，免蹈大戾乎？」

曾國荃在功名事業漸臻全盛的時候，猶存有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心念，這與曾國藩之憂讒畏譏，時懼盈滿的想法，恰成强烈的對比。所以曾國藩在寫給曾國荃的信中，要時時以此爲戒，他自己更是身體力行，切實履踐，足可令人相信，曾國藩確是志在救國救民而不願做大官的人物。所以他纔在這些地方勘得破，認得清。若是他在一開始便存有圖功名謀富貴的想法，此時就決沒有這種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戒懼心情了。

他在削平太平天國之亂，湘軍聲威達於極盛之時，毅然以「湘軍作戰年久，暮氣已深」爲理

由，奏請將湘軍裁遣歸里，明白表示他無意拔宅權以自重的態度，固然令人覺得他不免有要甚之處，而他這種脫屣權力與漠視富貴的光明磊落態度，畢竟是令人萬分欽敬的。至於說，他在領軍作戰時何以一再請求爲父母服喪終制，而在戰事終了之後何以又不再重申請呢？這一點，仍然與他當時的憂畏態度有密切關係。

曾國藩在削平太平天國之亂後，皇帝封他爲一等毅勇侯，世襲罔替。他是事實上的湘軍領袖，凡是湘軍出身的將領，無論是執掌兵權抑或出任疆圻，都視他爲精神上思想上的領導者。而湘軍在裁遣之後，被裁者多至數萬，功名路斷，難免有很多人感到心懷不滿。曾國藩如果在此時請求解官回籍終制，皇帝當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如他在回到鄉間之後，以一個在籍鄉紳的地位，忽然爲一羣圖謀不逞之人所挾制，並奉之爲領袖人物，即使曾國藩知所自處，而對清朝政府來說，也仍然不是保全功臣之道。如果滿清政府懷有過分的恐懼，以爲曾國藩之辭卸官職，正表示他有不願繼續爲朝廷效力的意願，那就更容易發生不必要的猜忌了。所以，曾國藩在此時一方面自動解除兵柄，一方面更留在兩江總督任上繼續爲清政府絕對感覺放心的最好辦法。試看他在兩江總督任內因奉旨剿捻而不以勞苦爲辭，逢到軍事失利，立即趁機推薦李鴻章自代，亦無非仍是遠權勢而避嫌疑的作法，不過在表面上不太顯露痕跡而已。至此，我們當然要相信曾國藩之功成不居與遠嫌避位，正是他的一貫作風了。

曾國藩說：「歲大位大權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這確是帝王專制時代

的殘酷現實。曾國藩熟讀歷史，所以他能在歷史事實上看出這明白的教訓。除此之外，則他在儒家思想中所陶冶出來的立身態度，對此亦甚有關係。曾國藩家書卷一，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八日致諸弟書云：

「吾輩讀書，只有兩事。一者進德之事，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以圖無忝所生。一者修業之事，操習乎記誦詞章之術，以圖自衞其身。」

在這番話中可以看出，曾國藩在功名事業之外，極其重視進德修業之事，以爲如此方能無忝其所生。這還是他在初爲翰林時的思想。及至晚年，功業已成，身名俱泰，他所時切在念的仍是他自己的德行與學問。如同治八年八月日記云：

「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學業既一無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叢集，自顧竟無湔除改徙之時，憂媿曷已！」

「念生平所作事，錯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學問一無可取，後世將譏議交加，悅悔無及。」

曾國藩的道德文章，即使不能說是千古以來所罕有，至少在清代是第一流的人物。尤其是在道光咸豐以後，世風日下，人心日偸，整個國家社會都有分崩離析之危險的時候，竟然能有曾國藩這樣一個節行文章俱屬卓犖不凡的人出來挽救國家危亡，轉移社會風氣，實在可說是國家與人民的福分，曾國藩如此的過份謙抑自咎，適足以使人覺得他的成就太不平凡，他的偉大太難以企

及。曾國藩全集卷四，「湘鄉昭忠祠記」中的一段話，頗可以看出他自己的抱負。文曰：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爲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于亡等之欲，姦僞相吞，變詐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僞而崇拙，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遠遊之還鄉而無所顧悸。由是衆人效其所爲，亦皆以苟活爲羞，以避事爲恥。嗚呼！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羣倫，歷九載而戡大亂，非拙且誠者之效歟？」

他在這一段文字中所提出的「誠」「拙」二字，正是他自己所用來鼓舞人心與轉移風氣的特性。薛福成所撰「代李伯相擬陳督臣忠勤事實疏」中亦曾說到這點，而且特別加以强調，云：

「曾國藩自通籍後服官侍從，卽與大學士倭仁、前侍郎吳廷棟，故太常寺卿唐鑑，故道員何桂珍，講求先儒之書，剖析義理，宗旨極爲純正，其清修亮節，已震一時。平時制行甚嚴，而不事表襮於外，立身甚恕，而不務求備於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無前人講學之流弊。繼乃不輕立說，專務躬行，進德尤猛。其在軍在官，勤以率下，則無間昕宵，儉以奉身，則不殊寒素，久爲衆所共見。其素所自勗而勗人者，尤以畏難取巧爲深戒，雖禍患在前，謗議在後，亦毅然赴之而不顧。與人共事，論功則推以讓人，任勞則引爲己責。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繼而同僚諒之，終則各省從而慕效之。所以轉移風氣者在此，所以宏濟艱難者亦在此！」

看了這一番話，我們對于曾國藩何以能在天下大亂之時倡導羣倫，創下這一番廻天事業的原

因所在，亦可以得到一個明確的概念了。

近人黃濬所撰花隨人聖盦摭憶，中有一條說：

「當道、咸、同之間，外人已有疑中國必亡者。歐洲之謂中國卽一陵夷衰微終至敗亡之國，人有幼年、壯年、老年，一息待盡之年　國亦有之。歐洲之謂中國卽一陵夷衰微終至敗亡之國，蓋彼見中國古所今多湮塞，昔所傳金石土木之工，堅緻鉅麗，今疏鑿之洪流巨川，四通八達者，日祇有遺跡，剝落損壞，無復完美，且作法多有失傳者。中國古昔之盛，與近今之衰，判若霄壤，遂疑中國精力業已銷鑠殆盡，將近末造，難支他國爭勝之勢。道光十九年，有英國著名之使臣，深知中國之先者。其言以爲：中國雖疆圉廣闊，外無異國覬覦食，內無土寇鴟張，然其中實有潰敗決裂之象，不過略遲而已。其意見如是。而彼時意見相同者，不乏其人。大抵歐洲皆以道光末年爲中國危險之時，苟易新君新政，略有缺失，卽恐災害並至。縱使幸而無事，終多變故之迭生。蓋當時覘國者，已極爲中國危。所謂潰敗決裂者，已不能不謂爲知微之論。然道光以來。中國雖大亂而未嘗亡，所以不亡之理由，正在於別有曾、左、李、沈諸賢，明白而剛强者，力爲支拄之。有如此之人，國自不易亡。及其後不修內政，但知昌言撻伐，而禍變愈深。蓋明白人愈少，則國始易亡也。」

黃濬以爲中國當道光、咸豐之際已有潰敗決裂之象，賴有曾國藩等一班明白事理之人出來支拄大局，始能轉危爲安，這話並未完全說對。我們研究曾國藩的傳記可以知道，曾國藩之所以能

够在國家大亂時挽狂瀾於既倒，第一個原因是他有儒家的倫理思想爲精神上的中心憑藉，第二個原因是他能以道德與精神之力感召他人與之羣策羣力。外國人觀察道光末年的時局，只看到表面上的分崩離析現象，而不知道儒家的倫理道德思想久已成爲中國社會的維繫力量，只是在人心陷溺，道德淪喪的惡劣環境中暫時被大多數人所忽視而已。而一旦到了社會動亂，國家將亡的嚴重關頭，能有曾國藩這樣樸實誠拙的人出來力爲天下人之倡，就能够使道德與人心重新滌垢磨光，再度成爲精神上的主宰。這是儒家思想的偉大之處，也是曾國藩所賴以成功的主要原因。外國人不能瞭解儒家思想，自更不懂得儒家思想對於中國社會所發生的影響力量之大。讀曾國藩的傳記與他平定太平天國之亂的歷史，我們身爲中國人者，應當對此多所留意。

以上所說，乃是曾國藩平定太平天國而使中國歷史在咸豐同治以後爲之完全改觀的影響。至於在平定太平天國之外，曾國藩在中國近代歷史上還有那一些另外的影響？則可以簡單地述說如下：

第一，是他在當時目擊西方輪船大砲之厲害，深知欲圖抵禦外侮，非整頓海陸軍不可；欲整頓海陸軍，又非學習外國軍制及改用洋槍大砲及輪船不可。但洋槍大砲及輪船都是外國製造的東西，決不可專恃金錢購買，則欲圖自强，尤非學習科技知識及培養人材不可。由于此一思想，所以他在同治四年奏設江南製造局，以爲自製兵械及機器之入手；更於局中附設學堂，以西方的格致算學之類教授生徒，是爲中國科學教育之萌芽。其後又以此爲未足，於是又有考選學生出國留

學之舉。凡此俱是同光以來自強維新運動之張本，而由曾國藩肇其端倪。對于中國的西化運動，影響不小。

第二，是由于他樸實誠拙的美德完全出於至性流露，其勤勞節儉的高尚品格又終生躬行不懈，故而在他的領導統率之下，僚友屬吏，均爲他的精誠感召所同化。一時之間，蔚成勤樸廉儉的政風。同治、光緒年間，大亂初平，政治上頗曾出現一股返淳歸樸的清新氣象，即由于此種影響所致。

說到這裏，我們還可以再舉出一些曾國藩的節儉美德來，在此附帶一述。曾國藩生平行事之處，芬所撰的崇德老人八十自訂年譜，中有記述曾國藩生平行事之處，云：

「文正官京師時，俸入無多，每年節醬以奉重堂甘旨，爲數甚微。治軍之日，亦儘年寄十金二十金至家。及功成位顯，而麗亭公已薨，故尤不肯付家中以巨貲。至直督任時，始積俸銀二萬金。比及薨逝，惠敏秉承遺志，謝却賄賂，僅收門生故吏所醵奠之刻全集費，略有餘裕，合以俸餘，粗得略置田宅。」

「文正手諭，嫁女奩資不得逾二百金。歐陽夫人遣嫁四姐時，猶恪遵成法。忠襄公（即曾國荃）聞而異之。曰：『烏有此事？』發箱奩而驗之，果信。再三嗟嘆，以爲實難敷用，因更贈四百金。」

官居一品，位至爵相，而所積之財產淺薄如此，嫁女之奩資又微薄如此，實在大可以勵習俗

而風末世。何況他的一生，學問事功，俱臻極致，元度之要讚他爲三德行之美，又足可與之鼎足而三。此外的讚譽尚多，限於篇幅，不一縷舉。

曾國藩死於清同治十一年，享壽止六十二歲。至於致病之因，大概還是由于心臟衰弱而突然致死。此照他臨死時的情形看，他的死因，年常有舌蹇心悸之症，終致於後來之心臟衰弱，猝然不起。在曾國藩的同輩諸人中，他在帶兵作戰時期的過分勞瘁及憂因患肺病而早死外，左宗棠壽至七十三，彭玉麟、駱秉章俱壽七十五，楊岳斌亦逾七十。自古憂能傷人，看曾國藩日記，每當前方軍事緊急及時局危殆，常有憂懼不勝的記載。可知除了胡林翼能克享大年，正坐此故。由這些地方更可使我們相信，曾國藩實在是爲國家民族而無保留地貢獻了他的生命。曾國藩之偉大，僅此一點，就不是他人所能及的了。

胡林翼

在沒有進入本題之前，我想先引述一段與本題頗有關聯的文字。黃濬撰花隨人聖盦摭憶中有一條說：

「一代之風尚興衰，肇端至遠，而造因甚微。讀書論世，正貴窮源竟委。清至乾隆末年，政治已壞，識者早知其必大亂。然迹其間撥亂之才亦相踵俱出，淵源倚伏，殆甚遼遠。例如金田之役由于嘉道秕政所激成，而二三老輩，所以隄成培助曾左諸人者，亦正在此時。湘軍雖起自曾左，而砥礪賢才，則始自賀耦耕（賀長齡）、陶文毅（陶澍）、林文忠（林則徐）等，相與提倡。耦耕刊經世文編一書，三湘學人，誦習成風，士皆有用世之志。左季高（即左宗棠）、羅山（即羅澤南）等，所由興起，而左之讀書，皆賀回里長書院時所資助。胡文忠爲陶文毅之婿，曾文正亦敬事耦耕。而文毅言左文襄（左宗棠）之才於林文忠，文忠自兩廣交卸，特紆道長沙訪左。時文襄尚爲舉人，文忠於嶽麓傾談竟曉，許爲異日濟時之才，訂交而別，事見文襄年譜。於此皆可見老成誘掖，豪俊景從，而皆難能可貴。雖其納交初心，未必便爲撥亂計，按之事實，却可謂醫濟之儲，黨援之雅也。」

這一段話敍述曾國藩左宗棠之所以能在國家大亂時出任艱巨，戡定大難，以爲齡之提倡經世實用之學於先，陶澍林則徐等人獎借扶掖於後，誠然極有道理；但在左宗棠的關係之間，還漏掉了一個極爲重要的居間推薦引見之人，是卽本文所要介紹的胡林翼，亦卽前文中所稱述的「胡文忠」。陶澍和林則徐在左宗棠還只是一名落第舉人時，就預見其人將來必爲濟世之長才，在黃濬看來已是極爲難能可貴；而胡林翼在陶林二人尙未發現左宗棠的才幹之前，便已知道他的才具卓越，更亟亟爲之攀揚汲引，這種識英雄於未遇的眼光，豈不更令人欽敬佩服麼？胡林翼之所以被譽爲淸代咸同中興的三大名臣之一，在這裏已可看出其端倪。更何況又足以與曾國藩左宗棠相互伯仲呢？

胡林翼，字貺生，一字潤芝，湖南益陽縣長岡村人。淸仁宗嘉慶十七年生。在曾左胡三人之中，曾國藩嘉慶十六年生，左宗棠嘉慶十七年十月生。胡林翼嘉慶十七年之間，眞合上「山川毓秀，大名臣，不但同爲湖南人，而且同生於嘉慶十六十七年之間，眞合上「山川毓秀，那句古話了。在三人之中，胡林翼家顯達最早，其父達源，以嘉慶廿四年的探花仕事，在三家之中最稱貴顯。胡林翼自己，中道光十五年湖南鄉試舉人，道光十六年士。朝考入選第九名，改庶吉士。道光十八年庶吉士散館，考列一等第八名，授職這一年，曾國藩剛中進士，左宗棠則在道光十二年中舉之後屢試春官不第，始終還舉人的身份。比較起來，在三人之中，又以胡林翼之顯達爲最早。

清宣宗道光十九年大考翰詹，胡林翼考在二等。翌年三月，充會試同考官。六月，充江南鄉試副考官。清代的翰林官，有所謂紅翰林黑翰林之分。其「紅」「黑」之別，就看他是否能常得差使，如點派各省學政、鄉試考官，以及國史館、實錄館、方略館等處的纂修等等。差使多的，不但收入多，而且其姓名簡在帝心，升遷自然也快，數年不得一差，考試又常居中等以下，不但陞轉無望，而且貧寒徹骨，即就是所謂黑翰林了。反過來說，這就是所謂紅翰林了。胡林翼成了翰林之後，一參加大考就列爲二等，翌年又兩次被點派差使，其爲紅翰林可知。曾國藩在當年也是紅翰林，所以能在七年之中，就由從七品的翰林院檢討直陞至從二品的內閣學士。胡林翼同爲紅翰林，其前途之光明遠大，理應如曾國藩。但事實上却大謬不然。因爲他在江南鄉試副考官的任上出了毛病，回京之後，就奉旨降一級調用，由待陞的紅翰林降爲內閣中書。

不久又因丁父憂開缺回籍。等到他丁憂期滿可以復補官職，他的一班同年，有的已經陞得很高，即比他晚中進士的曾國藩，此時亦已陞爲翰林院侍講，高出內閣中書很多了。因此使他覺得心灰意懶，自感宦途蹭蹬，功名無望，頗有終老家居之想了。在此一時期之前，胡林翼以一個功名得意的宦家貴公子，生活豪奢，縱情聲色，很像是俗語所說的紈袴濶少。而經歷了這一番顚躓挫折之後，他在生活與思想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轉變。昔日的浮夸奢靡，一變而爲此後的沉著穩重，篤實老練。所以我們很可以這樣說，胡林翼的一生事業，並不始於他的中進士，點翰林，而是始於他之丁憂復起之後。

胡林翼在丁憂之前的原官是內閣中書，憂滿起復，如果仍舊到吏部去候缺補官，當然也只能補內閣中書。清代的內閣中書，秩從七品，其職掌只是撰擬詔書勅諭的文字。如果要由此循序陞遷至可當大任的京卿大員，道路也實在太遠。胡林翼最初之所以遲遲不肯復出，這也是主要的顧慮。及到後來，由於座師潘世恩，王植及林則徐等人的一再勸令復出，又有另一種力量從旁援手，遂使胡林翼決定改從他途發展。此事不但在胡林翼的一生事業中有決定性的影響，對清朝中國的前途，影響亦甚大。近人徐一士所撰「曾胡談薈」中有一段說：

「道光庚子，林翼以編修分校春闈。是年秋，復充江南副考官。正考官文慶，以携人入闈閱卷被劾，由侍郎降爲員外郎。林翼亦獲失察處分，降一級調用，逐出玉堂，改官內閣中書，甚佗傺無聊。其江南門生某氏，於會試時約集同年之有力者，謂我輩受兩座師之知遇，不宜恝然。文老師爲國家大臣，帝心簡在，且係旗籍，升途較速，不久當復柄用。胡老師以新進驟遭罣誤，恐將一蹶不振。而其才氣過人，苟爲外吏，必能有所建樹。惟家非素封，我輩盍有以助之？衆以爲然，遂醵資爲林翼捐知府。」[1]

這一段話，就是胡林翼在道光二十年援陝西捐輸例報捐知府分發貴州一事之所本了。梅英杰撰胡林翼年譜，引述胡林翼是年六月上其二叔之書敍此云：

「閏五月十九日到京，住鄭小珊宅中。京官所降之缺，年內可補，而升途甚遲，無以爲奉養計。現擬以知府發貴州，而陝西捐例甚貴，承師友許貸萬五千金。」

一萬五千兩銀子在當時不是一個小數目，而且文中尚有「承師友許貸」的話，想來這一筆捐官的銀子，也不是他在江南考官任內取中的那幾個舉人門生所能負擔得了的。胡林翼出身正途，曾官清華，其身份極高貴。只因不幸而遭罣誤，以致不得已而必需從捐官途上另求發展，實在是很難堪之事。但亦正因爲有這一番刺激，纔使他此後的功名事業前途，無寧倒正是一個很好的轉變。

流傳在清代末年的很多野史，都說胡林翼在青年時代會是一個放浪不羈的風流人物。相傳他在結婚以後，他的岳父陶澍在南京做兩江總督，胡林翼陪送岳母前往南京督署，順便就在岳家作客。目睹南京城中的六朝金粉，紙醉金迷，頓時使他的遊興大發，也忘記了他在南京是總督大人的嬌客身份，竟然在秦淮河釣魚巷等處的歌榭燈船中流連忘返起來。督署中的幕友，有人將此情形告知陶澍，意欲請陶澍加以督教制止。然而陶澍却說：「潤芝之才，他日爲國勤勞，將十倍於我。後此當無暇行樂。此時姑縱之，以預償其日後之勞也。」竟不加干涉。此事的眞實性不知究竟如何，但花隨人聖盦摭憶的作者黃濬曾引述其友人所告的胡林翼軼事，說，相傳胡林翼在中進士點翰林之後，仍然性好冶遊。一夕，方與周荇農同就某娼家，邏卒忽至，荇農機警，急避入廚房，易服爲庖人，得免被執。林翼與其他諸人不及走避者，皆被縶縛送兵馬司訊處。以係現任翰林故，恐受處分，不敢言眞姓名，因是頗受辱。及釋歸，即與荇農絕交，謂其臨難相棄，友道不終故也。荇農係湖南善化人，其後胡林翼治軍作戰，其軍中絕不用善化籍之人，即此之故云。這

些傳說彼此並不牴觸，當可使人相信，胡林翼從讀書時代以至作官入仕，始終都是放蕩不羈而性好冶遊的。而從他捐貲出任知府之後，就有了顯著的轉變，亦當可使人相信，此卽是由於他丁憂家居時期因思想性行有了不同變化而生的結果。

盛行於清代末年的捐官辦法，造成了制度之敗壞與吏治之貪濁，最爲清代政治上的大弊。然而亦正因爲有此一種辦法的存在，纔可以使胡林翼由一個待補缺的七品內閣中書，一下子超擢爲四品的知府。如其不然，胡林翼在仕途的淹蹇沉滯，眞不知要到那一年纔有出頭之日呢！

胡林翼在陝西賑災案內援例捐納爲知府，照例可以自行指定前往候補的省分。當時胡林翼所自行指定的，是貴州省。貴州素稱地瘠民貧，服官者視爲畏途，而胡林翼居然自請指分貴州，在當時人看來，自不免大感意外。清人嚴樹森所撰胡林翼年譜敍及此事，云：

「時龍山友人李如嵓留鄴門，問曰：『今有司之法，輸金爲吏者得自擇地，君何獨取於黔？』公曰：『天下官方，獨貴州州縣吏奉上以禮不以貨。某之出，資用皆他人助成之。竊念兩世受國恩遇，黔又先人某初爲政，此邦貧瘠，或可以保清白之風，而不致負良友厚意。』李公爲之起敬。」

另外則梅英杰所撰的胡林翼年譜中亦曾說到，胡林翼於道光二十七年將往貴州候補之先，「偏謁先塋，誓不取官中一錢自肥，以貽前人羞。」可見胡林翼之所以要指省貴州，正是希望要藉

貴州之貧瘠困窮及政多盤錯，來磨練他自己的志節。由于他的這種抱負，到貴州不久之後，他的聲譽就蒸蒸日上了。

發生在道光二十至二十一年的中英鴉片戰爭，暴露了老大中華帝國之積弱不振。當時中國雖然慘遭戰敗之痛，在位的道光皇帝却並不知道中國之所以戰敗，正是由于吏治窳敗及兵不能戰之故。他以爲鴉片戰爭之所以發生，乃是兩廣總督林則徐貪功生事，以致釀成戰釁。所以他後來對于廣東省屢次發生的仇英抗外事件，極爲畏懼，屢誡疆臣不可生事，以免再生外禍。流風所被，各省大吏承望風旨，惟以安靜不生事爲尚，於地方之禍機潛伏，盜賊滋蔓，多置不問。胡林翼於道光二十七年前往貴州候補，當時的貴州地方情形，就是如此。清人郭嵩燾所撰的胡文忠公行狀曾說：

「旋捐知府，分發貴州，署安順府事。道光之季，寇亂漸萌，嶺嶠以南，駱越滇黔諸山中，奸宄亡命，狐嘯梟嘯，四出剽掠，勾結營兵胥役爲黨羽，無敢捕治。安順，宋之普里部也，當雲南驛路，向有冒頂大五小五諸匪，聚衆爲姦暴。……調署鎮遠府，府境跨有撫沅，所屬皆苗猺，其臺拱、清江、黃平，皆盜藪，勢尤橫。……咸豐元年，補黎平府。府境毗連湖南粵西，山深箐密，盜出沒剽奪，捕之輒越境竄匿。……」

胡林翼自道光二十七年至貴州，歷署安順、鎮遠、思南三府知府，繼補黎平府知府，陞貴東道，至咸豐三年冬間，始奉旨率帶黔勇前往湖北，協助總督吳文鎔征討太平天國之亂，共計在貴

州的時間前後七年，凡四握郡篆。他之所以會在七年之中被貴州當局調來調去，無非因爲他在一到安順之後，就顯出了他的剿匪才能十分出衆，所以纔被貴州當局倚重，凡是那一處地方寇亂嚴重，就把胡林翼調去抵擋。而不管那個地方的寇亂嚴重到如何程度，只要胡林翼一去，無不在最短期間之內立奏敉平。由是他愈爲本省巡撫所重視，不但屢次奏保，而且在數年之內，由候補知府而補爲實缺知府，更陞爲貴東道，皆由于他在歷任知府任內對于捕盜安民及綏靖地方，確實有其卓越不凡的貢獻之故。

胡林翼何以能以一介書生而對捕盜安民有其卓越不凡的貢獻？我們在他的文集與年譜中就可尋得很多的資料、

胡文忠公遺集卷五十三，道光二十七年致但雲湖丈書云：

「治盜之法，與其用捕，不如用民。捕利盜之源，則匿之惟恐不深。民惡盜之害，則去之惟恐不盡。然民恨盜而每畏盜，非畏盜也，畏官耳——送盜需費，官不即理，苛求細故，問擬擅殺、擅傷，制縛諸法，民懼盜誣攀，事後報復，則惟有忍氣吞聲而已矣。」

這一段話說出了官府、捕役、人民及盜匪之間的矛盾心理及奇異立場。惟其如此，所以纔會造成盜賊如毛而人民生活痛苦的現象。胡林翼洞見其中的癥結所在，以官府的身份支持人民的利害關係，更撇開與盜賊勾結爲利的捕役不用，自不難因民心之所向而得民力之助。當時他所用的辦法，一是延訪士紳，寄以耳目，以便得悉盜匪之姓名、狀貌、及道里遠近等等情況。二是自練

民壯百名，做照明代名將沈希儀及清代貴州按察使傅鼐的雕剿之法，出其不意，一舉而加以捲襲。三是嚴保甲、立鄉團，使外來的盜賊不能立足。至於他自己，更是短衣芒鞋，船率健兒出入嶮嶮，廢寢忘食，不辭艱辛。所以他在安順一年之間，就「前後擒巨盜二百餘名，一郡肅然，盜賊衰息。」道光二十九年調署鎮遠，「受印十五日，即破獲前守所移盜案十一人，置重典，境賴以肅。」黃平苗匪猖獗，大為地方之害。林翼奉檄往剿，會集營兵屯兵及苗兵一萬餘人，分路進搗巢穴，一舉而毀著名匪窩十數處，生禽匪首三百，斬馘無算，積年匪患，立告蕩平。黎平境內盜賊縱橫，林翼調黎平半年，獲盜三百餘人，盜首黃浪子等次第翦除，數十年暗無天日之地，一朝而頓慶更生。由于他的治績如此卓犖不凡，所以連遠在北京的皇帝也知道了他的才幹。至於鄰近諸省督撫大吏對他的器重，更不在話下了。

胡林翼在貴州十年，由于治績卓著而致政聲大起，既得上司之倚重，又承皇帝之垂注，理應一本初衷，繼續留在貴州服務纔是。但是他在奉調爲貴東道之後，却向本省當局一再稟辭，請求體念老母年高及自己因心勞力細而百病叢生，懇允放歸故里，這又是爲什麼呢？胡林翼遺集卷五十八葉一至五，載有他在此時所上與貴州當局的一件「論東路事宜啓」，瀝陳他在貴州歷官四府時所見到的地方情形，計有可慮者十五事，大約不外吏治腐敗，兵無一用，欲謀練兵討賊，則困於餉乏民窮，萬難措手，必須從練兵、求才、察吏、籌餉四端切實整頓，方能有濟。「然而言易行難，病多藥少，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挽回，亦非空言勸說所能補救。」「已亂易治也，未亂易

治也，而將亂難治。林翼之愚陋，即使殫精竭力，亦無補於萬一。況一人之精力幾何？一人之才識又幾何？如石塡海，如蚊負山，因自知其不堪矣。」胡林翼在後來出任湖北巡撫，以一個大亂之後，殘破不堪的湖北，經由他一手整頓，不數年之間就奠定了富强的基礎，凡所措置，亦無非即是他在此時所提出的「練兵」、「求才」、「察吏」、「籌餉」四事。可知他此時之不願再留在貴州，並非是他沒有此心願與能力把貴州治理好，實在是因爲他此時不過只是一個道員，沒有充份的權力可以容他從容展布，而貴州省的地方大吏又多闇茸庸懦，非旦夕所能整頓挽救。重以母老思歸，遂意倦而求去。恰在此時，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已在湖北湖南等地掀起了軒然大波，清軍所向潰敗，湖廣總督吳文鎔指名奏調胡林翼前往湖北帶兵剿賊，已奉皇帝允准。於是，胡林翼亦就在咸豐三年的十二月，率領他自己所訓練的黔勇六百人，奉母湯太夫人自貴州回湖南，參加了征討太平天國革命的行列。自此以後，他的事業邁向了另一個新的開始。

胡林翼在服官翰林時，還是一個放蕩不羈而性喜冶遊的花花少爺；在經過了一番挫折之後再起服官，就變成了一個勤於吏事而極能吃苦耐勞、暢曉兵事的賢能地方官，這種轉變實在太大了。在這種不尋常的轉變之中，我們當不難看出，胡林翼實在是一個有才具、有抱負、有識見的幹練政治家，他日如能假以事權，必定能有極不平凡的建樹。郭嵩燾撰胡文忠行狀，說他「自爲湖北巡撫，念國家多難而身負重任，刻自砥礪，益務繩檢其身，較其尺寸毫釐。而待人一秉大公，推誠相與，無粉飾周旋。」由此可以看出，胡林翼的官位愈高，責任愈重，他對自己的約束

檢點亦愈嚴。至其砥礪德行學問，以求日有進益，逸樂，正是因爲他當時所擔任的祇是皇帝的文學侍從之臣，未曾身負政治軍事，能像他這樣區畫分明的人的立身處世與服官任事，能像他這樣區畫分明的翼。郭嵩燾說：「嗚呼！此豈今之人哉？」在我們今日看來，郭嵩燾的話，實在很有道理。

自咸豐三年至咸豐四年，太平天國與清軍兩方在湖北方面的軍事情勢，有很大的變化。太平天國軍本來在咸豐二年的十二月間就攻占了武漢三鎮，至咸豐三年正月，又捨武漢而東下南京，旋復攻佔南京，作爲首都，而武漢亦即仍爲清軍所復。咸豐三年夏間，南京形勢已固，太平軍分道北向直隸，西向長江上游。北伐之師，旋因孤進無援而爲僧格林沁所敗。陷安慶、九江、南昌等重要城市之後節節西上，進兵極爲順利。其年十二月，攻廬州，桐城舒城等要地亦失，湖北省東邊的門戶大開，情勢十分危急。咸豐四年正月，湖廣總督吳文鎔兵敗黃州，死之，太平天國軍尾隨清方的潰軍泝江而上，再陷武漢，及湘陰。幸而曾國藩所新練成的湘軍水陸兩軍在湘潭打了一個勝仗，總算阻遏了太平軍進窺湖南之意圖，而湖北方面的情勢，則仍然糜爛不堪。胡林翼由貴州回到湖南，開始加入征討太平天國的戰事，亦正在這個危急困難的重要時刻。胡林翼年譜卷二敍次此事，云：

「咸豐四年正月已未，行至篁洲，聞吳文鎔）戰歿黃州，寢上竄漢口，湖北按察使唐公樹義方治水軍金口，遂往會師。公見唐軍無紀，亟移軍上流。癸亥，唐公軍潰，發憤赴水死。

公往經紀其喪，買舟遣其子護櫬還黔，亟登陸列陣拒寇，寇不敢逼。退屯嘉魚。是章復撫湖南，曾公國藩方治水師衡州，亦以吳公之招，發水陸軍萬七千人浮湘東下公軍無所屬，而寇自寧鄉湘陰敗退後，湖南境內解嚴，遂乞駱公資以餉械，請暫駐平江往剿，令副將塔齊布暨平江知縣林源恩率所部繼之。乙巳，公敗寇於上塔市，曾公至岳州，閩崇陽通城相繼南橋。王公壻既復岳州，亦擬率師往攻。前隊進羊樓司失利，寇復上陷岳州，大軍乃退保長沙。……一

胡林翼最初以貴州貴東道的官職奉旨率帶黔勇，前往湖北歸湖廣總督吳文鎔調乃變成了曾國藩的部屬，留在湖南協助湘軍抵禦侵入湖南的太平軍，其原因原來如此。這之後的發展，便是胡林翼在曾國藩及駱秉章的指揮之下，先與湘軍各路協力逐退入侵的太平軍，然後隨同東征的湘軍規取武漢。咸豐四年九月，湘軍再克武昌，胡林翼亦奉旨由貴東道使。十月，湘軍有田家鎮之捷，水師乘勝進薄江西之湖口及九江，胡林翼奉曾國藩二千，由咸寧東出瑞昌往援。曾國藩的水師，旋被太平軍所阻截，分爲外江與內湖被困內湖，太平軍則在英王陳玉成的率領之下，由皖西再侵入湖北東部的黃梅廣濟退漢口，再退德安，武昌大震。曾國藩急遣外江水師回救湖北，胡林翼亦以身係湖守土之責，自請回援武昌。自有此一轉變，胡林翼方脫離曾國藩的湘軍，開拓他自己在湖北的局

面。此時他已由湖北按察使擢陞江蘇布政使，復調湖北布政使，在湖北省內，已是僅次於總督楊霈及巡撫陶恩培的監司大員了。

胡林翼出九江前線率軍回援湖北時，漢陽已經失守，武昌亦復危。武昌城中的守軍雖有將近一萬人之多，無奈都是一些吃糧而不能打仗的無用之兵。咸豐五年二月庚戌，胡林翼在武昌城外的太平軍打仗，漢陽方面的太平軍忽然由背後來攻武昌。來攻沌口地方與太平軍打仗的太平軍不過只有二千，城中的一萬守軍遙見敵人來攻，紛紛縋城逃走，沒有一個人肯出力抵抗。太平軍到了城下，看見城上縋着許多條繩子，亦用繩子縋上城堵，武昌就此失陷，可謂兵不血刃。這時，巡撫陶恩培尚在城中，聞變自剄而死。胡林翼與李孟羣遠在沌口，遥救不及，只好退屯金口以自保。在太平天國之亂中，武昌曾三次失陷，但以這最後一次的失陷最爲容易，也一再潰敗，迫使收集武昌城中逃出的潰軍踵而來的胡林翼不得不從另募新軍，重創局面入手，湖北情勢，自此方有新的轉機。如其不然，即使以胡林翼的幹練有爲，事實上也仍是很難期有所振作的。

自武昌第三次收復，胡林翼率軍苦戰，歷時一年有半，始將湖北境內的太平軍全部肅清，隨之而收復武昌。這一次的武昌爭奪戰歷時甚久，作戰經過亦甚爲艱苦，但其效果却極其徹底而且圓滿。原因是前此兩次的武昌失而復得，都是由於太平軍的旋來旋去，並無久踞之意，故而失陷雖易，收復却也不

難。而這一次的情形却不然。因爲自從曾國藩由湖南率領湘軍東征，太平軍已經開始遇到眞正的勁敵。湘軍之出，聲勢既已不凡，其所採取的進攻態勢亦極爲厲害，一克武漢，再攻九江，大有扼吭搗喉，一舉而置太平天國於死地之光景。武昌、九江與安慶，乃是長江中下游的形勝要地，得此三地，卽足以控扼南京而傾覆之。自九江被圍，太平軍自必須力守武昌，以求占據形勢。由於這一緣故，武漢三鎭，亦就成了太平軍與滿清雙方竭力爭奪的戰略要地，胡林翼欲求收復武昌，自然倍感困難。面對此一困難情勢，胡林翼所採取的肆應措施，是這樣的：

一、他將水師偏裨鮑超拔置爲一軍之主將，除原有部屬外，更命他往湖南增募新軍三千人，作爲湖北的基本部隊。

二、商請曾國藩從南昌方面的湘軍中抽調一枝回援湖北。曾國藩深知武昌如不能收復，大局難有可爲。因此雖然曾國藩自己所處的情勢亦甚爲惡劣，仍然將羅澤南所統的五千人調回湖北來幫助他。

三、羅澤南所帶的五千湘軍到達湖北後，胡林翼將他們酌量分入湖北軍中，卽以湘軍的營制部勒訓練。不久之後，湖北軍亦逐漸轉弱爲強。

四、武昌城大而堅，圍城之師苦於兵少，不能發揮圍點打援的有效戰法。因此他先借重湘軍的水師控制長江水面的交通，以求封鎖武昌城中太平軍的糧餉接濟，又逐漸翦滅武昌以東各地據

城而守的太平軍，使武昌城中的太平軍陷於孤立，然後逐漸加强對武昌的進攻。

五、協調新被派任湖廣總督的荆州將軍官文及滿軍副都統都興阿，以所部防守漢水以北之線，一方面加强南岸軍的聲勢，一方面維護水師的安全。

六、整飭吏治，撫綏殘黎，並多方措籌糧餉接濟，使境內的一切作戰軍隊無虞餉需匱乏。不足之數，則以各種方式請求鄰省協濟。

由於胡林翼的周密部署及苦心經營，不久之後，湖北境內的清軍情勢即逐漸穩定。咸豐五年十一月，湖北南境的咸寧蒲圻等太平軍重要據點悉被清軍克復，武昌以南無敵蹤。是月，太平軍翼王石達開謀解武昌之圍，自皖南深入江西內地，以謀牽制。十二月，胡林翼羅澤南督率圍師三路攻城，城中亦大出兵來攻，苦戰兼旬，力挫其銳氣，嬰城待援，不敢復出與清軍戰。咸豐六年正月，石達開蹂躪江西五十餘城，南昌形勢孤危，曾國藩亟欲羅澤南回師相救，而武昌垂克，萬不能捨之而去。於是羅澤南不避艱危，不顧傷亡慘重，竭力向武昌進攻，清軍因之死傷枕籍，而城卒不克。三月，九江方面的太平軍大舉來援，武昌城中亦出兵夾擊，俱爲清軍所敗。羅澤南於此一戰役中受重傷，數日後創重而卒，李續賓代領其軍。四月，楊載福所統水師大破太平軍水師於漢陽，太平軍戰船二百餘艘盡被燒燬，長江江面肅清，援軍路斷，漢陽武昌二城始坐困。七月，石達開由江西回師南京，踏破向榮的江南大營，然後擁衆上援武昌，號稱十萬，旋爲胡林翼李續賓以寬壕高壘之法敗於青山，於是武昌援絕。十月，胡林翼益

募陸師五千，水師十營，對武昌採取長圍久困之計。城中太平軍食盡，於十一月間開門突走，爲圍城諸軍所分途追殲，殄滅無遺，武昌遂復。同日，漢陽城中的太平軍亦突圍東走，漢陽亦復。李續賓部署各軍，進復黃州、興國、蘄州、廣濟等地。至此年的十二月，湖北全省俱已規復，進行了一年有餘的武昌爭奪戰，至此始告結束。自武漢克復，湖北全境肅清之後，胡林翼可以用湖北的力量支援東征之師，太平軍所處的情勢，便日見不利了。

胡林翼從前在貴州做知府時，目睹貴州的吏治廢弛，民生疾苦，盜賊縱橫而官吏相與勾結，治安岌岌可危而兵不能戰，以爲欲圖整頓，非從察吏、求才、練兵、籌餉四者切實着手，不足以言振起。而湖北新經大亂，瘡痍滿目，如何方能使殘餘的黔黎得有再生之樂，如何方能使新復的地方治安鞏固，這也就回到了他從前所曾提出的老課題——非從察吏、求才、練兵、籌餉四者着手不可了。察吏所以安民，求才所以改善實際政治，練兵所以固圍，而籌餉所以養兵，四者互爲連鎖，缺一不可。武漢既復，湖北肅清以後，清政府爲酬庸有功人員，已將胡林翼補授爲湖北巡撫，加賞頭品頂戴，所以胡林翼此時已是實缺的巡撫大吏，實權在握，可以容他從容展佈，不比他從前在貴州做知府的時候，空有滿腹經綸，却無展布之地的光景了。但巡撫雖爲一省的最高行政長官，而按照清朝的政治制度，地方上的最高行政長官，巡撫之外，尚有總督。定例，總督管軍事而巡撫治民政。但若在一省之中，同時設有總督巡撫兩官，二人恰又同城而治的話，往往互相牽制，迭生齟齬。湖北巡撫駐武昌，而兼轄湖南湖北二省的湖廣總督亦駐武昌。胡林翼在湖

北做巡撫的時候，擔任湖廣總督一職的是滿人官文。清朝的慣例，常以滿人監視漢人官吏，故而滿人常見倚信而漢人則易受排擠。胡林翼在湖北巡撫任內，雖有滿腹經綸亟待展佈，却必須先要取得總督官文的合作。方能免其掣肘。關於這一層，清代末年的各家野史中，頗有若干資料，可以使我們瞭解，胡林翼之推誠待人，輯睦同官，儘有其巧妙之處。

薛福成庸菴文集有「書益陽胡文忠公與遼陽官文恭公交驩事」云：

「咸豐五六年間，逆賊陷武昌漢陽，蔓及旁郡，蹂躪數千里。是時文恭由荆州將軍改總督，凡上游荆宜襄郢諸郡兵事餉事悉主之。文忠駐軍金口，凡下游武漢黃德諸郡兵事餉事悉主之。二公值湖北全境糜爛之餘，皆竭蹶經營，各顧分地，文忠尤崎嶇險阻，與勁寇相持，獨爲其難。督撫相隔遠，往往以徽兵調餉，互有違言，僚吏意嚮，顯分彼此，牴牾益甚。文恭於鉅細事不甚究心，多假手幕友家丁，諸所措注，文忠尤不謂然。既克武昌，威望日益隆，文恭亦欲倚以爲重。比由荆州移駐武昌，三往拜而文忠謝不見也。或爲文恭說文忠曰：『公不欲削平巨寇耶！天下未有督撫不和而能辦大事者。且總督爲人易良坦中，從善如流，公若善與之交，必能左右之，是公不翅兼爲總督也。合督撫之權以辦賊，誰能禦我？』文忠亟往見文恭，推誠相結納，謝不敏焉。文恭有寵妾，拜胡太夫人爲義母，兩家往來益密，饋問無虛日，二公之交益固。文忠於是察吏籌餉，選將練兵，孳孳不少倦，文恭晝諾仰成而已，未嘗有異議。每遇收城克敵，及保薦賢才，文忠輒陰主其政，而推文恭首尸其名。朝廷以文恭督湖廣多年，內靖寇氛，外援鄰省，厥

功甚偉，累晉大學士，授爲欽差大臣，寵眷隆洽。文恭心感文忠之力，而文忠亦益得發衍。凡東南各省疆吏將帥之賢否進退，與大局一切佈置，每有所見，必進密疏，或與文恭會銜入告。文忠所引嫌不能言者，亦竟勸文恭獨言之。訏謨所定，志行計從。人謂文忠有旋轉乾坤之功，不僅澤在湖北也。……」

這一段話，概述胡林翼爲求減除不必要的掣肘而屈意結歡總督官文的情形，歷歷加繪。文中雖未指出這個「或爲文恭說文忠」的說客是何姓名，而據徐宗幹的歸廬談往錄所記，其人蓋卽當時的竇慶府知府滿人魁聯。由薛福成所記，胡林翼因交驩官文而屈意下之，甚至一切報功奏疏亦推官文列名出奏，官文因此累得晉擢，官至大學士，具見胡林翼爲了要達成他救國救民的偉大負，只要有利於國，無不多方爲之，卽使不利於他個人的功名利祿，亦無所顧惜。這種公忠無私的偉大志節，不但在當時罕有其比，卽是求之於往史，亦罕見其人。胡林翼之卓犖不凡，此爲其一端。

由於胡林翼能藉金錢與名位滿足總督官文的願望，使得官文感激而事事信從，於是，胡林翼眞的變成了以一人而兼總督巡撫二職，握軍政大權於一身，事事都可按照自己的計劃與想法一一推行，而不虞他人之掣肘。梅英杰撰胡林翼年譜記述此事，曾引述當時人的輿論，說：「一僉謂湖北軍政吏治，巡撫主藁，總督畫行。」督撫同心而胡林翼的主張，用賢黜邪，使湖北吏治日有起色；二

是在軍事作戰方面，亦能依照胡林翼守在境外的辦法，分遣湖北之軍出援湖南安徽情況之下，胡林翼所做的雖然只是湖北一省的巡撫，實際上却是在以湖北一省之力長江下游的宏謨遠猷了。

郭嵩燾撰胡文忠公行狀，敍述胡林翼在收復武漢以後的一應興革措施說：

「當是時，官私廬舍焚燬幾盡，諸事草創，民物凋殘。公一意振興，裁通省浮設武漢重兵以固根本，嚴查保甲以除奸匪，愼選賢員以資蘇息。設清查局，查被賊糧交代。設節義局，表章歷年殉難官紳士女。設軍需局，籌備東征軍士器械餉糈。細畢舉。尤以亂事之源不清，劾參鎭道府廳以下數十員，與屬吏更始。禁應酬，塞，不務察吏則亂賊則亂之流不實，黜浮華，於是在官者稍稍推廉尚能，知吏事矣。今大學士官公總督兩湖，司軍心，諮商籌度，官公亦深相倚重無疑忌，得盡所爲。今將軍都興阿公，多隆阿公，皆領馬隊兵，隸官公，號驍勇善戰。公見卽傾身與之接交，無不樂爲用者。其籌糧，曰鹽課，曰貨稅。湖北漕政久敝，官民交困，道光中葉以還，徵收常不滿半。程，民以是輸將足額。湖廣兩省自淮鹽阻絕，率食川鹽。公分置鹽課局於宜昌沙市穴老河口等處，視向來額課過之。用故侍郎雷公以誠奏行釐稅之議，設局各府縣市土人之法，嚴杜中飽，收支覈實，自是湖北兵與餉强天下。」

在上文所述的種種興革措施中，察吏、安民、清賦、籌餉等等，俱是巡撫的職掌；至於訓練軍隊，則權歸總督。今胡林翼在巡撫職掌之外，居然亦能左右總督所司的軍柄，並進而出兵分援鄰省，官文亦任其所爲，這種情形，看來實在使人感覺驚奇。就中分援鄰省一事，在當時頗爲湖北省內的官吏士紳所反對，而胡林翼一切不顧，毅然行之，這種抱負與識見，實在是當時人所萬難企及的。

自武漢克復，湖北肅清，滿清及太平天國雙方的軍事重心，逐漸下移至江西安徽之境。九江與湖口，控扼斷蕪湖黃以南的長江水域，且爲封鎖鄱陽湖水路的出口，曾國藩所統率的湘軍，在這裏與太平天國軍對壘數年，迄無重大進展。湖北既平，胡林翼可以湖北全省的人力與財力支援湘軍，曾國藩所處的形勢逐漸好轉，太平天國方面自亦必須厚集兵力，以與曾國藩爭此形勝之地。九江之北，隔著一道長江，北岸便是湖北的黃梅與安徽的宿松。此地自昔爲北來驛路之孔道，由安徽取道九江前往湖北者，莫不經由此路，亦是雙方大軍進出安徽湖北的重要通衢。形勢如此，戰事的重心自然亦萃聚於此。咸豐七年，胡林翼分遣李續賓都與阿諾軍，會同楊載福所統率的水師，由湖北的蘄黃廣濟出境，先奪取九江北岸的小池口要隘，旋又規復長江兩岸的湖口、彭澤、東流各地，與曾國藩的湘軍合力進圍九江。咸豐八年四月，李續賓以地雷轟破九江城垣，克之。九江既復，長江中游的險要之地，僅餘安慶一處。胡林翼因又與曾國藩商定，分兵四路向安慶進攻。所以，自咸豐八年至十一年，滿清與太平天國之間的重大戰役，便在圍繞安慶前後上下的各

地進行，而胡林翼所派遣的湖北各軍，也始終在這一戰役中擔任著重要的角色。郭嵩燾所撰的胡文忠公行狀敍次其事，云：

「公以九江既復，賊所扼長江險要，獨有安慶，奏請數路進攻。提督楊公以水師出江面，將軍都公由宿松望江逼安慶城，爲圍師，李忠武公(李續賓)規復太湖潛山桐城，與都公犄角。會廬州失陷，北路請援急。李忠武公奉朝旨催促，遂分營留守舒桐，自提五千人赴援。軍次三河，賊四面麕集，力竭戰沒，全軍陷覆。公時丁母湯太夫人憂回籍，懇請終制。將軍都公以三河之敗由公去軍無調度，應急起復公督師。總督官公亦疏請。公聞命，痛哭啓行，逕次黃州。時各軍退保黃梅，人心惶惶，聞公至，皆以手加額自壯。九年二月，進營上巴河，與今巡撫李公(續宜)整飭部伍，日夜訓練，謀大舉。會石達開由江西南竄犯湖南，掠郴桂而西趨寶慶，號稱六十萬，湖南告急。公命李公率所部往援，而以都統舒保公馬隊三百佐之，又以水師二營佐湖南水師分扼諸河道，湖北精兵援湖南者幾半，寶慶之圍速解，公之力也。已而協揆曾公由江西奉入川之命，總督官公奏請與公併力圖皖，乃定四路進兵之策，曾公循江而下爲第一路，多公（多隆阿）與今提督鮑公超攻取潛山太湖爲第二路，公出英山霍山爲第三路，李公由松子關出商城固始爲第四路。議者以鄂撫應駐黃州，不宜出境。公謂：我奪情起復，不赴前敵討賊，則此出爲無名。十月，移營英山。……」

這以下的情形，乃是胡林翼與曾國藩互相配合，一再力却太平天國英王陳玉成謀解太湖之圍

的攻勢，並進而合圍安慶的艱苦作戰，應留在後面再作論述。而由上文的敍述可復湖北全省之後，不但以進攻九江安慶爲己任，每遇河南安徽湖南等鄰省有警域，全力相救。這就是上文所曾說到的，胡林翼不顧湖北本省官吏士紳的反對，鄰省的事了。自太平天國之亂起，清朝政府最初一直倚恃向榮、和春等欽差大臣所統率的綠營兵爲征討太平軍的主力，悉索敝賦，以所能籌集到的兵餉悉數投注其中，而畢竟一於各省地方所發展起來的自衞武力，則因中央政府無力支援糧餉之故，必須由各省皆以本身利益爲重，但求自固疆圉而不肯以餘力助人。湖處，其結果則是各省當局自爲設後，元氣大傷，瘡痍未復，論理只能力求自保，何能有足够的力量分援鄰省？而這樣做，正有他的正當理由在。清人方宗誠所撰柏堂師友言行記卷二云：

「先是，宮保（指胡林翼，胡於咸豐八年因九江克復之功奉旨加太子少保銜，俗稱宮保。）肅清楚境，將議圍皖，同事多不欲行，公獨任之。及髮逆上竄，或議退師，或且之非計。公曰：『皖楚毗連，袤斜五百餘里，犬牙相錯，從何處設防？且防兵久東骨，弛懈成癉，心不畏敵，技藝生澀，乍聞鼓鼙，不能戰亦並不能守矣。況皖人過問，有過而問者，則又蠭起而議之排之，竊所不解。故不能保楚，實我罪也。』公日夜調度，病甚，猶靜坐籌畫。是年七月，楚境肅清。八月初，安慶桐得安慶爲根本，遂於兩年之內南北肅清，公之功也，蓋公之識遠矣哉！」

近代軍事學家每以爲，攻擊是最好的防禦。曾國藩亦說，討竊號之賊，與討流賊異。對付流賊，「當預防以待其至，堅守以挫其銳。」至於對付太平天國這樣的「竊號之賊」，則當翦除枝葉，攻所必救」，使其備多力分，然後可以根本傾覆之。曾國藩的想法，事實上正是胡林翼的想法。作戰猶如奕棋，最惡劣的棋手亦知道，退守的戰略就是自取敗亡，惟有向敵人著著進攻，方是致勝之道。胡林翼與曾國藩一樣，他們以文人而出來領兵打仗，其終極的目標在求戡平大亂，奠安民生，所以即使是力所不及之事，亦無不竭蹶以赴，一方面在求自盡職責，二方面希望藉此鼓舞人心，共赴事功。這番話雖然不曾由胡林翼自己親口說出，我們却可以從他的行事中體認出來。前文所說，雖是飾辭，却也言之成理，別人不易將他駁倒。至於咸豐九年太平天國的翼王石達開由江西進犯湖南，騷騷乎有西入四川之意時，胡林翼不遑寢處，憂思忡忡，在百無辦法之中仍舊設法令李續宜統兵往援，我們若能瞭解這其間的複雜曲折之情，當必更能進一步體認胡林翼公忠體國，力顧大局的偉大襟懷。關於這一方面的情形，我們可以先抄錄一些胡林翼自己所說的話，藉以瞭解其意向之所在。

胡文忠公遺集卷六十四致官撰帥書云：

「石達開擾郴桂，向寶慶常德，隱隱有入黔入蜀之勢。入蜀則湖北上游爲人所制，十年二十年不得安枕。謂應亟請滌帥入蜀，以資統帥湘將。」

這一段話，說明了胡林翼由於戰略形勢的觀點，極其重視石達開入湘以後

的動向。由於石達開可能西向入蜀，爲確保湖北之上游安全計，他有必要及時救止。所以他認爲湖北有援湘之必要，而援湘實亦卽爲湖北自保之計也。

胡文忠遺集卷六十三，致羅澹村方伯書云：

「希菴已到武昌否？何日西上？弟前說恐公議仍以爲不妥（原注：初九日所上條陳分兵援湘之說也），弟亦不敢自信其是。……林翼之日夜憂思，夜不能寐，畏湖南之以鄰爲壑也。……」

此信中所說的「希菴」，卽李續宜，此時正因母病請假，由安徽前敵回湖南省視，尚未行抵武昌。所謂「畏湖南之以鄰爲壑」，意指湖北如不能援湘，湖南不能獨力敗之，則爲湖南之計，惟有驅之出境爲上，無論向鄂向蜀，均非所顧。而湖北旣不利其入川，復不利其向鄂，爲避免遭種情勢發生，是救人而兼自保之計。

胡文忠公遺集卷六十三，致官撫帥書云：

「初八日得湖南軍報，大局雖無潰敗情狀，而備多力分，左支右絀之情形，已在語言之外。細心體察，竊恐其力不能勝。……若賊志必在捌鄂之背，窺蜀之藩，則現在兵力，惟黃州六千人可禦一路，而武昌岳州荆宜五府地面，防不勝防矣，況又有皖賊之牽綴於前也哉？湖南去冬以來，庫有所餘，約逾百萬。湖北每月供支東征之餉，必虧數萬以外。設湖南果不支，禍必及於鄂省，地勢與兵力餉力尙不及湖南，則鄂事必不堪涉想矣。——大抵賊若捌鄂之背，必在夏秋之

間，其大枝另由西路規伺巴蜀，則尙未可知也。任，將才又不能多，日夜籌思，安得有一二萬人以爲鄂用乎？且恐湘人之驚魂未定，則必少。湘中鑒於前此之空虛，非全境肅清，三五士民豈堪再罹奇禍也耶？愚見欲自守於境內，不月後必無援師出境，亦必無追兵到鄂也而勢分。有一愚下之策，不如及希菴假歸之便，如助剿於境外；助剿則兵少而功倍，自邵陽，以剿寶慶一路之賊。救鄰，美名也。湖南即派湘軍撫標精銳五千人，從岳州湘陰度處之，盛德也。橫逞意氣，不應爭者必忿爭，而以厚道一心奉公，人未乞師而予以精兵，一意保民，不待之，大之隱憂。此又陰德之尤大者也。……」

此書反覆陳說，以各種理由加以勸譬，務求使對方瞭解援湘即所以保鄂，自守不如救人之得美名而有實利，其中的利害得失，實在也是很明白而透徹的了。推原胡林翼之本心，出與他之出境討賊原無二義，其目的皆在爲國家盡力除此大患而已。祇因與他同時之人並無此高尙理想，於是始不得不以利害得失之說歆動之，揆其初意，何嘗有此想法哉？亦正因爲胡林翼能說得出這許多冠冕堂皇的理由，使得鄂中僚友士紳等人無辭以對，而總督官文又素來惟林翼之馬首是瞻，這纔使援湘之舉成爲定局，而胡林翼爲此，亦舌敝頰脫，煞費周章的了。我們歷觀胡林翼這種不以畛域之見自限，但就力之所及，分兵四援的事實看來，可知清朝政府之所以終能將太平

天國之亂事戡平，胡林翼的居中協調之功，實在具有極大的影響。如果不是胡林翼之統籌全局，調和將帥，其間正不知更有多少阻力橫梗其間哩！至於他以湖北省的餉源，全力支援曾國藩的東征之師，使曾國藩得以免其後顧之憂，更是彰彰在人耳目之事，在此不須再作更多的贅述了。

湖北以其財力充份支援曾國藩的東征之師，由胡林翼來說，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這理由在前面亦曾約略述及——湖北省在喪亂之餘，地方殘破，民力凋敝。若不是胡林翼多方從事撫綏安輯，興利除弊，還眞不容易一時回復到小康安定的局面。這其間所費的經營布置之心，如察吏安民，懲貪任賢，整頓稅收，廣闢利源等等，正復屈指難數。但即使如此苦心孤詣地經營到最爲焦心的事，仍不外乎兵與餉兩事。

胡文忠公遺集卷三十三，收有胡林翼在咸豐九年二月十一日所上的「遵旨覆奏行軍機宜疏」一道，梅英杰撰胡林翼年譜，曾加以摘錄引敍，云：

「軍興九載，鄂之謀皖，亦已二年，而訖未能得勢者，無他，備一路而虛一路，賊乃得乘間抵隙，狡焉思逞也。即如七年，官軍併規宿松，賊從蘄州張家塝伺隙竄入。八年，力扼太湖，於又從商霍上陷黃廳各縣。是官軍注重於前，賊必轉襲其後，官軍每仰攻挫銳，賊轉以餘力乘虛，往事已然，前車可鑒。臣愚以爲必保鄂然後能謀皖，必謀皖然後能平吳。然謀皖非三道進兵不可，鄂中防剿江皖，水陸馬步，已五萬餘人，又協濟侍郎曾國藩、水師彭玉麟各，通計月需餉三十六萬。除本省自籌外，仍月欠十餘萬兩。欲添兵則餉糈難繼，欲分兵則統將

乏人。亟宜訪求延攬，以圖賢才輩出，共濟時艱。……」

由此疏可知，湖北省除養兵五萬外，再加上負擔東征湘軍的協濟餉項，共計月需銀三十六萬，已遠超出湖北所能征得的稅收總額之外。不添兵則奏功難期，欲添兵則餉糈不繼，這眞是一個無法解決的難題。

自古以來，理財之法不外乎開源與節流二道。湖北時當軍興，援皖援贛與援湘之兵，出，省內尙需有防守及番替之兵，故而五萬之數，實在無法裁減。而曾國藩的東征之師，湖南與湖北之協餉，在二省均義不容辭。這是湖北財政的大宗支出。大宗支出不能裁減，節流之道，實在亦太難了。胡林翼這時從京中奏調來一位理財能手，即是後陞戶部尙書，時官戶部主事的閻敬銘，由他專管湖北全省的總糧臺。此人清强而有執，於一應支費，事事務求節省浪費，嚴杜浮濫，乃是胡林翼的一個得力幫手。胡文公遺集卷七十五，有與嚴渭春書云：

「丹初（即閻敬銘之字）能節小物，而不能節其大浪費，總在兵多，弟之罪也。丹初能司出而不能司入，司入者，弟與兄之責也。」

嚴渭春即嚴樹森，在胡林翼死後繼任湖北巡撫，當時則在湖北擔任布政使，理財裕餉，正其專責，故而胡林翼要說，「司入者，弟與兄之責也。」流無可節，則裕餉之道，自然只有設法增加收入之一法了。但無論是增田賦、增鹽課，或增商稅，都是病民之害政，賢者所不樂爲，胡林翼只是實逼處此，不得不然耳。權衡利害，三者之中，又以鹽課與商稅二項，對于社會民生的爲

害較小，所以胡林翼所注重的亦在此二項。但胡林翼之重視鹽課商稅，亦並非是多設關卡，嚴查商旅，使無偷漏之意。他以爲商人所繳付的稅款並不少，征額之所以不豐，其弊乃在經手人與書吏胥役之中飽侵盜。所以他認爲欲求增加稅課收入，正當杜絕中飽，嚴防侵盜，否則徒然只是病商厲民的害政而已。胡文忠公遺集卷六十一，有「致牙厘總局李香雪太守書」云云：

「餉事以厘金鹽課爲可大可久之謀，然此二事在人不在法。此番力請壽山回省，欲與老兄細商分局人才，預防中飽也。所有應辦之事，乞老兄直言無隱。弟處本無絲毫飾徇之情，聞善言，見善行，無不即時道奉者。此情早在洞鑒之中。」

此一段話，蓋即胡林翼年譜中所謂的「益務推廣厘金於各府縣市鎭，倣劉宴引用士流之意，招致樸幹士紳佐官董理，絲毫精密，嚴杜中飽，一除稅關衙署錮習」之張本了。因爲後來胡林翼招致前來擔任稅關征收事宜的主事者，都是能實心任事而廉介有爲的樸幹士紳，對于所經收的稅款，涓滴歸公，弊絕風清，於是湖北的財政乃大有起色。但胡林翼爲此，却已費盡心血。焦勞不堪。爲了發洩他心中的苦惱，他曾在寫給李續宜的信中說：

「天下惟籌餉可籌耶？」（遺集卷六十六，致李希菴書）

又有與糧臺書云：

「爲今日計，須爲鄂中速思籌餉之法。籌餉無盛德，無令問，無美譽，千古皆然。以一人爲藁薦，任人浸溺其上，或可稍救於萬一。」（遺集卷七十三）

這眞是概乎言之的話，不但可以使我們看出胡林翼的器識與抱負是何等不凡！自古以來，有辦法籌餉之人，都被後世目爲聚斂之臣了。籌餉之著名的事例，莫如唐代之劉宴。劉宴正人，尙且被此惡名，等而下之者，自更不必說所以要被人目爲聚斂，大致由于國家的政治濁亂，賦稅日減而軍費日增，故不得不設爲補苴之法，多方謀求增加收入，以應付日益增加的支出。而因當時這些司國計之人祇有籌餉能致力於革新政治，故而卽使稅收日增，而國家仍然不免於覆滅，徒增人民之困苦而無補於危亡，老百姓的怨氣無法發洩，就要把他們視爲聚斂之臣了。胡林翼在當時雖然亦汲汲於增因他手握全省官吏的進退黜陟之權，同時更將全副精力用於討平太平天國的亂事方面，所以湖北省老百姓的負擔雖重，湖北省的吏治民生却蒸蒸日上，不久之後，且能夷平大難，不湖北人民救出水火而登之衽席。所以卽使胡林翼在當時曾經使湖北老百姓增加了很多得失，人民還是覺得應該感激他的籌劃苦心的。所以，胡林翼雖說籌餉是賤役，籌餉千年萬世之後的歷史記載，對此無疑必有公正之評價，必不以聚斂相視也。

胡林翼爲了籌餉贍軍，以便早日戡定太平天國之亂，至於不惜身被惡名，甘爲天下人之藪而任人溲溺其上，這種捨己救世的崇高襟懷，看起來是何等的偉大光明而難以企及端，尙不以充份表現胡林翼的偉大之處。方宗誠撰柏堂師友言行記，曾有關于胡林翼的軼事數則，云：

「胡文忠公忠體國，其調和諸將，刻刻爲國求才，出於至誠。時彭雪琴侍郎（即彭玉麟）楊厚菴提督（即楊載福）分帶長江內湖水師，偶因事不和。文忠知之，乃致書楊公彭公，請其會商要事。楊公先至驢談，而彭公至，楊公即欲出，文忠强止之。彭公見楊公在坐，亦欲出，文忠又强止之。二人相對無語。文忠乃命設席，酌酒三斗，自捧一斗，跪而請曰：『天下糜爛至此，實賴公等協力支撐。公等今自內，又何能佐治中興之業邪？』因泣下沾襟。於是彭楊二公皆相呼謂曰：『吾輩負宮保矣，如再有參差，上無以對宮保。』遂和好如初。鮑春霆提督（即鮑超）在安徽告假回籍三月，曾相方在祁門，以檄促之。文忠則手書二十六封，令速返。春霆至望江，又稟請曾相發二千金寄家。曾相斥之，謂時事孔亟，毋得遲遲其行，今且未立一功而自謀家室，將何以服前敵軍心？文忠聞其事，即自寄三千金贈之，春霆感激，致死力焉。曾相嘗奏薦沈幼丹（即沈葆楨），幼丹久不至，曾相有忿意。文忠因致書解之，曰：『天下糜爛，吾輩二三人撐持。吾輩不低首求人才以自助，可乎？』其苦心維持大局蓋如此。」

除以上諸事以外，更有一事。即咸豐九年的太湖潛出戰役發生前，太平天國的英王陳玉成糾衆十餘萬來攻，駐防前敵的湖北軍分歸多隆阿、鮑超、唐訓方三人統率，權分勢均，各不相下。其時胡林翼意欲以多隆阿爲總統，使鮑唐兩軍均歸節制，以統一兵權而便利指揮。祇因鮑唐二人均有不願，胡林翼調協其間，遂煞費苦心。他在此時寫給曾國藩的信中說：「克己以待人，屈我以伸人，惟林翼當爲其忍，爲其難，非如此則事必不濟。」這幾句話，與前面所說的「天下糜爛，

恃吾輩二三人撐持。」正是前後一轍，聆其言如見其人。曾國藩雖是湘軍的主帥與太平天國之亂的領導人，但在這些地方却不能如胡林翼之公忠體國，胸中不存任何芥蒂。咸同中興的三大名臣，向來以曾國藩居首。在這些地方，曾國藩事實上是要比胡林翼遜色一些的。

胡林翼早年在貴州做知府時，屢次剿平匿藏深山中的積年盜患，由此可以使人知道他在軍事指揮方面極有才具。自領兵從事武昌的爭奪戰，屢經歷練，對于臨陣對敵更加增多了許多經驗。因此他後來協同曾國藩出師安徽時，便常常有極其正確的戰略觀點，對于戰事的全局發生極爲深遠的影響。例如他在咸豐九、十年間對太湖潛山戰役的看法，便是最明顯不過的例證。

太湖與潛山，位於安徽省的西南隅，大別山脈的南麓，爲湖北省向東通往安徽的驛路所經之地。太平軍由安徽進入湖北，胡林翼由湖北進規安慶，這兩處地方都是必爭的戰略要地。咸豐九年十一月，曾國藩由湖北移營安徽之宿松，其地在太湖之南，向西即入鄂境，與湖北多隆阿曾大破太平軍於太湖以東之石牌，太平軍萃聚太湖城中，四路進攻之策，安徽方面的太平軍聞之，久不能克。及胡林翼定湖北入皖諸軍進而圍就在曾國藩進駐宿松的同時，陳玉成已調集了十多萬大軍，由江蘇乞援於英王陳玉成。陳玉成亦欲乘機擊破清軍，以解除安向廬江桐城一帶蔽地而來，其目的不僅求解太湖慶所受的威

脅。由于陳玉成的來勢太凶，而淸軍由湖北四路出師，兵力分散，看來勢難抵敵。其在淸軍圍守之中，如果撤圍師而厚集諸軍以待敵，則多時以來的圍守之功歸於白費，未如果不撤太湖之圍，又未免有腹背受敵之虞，何去何從，實費周章。在這種情形之下，爲撤圍勢將使太湖之敵與陳玉成之軍相合，其勢益不可當，曾國藩亦因此而遲疑不能決反覆籌議，以爲不然。他在此時與曾國藩一日一信，互相討論當前的軍事問題。在十一寫給曾國藩的信中，他提出了很明白的看法，說：

「太湖兵力甚厚，應專力打援賊，即放走城賊，則即得太湖猶獲石田也。」

同月十七日，他在寫給李申甫嗣部的信中亦甚無妨。援賊破，則所得不止太湖；援對此一觀點解釋得更爲明白，云：

「得書，敬悉軍事不了，恐爲三河之覆敗，爲寶慶之被圍，日夜苦思，呻吟不已。更定計，奮然興起，坐以待旦。以地勢賊情而論，已拊其背而扼其吭，官渡摧袁，虎牢計深機，亦不過如是。若遲滯不決，則步軍必被圍困，馬隊攻壘非所長，求野戰不得，累及滁丈彌縫補救耳。或疑闕東面是縱賊，不知賊所恃者城，官軍所困者，株守之城賊戰，可勝也；若待援賊外圍，城賊內變，是官軍有內外夾攻之病，其敗無疑。或又疑太湖功棄垂成，不知得空城不如破賊。去冬曾得太、潛、舒、桐矣，棄之如遺，則得城不如破賊之功，不待再計而決矣。況破援賊則可連下五六城，而太湖仍在吾掌握之中，仍釜中游魂耳。舍大圍不謀，

而小圍是好，智者不爲也。……」

由于胡林翼之決計如此，他終於不顧曾國藩責令統一指揮，合力禦敵。十二月，陳玉成的大凝學、多隆阿各軍合而爲一，以多隆阿爲統帥，軍由潛山而至太湖，連營百數，與多隆阿各軍大戰六日，清軍以兵少而陷入苦戰。此時曾國藩及胡林翼乃抽調各路援軍陸續投入戰場，互相形成了包圍與反包圍的巧妙形勢，血戰兼旬，終將陳玉成的主力擊潰。據王闓運湘軍志卷三湖北篇所記的此役戰果，是：

「寇棄屯走。二十里，軍械委積。燒屯館柵壘數百，俘寇三百人，斬馘以萬數。其夜，太湖寇遁走。甲午，潛山寇遁走。」

至于這一戰役的直接影響，則是安徽方面的太平軍再沒有力量可以阻止清軍的全面推進，而安慶亦終於在不久之後被圍。自安慶攻克之後，太平天國所處的形勢更如江河之日下，然則潛山太湖戰役對于全盤情勢的影響便不可說不大了。

我國古代的兵學思想，常以爲作戰當謀致敵而不爲敵人所致。蓋敵人如能爲我所致，則我可先占有利的戰場所部署的，正是此一策略之實際運用。如果不是九年十二月至十年正月的潛山太湖之戰，胡林翼在此一戰役中予陳玉成野戰軍主力以重大的打擊，則清軍在安徽的作戰，恐怕尚須經過一段很長時間的艱苦奮鬪——如不能大破來援之太平軍主力，雖得城得地

何益？胡林翼非軍事專家，在這裏却表現了非凡的軍事思想與領導才能，其識見之高卓與判斷之正確，實在令人欽佩。至于曾國藩在受任兩江總督以後所擬訂的十道並進計劃，在胡林翼文集中亦早已有其端倪。胡文忠公遺集卷七十二，咸豐十年致曾國藩書云：

「昨夜沉思，總是放膽放手大踏步乃可救人。救不得吳越，仍損武惠之名，不如力一救也。兵勢須布遠勢，忌近謀。丈所言之三略，應併爲內三路小三枝，另籌兩大枝，一出杭州，一出揚州。其內三路小三枝，則大帥之中權也。沈、李饒所辦廣信一路，竟須馳入杭州，以爲平吳根本，保越人之命，取越人之財，事乃有濟，拘守廣信，無當也。應卽請幼丹爲豫章藩司，奏補次青（李元度）浙江藩臬。次青應駐杭州；杭州危，駐衢州，杭州存，移湖州，投袂卽行，此爲先着。江督之履，已連齊魯，應以知兵任戰之李少荃（鴻章）劉霞仙（蓉）等募各路步兵一萬五六千人，開幕府於清江浦，而以多、都兩公專司馬隊。又少荃、小泉（李瀚章）可奏補江寧江蘇實缺，卽是江北籌餉之本。失守後，前人已死未死，後人已放未放，均不嫌更正察看。楊廷和乘時革弊政，一筆勾銷之法，可敏決之。此兩枝定妥，布局宏遠，丈從徽、寧鼓行而東，東吳公事，應卽如此勾當。急脈緩受，大題小做，恐或不濟。餉事不怕無錢，只怕無人，丈毋專取丞相謹愼爲也。」

此信寫時，正當太平天國的忠王李秀成再破江南大營，蘇常失陷，而杭州尚爲清有。胡林翼爲曾國藩借箸代籌，以爲竟當乘蘇省殘破，舊有文武官吏下落不明之時，直捷以能幹任事之李元

度、沈葆楨、李鴻章、劉蓉、李瀚章等分佈蘇贛浙三省的藩臬要缺，就地籌餉治軍，路向南京展開包圍形勢。形勢既得，事情自然順手，必不可急病緩治，但事補苴小處而忽略全局。信中所提到的楊廷和，乃是明朝有名的賢相，乘明武宗崩駕，新君未立之時，假借遺詔名義，盡革正德一朝的弊政，歷史上稱爲美談。以胡林翼的膽識魄力和他的明快作風，如果曾國藩的兩江總督換了胡林翼來做，蘇常淪陷以後的江南大局，必不致要在三年以後方能逐漸改觀。因爲曾國藩後來所倚以成功的，卽是李鴻章的上海軍與左宗棠的浙江軍，與此時胡林翼所籌議的大致無異。只因時日遷延，以致奏功遲緩，若能如胡林翼之當機立斷，必可減少甚多的無形困難。胡林翼勸曾國藩不可專學諸葛亮之謹愼小心，在其他的許多信件中，又曾一再敎勸曾國藩要有不怕包攬把持，放手去幹的勇氣，凡此特性，正是曾國藩所缺乏而胡林翼所持具的。比較兩人的異同，卽可知道，胡林翼所以能在極短時間之內，將殘破不堪的湖北省收拾整頓，一變而爲後來的富强安定，卽在他的有膽有識，以及凡事但求有利於國計民生而不辭包攬把持之名的緣故。在這些地方，胡林翼的治事之才與卓識之見，似乎又要比曾國藩高出一籌。

說到曾國藩之出任兩江總督，有一件事亦可以在此附帶一述。薛福成庸菴筆記「肅順推服楚賢」一條說：

「肅順於咸豐年間始爲御前大臣，貴寵用事。後遂入直軍機，屢興大獄，竊弄威福，大小臣工，被其賊害，怨毒繁興。卒以驕橫僭儗，獲罪伏法，其人固無足論矣。然是時粵賊勢甚張，而

討賊將帥之有功者皆在湖南，朝臣如祁文端公、彭文敬公，尚懵焉不察，惟肅順知之已深，頗能傾心推服。平時與座客談論，常心折曾文正公之識量，胡文忠公之才略。蘇常既陷，何桂清以棄城獲咎，文宗欲用胡公總督兩江。肅順曰：『胡林翼在湖北措注盡善，未可挪動，不如用曾國藩督兩江，則上下游俱得人矣。』上曰：『善。』遂如其議，卒有成功。」

照此說來，胡林翼在當時本來很有可能由湖北巡撫調任兩江總督，只因他在湖北所作的一切措施作爲事事妥貼，皇帝覺得仍須多加倚畀，纔將兩江總督一席改派曾國藩出任。胡林翼與曾國藩二人的抱負與志趣大致相似，其公忠體國的精神亦復無異，兩江總督一職，無論由曾國藩或胡林翼來做，最後都可以達到戡定大局之結果。但胡林翼拮据經營數年之久，曾國藩賴其全力支援，始得以克成大功，而胡林翼始終只能官至巡撫，且因勞瘁不起而卒於湖北巡撫之任，就酬庸報功之義而言，胡林翼所得到的，總不免令人覺得是太不公平了一點。

曾胡二人，同爲咸同中興的名臣，無論就學識、德行、志業、抱負而言，兩人之間都大致相爲軒輊，難分上下。然而在性格與行事方面，兩個人的差異就大了。大致曾謹愼而胡明敏，曾拘執而胡爽朗，因此之故，二人的造就亦復不同。除此之外，如果還有什麼差異，那就是見之於收攬人才方面的了。

方宗誠撰柏堂師友言行記，盛稱曾胡二人之能禮賢下士，說：「自道光以來，公卿不下士久矣。近惟曾相國及潤芝宮保開此風氣耳。」薛福成庸菴筆記中亦有一條，極誇曾國藩幕府人才之

盛。但即使如此，王闓運却曾很不客氣地批評曾國藩與左宗棠，以爲曾國藩只能收人才，左宗棠只能用人才而不知人才。他對於胡林翼沒有批評，想來是胡林翼在這方面並沒有可資批評的地方。而揆之事實，胡林翼不同於曾左的地方，正是他之能多方諮訪，廣求人才而用之。這篇文章既然是胡林翼的評傳，自然值得提出一說。

柏堂師友言行記說：「胡宮保嘗言，『欲平亂須博求人才，欲富國須修明政事。』此二語可爲天下萬事法。」胡林翼對於人才的看法，在他寫給閻敬銘的信中說得很清楚。胡文忠公遺集卷六十三，「與閻丹初農部」云：

「弟才學至劣，而好善之誠，殆過時人，如憐其愚而教益之，則事猶可爲也。天下之患，不獨在盜賊，患在人心不轉，人才不出耳。人才隨時而生，患在人之不求耳。」

作爲一個政治領袖，不可能事必躬親，更不可以自恃才智，察察爲明。胡林翼深知政治藉賢才而治的道理，更知道必須廣求賢才以爲佐理，所以他不但隨時隨地留意訪求人才，而對於所得到的人才，更是多方愛養照顧，無微不至。徐宗幹歸廬談往錄中有一條說：

「文忠公晚年，專以薦賢爲務，知人善任，海內交推。」

又有一條記述其訪求人才之法，云：

「文忠公關心時事，遇四方之使，雖小吏末弁，引坐與談，舉所述聞見，隨筆記之以爲參考。若稍有志意者，則必問所見人才，所學何方，已效安在，且令指實事一二證之，兼注考語。

故凡能所在，手摺數十，諸如此類。或不知其故，以爲公何厚我而殷勤若是，則愚也。文忠薦舉人才，往往非宿昔相知。蓋由博采愼取，默具權衡，信乎大臣之用心也。」

胡林翼廣求人才而大半由於訪詢而得，這在他的文集中亦有證據可憑。如卷六十一「復李次青觀察書」云：

「奏調林鏡颿、林聽孫、閻丹銘、衞榮光、張建基、童子木六君子者，惟林鏡颿尙識面，餘皆不知，蓋訪求而得也。」

從言語訪詢中所得到的人才，往往並不確實可靠，則胡林翼亦常以親自觀察的方法以求徵驗。近人海虞老漁所撰「說曾滌笙論字」一文，曾附述胡林翼的軼聞一則，云：

「中興諸老，益陽、湘鄉、湘陰、合肥諸公，於見客之後必修報詣禮，躬入其室。文忠恆謂：凡客之請謁者，必有所備而來。若報詣逕入其室，觀其所讀書，即可知其所學，觀其衣服起居，即可知其人之奢儉，設有嗜好，亦可周知。其後合肥於同治朝初領封圻，報詣而不入室，寖失益陽意旨。至晚年，並報詣而無之矣。」

文中所說的「益陽」，即胡林翼，「湘鄉」，即曾國藩，「湘陰」，即左宗棠，「合肥」，即李鴻章也。這一條記載不但寫出了胡林翼的謙恭與李鴻章的驕蹇，也寫出了胡林翼如何藉報詣之禮，來觀察賓客的生活與言行，以此徵驗外間對其人的譽揚或貶抑究竟如何，自不難得到清楚明白的具體瞭解。亦正因爲胡林翼能用這種眼耳並用的方法勤求人才，所以他所收攬的

人才亦最有可觀。咸豐十一年八月，胡林翼以勞瘁不起，卒於湖北武昌節署，曾國藩上疏奏陳胡林翼的生前功績，除了備陳其忠勤事實以外，更縷述其推賢讓能及愛護人才的盛德，云：

「大凡良將相聚，則意見紛歧。或道義自高，而不免氣矜之過；或功能自負，而不免器識之偏，一言不合，動成水火。近世將材，推湖北爲最多。如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都興阿、多隆阿、李續宜、楊載福、彭玉麟、鮑超等，胡林翼均以國士相待，傾身結納，人人皆有布衣昆弟之歡。或分私財以惠其家室，寄珍藥以慰其父母。前敵諸軍，求餉求援，竭蹶經營，夜以繼日，書問餽遺，不絕於道。自七年以來，每遇捷報之疏，胡林翼皆不具奏，恆推官文與臣處主稿。偶一出奏，則盛稱諸將之功，而己不與焉。其心兢兢以推讓僚友，扶植忠良爲務。外省盛傳楚師協和，親如骨肉，而於胡林翼之苦心調護，或不盡知。此臣所自媿昔時之不逮，而又憂後此之難繼者也。」

又，曾國藩在覆李續宜書中更說：

「潤帥近日扶持善類，力挽頹風，於人之邪正，事之是非，剖判入微，不少假借。有權術而不屑用，有才智而不自用，皆大過人處。」

曾國藩對胡林翼之推崇，不但一出至誠，而且自媿不如，正可知道胡林翼在咸同中興三大名臣之中的地位，正應與曾國藩相伯仲，而高出左宗棠之上。只可惜他死得太早，來不及有更多的展布，便遽爾因病不起，未免是國家民族的重大損失。

胡林翼之死，主要由於憂勞過甚。這在他的文集中有很多具體的記述。如文集卷七十九復左宗棠書云：「林翼積年戎帳，精力已頹。若再遲延一二年，英葦銷歇，即再鞭策，亦無能爲役。」這還是咸豐八、九年間的情形。其時胡林翼丁母憂，適逢李續賓三河喪師，胡林翼力疾起復，親赴黃州收拾整頓，力挽危局。至太湖潛山之戰發生，陳玉成挾十餘萬衆來攻，清軍形勢危殆，胡林翼苦思對策，深夜不寐，雖終獲勝捷，而精力益形不支。至咸豐十年，遂常有氣喘吐血及精神恍惚的現象。即使如此，他在安慶之圍方急，陳玉成竭力向安徽湖北四處竄突的時候，仍復不顧病體安危，力疾披閱軍報，每至夜分。於是咯血的情形愈見嚴重。這是肺結核因勞瘁過度而日益惡化的徵象。胡林翼亦自知長此以往，勢將一瞑不起，但他仍竭力振作，要拼出最後一分精力支持到底。他在此時寫給曾國藩的信中說：「賤恙桐城王醫與作梅均言，心肺脈模糊，此是最重之症，用一分心即增一分病，用一日心即增十日病。然願即軍中以畢此生，無他念也。」又一信云：「邇日並軍報亦廢閣不閱，夜則五心如火焚，已十餘日。生死之際，如倦極思得一睡，睡着便安，即歿吾寧也之義。」果然，他終於因勞瘁不堪而致咯血愈劇，於咸豐十一年之八月二十六日卒於武昌，享年止五十歲。比較起來，曾國藩與左宗棠與他的生年相近，胡林翼是死得最早的一個。他之早死，勞瘁過度固是主因，而早年生活之放蕩不羈，或不免因斲傷過甚而種下體弱易病的遠因。

綜述胡林翼的一生事蹟，我們大致可以得到一些如下的概念。卽：胡林翼出身翰林，科名早

顯，由於自恃才智過人而疎狂不羈，在早年頗有花花少爺的模樣。但在經過一番挫折之後，事業前途蹭蹬，使他翻然悔悟，於是在捐官知府之後就一改早年所爲，立志要爲國家民族做一番事業。七年知府，聲譽鵲起，其後屢經危難，更能竭力支撐，終於能藉着他過人的才智與能力，在平定太平天國之亂的長期戰爭中大展弘猷，爲曾國藩的平吳大功做好基礎工作。胡林翼初到湖北之時，所帶的兵數少而質差，屢經挫衄，在湘軍各部中稱爲最弱。但在經歷過一番戰火的歷煉及參用湘軍營制加以訓練之後，居然壁壘一新，屢有勝捷。自此之後，湖北之軍，遂以善戰著稱。這自然都是胡林翼的收拾整頓之功。其後湖北雖經克復，而大亂之後，百事俱廢。也靠了胡林翼的竭蹶經營，方在數年之間奠立富强之基。但他仍然不以此爲滿足，於分兵四援鄰省之外，更全力支援曾國藩的東征之師，使無後顧之憂。東南大局之終能底定，至此已具備了先決的條件。咸同中興，素來以曾胡並稱，而胡林翼的才具實勝於曾國藩，只是他謙退爲懷，不肯自言功績而已。亦正因爲他處處能推功讓賢，調和將帥，以故人心歸附，士樂爲用。凡此施爲，充分顯示出一個成功的政治領袖，自然可以改造時勢，戡定大難。這樣的人物，在歷史上並不多見，而清朝政府在當時居然能够得到，實在是太幸運了。

左宗棠

「自唐太宗以後，左宗棠是對國家主權領土功勞最大的第一人。」——繆鳳林

上面所引的這段話，見於李少陵先生所撰的「左宗棠故事新編」。說這話的繆鳳林先生，則是從前的中央大學教授，歷史學家，民國三十一年考察西北歸來，對左宗棠經營西北所作的結論。類此的論點，在「左宗棠故事新編」中尚有引述，舉此一端，以略見民國以來國人對左宗棠的推崇敬仰之一斑而已。

清朝的咸同三大中興名臣，曾左胡並稱。試將曾左胡三人略作比較，曾國藩無疑是最成功的領袖人物，他的德行、器識和學問，在三人中應居第一。胡林翼才具恢閎，規模遠大，只可惜死得太早。至於左宗棠，則人稱之有覇才，假如生當亂世，必可圖王稱覇，自成一番事業。而他之所以嶄起，亦正因爲清朝末年紛至沓來的各種變亂，使滿清政府窮於應付，不得不破除資格，用人惟才，因此纔能使他以一個不第進士的舉人身份，由巡撫、總督而一直做到入閣拜相、封侯賜爵爲止。亦因爲他具有圖王定覇的卓犖才略，所以纔能在清朝末年內憂外患相互煎迫的情形之下，力排一切困難，舉西北數百萬方里已失之疆土還之滿清，博得了「自唐太宗以來，對國家主權領

士功勞最大的第一人」之美譽。從這些地方，我們可以看出，左宗棠的軍事學識與政治應當在三人之中居於第一。然則所謂咸同中興三大名臣，究竟孰高孰低，孰優孰劣，倒難下一斷語的呢！

前文已曾介紹過曾國藩與胡林翼的生平概述，這裏且來談談左宗棠。

左宗棠是湖南湘陰縣人，世居縣東鄉之左家塅。父名觀瀾，乃是縣學中的一名秀才弟三人，長宗棫，早卒。次宗植，與左宗棠同榜中舉，官至內閣中書，有文名。宗棠行高，自稱湘上農人，生於清仁宗嘉慶十七年。左宗棠二十九歲時在長沙處館，曾作詩八首，中一首述及其父母當年里居食貧之狀，有四句云：

「研田終歲營兒脯，糠屑經時當夕餐。乾坤憂痛何時畢？忍囑兒孫咬菜根。」

此詩後附自注，「研田」句下注云：「父授徒長沙，先後廿餘年，非修脯無從得食之，僅乃得活。後長姊爲余言也。」「糠屑」句下注云：「由這些地方可以教讀爲生的窮儒，家中的經濟情況並不寬裕。不寬裕的人家而仍令子弟讀書，無非希望他們能夠中舉人、中進士，由此可以入仕做官，得功名，建事業。左宗棠兄弟三人，在他父親觀瀾先生的教導之下，所走的正是此一道路也正是很兄宗棫，於嘉慶二十一年即入縣學，時年甫十三歲。宗棠自己，於十四年中秀才，入縣學。次兄宗植，更於嘉慶二十一年即入縣學，時五歲時開始從二兄入學讀書，九歲時即開始學作八股文，十五歲應童試。到了

二十一歲那年，與次兄宗植同時應湖南鄉試，宗植中是科之解元，宗棠則中第十八名舉人。既中舉人，距進士只差一階，以宗棠兄弟之才學，理應到手取來。但因科舉考試所重的是八股時文，所講究的是經義純熟，與經國濟世的眞才實學並無相干。所以雖然左宗棠的文才優美，左宗棠亦滿腹經綸，仍然不能入時文之彀，屢試屢黜，迫得左宗棠只好與他父親觀瀾先生一樣，以教書處館作爲謀生的方法。因此，他早年的生活也是很清寒困苦的。

左宗棠之子孝同所撰「先考事略」，有一段說：

「府君嘗言：吾十八九歲時，於書肆購得顧氏方輿紀要一書，潛心玩索，喜其所載山川險要，戰守機宜，瞭如指掌。兼得亭林郡國利病書及齊氏水道提綱等書，於可見諸施行者，另編存錄之。於時承平日久，士人但知有舉業，見吾好此等書，莫不竊笑，以爲無所用之。」

上文所說的「顧氏方輿紀要」，即清人顧祖禹所撰的「讀史方輿紀要」；「亭林郡國利病書」，即顧亭林所撰的「天下郡國利病書」；「齊氏水道提綱」，即清人齊道南所撰的「水道提綱」。這幾部書，都是地理學方面的有名著作，尤其是讀史方輿紀要與天下郡國利病書，正是顧祖禹與顧亭林先生窺饋史地之學多年之後，以歷史與地理相爲印證而寫成的兵要地理與政治地理，極富於經國濟世的大學問。左宗棠對這些著作大感興趣，據年譜所記，他對于這幾部書「昕夕稽究，有所證發，輒手自條記」；然而當時人却認爲他所作的，乃是無用之事，實在太使人洩氣了。在科舉考試時代，讀書人爲了希望從科舉考試中去弋取功名富貴，往往以全付精力去從事八股時文

的鑽研揣摸，而置一切與八股文無關之書於不顧。清人徐大椿曾作道情詩加以譏刺，云：

「讀書人，最不濟，讀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爲求才計，誰知變作了欺人計。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是聖門高弟。可知三通四通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那朝皇帝？案上放高頭講章，店裏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噓唏。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只是百姓朝廷的晦氣！」

這首詩諷刺清代讀書人之但知背誦八股時文，而懵然不知此外一切的學問文章，雖不免嘲謔過甚，却也正是當時大多數讀書人的眞實寫照。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之下，讀書人以應試中舉爲人生最大之鵠的，除了致力於八股時藝之揣摩學習，實在也更沒有足够的精力，可以從事於與科舉考試無關的經世實用之學了。在前面所寫的「曾國藩之科名早達，所以他纔可以在中了進士之後把八股時文一起丟開，專心去閱讀有用之書，儲備學問，以爲他日匡時救世之用。如其不然，他勢必亦要在科舉考試中蹭蹬一世，無學問事功之可言了。

左宗棠開始對天下郡國利病書及讀史方輿紀要等書發生興趣，還是他十八、九歲時的事。那時他不但不曾中舉，甚至連秀才都不曾掙得一個。而他居然不去鑽研專爲弋取功名富貴的八股時文，却要對這些與功名富貴無關的學問發生興趣，自不免要使一般庸庸碌碌的人爲之十分奇怪的了。

說到左宗棠之對這些無關科舉的書發生興趣，也是十分偶然的巧合。原因是左宗棠甫於十五歲那年初應童子試，翌年參加府試，得獲第二名，還沒有來得及等到學院按臨時參加院試（舊時

制度，各縣童生，須經學政考試及格，始得取爲縣學生員，名爲院試），他的母親余太夫人就在這年十月間得病去世了。依照從前的禮制，遭父母之喪，例須丁憂守制二十七個月。在丁憂期間，服官者須解職回籍守制，應試者亦不得參加考試。左宗棠既然不能在這段時間內參加考試，自可不必多費心思去鑽研八股文。恰在此時，他買得方輿紀要等書，讀了之後大感興趣，遂使他的思想學識都由此而進入了一個不同的新境界。到了道光十年左宗棠十九歲時，母憂未滿，他的父親觀瀾先生亦卒，又須再丁父憂。這一年，湖南善化籍的江寧布政使賀長齡因母老乞歸養親，由南京回到長沙，遇到了左宗棠。晤談之下，得知左宗棠對于兵要地理及全國山川形勢與社會情狀很有研究，大爲傾倒，於是乃在鼓勵與嘉勉之外，更將他自己所收藏的甚多官私圖史都公開出來，任令左宗棠恣意取閱。每當左宗棠讀畢一書而向賀長齡另借他書時，賀長齡必定向他詳細詢問讀書所得，相互討論研究，使左宗棠得益極多。賀長齡是清朝最先提倡經世實用之學的第一人。由于他的啓牖與獎勵，左宗棠的生平學問，在此時乃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而賀長齡之弟賀熙齡此時以御史家居，主講長沙城南書院，左宗棠在院中讀書，從學十年，所得於賀熙齡的教誨誘掖亦極多。

道光十二年，左宗棠丁憂期滿服闋。這一年，他已經二十一歲。由于他在丁憂以前還未曾中過一名秀才，而道光十二年適逢三年鄉試之期，如果要等中了秀才之後再來考舉人，勢必又要再等三年。好在那時有所謂「捐監」的辦法，就是說，未曾中過秀才而希望參加鄉試，可以出錢捐

一個監生，一樣可以下場。爲了爭取時間，左宗宗就採取了此一辦法，捐了一個監生，與他的次兄宗植一同入場應試。這一年的湖南鄉試主考官，是禮科掌印給事中徐法績。左宗棠的考卷，本來已被閱卷官所擯斥，並無取中之望。而這一年的鄉試，道光皇帝曾經特別降旨，要各主考官注意搜閱未被取中的「遺卷」，以避免人才或有遺落。徐法績獨閱遺卷五千餘卷，搜遺得六人，而以左宗棠居首。榜發，宗棠之次兄宗植榮獲第一，宗棠亦中第十八名舉人。這是左宗棠在科舉考試中所得到的最高功名。自此以後，他曾三次赴京中參加會試，都未得中進士。之後，他絕意於科舉，就此以舉人的資格終其一身。

以左宗棠與曾國藩相比，曾國藩是在中了進士之後纔讀書，這自然無礙于他的功名富貴。左宗棠還沒有得中進士，就以他的大部分精力專致於經世實用之學，自不免要影響到他在功名之途上的發展。所以，他之三赴會試而三遭黜落，說起來也就不足爲奇。惟一值得欣慰的是，左宗棠在科舉考試方面雖然屢屢不能得意，他的學問與器識，却已深爲當時的有識之人所知。如胡林翼，即是其中之一。由于胡林翼之譽揚推薦，他因此而得以結識了當時的一些重要人物，如陶澍、林則徐、張亮基等，這幾個人在左宗棠的一生事業上，都是有着很大影響力量的。

陶澍，是湖南省的安化縣人，道光時官至兩江總督。道光十七年。左宗棠正主講於醴陵縣的涤江書院時，適值陶澍乘閱兵江西之便請假回湖南省墓，道出醴陵。醴陵知縣爲這位總督大人治館舍，請左宗棠代撰楹聯。左宗棠寫了如下一副對聯：

「春殿語從容，廿載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翹首公歸。」

這一副對聯雖然不脫譽揚性質，但措語甚爲大方得體。聯中所說的「印心石屋」。以此襯托陶澍之眷念先人與道光皇帝之垂愛臣下，十分適當。所以當陶澍一見此聯時，卽大爲激賞。在訪知是湓江書院的山長左宗棠所作之後，立刻請醴陵知縣邀來晤談。一見之下，目爲奇才，竟夕傾談，相與訂交而別。以一個官居一品的現任總督，竟折節下交一個只有舉人功名的書院山長，看來未免使人感到十分奇特。而更奇特的事情，還在後面呢。徐宗幹歸廬談往錄中有如下一段記載，說：

「文襄（卽左宗棠）長女，爲陶文毅（卽陶澍）公子婦。其締姻時，文襄年少而貧，與胡文忠公（胡林翼）厠故。文忠，文毅婿也，省文毅江南督署，文襄與偕，文毅奇賞之。一日，傳優人治盛席堂上，凡三人。衆莫測其故。酒酣，文毅爲主，文襄爲賓，文忠爲介，而文毅爲主，拜，指謂文襄曰：『吾一子，無可託者。觀君志意出吾上，願乞賢女配之，俾成立。』文襄慨然允諾。文毅薨，桃始八歲，文襄乃就文毅家主持內外，歲脩三百金。如是十年。文毅家號巨富，文襄多藏書，清代掌故之類尤備。文襄日夕討論，學遂大進。文毅家號巨富，文襄佐湖南撫幕時，餉事有急，輒令陶氏輸重金爲倡，不少顧惜。其長女極賢幹，有父風，能任家政焉。」

左宗棠在三赴會試不第之後絕意仕進，就是在安化陶氏家中處館，一方面教育他的未來女婿

陶桄、一方面勤研朝章典故及經世實用之學，使他的生平學問，由此更上一層樓。胡林翼與左宗棠同年而早生四月，其年歲較左宗棠爲差長，中進士亦早。胡林翼早已是陶澍的女婿，而左宗棠爲「姻丈」，這樣的變化，看來未免滑稽。而陶澍之所以要這樣做，正是因爲他深知左宗棠器宇宏遠，志行堅毅，不但其前途未可限量，亦可託以大事之故。雖然我們不能確定，這其間有沒有胡林翼譽揚推薦的因素在內，而在左宗棠與林則徐、張亮基二人的關係中，胡林翼的居中薦舉之功，應爲明確之事實。胡文忠公遺集卷五十三，咸豐二年致湖廣總督程矞采書云：

「湘陰孝廉左君宗棠，有異才，品學爲湖中士類第一。林文忠（林則徐）、張亮基皆深知其才品超冠等倫。曾三次薦呈夾袋中，未蒙招致。此人廉介剛方，秉性良實，忠肝義膽，與時俗迥異。其胸羅古今地圖兵法，本朝典章，切實講求，精通時務。訪問之餘，定蒙賞鑑。」

又，遺集卷五十四，咸豐二年致湖南巡撫張亮基書云：

「前舉衡湘之士七人，聞其有才，未曾面晤，必可羅而致之，量才驅策。內有左子季高，則深知其才，如果長爲鄉野之人，實爲國家社會之重大損失。所以他每次遇到機會，總要將左宗棠介紹給他所熟識的長官僚友，以期望左宗棠能够出山，爲國家社會做一番事業。但在當時的政治風氣之下，人人重視科舉

考試，以爲惟有進士，翰林之類纔是有學問的人才。左宗棠不過只是一名舉人，既不容易爲人所重視，自很難在科舉考試之外另覓發展的道路。所以即使胡林翼努力爲左宗棠推轂，除了陶澍和林則徐對左宗棠十分器重之外，如程商采等，不過以等閒視之而已。倒是張亮基，平素深受林則徐的提拔薰陶，已曾耳聞左宗棠之名。及至他到湖南來做巡撫之時，正值太平天國軍圍攻長沙，軍情搶攘，國事如麻。他深知非常之時需要非常之才來匡扶救正，而左宗棠正是他所最需要的得力幫手。於是，經由胡林翼的推薦與張亮基之敦聘，僅有一個舉人功名的左宗棠，終於也參加了實際政治，開始創建他此後的事業了。

左宗棠於道光十八年第三次北上會試，落第南歸之後，就決計不再參加會試。這一年，也就是陶澍與他結爲兒女親家的那一年。翌年，陶澍卒於兩江總督任上。喪歸湖南，賀熙齡致書於左，要左宗棠去教育陶澍之子，亦即是左宗棠自己的未來女婿陶桄。自此以後，左宗棠即在安化陶家處館，前後歷時凡八年。據左宗棠年譜所記，左宗棠在這段時間所從事的學問，大致如下：

第一是，「偏覽文毅公所藏本朝憲章，重訂往歲所繪輿圖。」

第二是，因中英鴉片戰爭發生，遂詳究唐宋以來一切公私載籍中有關外國事宜之掌故，以求瞭解古代從事洋務及海防之情形。

第三是，因讀書益多而洞察世事所以敗壞不振之故。更因學問日做，人才日衰，而頗以爲農家乃生人之第一要務，遂積多時之力，撰成農書一種，名曰樸存閣農書。

第四是，他在湘陰縣東鄉之柳莊買田一區，移家居之，即以他所研究的古代區種之法，在柳莊實地試驗。並作廣區田圖說，以介紹區田種法的利益。

既然他將全部精力都放在教書、讀書、研究與著作方面，他昔年所從事的八股時文，自然已經一切棄去不爲。假如不是清朝中國在此時發生了驚天動地的大變局，他很可能即以讀書耕田的方式終老此生了。然而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發生了，湖南與廣西隔鄰，首當其衝。新調來的湖南巡撫張亮基深知左宗棠其人，由于胡林翼之推薦，及江忠源、郭嵩燾等人的敦促，左宗棠終於加入了張亮基的幕府，成爲張亮基的幕後捉刀之人。左宗棠年譜卷一，敍述左宗棠入張亮基幕府的經過情形說：

「咸豐二年壬子，公四十一歲。四月，粵寇陷全州，掠船數百，將順流趨長沙。新寧江忠烈公忠源率楚勇過簑衣渡，大敗之，寇遂東趨永州，還陷道州，分擾江華、永明、嘉禾、藍山縣境。七月，陷桂陽州。庚戌，進陷郴州。巡撫駱文忠公秉章奉詔來京，張公亮基自雲南移撫湖南。未至，駱公候代居城中，與幫辦軍務羅公繞典議防守。丙子，寇酋蕭朝貴遽率死黨，取間道掠安仁、攸縣、醴陵，犯長沙。八月，公自柳莊徙居湘東白水洞，誅茅築屋，親黨多從避亂。丁酉，張亮基至長沙。先是，胡文忠公數以書薦公於張公，張公行抵常德，發急足至山中延請公，公復書辭謝。是時，江忠烈公已追寇壁城南，書來促公行。景喬先生（卽左宗植）與郭公嵩燾亦皆勸公出，乃應聘。至則張公一以兵事任之。」

張亮基曾爲林則徐之部屬，林則徐甚爲賞識他的才能，曾以張亮基與胡林翼並稱，比之爲自己的一雙左右手，由此可知林則徐對張亮基的倚信程度。張亮基一到湖南，便把左宗棠請入他的幕府。左宗棠與他相見之下，也即刻發現張亮基是一個明爽果斷，極有作爲之人。二人氣味相投，左宗棠當然也就願意留在張亮基幕中，爲之運籌畫策，抵禦太平天國軍對長沙的攻擊行動。張亮基年譜敘次左宗棠協助張亮基辦理長沙城守事宜的情形說：

「調發兵食，於省城設立軍需總局支應一切。檄在籍知縣黃冕專任南城防守。自是清監獄、稽保甲、築月城、開內壕、製兵械，增守具，諸務畢舉。」

長沙的攻防戰，前後歷時三月。由于太平軍少而長沙城大，事實上太平軍所攻圍的祇是長沙南城一面，因此城中的守軍亦得以集中全力應付。不久，城外的各路援軍大集，而長沙城防堅固，不能破，太平軍乃捨長沙而西向益陽，掠船隻出洞庭湖，連陷岳州、漢陽、漢口及武昌，駭震乎成爲難制的大敵。此時，湖廣總督徐廣縉因畏敵逗留被逮，朝旨以張亮基署湖廣總督，左宗棠亦與之偕行。又不久，張亮基亦因田家鎮兵敗，降調爲山東巡撫，左宗棠仍回湖南。這以後，就是左宗棠入參繼任湖南巡撫駱秉章之幕府，開始他「內定湖南，外援五省」的事了。

自從張亮基由湖南巡撫調署湖廣總督以後，湖南巡撫一職，皇帝仍命調任湖北巡撫的前任湖南巡撫駱秉章回來擔任。駱秉章於咸豐三年三月再任湖南巡撫，至咸豐十年九月調升四川總督，共計擔任第二度的湖南巡撫七年有半。有關史傳頗誇張他在此一段時間之內的實際功績，但清史

駱秉章傳的文字太繁，無法轉引，且摘引一些文字較簡的其他傳記文字如下，以略見其一斑。

朱孔彰撰中興以來將帥別傳卷十四駱秉章傳云：

「詔署湖北巡撫。明年，復命巡撫湖南。當是時，安慶江寧並陷賊，粵東西土寇接踵起，貴州教匪復結逆苗爲亂，環湖南邊境游氛四逼。又自承平久，官吏習爲苟且粉飾之計，下情否隔，民困無由上達。公時以侍郎治團練，公與同心戮力，祛壅蔽，力挽積習。曾文正公方爲舉人，公欲求人才，作士氣，察民隱，及文正治師東征，糗糧船砲軍械，公悉力資給焉。左文襄公方假捐輸事拘陶文毅公之子入署。文襄遽出爭辯，公笑曰：『正欲公出耳，陶公子豈敢加以非禮乃爾？』於是談笑匙相得，文襄遂出佐戎，知無不言，言無不行，湖南之强自此始。由是天下不多駱公之能用人也。五年，武昌三陷。胡文忠公林翼已爲鄂撫，飛書告急，公悉力資給，如所以資文正者。會粵寇何祿、陳金剛等分道犯湖南，而武岡、邵陽、淑浦諸土寇時時竊發，公皆遣將討平之。自援鄂外，復以餘力援黔、援粵、援江西，徵調無虛歲。而江西之役尤偉，籌餉三百餘萬，不分畛域。……」

這一段文字敍述駱秉章在湖南巡撫任內的安內攘外功績，頗爲簡單扼要，但在開頭部分的前後次序，頗有錯亂。因爲左宗棠之入駱秉章幕，乃是咸豐三年七月始往衡陽創建水師，咸豐四年七月始率湘軍水陸之師東征，其時間均在左宗棠入駱秉章幕府之後甚久。然則所謂駱秉章與曾國藩同心戮力，以及資給湘軍糗糧船砲軍械等

事，當然也都是左宗棠參贊駱幕之後的事了。這些史事之需要加以辨明，乃是因爲清代以來的很多野史都曾說到，駱秉章第二度出任湖南巡撫，凡事俱皆仰成於左宗棠，駱秉章本人，不過坐嘯豐諾，拱手受成而已。例如清人徐宗幹所撰的歸廬談往錄中就說：

「左文襄公初以舉人居駱文忠公幕府，事無大小，專決不顧。文忠日與諸姬宴飲爲樂，文襄嘗面嘲之曰：『公猶傀儡，無物以牽之，何能動耶？』文忠乾笑而已。嘗夜半創一奏草，叩文忠起讀叫絕，更命酒對飲而去。監司以下白事，帆報請左三先生可否。……」

內室大呼。文忠起讀叫絕，更命酒對飲而去。監司以下白事，帆報請左三先生可否。……」

左宗棠行三，所謂左三先生，便是駱秉章對左宗棠的稱呼。薛福成庸菴筆記中亦有一條說：

「大學士恪靖侯左公以在籍舉人居駱公前任張石卿中丞之幕，張公既去，駱公復賓禮之。左公練習兵事，智略輻湊，駱公專任以軍謀，集餉練兵，選用賢將，屢却悍賊，兩敗石達開數十萬之衆，復分兵援黔援粵援鄂援江西，丰采幾與曾胡兩公相並，則左公帷幄之功也。駱公每公暇適幕府，左公與幕賓二三人慷慨論事，證據古今，談辯風生，駱公不置可否，靜聽而已。世傳駱公一日聞轅門舉砲，顧問何事？左右對曰：『左師爺發軍報摺也。』駱公領之，徐曰：『蓋取摺稿來一閱。』此雖或告者之過，然其專任左公可知。惟時楚人皆戲稱左公曰『左都御史』，蓋以駱公官銜不過右副都御史，而左公權尙過之也。」

凡此記述，俱可知左宗棠雖以幕賓身份居湖南巡撫之幕府，實際上却是操持湖南政柄之人。然則駱秉章傳中所說駱秉章在湖南巡撫任內的各種安攘政績，豈不正就是左宗棠的政績麼？所以

後來的人爲左宗棠編纂全集，直接就將駱秉章任湖南巡撫七年半之間所上的奏摺，亦編入左宗棠全集之內，名之爲「駱大司馬奏稿」，作爲左宗棠全集的附篇，其目的卽在使人知道此亦是左宗棠所撰的奏稿，不過假駱秉章之名奏上皇帝而已。

駱秉章稱左宗棠爲左三先生，湖南人則稱左宗棠爲左都御史，而監司以下向巡撫白事，駱秉章又要他們直接去向左宗棠請示，「公可亦可，公否亦否」。像這樣一個在籍舉人身份的師爺，豈不就等於是實際上的湖南巡撫與眞正的巡撫麼？然而實際上的巡撫以下的文武官吏，都必須奉事惟謹，卽使他刻薄少恩，人們也只有隱忍含容，不敢相較。但如並無巡撫身份而操巡撫之權，那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尤其是巡撫以下的監司大員，去巡撫不過一階，較之左宗棠的在籍舉人身份，則不知高出多少。若在平時，舉人見了本省的監司大員，應該是趨奉承應之不暇。現在只因巡撫的過分倚信，却要使監司等官事事去向被巡撫所倚信的舉人去請示，事幕賓如事巡撫，這其間就難免不會發生不愉快的芥蒂了。如果左宗棠在此時更不注意顧及幕賓的身份，儼然以巡撫的氣使，這其間的問題當然更多。咸豐九年，左宗棠因掌摑永州鎭被革總兵樊燮，以致被樊燮控告於都察院及湖廣總督官文之處，隨之而引起軒然大波，究其事實，就是由于當時的湖南布政使文格，因平素對左宗棠多有不滿，乘機推波助瀾所造成的結果。

駱秉章年譜敍述左宗棠被樊燮控告一事，曾說，「聞有人唆聳樊燮在湖廣遞稟，又在都察院

呈控」，而未曾說明此唆聳之人究竟是誰。朱孔彰撰中興將帥別傳，在左宗棠傳中亦曾提及此事，則說，「布政使，即文格。考之左宗棠年譜，左宗棠於咸豐十年三月因樊案自長沙避至襄陽所寫與郭崑燾的信，中間曾說：「抵襄陽後，毛寄耘觀察出示潤公密函。言含沙者意猶未慊，又，他在此年中寄與李續宜的書中亦說：「網羅四布，足爲寒心。」

「未至英山以前，竊自忖度，如夫己氏必不相舍，山北山南，網羅密布，即匿影深山，亦將爲金丸所擬。」

由這兩封信中可以知道，這一個隱身幕後唆聳樊燮出面呈控，又在總督官文那裏廣爲布置，必欲將左宗棠逮捕歸案而後已的人物，不但官位甚高，而且與湖廣總督官文的關係亦甚密切。

又，胡林翼於咸豐九年寫與左宗棠的信中曾說：

「間公者湘人，非鄂人。此沛公司馬之類也，何足介意。」

綜合這些資料，湖北的官，合於胡林翼信中所說的情形。再則文格此時與駱秉章之間的關係不好，如能借此將左宗棠信中所說的情形。而文格不但官高，且與總督官文同爲滿人，彼此之間的駱秉章擠掉，他自己便有希望可以升爲巡撫。一石兩鳥，也與胡林翼信中所說的「沛公司馬」相合。由于這種情形，我們可以知道，左宗棠之所以會在當時惹下這一番大禍，正是因爲他以幕賓

而隱操湖南之政柄，招怨樹敵太多。至於他因氣性剛強而致開罪多方，則在胡林翼此時所寫與官文的信中，顯示得更爲清楚。胡信原文，不見於胡林翼全集，但却載於梅英杰所編的胡林翼年譜，謂是得之於長沙張氏所藏。摘敍如下：

「湖南左生季高，性氣剛烈矯强，歷年與鄂省交涉之事，其失禮處久在山海包容之中。濮鼬所謂宰相之度量，亦深服中堂之德大，冠絕中外百寮也。來諭言湖南之案，其案外之左生，實係林翼私親，自幼相處，其近年僻氣不好，林翼無如之何。如此案有牽連左生之處，敬求中堂老兄格外垂念，免提左生之名。此係林翼一人私情，並無道理可說，惟有燒香拜佛，一意誠求，必望老兄俯允而已。」

此信中一再說到左宗棠之「氣性剛烈」與「僻氣不好」，可知左宗棠最爲人所詬病的「使氣好罵」之病，在此時已見端倪。亦正因爲他連布政使文格那樣的監司大員也得罪了，而文格與駱秉章之間的關係又並不很好，所以文格纔要唆使樊燮，在控告永州知府黃文琛的案內將左宗棠亦牽連入內，藉圖陷害報復。關于此一案件的後來發展情形，薛福成庸菴文集「肅順推服楚賢」一節中曾有記載，引敍如下：

「左文襄公之在湖南巡撫幕府也，已革永州鎮樊燮控之都察院，而官文恭公督湖廣，復駁劾之。廷旨勅下文恭密查，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卽就地正法。肅順告其幕客湖口高心夔，心夔告衡陽王闓運，闓運告翰林院編修郭嵩燾。郭公因與左公同縣，又素佩其經濟，傾倒備至。聞

之大驚，遣閻運往求救於肅順。肅順曰：『必侯內外臣工有疏保薦，余方能啓齒。』郭公方與京卿潘公祖蔭同值南書房，乃挽潘公疏薦文襄。而胡文忠公上『敬舉賢才力圖補救』一疏，亦薦文襄才可大用，有『名滿天下，謗亦隨之』之語。上果問肅順曰：『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果長軍旅，自當棄瑕錄用。』肅順奏曰：『聞左宗棠在湖南巡撫駱秉章幕中，贊畫軍謀，迭著成效，駱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難得，自當愛惜。請再密寄官文，錄中外保薦各疏，令其察酌情形辦理。』從之。官文知朝廷意欲用文襄，遂與僚屬別商具奏結案，而文襄竟未對簿。俄而曾文正公奏薦文襄，以四品京堂襄辦軍務，勵望遂日隆焉。」

左宗棠因樊燮之控案而轉禍爲福，雖是他命運中的丕變契機，畢竟得力於郭嵩燾、潘祖蔭、胡林翼之竭力營救，而肅順的推挽之功，尤不可沒。加其不然，即使左宗棠能逃出陰謀陷害者之毒手，他此後的事業，亦決不能如此順利。造化弄人，欲害之而反足以成全之，世界上的事，實在很難預料其結局。當樊案未了之時，左宗棠爲了逃避陷害的網羅而投身於胡林翼的湖北巡撫衙門，要求殺賊自效。不料事情發展到後來，皇帝却令他自募一軍，隨同曾國藩襄辦軍務，從此開始了他後半生的輝煌事業，眞是所意想不到之事。在此以前，左宗棠自以爲年逾四十而功名無望，每自嗟嘆，說：「除非夢卜覓求，此生殆無幸矣。」所謂夢卜，卽殷高宗之因夢而得傅說，周文王之以卜而得呂尙的往事；覓求，則是遠求之意。照他的意思，若不是皇帝會因夢賚良弼而致遠道前來尋求，他當已沒有建功立業的希望。

不料夢卜未來而機遇忽至，實在大出於左宗棠自己的意料之外。左宗棠初入張亮基幕府，已因長沙城守之功，由張亮基保薦爲知縣。至駱秉章任巡撫，更由知縣職銜屢次保陞至同郎中，再加至四品卿銜。至此奉旨募軍從征，所帶的職銜亦就是四品京卿。後人不察，以爲左宗棠由舉人而逕授四品京卿，乃是清朝不以資格用人的開始，其實是不對的。

左宗棠於咸豐十年秋提軍一旅，轉戰於贛東皖南之間。當時他所擔負的任務，並負責維護祁門大營的補給線安全。因爲曾國藩當時將大營紮在祁門，本打算東出徽州，應援浙江，及東北向寧國廣德，規取金陵。而祁門雖處皖南，其地却與樂平相毗通，由此通向饒州南昌，不但路程甚近，而且正是贛東產米之地，運輸便利，乃是曾軍的補給線與生命線。左宗棠到達贛東不久，即逢皖南大戰，太平軍的忠王李秀成及侍王李世賢，爲了協助英王陳玉成謀解安慶之圍所發動的皖鄂邊境大戰，也在此時策動大軍流突贛東皖南，進攻曾國藩的祁門大營，以爲南北呼應之計。左宗棠在此時以一旅孤軍奮戰而前，屢破太平軍圍攻祁門大營的計劃李世賢的大軍，不但確保曾軍的後路安全，也打破了太平軍的中興將帥別傳左宗棠傳敍次此事，略云云：

「十年秋，公提五千人由江西轉戰而前，所向克捷。曾公進兵皖南，駐祁門。僞侍王李世賢、僞忠王李秀成糾數十萬賊衆圍繞祁門西路，直趨浮梁景德鎭，斷祁門餉道。公出奇兵，與鮑提督（鮑超）夾擊，大破賊於洋塘，退入浙境。明年三月，公進軍婺源。賊犯景德鎭，陳總兵大

富屯守，戰沒，景德鎭復失。公回軍，大破賊於范家邨，八戰八克，斬馘逾萬，遂收浮梁、樂平、鄱陽、建德，曾軍糧路乃暢通。曾公奏公疊破巨寇，振江皖全局，勳績甚偉。擢三品京堂，補太常寺卿。」

這一段話，歷敍左宗棠疊破巨寇的情形，看來似甚容易。但我們若能注意到當時雙方兵力的對比，就知道左宗棠在此時所打的，實在是一場非常艱苦的硬仗。因爲左宗棠由湖南招募而去的「楚勇」，總共不過只有五千，而他所面臨的敵軍，却常達十數萬人之衆。以五千敵十萬，比數懸殊，若不是左宗棠謀猷素著，指揮若定，卽使湘軍再强，亦不能如此容易的克敵制勝。於此，我們可以抄錄一段左宗棠年譜中敍述樂平之戰的情形，以略徵其一斑。

左宗棠年譜卷二，敍咸豐十一年三月的樂平之戰云：

「庚子，曾公攻徽州，軍潰，退屯休寧，檄鮑超軍援景鎭。未至，李世賢悉引衆來攻樂平。樂平城小坍壞，公調團兵入守，令各營築壕，城東南引長畈水塞堰陷賊騎。已，寇前鋒逼外壕，圍勇夜悉遁歸，乃調一軍入城，而部分各軍守外壕。辛丑，寇大至。時官軍在壕內五千人，寇衆號十餘萬，圍樂平數十里，分起撲壕。軍士寂然，憑壕屹立，俟寇逼近，乃擊之。寇屢前屢却，相持至夜深不退，公與王開化益治軍。壬寅，寇自東北漸趨西城，仰攻益急。守壕軍士傷亡相繼，前者僵，賊後者上。於是王開化率隊趨西路，王開琳趨東路，各持短兵，視寇聚散分合。鼓聲起，越壕幷出，大呼殺賊。寇大驚擾亂，軍士鋒刃爭下，無不以一當百。游擊史聿舟礮穿右脇

死。各路乘勢衝擊，寇大奔敗，僵尸十數里。會天大風雨，販水驟漲，寇人馬相蹈藉，溺死者尤衆。李世賢易服潛遁。是役殺寇凡五千人，寇悉衆東竄。」

以五千之衆戰有利的形勢，把握戰機，誘致敵以致命的打擊。樂平城小而且坍壞，左軍力守三十數萬之敵，最好的辦法是選擇最後並且把握敵軍攻擊力竭而士氣消沉的有利時機，一舉加以擊敵軍的猛烈進攻，署正確，指揮若定，亦可看出左宗棠督辦浙以看出左宗棠之部軍之强勁善戰，臨危不懼。以這樣的指揮官與軍隊，自足可進而獨當一面，與太平軍爭衡一方的省城杭州在太平軍長久圍困之下力竭被破，浙江全省，除了衢悉數被太平軍所攻陷。浙江巡撫王有齡，亦在杭州府城及少數幾個屬縣尚在清軍失陷時自殺殉職。朝命初以左宗棠督辦浙江軍務，繼命之爲浙江巡撫。他於此時上疏奏報辦理軍務之計畫曰：

「浙江全省自金華嚴州處州失守，紹興寧波台州相繼淪陷，局勢全非。自江西入浙之道，遍地賊氛，勢非節節攻剿，不能深入。節節攻剿，又恐曠日持久，餉竭兵疲，先已自困，勢非蹈虛乘瑕，誘賊野戰不可。以東南大局見在言之，湖北江西一律肅清，皖北逆氛漸熄，諸臣聲勢聯絡，力保完善之區，以規進取，從此漸偪漸進，庶可以規進取。以江浙見在局勢言之，皖南守徽池以攻寧國廣德，浙江守衢州以規嚴州，閩軍嚴遏其由浙竄閩以繞犯江西之路，然後餉道疏通，一意進取，得尺則尺，雖程功迂遠，實効

可期。此一定之局也。」

之後，朝議以左宗棠奉命赴浙，遲遲其行，降旨促令速入衢州，以謀進規金華嚴州。左宗因再上一奏，曰：

「臣前奉諭旨督辦浙江軍務，甫三日即接徽防將楊輔清犯徽之稟。臣深恐徽婺疎虞，則江西饒廣腹地，防不勝防，而衢州又成孤注。不得已派馬步三千交劉典，爲固婺援徽之計。擬此軍即由徽入浙，臣由玉山入浙。旋城衆數萬，已由遂安開化，逼婺東，與徽郡賊相首尾，其勢又出官軍之後。頻年東南賊蹤，每遇堅城，必取遠勢包圍，待自困而後陷之。辦賊之法，必避長圍，防後路，先爲自固之計，乃可以制賊而不爲賊所制。臣若先入衢州，無論不能固江皖邊圍，亦且不能壯衢城聲援，一入逆賊長圍詭謀，又成糧盡援絕之局。故決計由婺入浙，先攻開化，以清徽郡後路，分軍由白沙關扼華埠、收遂安，俾饒廣兩郡相庇以安，然後由遂安以援衢州，目前固不能舍衢前進也。……」

左宗棠在這兩個奏疏中提出了他規復浙江的戰略觀點。第一，由于淪陷的地區太廣大，而左宗棠的兵力又少，若不能「乘虛蹈瑕，誘賊野戰」，以相機擊破浙省太平軍的主力，左宗棠必不能以微少的兵力節節攻剿，轉戰深入。否則即使不致陷于糧竭兵疲，亦將因攻堅不下而消耗元氣，無法達到預期之作戰目的。第二，由于太平軍慣採遠勢包圍，截敵後路的戰術，左軍進取浙江，亦當避長圍，防後路，先爲自固之計，然後乃可以制敵而不爲敵人所制。基於此一觀點，他

更加必須將他的野戰兵力小心運用，以期適時捕捉敵軍的主力而加以殲滅，決不可貪得攻城掠地之利，而反陷入敵軍的包圍詭計。我們從左宗棠率軍入浙以後的作戰情形看，可以發現他後來所恃以規復浙江全省的戰法，就是前面所述兩大戰略觀點的引伸。只是因爲後來滿清政府逐漸增加他所統率的兵力至三萬餘人，使他可以有足够的兵力鞏固業已收復的地區，由此得以放膽前進，無虞後顧。而兵力既厚，亦可以使他有力量從事於太平軍堅守不出，亦可以將他們圍之於一城一地而加以殲滅。所以，看起來好像是他在後期的戰略部署與前期頗有不同，其實仍與他最初所構想的戰略觀點並無異致。

於此，我們當可知道，左宗棠之規取浙江，正是勝算在握，可以計日程功。所以然之故，則是由於他在軍事學方面的素養極爲深厚，一旦施諸實用，立可見之成功的道理了。左宗棠在駱案發生時嘗欲在曾國藩或胡林翼部下任一營官，以求殺敵自效。當時他在寫給李續宜的信中說：

「八年戎幕坐嘯，未克親履行間，實爲闕事。照他信中的意思看，他當年在駱秉章的幕中，雖然能手握兵符，運籌帷幄，指揮湖南全省的兵將從事內剿，外援鄰省，究竟不免要被人譏爲只能坐而言而不能起而行的白面書生，很希望能適時實驗一番，以證實他在書本上學得的戰略戰術原則，究竟是否眞正有用。而自他親率一軍轉戰於皖、浙三省以來的實際表現，我們已可知道，左宗棠的兵學造詣，不但可用於幕僚作業，亦可用於一軍之中，左宗棠的軍事才能，應居第一。這也更

加可以知道，此後的西北平回之役，自當以左宗棠爲最適當的統帥人才。

由咸豐十一年至同治二年十一月，浙江全省的太平軍漸次肅清，只餘下杭州省城尚在太平軍的控制中。至於杭州以北，由武康、德清、湖州通往江蘇的水路，亦尚在太平軍的控制中。至於李鴻章的淮軍正由蘇州進攻常州，曾國荃在南京城外的圍城之軍，亦正逐漸縮小對南京的包圍。太平天國的形勢日蹙，其覆敗似已可預見。但左宗棠以爲，各路進軍如但知集中全力進攻名城大邑，對於太平天國殘餘軍力的可能突之路不知預先注意防範，實爲可慮。因此在此時奏上一摺，提出他對此事的意見說：

「金陵寇勢已蹙，句容溧陽廣德均爲賊據，其必由此逃竄，殆無可疑。臣三次函商曾國藩，請其注意廣德。設寇由廣德竄入皖南腹地，晝夜疾馳，不數日即可出險，恐守城各將，來弗擊，去弗追，終成不了之局也。曾國藩所慮，以無大支游擊之師。臣竊以爲賊勢實窮，官軍兵力亦未爲薄，如權緩急應之，蘇州既克，杭州之圍正急，海寧嘉興之賊，不足爲蘇州之患也。常州陳坤書，李鴻章言其不甚耐戰，暫舍不攻，金陵破，常州必應手而下。惟溧陽守賊，賊竄必假道於此。李鴻章如暫緩嘉興不攻，由無錫移軍急攻宜興溧陽，西北與李世賢狡悍著聞，曾國藩溧水守軍聯絡，縱未能即拔，較空此一路任賊竄過，自爲勝之。曾國藩力持堅守之議，見

正布置皖南江西防兵，固爲老成之見。然賊知我以堅守爲主，必不攻，各將以堅守爲事，必不戰，倘賊舍城不攻，從間道疾馳而過，恐調撥尾追亦有所不及。何如厚集兵力，扼廣德建平東壩，與李鴻章一軍聯絡之爲得乎？臣思慮所及，敢畢獻其愚。……」

這一奏疏，明白說出了左宗棠對江浙各地太平軍殘餘勢力行將肅清之前的可能疏漏，種防範措施。照他的看法，金陵、杭州、嘉興等地目前雖仍在太平軍固守之中，但早晚必克，絕無疑問；所成問題的是，太平軍在蘇浙皖毗連的溧陽廣德等地仍保有大部軍力，假使曾國藩的皖之軍，不能與李鴻章的上海軍東西聯成一氣，在南京與蘇州之間建立一條有力的封鎖線，萬一此寇向皖南贛東一帶流突，即使金陵已破，仍將成爲不了之局。他的此一顧慮，事後證明極爲正確。因爲在南京城破之後，小天王洪福瑱在南京城中逃出，在溧陽廣德一帶得到了李世賢與汪海洋的接應，仍有數萬之衆，由皖南向贛東逃竄，流突於贛閩粵三省邊界之間。其後洪福瑱雖被江西的清軍捕獲，李世賢汪海洋則在沿途裹脅民衆，又發展成一支龐大的叛亂力量，最後仍須由清政府調集數省大軍，費了一年多的時間實行圍剿，方將他們在廣東嘉應一帶完全消滅。若是早依左宗棠的意見預作防範，何至出此重大紕漏？所以左宗棠的顧慮，可謂洞曉先機，甚有遠見。但曾國藩在當時既無游擊之師可以布置調度，李鴻章又藉口常州尚未攻下，他的軍隊不能越常州而遠攻溧陽，所以左宗棠的建議雖然高人一等，却未能爲當時之人所重視。左宗棠與曾國藩之間，後來因奏報南京城寇逸出之事發生齟齬，至於彼此交惡終身，不知是否也與此事有關，就不得而

知了。

杭州、常州、南京等重要根據地先後爲清軍克復之後，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在表面上算是已經全部平定。爲了酬庸功臣，曾國藩和曾國荃兄弟，一封侯而一封伯；左宗棠與李鴻章，也都得到了伯爵的封賜。左宗棠先已於同治二年四月由浙江巡撫陞爲閩浙總督，至是更蒙詔旨加太子少保銜，賞穿黃馬褂。上距他因樊燮控案而僕僕於湘鄂道上，飽受虛驚之時，不過只有三年多的時間而已。一個舉人身份的巡撫幕賓，在三年多的時間之內就做到了兼轄二省的總督，左宗棠的成就，看來實在不凡。由此亦可知道，非常之才如能值非常之時，而又得到非常的知遇，必定在很短時間之內就會振翮直上，一飛沖天。如左宗棠，就是極明顯的事例。不過，左宗棠的才學畢竟不凡，他的成就，尚不能侷限於此。因爲當時的清朝政府，內憂外患，正方興未艾。太平天國之亂雖平，而北方的捻亂，西北的回亂，還正如野火燒山一般地燎原未已。至於外國列强之眈眈而視，更不知禍在何日。欲圖攘外，必先安內；欲圖禦侮，必先自强。這正是當時的朝野上下所感到亟須解決的嚴重課題。左宗棠此時既已由在野變而爲在朝，並且躋位通顯，隱隱然成爲朝廷與百姓的重望，自當殫精竭慮，克盡忠貞，以挽救國家民族所面臨的大難。所以，我們在此後所看到的，便正是他如何收拾整頓及發奮圖强的種種事蹟。

左宗棠的一生事功，可以數得出來的重大功勳有三——平浙、平捻及平回。平浙的功績偶在一隅，平捻亦不過在全部剿捻戰史中略占一部，兩者俱不是豐盛宏偉的不世勳業，而平回則不

然。後人追論左宗棠對國家民族的最大貢獻，就是他能够把中國自陝西甘肅以至新疆的一大片廣袤土地，從接受外國人支持的回教叛民手中奪取回來，仍舊置於中國版圖之中，使得業已破碎的金甌仍歸完整，這一偉大的功績，就遠非他人之所能及。本文在一開頭就引用前中大教授繆鳳林先生的話，以爲左宗棠是唐太宗以來最了不起的民族偉人，此一讚譽，就是由于他的平回功績而來。下文我們就要談到這一方面。

中國的西北各省，自昔爲漢回雜居之地。其中以新疆的回族人數最多，民族問題也最複雜。新疆以東，自青海寧夏甘肅而至陝西，漢族漸多而回族漸少，但漢人信奉回教的人數仍然極多。所以，中國的大西北，可以說是回教的世界。在滿清統治時代，滿清政府對信奉回教的人民頗爲輕蔑而且歧視。兼因民族背景之不同，因此遂使回族與漢族，及信奉回教之漢族與不信仰回教的漢族之間，彼此均有仇隙。再加上回教本身亦有新舊教派之分，爭執時起，而政府對付這些教派的態度又常是袒舊教而抑新教，因此，回教中的新教爲了與舊教鬪爭，就往往採取反清的立場。反清，不一定能得廣大教民的支持；如果在揭櫫反清之時，更利用民族仇恨煽動回民「仇漢」，所能得到的支持力量就大了。於是，宗教糾紛與民族糾紛及政治糾紛結合在一起，最容易發生大規模的動亂。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中央政府的力量足以鎭壓防範，自然可以勉强相安一時。但如政府的統治力量一旦發生動搖不穩，情勢就不一樣了。清同治年間的陝甘回亂，就是在這樣的情勢下發生，最後並且由陝甘蔓延及于新疆的。

以新疆與西北其他各省相比，情況又自不同。原因是新疆於雍正乾隆以後方始版圖。當時的滿清政府爲了自私自利之目的，藉口新疆的地位重要，情勢特殊，並地方行政機構，而只以滿人之親貴派充將軍、參贊、辦事大臣、領隊大臣等職，置於軍事統治之下。被派到新疆去作將軍、大臣等官的滿人，也知道這是皇帝對他們的「調劑」，一到新疆，無不視之爲發財之利藪，貪污作弊，營私肥己，無所不用其極。更不堪的，還縱使所屬的兵丁胥役，任意魚肉百姓。這就使得新疆的民族糾紛、宗教糾紛、與政治糾紛更形尖銳，由外國力量爲之支持，希望在新回教領袖張格爾藉口南路參贊大臣斌靜無理壓迫同人的野心份子也更容易萌生覬覦不軌之心。發生在道光年間的張格爾之亂，就是新疆製造獨立，並將滿清勢力逐出新疆的叛亂運動。在那一次的變亂中，南疆的西四城淪陷，事情幾乎鬧得不可收拾，得了布魯特的軍事力量爲支持，希望在新了同治年間，滿清政府因內憂外患而弄得東支西絀，迅速敉平，釀亂的因素却始終未能改善。到大的回民叛亂，於是新疆的回民也勾結了安集延部的發生了規模龐的叛亂不久便逐漸擴大，新疆全部淪陷。這時，布土酋長阿古柏，帶兵侵入喀什噶爾，擁立張格爾之子布土爾克爲王。其後，西寧方面的一個回教領袖妥得璘，也在廸化僭號稱王。南疆與北疆的回教王國。滿清政府對付陝甘方面的回亂，已經感到餉絀兵單，敉平無力，對于打敗了妥得璘，囊括了新疆的絕大部份領土，稱畢修勒特汗，其目的顯然要將新疆打成一個獨立這個遠隔在數

千里外的新疆，更加覺得心餘力少，無法可施。若不是左宗棠在這時力任艱鉅，收拾整頓，眼看這廣袤數百萬方里的大片土地，就要從此淪爲外人所有了。

左宗棠奉朝命移督陝甘，是同治五年九月間的事。這一年，他五十五歲。在此以前，當他還在福建做閩浙總督的時候，滿清政府曾因陝甘回變連年不能平定之事，降旨向他詢問平定方略。他以爲剿寇並無困難，無論是騎戰步戰，只要訓練熟習，裝備充足，自足以克敵制勝。所成問題的是，陝甘自經回亂之後，人民被殺戮殆盡，田地拋荒，物產凋耗，不但軍餉籌措困難，而且有錢無處買米，這纔是最需妥籌對策的重大難題。所以在進兵之外，仍應同時舉行屯田之法，衝要地區用軍屯，偏僻地區用民屯，雖然耗費較多，總要比無糧可覓，懸軍待哺的情形好得多。他當時並沒有料到朝廷會將平定陝甘回亂的重大責任交付給他，只是就事論事，據實敷陳關于此事的意見而已。殊不料當時的朝中，正因陝甘亂事了結無期，難覓可以任事之人而焦慮無策。論到善於知兵之督撫大臣，在平定太平天國的戰爭中儘不乏戰功卓著之人。滿清政府在富有作戰經驗的湘軍將領中尋覓，先找到了在四川做布政使的劉蓉，擢升他做陝西巡撫，命他帶湘川之軍入陝剿同。其後因對太平天國的作戰行動將近結局，又將督辦江西軍務的欽差大臣楊岳斌調爲陝甘總督，命帶所部湘軍西征。劉蓉在陝西，僅能勉强應付流突入陝的太平軍與捻匪。至於楊岳斌則困處蘭州，一籌莫展。因急於成功之故，把軍隊全都開入甘肅，結果弄得後路被截，餉道中斷，甘肅本身又無餉可措，於是軍隊潰變，他自己則除此之外，李鴻章雖然很有幹才，此時正負責剿

捻，無法更動。而左宗棠恰在此時侃侃陳奏陝甘回亂不難平定，於是，「平回」的重責大任，便自然而然地落在他的身上了。於是，他在三個多月之後奉旨調爲陝甘總督。

同治年間的陝甘回亂，在釀變之初，原本是性質比較單純的種族糾紛與宗教歧異，倘能妥善疏導，剿撫並施，並不難於平定。但漸到後來，由于戰亂之延長而使情勢變得複雜，便愈來愈不容易解決，而若干野心份子也很想利用這種混亂情勢來發展他們的政治陰謀了。如盤據甘肅金積堡的叛回首領馬化漋，便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關於馬化漋與金積堡的情形，我們可以先看左宗棠年譜中有關此事的敍述。

「馬化漋所居金積堡，當秦、漢兩渠間，扼黃河之要，地形絕險。貿易通西北各省及蒙古諸部，擅有鹽茶之利。馬化漋始以新教煽惑回民，西寧、河狄口外之回，皆崇奉之，遂潛圖雄長諸回部。環金積堡寨五百有奇，屯聚黨衆，占取漢民產業婦女，寧靈數百里間並被其害。董志原回久與通市，馬化漋助使入擾，而收其所掠財物。又陰嗾所部，出掠蒙古藩部。穆圖善署總督，馬化漋陽輸銀米歸誠，穆圖善遂任以招撫之事。乃益修築堡寨、購馬、造軍械，與陝回相首尾。陝回敗，則資以糧械戰馬，往往爲公軍所捕戮。而穆圖善始終信之，數爲奏請，至賞加提督銜。」

寧夏的金積堡，就是古代的靈州。宋代的元昊，曾在此地建西夏國，割據僭號，歷時二百數十年，宋朝政府始終無法討平。不得已，只好每年給予歲幣歲帛，以免夏人之入寇抄掠。至於董

志原，則地在甘陝接壤，當時乃是叛回在甘南的主要根據地。馬化滌據有金積，富馬壯，又得新教回民的傾心歸附，在陝甘回亂中看見歷任的總督將軍都是一些怯懦很有乘時崛起，割據一方的野心。他一方面藉名歸順玩弄滿清官吏，一方面在暗中叛回，其目的無非希望將陝甘二省的混亂局勢無限期的延長下去，一旦羽翼豐滿，一般地立國稱王了。陝甘回亂之歷久難平，雖說官吏無能與兵不能戰亦是重要的原因，而其中的主要的癥結，還是在於馬化滌之陰謀策動，與穆圖善之流的人物爲其所愚，反而對馬化滌之外，西寧方面的馬占鼇，大致情形亦相彷彿，不過在諸人之中以馬化滌勢力最強，爲害亦最大。所以，表面上看來似乎只是漢回仇殺與新舊教的鬪爭，而演變到後來，却已隱藏着僭號割據的潛在危機，情勢極爲複雜，處理起來亦極爲困難。

仇殺與械鬪，不難依法處置。所成問題的是，明明知道其中存有僭逆與謀叛，亦儘有國家憲典在，不難依法處對一切公開的討伐，便不是單純的軍事力量所能解決的了。何況陝甘的動亂歷時數年，人民殺戮，地畝拋荒，物產彫耗，無論是征討或招撫，都互相袒護，竭力反決。面對這種情勢，庸劣無能之人固然一籌莫展，才幹敏練之人也一樣躊躇却顧。左宗棠家書中有寄諸子書云：

「吾移督陝甘，有代爲憂者，有快心者，有料其必了此事者，有怪其遲久無功者，吾概不介

意。天下事總要人幹，國家不可無陝甘，陝甘不可無總督，一介書生，數年任兼圻，豈可避易就難哉！」

看了這樣的話，我們不能不佩服左宗棠勇於任事與不避艱危的偉大精神。事實上，當時並沒有另外人更有如此偉大的抱負與胸襟，也並無其他人更有如此的才具足以擔當此一艱巨的任務。左宗棠之所以要這樣不避艱危，一方面固是他公忠爲國的精神使然，一方面也因爲他自認有此把握可以勝任此事，故而毅然引爲己任，立志要爲國家消此隱憂。左宗棠書牘中有與友人夏小濤之書云：

「西事大類蘆灘，失今不圖，西陲恐非復朝廷所有。弟不自忖量，引爲己任。……又有與浙江巡撫楊昌濬書云：

「西事大類蘆灘，當事知其不了，欲以不了了之。……」

由這些話中，我們很可以看出，左宗棠之所以毅然要以西事爲己任，正是因爲他目擊西事危急，而當事者猶復顢頇畏葸，勢必要將陝甘請寧這一大片土地完全斷送不止。因此他不得不挺身而出，要竭盡一身之力，爲國家民族保存此一塊土。至於他當時何以有此把握，敢於挺身而出呢？我們只要看他以後的施爲次第，便可知道他本自成算在胸，邱壑分明的。

左宗棠奏稿卷二十一，同治六年正月由閩赴陝，行次漢口時所上「敬陳籌辦情形」一摺，其中縷陳他對於剿捻剿回的計劃說：

「今所患者，捻匪回逆耳。以地形論，中原爲重，關隴爲輕。以平賊論，剿捻宜急，緩。以用兵次第論，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後客軍無後顧之憂，餉道無中梗之患。……回多於漢，蘭州雖爲省會，形勢孑然孤立，非駐重兵不能守；駐重兵則由東路分剿各路之兵，又以分見單，不克挾全力與偕，一氣掃盪。將來臣軍入甘，應先分兩大枝，由東路廓清各路，分別剿撫，俟大局戡定，然後入駐省城，方合機局。是故進兵陝西，必先清關外之賊；進兵甘肅，必先清陝西之賊；駐兵蘭州，必先清各路之賊。然後餉道常通，師行無梗，得以一意進剿，可免盧圍之虞。亦猶之江皖布置周妥然後入浙，浙江肅清然後入閩，閩疆清然後入粵。已復之地，不令再被賊擾，當進戰時即預收善後之效，民志克定，兵力常盈。事前計之雖似遲延，事後觀之反爲妥速。自古邊塞戰爭，屯田最要，臣已屢陳其利矣。漢宣帝時，先零羌反，趙充國銳以自任，所上屯田三疏，皆主持久之議。宣帝屢詔誚責，充國持議如初，卒收底定成效。可知兵事利鈍，受其事者固當身任其責，至於進止久速，則非熟悉彼已長短之形，饑飽勞逸之勢，隨機立斷不能，此蓋未可臆度而遙決者也。臣頻年轉戰東南，於西北兵事，未曾經歷，所部南方健卒，於捻回仗倆並無聞見，若不愼之機先，加以迫促，誠恐所事無成，時局亦難設想。伏懇皇上假臣便宜，寬其歲月，責臣以西陲討賊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明軍令。臣惟勉竭駑鈍，次第規畫，以要其成。剿捻剿回，均惟事機所在。若兵力未集，馬隊未練，屯務未舉，車營未成，則無所藉手以報君父，雖身任咎責，無補時艱。此則耿耿愚忱，有不能不預爲披瀝者。……」

這一道奏疏，大致已經勾繪出他此後在陝甘剿剿捻剿回的具體情形。而他從同治六年十二月因追剿西捻而馳驅於山西河北諸省，至西捻剿平後入京陛見，皇帝及太后詢問他平回需時幾年，他對以需時五年。及後他於同治七年十月回抵西安，由此節節展開攻剿，由陝西而甘肅，由甘肅而寧夏，由寧夏而青海，至同治十二年九月關隴寧靈全部肅清，前後時間，恰爲五年，適符前言之期，說來也實在是很湊巧的。其中的實際作戰經過，亦正與他在此疏中所說的一樣——先逐步肅清後路，然後節節向前推進，不貪近功，不求速效，收復一處地方，即辦妥一地之難民賑濟及善後復員工作，所以戰事甫經結束，地方已有欣欣向榮的生機。自古以來，料理兵事與民事能够像左宗棠這樣有條有理，一絲不紊的，實在少見。然而這一切似乎是在一開始即已了然於其胸中，這一種大經濟大學問，也就太不容易了。

回顧左宗棠在同治七年至十二年用兵關隴所遭遇的實際困難，我們當可體認出左宗棠爲了平定陝甘回亂，所耗費的心血是何等的勞瘁艱難。

首先需要提出來的，乃是籌措糧餉及運輸方面的困難。這一困難問題，在關隴用兵所遭遇的各種困難之中，應爲最大的一種。爲了解決此一困難，所耗費的心血也最多。下面先摘錄左宗棠奏疏及書牘中的一些文字，以略見一斑。

書牘卷十七頁四十六答吳子健書曰：

「弟自出山以來，備嘗艱苦，由湘入閩，均未嘗請撥部款。蓋東南諸省，尙可於捐款厘務設

法，比調督陝甘，則偪入窘鄉，一籌莫展矣。隴之苦瘠；甲於天下，通省地丁錢糧征收額僅二十七萬兩有奇。變亂以來，徵收十不及一。所恃以支持數年者，專在省關協濟。其仰面求人，良非得已。」

這一段文字說出了甘肅本省籌措兵餉之困難。爲了養兵，爲了購辦糧秣器械與軍火，這一切費用之所出，都來自各省的協濟，也就是戶部分撥的所謂「協餉」。爲了求討協餉，左宗棠必需運用各種關係軟求硬討，然而仍然有解有不解，以致軍餉奇絀，困苦萬狀。如光緒東華錄中就有一條說到西征之餉，

「各省撥解之數，有過半者，有不及一半者，惟湖南止解三分之一，河南撥解不及十分之一，廣東福建四川，欠解亦多。」

又光緒東華錄引左宗棠奏疏云：

「臣二次督師入關度隴，各省每年解到協餉約五百萬兩。合捐輸入款，極力撙節支銷，截長補短，挪東掩西，每年虧挪百數十萬兩。」

各省協餉解不足額，影響所及，一是軍士及官長的月餉不能依時發放，不免影響士氣。但這還是小事，較此更爲重要的，則是因此而使糧秣的採購及運輸都發生延誤，軍士無米果腹，勢將無法打仗，這問題就大了。

左宗棠奏稿卷卅二，同治八年五月十九日奏請勅各省力籌協餉摺云：

「臣軍餉事短細，蒙天恩諭各省，除每年原協臣軍餉銀三百三十萬兩，署督撫臣劉典軍餉銀六十萬兩，又一百二十萬兩，署撫臣劉典軍餉銀六十萬兩，又添撥厘金三百萬兩。各省如果遵旨分撥起解，臣自可一意馳驅。乃函牘頻催，自正月起截至四月底止，計各省應解銀二百三十萬兩，除穆圖善解不計外，其解到並起解在途者，止七十餘萬兩，臣與劉典軍積欠已久。而自董志原平後，令各營前進，就近墾荒布種，招輯流亡，所需經費，不得不於正餉內通融挹注。五月節前，各軍僅求一月足餉，迄不可得。秦隴用兵，籌糧難於籌餉，籌轉運又難於籌糧，古今不易之局。而采糧轉運二者，尤非實餉到手，無從籌措。雖有良將，不能點鐵而成金；雖有神兵，不能煮沙以當粥。迫軍士因饑致潰，伍籍空存，搜括民糧以爲食而民亡，強募游手以充兵而兵廢，卒致戰不能戰，守不能守，楊岳斌之急赴隴西趣戰而潰，穆圖善之急保蘭垣竭蹶而危，足爲前鑒。臣奉命出師，豈敢逗遛不進。然不預將後路稍爲布置，餉道概予疏通，而貿然前行，再蹈覆轍，其必貽朝廷異日之憂也決矣。臣才智技能與閱事之久，無以加於楊岳斌穆圖善，而責任之重，時局之艱，無以異。此後師行愈遠，得餉愈艱。應懇天恩勅下各督撫臣，於協撥陝甘各款，按日如數解到西征糧臺，毋有短缺，俾得預爲布置，速赴戎機，大局幸甚。」

然而即使有左宗棠的力疾聲呼，以及皇帝的煌煌諭旨，各省協餉之依時如數解到者，仍是寥寥。大部分的情形是解八成而欠二成，或者指東抵西，設法抵賴不解。在無法可施的情形之下，一般所用的應急辦法是：

「於餉銀解到時，先儘購運糧食、草料、軍械、軍火之需，每月每營儲六、七百兩，俾勇丁長伏聊資餬口。至疾病之藥餌，傷亡之卹養，與夫統領營哨官以故將領雖極窘乏，而士卒尚免饑疲。」

由于官長與士兵的欠餉雖多，生活雖苦，全軍上下始終鬪志堅強，士氣不隳。相傳左宗棠駐兵安定時，歲暮天寒，雪壓行帳，帳篷中的溫度極低，左宗棠仍是照樣穿着他的老羊皮袍子，手披圖籍，據案批閱軍報不少懈。蘭州道蔣凝學勸他移住蘭州督署，他批覆云：

「該道稟請移節省垣，自是體念衰軀之意。惟念前敵諸軍冒寒履冰，袒臂鏖戰，本爵大臣斗帳雖寒，猶愈於士卒之苦也。所請應作罷論。」

又，左宗棠奏稿卷四十七，光緒元年九月奏請以楊昌濬來甘相助一摺，中云：

「臣之馭軍，別無才能權智，所恃者誠信不欺，絲毫不苟，不敢以一時愛憎稍湖湘子弟習而安之，雖欠餉積多，尤無異說。」

人心。行之既久，凡此俱可以說明，由於左宗棠之與士卒同甘共苦，誠信不欺，西征士兵深知欠餉是由于協餉不解所致，雖處于困極苦之境地，始終能含容隱忍，奮勉到底，而全無怨言。由這些地方，我們看到了左宗棠公忠爲國，白首行邊，勤勞刻苦的實際情形。

籌餉之外，與士兵生活打成一片，精誠感孚，與士卒同樣困難的問題，是籌糧。俗語說：「大軍未發，糧草先行。」意思說軍隊

的補給要在行軍之先就準備妥當。作戰而缺乏糧秣的供應，雖猛將銳卒亦將因饑疲而致潰敗。但陝甘的情形如何呢？左宗棠書牘卷十，答蔣之純書云：

「秦隴兵燹連年，各處千里無人。陝之延榆綏鄜，甘之平涼涇固，一望黃茅白骨，蒿目心傷。」

大亂之後，人民死亡流徙殆盡，地畝拋荒，一片榛莽，根本沒有糧食生產，所以征西大軍所需的糧食，必需先從外地購運。但西北地方山嶺崎嶇，轉運困難，從湖北河南等地購買糧米運達陝甘前線，不但運輸工具也極難覓致，籌購籌運，勞費萬狀。所以左宗棠要說：「秦隴用兵，籌糧難于籌餉，籌轉運又難于籌糧。」為了解決這些困難，左宗棠向來主張屯田，一可供官兵食用之需，二可省轉運之費，三可為善後工作奠定基礎，凡一舉而三得。所以凡是西征大軍所收復的地方，左宗棠都要命令那些距前敵較遠的隊伍，利用戰守之閒暇，在附近從事耕作。所收穫的糧食和蔬菜，即由營中作價收買。這樣做法也有幾項好處：第一，兵士不致習逸成惰；第二，多種則多穫，可以增加士兵的收入；第三，耕熟之地准由原主認領，可使逃荒的地主聞風而趨，自然而然地發生招徠的作用。至於百姓有願墾荒的，左宗棠不但發給籽糧且按丁口大小，逐日給米，以為餬口活命之計。左宗棠奏稿卷四十，同治十年八月奏曰：

「陝甘頻年兵燹，子遺僅存，往往百數十里人煙斷絕。新復之地，非俵給牛種賑糧，則垂斃之民，殆將盡填溝壑。各省克復一郡縣，收一處丁糧厘稅；甘肅收復一郡縣，即發一處牛種賑

糧。非如是則有土無民，朝廷亦安用此疆土也。」

百姓墾荒所穫糧食，也由軍隊照市價購買。亂足以發生鼓勵招徠的作用。對於甘肅境內作戰力極免其流落爲匪，一方面轉兵爲民，辦法令他們從事屯墾，給予荒田使之耕種，一方面散遣餘兵的善後工作。如此，凡是征西大軍所收復的地區，不久便有糧食生產，可以補充前方軍隊的需要，而收復區內的善後復員工作，也逐漸地走上了軌道。在事後看來，這樣的做法當然極其正確；而在實施之當時，正不知費却多少心血。更因各省協餉不繼而致軍費短絀，糧等復員所需，亦必須從軍費內抽撥勻支，在調度上便更不免捉襟見肘，困難重重。凡此牛種賑問題之外的第二種重大困難，乃是來自朝中和同僚的掣肘。這種困擾，足以影響到他原預定的軍事計劃，使之無法依時實施。爲了克服這種困難，又不知費盡了多少周章。

盤據金積堡的回酋馬化漋，左宗棠早知他便是陝甘回亂的幕後領導之人，所以一開始就以此爲目標，以爲如能拔此根株，卽可收正本清源之效。殊不知當時署理陝甘總督的圖善，對此根本抱着不同的看法。一切的阻撓和掣肘，便都由此人而生

穆圖善是滿洲人。清朝末年，滿洲人靠着他們豐鎬世家的身份，養尊處優，盤踞要津，一向最善於作威作福，貪污舞弊，但是却最沒有能力領兵作戰，應付困難。遇到地方發生叛亂，他們所惟一能拿得出來的辦法，便是招撫。穆圖善署理陝甘總督，轄下的兵力多至一百四十營，年耗

兵餉一百二十萬，但却應付不了境內的回亂。馬化滾看準了穆圖善之貪庸無能，因此藉此玩弄穆圖善於掌股之上。左宗棠家書中有一信述及此事，云：

「甘肅官兵事，均不可問，整理最難。以前署督庸妄太甚，而樞廷袒之也。馬大總戎，稱官軍爲敵人。穆將軍三年前辦此不了，遂以撫局羈縻之，並劾主大，封授僞官，自稱其實中外無不知馬化滾之紓爲異患也。穆又自陳得馬化滾糧數千石，其實納賄亦不少。阿拉善王上書於我，痛詈穆將軍。穆曾奏馬化滾爲良回，隱以我爲激變也。與旗員鬧口舌，是吃虧事，與前任爭是非，非厚道。然事關君國，兼涉中外，不能將就了局，且索性幹去而已。」

由于穆圖善得馬化滾之厚賄而處處爲之包庇，故當左宗棠的大軍肅清陝西，又攻下甘南董志原的回匪巢窟，兵鋒漸向金積堡時，穆圖善就奏請朝中，以河州總兵胡昌會率同馬化滾安撫同衆，及以南路河狄之回阻梗蘭州餉道爲言，請旨飭下左宗棠移兵南向秦州，以阻撓左軍之進剿金積。左宗棠覆奏，以爲駐軍當求居中調度，而秦州地偏南路，不能兼顧北路中路，又其地無賊，亦不可避勞而就逸。朝旨以爲是，於是命劉松山由董志原北向定邊、花馬池、趨靈州及金積。馬化滾此時，一方面據堡堅守，一方面以劉松山濫殺激變爲詞，唆使綏遠將軍滿人定安上疏訐奏劉松山輕進濫殺激變。及至朝旨命左宗棠及穆圖善查奏，則穆圖善又堅執馬化滾係「已撫良回，劉松山激成事端，恐甘省兵禍無已時。即將來左宗棠剿而後撫，亦未必能堅回民之信。奴才不敢知

而不言，聞而不顧。」左宗棠因此覆奏曰：

「馬化滕之陰賊險狠，天下共知。自就撫後，築寨修堡，購馬造械，仍與陝回互相首尾。陝回敗則資以馬械，仰其鼻息。且常嗾陝回窮則助以軍糧，從前屢見章奏。自靈寧西達西寧，南通河所部掠蒙古回部。定安所訊據活賊白天才之供，劉松山自花馬池南下時曾擊敗飽掠回巢韋州蘇光棍之黨，事皆在八月以前，是時官兵未抵下橋，其變果誰激之？言者所稱濫殺激變，自是指八月初三日郭家橋大捷而言。馬化滕八月初四日所上臣稟，於劉松山軍抵何處，且一字不提，豈果有激變之事而反爲之諱乎？白彥虎、楊文治諸逆之突犯固原州，豈亦固原各軍激之而然乎？甘肅漢回雜處，昔本漢多於回，今則回多於漢。里，漢民幾無遺類，其產業婦女均歸金積堡，老弱死亡，壯丁爲其傭工細僱，漢靈州紳民之稟，聳惕不安，頗慮失此不圖，張駿元吳之患，必抑何怪其然？臣接如此大聲疾呼地以馬化滕將成元吳之續爲言，當時的朝廷之中，仍頗以左宗棠

但即使左宗棠他的話並不可靠。直到這年九月，劉軍攻克金積堡以北的馬家為危言聳聽，懷疑三等人的僞札一道，稱馬重三等人爲「參領」，而自署的頭銜馬化滕給逆回馬重鄂兩河等處地方軍機事務大總戎馬」，上鈐僞印一方，由此方纔使人確信馬化滕心，而穆圖善之阻撓掣肘，至此時方纔歸於無效。然而左宗棠的軍事行動，則已就延甚久，而金積堡之防務，也因之而加强不少，益增進攻的困難了。

除此之外，左宗棠征西所遭遇的困難，當然還有很多。諸如前引左宗棠家書中所說的甘省吏治敗壞，兵不能戰，收拾整頓，均極費苦心等，均是。而在金積堡攻克，河州蘭州等處的逆回亦一一掃清之後，對于這些仇殺漢民輾轉逃來的作亂逆回究應如何安插，也是一件煞費周章之事。左宗棠當時所採的辦法，是將他們集中起來，遷徙到固原平涼等處安置，一方面避免漢民的報復，一方面免致與本地回民難以相處。這些事情太瑣碎，而且頭緒也太多，不便在此縷述，故爾從略。

左宗棠自同治五年九月奉調陝甘總督，至同治十二年九月肅清關隴，前後歷時凡七年。這七年之間，剿捻剿回，圖軍實，籌善後，清吏治、郵民生，雖然克敵大功，但也使他神勞形瘁，白盡了滿頭的黑髮。曾國藩從前曾與左宗棠交惡多年，在聽說西征大功告成之後，也不禁大爲欽佩說：「雖起胡潤芝於九泉，亦不能及左季高之成就，餘子不足言矣。」

但左宗棠的事業並非到此爲止，因爲關隴雖平而新疆尚未收復，西北回民的叛亂並未全部戡定。而左宗棠雖然七年勞瘁，却仍然意興勃勃，自覺廉頗健飯，寶刀未老，正當及時爲國宣勞，效新息侯馬援當年建功絕域，立銅柱爲銘的往事，收復新疆，還我金甌無缺。於是，在光緒元年三月間，他又奉命督辦新疆軍務。

平定回亂，肅清關隴，在當時已是人所難能之事；新疆遠在西陲，千里黃沙，號稱瀚海，無論行軍作戰與轉運糧餉，都要比陝甘用兵困難得多。但當時的滿清政府爲了維護他們的種族利

益，最初還不肯放棄滿人專制的想法，仍舊希望要由滿人來加以收復，以便始終作爲滿洲人所獨享的禁臠。所以，在關隴肅清，行將開始用兵新疆的時候，他們所派出來負責軍務的欽差大臣，兩個都是滿洲人——一個是景廉，另一個是金順。

景廉是滿洲正黃旗人，翰林出身，由侍郎改授伊犂將軍，從此轉文爲武，一直在新疆擔任軍職。清史景廉說他「才望」。無奈他可知他實在沒有經國濟世的長才。至於金順，則是驍騎校出身的滿洲鑲藍旗人，雖有軍功而胸無韜略，一樣擔當不了大事。這樣的人選，在當時的滿洲世家中已可算得上是「才望」。無奈他們雖能作大官而實無匡時濟世之才，勉强派他們去做督辦新疆軍務的欽差大臣與幫辦大臣，祿祿經年，寸長未效。恰在此時，臺灣發生了牡丹社生番殺害琉球遭海難人民之事，日本派兵三千渡臺，聲言實行「膺懲」；中國方面亦派船政大臣沈葆楨帶兵前往布置，一時雙方劍拔弩張，大有開戰可能。李鴻章時爲直隸總督，深知中國力主和平解決，沈葆楨亦主此議。而日本的態度强硬，堅索鉅額賠款。此事雖經英美等國的調停解決，而中國的朝野上下因此大受刺激，以爲中國因海防不修而致見侮於日本，此可忍孰不可忍？於是主張暫停西北方面的軍事行動，撤西北用兵之餉以建設海防，藉此爲生聚教訓之計。這就發生了海防與塞防孰重孰輕的問題。清政府爲此降旨密詢左宗棠的意見。左宗棠具疏覆奏，除了力陳塞防的重要性外，更堅決主張新疆決不可放棄。他在此疏中有許多極爲警策的名言讜論，即使在一百年後的今日，仍爲不能改變的國防理論。只因文字太多，無法在

此引敍。所應注意的，則是此時的朝議，頗多贊成海防論者的停止西北用兵之議。若非有當時的軍機大臣文祥力排衆議，一力贊成左宗棠的用兵主張，則當時的西北局面，很可能因海防論者的主張得行，而致棄新疆予回部，坐致一百數十萬方里的疆域淪爲外國，這其間的關係，就太大了。這方面的情形，可以引據清人李雲麟所撰的「西陲述略」一書所說，述之如下：

「當光緒紀元之始，海防邊防並急。冬十一月，雲麟進謁故相國文文忠公祥。文忠曰：方今建議諸臣，多因海防喫重，請暫停西陲用兵，盡關而守，廷論疑之。余因會議時排衆議之不決者，力主進剿，幸蒙俞允，因有命左節相督師之命。前此所以力爭者，我朝疆域與明代不同。明代邊外皆敵國，故可盡關而守；今則內外蒙古皆臣僕，倘西寇數年不剿，養成强大，無論壞關而入，陝甘內地皆震，卽馳入北路，蒙古諸部落皆將叩關內徙，則京師之肩背壞，彼時海防益急，兩面受敵，何以禦之？此次以陝甘百戰之師乘銳出關，破未經大敵之寇，烏魯木齊轄境不難指日肅清。烏垣既克，乘得勝之威，南鈐回部，北撫蒙古，以備禦英俄，實爲邊疆久遠之計。……」

文祥的見解，實在卽是左宗棠請將新疆建爲行省的理論根據。光緒三年三月，吐魯番城克復，全疆底定在望，左宗棠卽於此時奏請新疆建省，以國防形勢之觀點提出其理由，謂：

「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環衛北方，百數十年無烽燧之警，不特前代所謂九邊盡成腹地，卽由科布多、烏里雅蘇臺以達張家口，亦皆分屯列戍，斥候遙通，而後畿甸晏然。蓋祖宗朝削平準部，兼定回部，開新疆，立軍府之所貽也。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西

北臂指相連，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則蒙部不安，非特陝甘山西各邊時虞侵軼，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亦將無晏眠之日。」

亦正因爲主持中樞的軍機大臣之中，有文祥這樣明白事理的人在，所以左宗棠力主新疆決不可棄的理論，方能順利得到通過。更因景廉不足以勝任收復新疆的重責，於是，朝議又以爲此時必須要有左宗棠這樣的宿望重臣出而統率，方足以連絡各軍，有利兵機。於是，朝旨將景廉調爲正白旗漢軍都統，回京任職；金順仍以烏魯木齊都統作爲幫辦大臣。但他這次所幫的已非景廉而是左宗棠，因爲就在這一道旨意中，左宗棠已經以陝甘總督的身份，被授爲督辦關外軍務的欽差大臣了。

左宗棠肅清關隴，已經因籌糧餉籌轉運而致耗盡心血。現在在肅清關隴之後，又要再出兵新疆，而最近的新疆前敵，亦在肅州的西面二千餘里之外，長途輸運，再加上採購的困難，使得左宗棠頭上的白髮更多了一些。

根據左宗棠年譜等書的記載，左宗棠因準備出兵新疆而在各地采辦糧食，分地儲存。截至光緒二年四月爲止，由甘肅運至安西哈密的，約一千萬斤；由哈密運存古城子的，約四百萬斤；由歸化和包頭運存巴里坤的，約五百萬斤；從寧夏運存巴里坤的，約一百萬斤。另外他還從俄國境內買糧四百八十餘萬斤，經北路運存於古城子。以上合計，約共二千四百八十萬斤。這一批糧食，若以現代的交通工具來擔任運輸，亦需載重五噸的卡車二千四百餘車次。而由上述採糧地

區經肅州或哈密以達巴里坤前線，路程都在三千五百里以上，長途轉運，車輛的調遣與油料的消耗，都非常驚人。若在左宗棠出兵新疆的時候來說，這一切都要靠人力或獸力來擔任輓運，所遇到的困難更不止百倍了。這裏面的主要原因，自然是程途太長，交通工具太落後，以致途中所消耗的糧食太多。如以車運而言，一車載糧不過六百斤，一夫兩騾，日需耗糧二斤，料十六斤，途程四十餘日，車未至而車糧已罄。駝運的耗糧較少，每駝日餵料一升，一夫可管五駝，到達時尚有四百斤的餘糧。比較起來，自然只能以駝運爲合宜。但蒙古新疆所產的駱駝有限，爲了運輸二千四百餘萬斤的糧食而需要雇覓數以萬計的駱駝，這就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不得已，只好視道路情形及水草便易，酌量兼行車駝二運。僅此一點，所費的周折與所耗的精神便已不可計量。

路程遠而運輸困難，所需要的運輸費用自然也多。由左宗棠奏稿中可以見到新疆之役運輸費用方面的若干資料。例如在肅州購糧，每百斤需銀五兩七錢，運至安西的運費是十一兩七錢，運到巴里坤的糧食，運費約爲糧價之三倍。從前左宗棠用兵關隴時，由河南湖北等處採辦糧食運往甘肅，轉運所費，大約爲糧價之一倍。以此相比，用兵新疆，單是運輸費用的支出，就要比關隴用兵時增加二倍。如此一來，兵餉的支出相對增多，而籌餉的問題也就更加困難。

由於各省的協餉拖欠不前，而軍糧的采辦轉運與軍械火藥等一切軍需供應事事不能停止不

辦，左宗棠當時所用的辦法是借洋債——向外國設在上海的各銀行借債，然後將協餉解去償還。在這方面，左宗棠有一個最爲得力的幫手——在上海主持採辦局的候補道胡光墉。此人頭腦聰明而手段靈活，不但憑他個人的信用爲左宗棠借得洋債，並且在上海主持搜集軍事情報及購辦最新出品的鎗械大砲。

當時德國曾造成一種最新式的後膛螺絲開花大砲，即左宗棠奏疏中所說的「義耳砲」。此砲的口徑大，測距準，命中率高，破壞力大，比之當時新疆叛軍所擁有的英式大砲厲害得多。由于有這種遠較叛軍裝備精良犀利的新式大砲，所以左宗棠的大軍在向叛軍所據守的城堡或陣地展開攻擊時，往往只需短時間的轟擊，就會把叛軍駭得魂飛天外，奔竄逃遁之不暇。左宗棠的軍事行動，因此也就得到順利的進展。不過這已經是後話，在此可以暫且不提。

光緒二年三月，左宗棠在甘肅所做的西征準備，已經大致完成，各路先頭部隊，也在指揮官張曜、金順、徐占彪等人的統率之下，分頭出關，他本人便也於三月十三日由蘭州移節肅州，展開了對新疆的軍事行動。

由于運輸能量有限，與沿途水草缺乏之故，出關部隊的行動，處處都被限制在定量的範圍之內。因此，左宗棠所計劃的戰術，是「緩進速戰」。所謂「緩進」，是當他的部隊進佔一地後，先用營中的車駝將後方的糧料逐漸搬來儲存，隨後二批部隊跟着進駐，騰出的車駝，又可回去搬運第二批糧料，然後第三批部隊又跟着進駐。如此層遞啣接轉運，必俟兵員和給養都達到足够的

數量，然後方對選定的次一目標發動攻擊。所謂「速戰」，即因給養的補給不易，必須爭取時間，以迅速有效的方法集中全力展開攻擊，務期一舉摧敵之後進佔預定的目標，以便繼續展開次一目標的攻擊。由于出關大軍之精銳勇猛，前敵總指揮劉錦棠更以善戰著稱，所以左軍的進攻着着得手。到了光緒二年的九月間，已將烏魯木齊、昌吉、呼圖壁、瑪納斯等重要據點先後克復，肅清天山北路。這是收復新疆的第一階段，軍事行動到此暫時中止，原因是九月以後天氣漸冷，作戰不便。而在一場重大戰役之後，消耗的軍火與糧食極多，也需要經過較長時間的存儲補充，然後可有足够的力量進行次一戰役。

但軍事行動雖然暫時停頓，左宗棠在新收復地區內所做的屯田與復員工作，則已在全力進行。因爲左宗棠始終相信，用兵新疆，必不能永久倚賴後方的糧食供應，此不但因爲補給線太長，運費太貴，接濟困難的單純原因，從長遠的觀點看，總需要在新疆能有足够的糧食生產，方是有恃無恐的長久之計。所以北疆一經收復，他就在巴里坤、烏魯木齊及昌邑等地努力從事兵屯與民屯。兵屯是利用駐防的兵力，民屯則是由嘉峪關內招去的甘肅窮民。經過一年的努力，到了光緒四年，已墾田六萬餘畝，徵糧數目不詳。左宗棠以這種辦法解決軍糧補給困難的情形，在我國官方的紀錄中雖然沒有資料可尋，但在當時的外國報紙中却曾明顯的加以讚揚。清光緒年間逐年編印的西國近事彙編，譯載光緒四年五月某西報的一篇論評說：

「喀什噶爾爲中國克復，則彼處確爲中國之一隅，中國於亞洲，即爲有權。當初陝甘總督左

欽帥募兵於關外屯田，外國人方竊笑其迂。及今觀之，左欽帥急先軍食，謀定而往，老成持重之略，決非西人所能料。一八七六（卽光緒二年），兵克烏魯木齊，分略諸地。部署既定，然後整兵，進對强勁之虜。自吐魯番、庫車，進阿克蘇，勢如破竹，迎刃而解。其部伍嚴整，運籌不苟，如俄人攻碁法（卽基輔）一般。其兵亦耐勞苦，志堅力果。計二十日經過一千二百里荒野沙漠，而得三城一大捷，由是葉爾羌和闐各城先後克復。一八七七年，兵在喀什噶爾過冬，一律肅清，可謂神勝；其克喀什噶爾也，兵以以寡圍勝。使歐人當此，其軍律亦不過如此。平時歐洲人輕料中國，謂中國人不能用兵。今觀中國之恢復囘部，足令吾歐洲人一清醒也。」

此文於讚揚左宗棠之屯田新疆外，更將他收復新疆的戰績亦作了客觀的分析，可以使我們知道左宗棠謀定而戰的老謀勝算，雖外國人亦爲之心折不止。文中所說的光緒三年左軍由北疆越吐魯番進克南疆東四城，光緒四年再由東四城進克西四城，全部肅清新疆叛囘，亦正是左宗棠用兵的屯田成績，此時亦已由新疆北路推廣及於新疆南路，渠道水井，一一興建，不過，左宗棠平定陝甘到了大功告成的那一年，他也已經到了六十七歲的高齡。此時全軍就不需要從內地去轉運軍糧了，收復新疆，前後歷時十四年。新疆雖已底定，而新疆問題尚未完全解決。原因是俄國人乘新疆囘亂之時出兵

借我伊犂，以保衛其邊境爲藉口，至全疆底定以後猶不肯交還。清政府派滿人崇厚前往交涉，俄人要索賠款五百萬兩，又盡割伊犂附近的要隘，祇肯交還孤城一座。消息傳來，舉朝大譁，左宗棠反對尤力。清廷改命曾紀澤重新去與俄人談判，並命左宗棠統籌戰守事宜。左宗棠主張三路進兵，以武力收復伊犂，他本人並且由肅州與櫬西行，以示與俄人作死戰的決心。這一問題，最後由于俄人之態度軟化而得到和平解決，曾紀澤與俄人另訂新約，爭回不少權利。大家都認爲這是中國外交史上的勝利，其實則曾紀澤固然折衝有功，而左宗棠在此時所表示的實力後盾，實有決定性的影響。所以歷史學家對于左宗棠當年的貢獻。都有極佳的論評。近代史專家郭廷以先生就曾說過，「一部清朝晚年的歷史，幾乎都是吃敗仗，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記載，讀來令人氣沮。惟有左宗棠的西北經略則是例外，確實值得我們興奮。」這一番話說明了左宗棠在中國近代史上的貢獻與地位。清人宋伯魯曾有詩詠之，曰：

「左侯崛起中興日，誓掃天驕擴帝仁。萬里車書通絕域，三湘子弟盡功臣。風林魚海春風遠，玉塞新城柳色新。今日西陲需保障，九原誰為起斯人？」

讀了這首詩，能不使我們對左宗棠油然而生敬仰懷念之心麼？

左宗棠後來於光緒六年奉召回京陛見，旋充軍機大臣。不久後又出爲兩江總督。光緒十年，中法戰爭發生，左宗棠奉派前往福州督辦軍務，就在第二年得病身故，享年七十四歲。自清末以至民國，有關他的遺聞軼事流傳頗多，但大都誇張他的傲慢自大，很多都並不可靠。倒是劉聲木

所撰的蓑楚齋隨筆中有一條說：

「湘鄉楊石泉制府昌濬，由諸生官至封疆，皆師陝甘，剿平回匪，制府適任浙撫。浙省例有西征協濟之餉，每到日稍遲，文襄卽來函詰責，並問以官從何來，而頗與當年左宗棠因協餉不前而焦慮煩惱的情形相合，似爲確實的事實。由這一條記載，我們不但可以想見左宗棠當年處境之困難，而對于他處駱秉章幕府時代之開氣不好等等光景，亦彷彿見之。大概這就是左宗棠的眞面貌——豪邁爽朗而才具揮霍多人及僻剛烈，有觸必發，只是性氣。至于他的素行高潔，廉介儉樸，以此不能爲人所曲諒，如此而已。雖垂老不改其志節，則已是一般的公評，不須再在此多所論述了。

張之洞

在晚清末年的歷史上，張之洞這個人，頗具有舉足輕重的力量。因爲他在光緒宣統大學士兼軍機大臣，乃是實際上的宰相，所以一般人就以他的籍貫——直隸南皮縣爲代名，稱之爲「南皮」而不名。

宰相以原籍的郡縣爲代名，其制度起于明代。李調元淡墨錄云：「自明至國朝，沿，稱閣臣不舉其姓，但稱其本貫郡縣；如李文勤公爾，祇稱『高陽』，是也。尚書公然。唐之中葉，稱宰相但舉長安邸所居坊里之名，又與今異，蓋一時風尚云。」但清代三百年中，南皮人作到宰相以下卽不的，並不止張之洞一人。如張之洞的堂兄張之萬，在光緒十年甲申朝局變革時入相，亦被稱爲「南皮」。只是張之萬的相業無足稱道，他在晚清歷史上的重要性又遠不及其堂弟之洞，於是，所謂「南皮」之名，習慣上也就成了張之洞的代名了。

說到張之洞，就可以想到後人對他的一些不客氣批評。如凌霄一士隨筆的作者徐一士，及花隨人聖盦摭憶的作者黃濬，都曾很不客氣地批評他「巧宦熱中」，與「好大喜功」。這張之洞傳中的文字，頗有契合之處。但近年以來所行世的若干專書，却頗以張之洞爲晚清以來不

可參見的傑出政治家。如果「巧宦熱中一之說足以成立，則張之洞的道德與人品便大有問題，如何能被推崇爲傑出的政治家？如果「好大喜功」的批評沒有錯誤，那末他的一切建樹就沒有切實的成效可言，傑出政治家的頭銜當然更有問題。面對這種互相不能調和的歧見，例也頗有令人無所適從之感。

爲了澄清這兩種不能調和的歧見，對于張之洞這個人，實在有深入研究以求了解之必要。以下先略述張之洞的生平簡歷，然後再由他的言論思想與實際施爲，以檢討他的行爲動機與所生的影響。

張之洞，字孝達、號香濤，直隸南皮縣人。生於清道光十七年。父瑛，以舉人官貴州，由知縣歷陞至知府。張之洞生於貴州，其時伊父即在貴州興義府任知府。之洞天賦並不很高，但因讀書用功之故，在十六歲的那年，就以舉人第一名高中了順天鄉試的解元。其後，張之洞丁父憂及守制期滿，則他的堂兄張之萬又屢次被派充爲會試考官，張之洞例須廻避，不能應試。直到同治二年赴京會試，方被取中爲一甲第三名的「探花」。自此以後，他在京中的翰林院中供職，由編修歷陞至侍講學士。光緒七年六月，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這年十一月，就由內閣學士補授山西巡撫，開始出膺疆寄。在山西作巡撫一共三年，光緒十年，中法兩國因越南問題發生戰爭，廣東防務緊張，淮軍出身的兩廣總督張樹聲，與湘軍出身的督師尚書彭玉麟不能合作，朝命調張之洞前往接代，不久就有諒山大捷之功，張之洞也因此而被實授爲兩廣總督。在兩廣六年。

調補湖廣總督，自此一直坐鎮武漢，直到光緒三十二年。這其間，他雖然也曾三度由湖廣調往兩江，署理兩江總督，但始終只是署理而已，不久仍回任湖廣。光緒三十二年，他以體仁閣大學士內召爲軍機大臣，入參大政。至宣統元年，卒於任，享年七十三歲。總計他一生之中，居翰苑十八年，任巡撫三年，任總督二十三年，居相位三年，與政治上的關係不能說不深。尤其是在湖廣總督任內，前後凡十七年之久，舉凡湖北所辦的一切新政，悉出于張之洞所規劃經營。這在中國近代化的歷史上頗有長遠的影響，對張之洞而言，尤其是應當大書特書的。

張之洞在翰林期間，乃是著名的清流黨人物。清史稿本傳就說：

「往者，詞臣率雍容養望。自之洞喜言事，同時寶廷、陳寶琛、張佩綸輩蜂起，糾彈時政，號爲清流。」

這是光緒初年的事。但當時號稱爲清流黨的顯要人物，除了張之洞以外，到後來都沒有好結果。如寶廷，因典試納妓事上疏自劾免官，放廢終身。據說他之所以這樣作，乃是因爲看出朝廷將對他有所不利，所以借此求去，以免落得更加不利的後果。如陳寶琛及張佩綸，先後被慈禧太后派往南洋及福建會辦軍務，陳寶琛丁憂後未再起用，張佩綸則因馬江兵敗而遭革職，從此永不翻身。既然這些人的遭遇挫折，明顯地是由於他們遇事敢言的緣故，那末，張之洞亦同爲清流黨人，何以他不但未曾與寶廷張佩綸等人同遭不幸，反而外放巡撫，旋擢總督，身膺疆寄者歷三十六年，甚得慈禧之寵信，官途得意，始終不衰呢？這一點，就是徐一士與黃濬所批評的「宦術甚

工」之力了。

說張之洞的宦術甚工，並非空言汚衊，而是有具體的事實可徵的。關于這個問題，還是應當從張之洞處身於「清流」的時期說起。

比較張之洞與其他清流黨人的不同，可以看清史稿張佩綸傳云：

「是時吳大澂陳寶琛好論時政，與寶廷鄧承修輩號清流黨，而佩綸尤以糾彈大臣著。一時如侍郎賀壽慈、尚書萬青藜、董恂，皆被劾去。光緒八年，雲南報銷案起，王文韶以樞臣掌戶部，臺諫爭上其受賕狀。上方意任隆密，乃援乾隆朝梁詩正還家侍父事，請令引嫌乞養。不報。又兩疏劾之，遂罷文部，而擢佩綸署左副都御史，晉侍講學士。……」

又清史稿鄧承修傳：

「與張佩綸等主持清議，多彈擊，號曰鐵漢。先後疏論闈姓賭捐，大乖政體，關稅侵蝕，嬰害庫帑。以考場積弊，陳七事糾正之，吏治積弊，陳八事肅澄之。又劾總督李瀚章失政，左副都御史崇勳無行，侍郎長敍違制，學政吳寶恕、葉大焯，布政使方大湜、龔易圖，鹽運使周星譽諸不職狀。會邊警，糾彈舉朝慢弛，請召還左宗棠柄國政。逾歲，彗星見，則又言宗棠蒞事數月，未見設施，而因推及寶鋆王文韶之昏眊，請罷斥，回天意。是時文韶方嚮用，權任轉重。會雲南報銷案起，又嚴劾之。」

由張佩綸鄧承修兩傳中的文字看來，清流黨人大多喜歡彈劾權要而臧否人物，招致最高統治人物之厭惡與忌諱的。如前引兩傳中所彈劾的，很多都是赫赫有名的朝中大致都有奧援，一旦因罪證確鑿而不得不將他們罷免，勢必會因此而得罪了他們的幕後支持者。如王文韶之「上方意任隆密」，更明顯地可以知道他是慈禧所信任之人。而張佩綸與鄧承修却必要一再上疏嚴劾，務欲去之而後已，這在慈禧看來，分明就是討厭的眼中之釘，一旦遇到機會，必然要拔之而後快的了。張佩綸後來會以素不知兵的一介書生，派到閩浙前敵去應付法國人之入侵，就是慈禧的借刀殺人之計，而張佩綸果然也因此而落得身敗名裂，百劫不復。鄧承修的遭遇，亦與張佩綸彷彿，在中法戰後被派往越南與法國人會勘邊界，歷盡艱辛，灰心中，幾乎無法完成使命。最後也只好知難而退，謝病歸里，以讀書養母終老於家。陳寶琛之所以得罪，亦是由于他彈劾李鴻章而使慈禧大不高興之故。從這些地方可以知道，清流黨人彈擊權貴，固然可以大快人心，却也可以葬送自己的政治前途，因爲這是在位的慈禧太后所不願看見的。反過來看，如果清流黨人僅只喜言時政而並不糾彈人物，就不致引起慈禧后的討厭。張之洞與其他清流黨人不同的地方，便在這裏。

收在張之洞全集中的張文襄公奏議，凡七十二卷，最前面的一二三卷，卽是他在翰林期間所上；亦卽是他在身居清流黨人時的言論紀錄。綜觀這三卷奏議中所收的奏摺及附片，共計三十九件，其中沒有一件是因彈劾他人而上的。再細看這三十九件奏摺及附片的內容，又無一不是因事

陳言，提出各項籌議內政外交的意見。其中所流露的一片忠君愛國之心，以他的生來，著實可以使閱者感動，斷不致被誤認爲「出位妄言，干政撓權」。

最明顯的事例，就是發生在光緒六年十一月間，法處死護軍之事，刑部尚書潘祖蔭不能抗，因此引起舉朝爭議，張之洞與陳寶琛二人在此時所表示的不同態度。

張文襄公年譜卷一，記有張之洞與陳寶琛商議上奏諫諍的情形說：

「先是，有中官率小奄二人，奉內命，挑食物八盒賜醇邸，出東右門，與護軍爭毆，遂毀棄食物回宮，以門兵交刑部，將置重典。琛，宣統時爲皇帝之師傅（即陳寶琛）擬上疏極諫。公謂措詞不宜太激，止可言漸不可長，門者，不能復言矣。太傅以爲然，改正義爲附君言之；若言而不納，則他事大於此禁不可弛，如上邊懿旨不妨加重，兩宮邊祖訓必宜從輕。出自慈恩，益彰盛德。』公猶慮其太『附子一片，請勿入藥。』太傅以示幼樵侍講，侍講曰：『精義不用可惜』，卒諫乎？』翌日，以俄事遇太傅於直廬，問『如石投水。』意謂留中也。又數日，兩宮視朝，諭樞臣此事可加重。公聞之，照原議，毋庸折簡與太傅曰：『如石投水，竟成佳讖。』」

張之洞的原奏，見於張文襄公奏議卷三。疏中確實不曾要求從寬處分護軍，而只以閹宦之禍

最烈，履霜之漸當防爲言，婉轉提醒皇太后不可因此而啓太監窺伺之隙，從而希望慈禧能够自己覺悟，對於宮門護軍的執法行爲不可藉端苛責。張之洞自己所撰的「抱冰堂弟子記」，對於此一奏疏甚爲得意，曰：

「前數日內，有兩御史言事瑣屑，不合政體，被責議處。恭邸手張、陳兩疏示同列曰：彼等摺眞笑柄，若此眞可謂奏疏矣。」

張之洞的文筆向來極好，像這樣旁敲側擊而婉轉陳言的奏疏，當然游刃有餘。他之假託旁人撰書而引述恭王對他的誇獎之辭，藉以顯示他之立言得體，正不足怪。至於陳寶琛的奏摺，雖然正摺的主要內容與張之洞的奏疏相似，只因多了一個附片之故，情況就不一樣。陳疏及附片，均見於陳文忠公奏議卷上。奏摺無甚特出，其內容可以略而不提；至於此摺的附片，因與前引張之洞年譜中所述的記事有關，且直接關係到張之洞陳寶琛二人對此事的不同態度，需要擇要摘述其主要內容如次：

「此案本緣稽查攔打太監而起，臣恐播之四方，傳之萬世，不知此事始末，益滋疑議。臣職司記注，有補闕拾遺之責，理應抗疏陳。而徘徊數日，欲言復止，則以時事方艱，我慈禧皇太后聖躬未豫，不願以迂戇激烈之詞，干冒宸嚴，以激成君父之過舉。然后旰食未遑，我慈禧皇太后垂簾以來，法祖勤民，虛懷納諫，實千古所僅見，而於馭制宮寺，尤極嚴明。臣幸遇聖明，若竟曠職罔恩，取容緘默，坐聽天下後世執此細故以疑議聖德，不獨無以對我

皇太后皇上，問心先無以自安。不得已附片密陳，伏乞皇太后鑒臣愚悃，宮中幾暇，深念此案罪名有無過當？如蒙特降諭旨，格外施恩，使天下臣民，知至愚至賤荒謬貌抗之兵丁，皇上因尊崇懿旨而嚴懲之於前，皇太后因繩家法防流弊而曲宥之於後，則加天之仁，愈足以快人心而光聖德。……」

細看陳寶琛的此一附片，亦沒有什麼過分激烈的言詞，只不過以護軍執法，無可加罪爲言，希望慈禧太后懷懼天下後世議論之可畏，特予加恩曲宥，如此而已。措辭如此恭謹小心，立言又極爲周正得體，所以無怪乎連張佩綸（卽前文所說的「幼樵侍講」）也要以爲「精義不用可惜」，主張仍與原摺一同遞呈的了。此案之得以轉圜，畢竟還是由於「附子一片」之力；因爲此片使慈禧懍然而知清議可畏，不敢再堅持她的無理專恣。而由此一事，亦正可以看出，張之洞雖與陳寶琛張佩綸同爲清流，他們的立身處事，却正有着極大的分野。

古語曾有所謂「爲政不得罪於巨室」的話，雖是鄉愿之甚，却深含明哲保身之理。張之洞一生宦途得意，未嘗不是得力於這一句話。從他入仕以來的一切作爲看，他之所以能够一帆風順，就是能牢守原則，決不開罪掌握政權之最高權威人物。這一個掌握政權的最高權威人物，自然就是晚清歷史上獨攬大權達四十餘年之久的慈禧太后。在光緒親政的期間，頗有人誤以爲光緒已由慈禧手中取得了政柄，連張之洞也幾乎因此而誤認；但當一旦認清大清皇朝的主人仍是隱居幕後的慈禧太后，而不是暫時處身臺前的光緒皇帝時，他的侍奉對象卽刻又轉變了。由於他的善於變

化迎合，後世史家因此很不客氣地批評他「宦術甚工」。若以比與陳寶琛張佩綸等其他清流黨人相比，他的做官方法，確實要高明得多。

張之洞的一生，特點甚多。關於他「宦術甚工」的部分，後文另有敍述。在這裏需要先說一說關於他的一項特別長處——清廉；這對於瞭解張之洞的爲人，也是很重要的。

張之洞在做翰林的時期中，曾經被點放過兩次試差與兩次學差。試差，是同治六年時以翰林院編修奉旨充浙江鄉試副考官，與同治十二年以編修加侍讀銜奉旨充四川鄉試副考官。學差，是同治六年以編修奉旨派充四川學政，至光緒二年十一月任滿交卸。清代的翰林，生活甚爲清苦，同治十二年十月，任滿交卸。同治九年十月，任滿交卸。同川鄉試事竣，又奉旨簡放湖北學政，全賴外放學政與考差時所得的陋規程儀等沾潤。俗語有所謂，「一任學政，十年吃著不盡」之說，可見學政收入之豐。尤其是四川的學政，因爲省份大而生童人數甚多之故，所得的陋規收入，就有二萬數千兩銀子之多，素來被視爲肥缺。但張之洞的作風頗與人不同。他做學政，將舊習相沿的陋規一概裁去不要，以致在任滿交卸時，依然是兩袖清風，一擔行李，與來時無異。回到京中，仍然過那翰林院的清苦生涯，而處之泰然。這種不事貨利的清廉作風，在他後來歷任封疆大吏時，依然不改。所以清史稿本傳說他，「任疆寄數十年，及卒，家不增一畝」。清代末年，政風穢濁，貪污盛行，像張之洞這樣皎潔清白的作風，大可以勵廉隅而風當世。他之所以能夠被當時的清流領袖李鴻藻所賞識，成爲清流黨中的一員大將，未始不是由於此一特性使然。他後來之

能够出膺疆寄，極得慈禧太后之倚信，這也是一項很重要的因素。

張之洞中探花，是同治二年的事。中探花之後，照例卽授職爲翰林院編修，官正七品。由此一直到光緒七年二月，他方由詹事府的左春坊左庶子補授翰林院侍講學士，官從四品。同年六月，再陞爲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官從二品。本來，翰林院官陞至侍讀學士或侍講學士之後，再上面的陞銜，不是正三品的詹事，就是從二品的內閣學士。張之洞在陞至侍講學士後再陞內閣學士，亦只能說是循序而陞，並沒有超擢之意。只是他在陞任內閣學士之後不過只有五個月，就奉命補授兼兵部侍郎銜的山西巡撫，頓時成爲封疆大吏，上距他之由左庶子陞侍講學士，不過只有十個月，看起來便不免使人覺得陞遷太驟了。關於他陞授山西巡撫的原因爲何，史傳不詳，私家筆記中亦未見記述，所能看得出來的，只是他在到山西巡撫任後所上謝恩摺中的幾句話。

張文襄公奏議卷四，到山西任謝恩摺中，有句云：

「惟有虔稟懿訓，奉宣皇仁，期無負公正之特許，誓一掃因循之錮習。」

照清代的政治制度，監司以上的方面大員奉派新職，例須由皇帝召見訓示，然後方能前往到任。由上面的話，可知張之洞蒙慈禧召見時所得到的訓示，乃是要他到山西去整頓官方錮習，刷新政治風氣，而慈禧更曾當面褒嘉張之洞居官公正。然則張之洞所以能够被任命爲山西巡撫，大概便是由于慈禧對他甚爲賞識，所以纔有這一番特殊的遷擢了。按，張之洞終身對慈禧懷有感大的好感。同治二年張之洞參加殿試，因爲對策不用常格，已被讀卷大臣抑置三甲，賴大學士

賞識之特別賞識，始拔置爲二甲第一。及進呈試卷，慈禧太后認爲他的文字特佳，再拔置爲一甲第三，因此方纔得居鼎甲。這是他對慈禧最爲感恩的事。這一次由內閣學士擢陞山西巡撫，又蒙慈禧親口褒奬爲公正，顯然可知他在慈禧心目中的「廉眷」甚爲優隆，在感德之餘，又焉得不刻骨銘心，頌揚聖恩不止。正因爲慈禧卽是當時大清朝的實際柄政之人，既然此一最高權威者對他如此寵遇有加，無論是基於報恩或是爲自己的政治前途着想，他都需要對慈禧格外效忠。於是便注定了張之洞在性格上只能成爲一個迎合慈禧意旨爲主的人。所以儘管他在政治、軍事、外交、教育、經濟等幾方面都有過很多的意見，而他所有一切的思想與見解，都以不與慈禧太后的意旨相違背爲原則。這樣的特性，也終於使他只能成爲一個調和折中的改良主義者，而沒有獨特的思想與見解可言。最顯著的事例，就是他所提出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教育主張。

「中學爲體」與「西學爲用」的教育主張，正是張之洞所撰「勸學篇」一書的精義。此書撰成於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其後曾經一再被人翻刻，風行一時，也因此而使張之洞在晚清的學術思想界發生了頗大的影響。

勸學篇全書，凡二十四章。第一至九章曰「內篇」，所言「皆求仁之事」，其主旨在「務本以正人心」；第十至二十四章曰「外篇」，所言皆「求智求勇之事」，其主旨在「務通以開風氣」。他在序言中說：「今日之世變，豈特春秋所未有也。」由于西方潮流對中國所發生的衝擊太大，於是，「圖救時者言新學，黜害道者守舊學」，各種思想上的矛盾衝

突，因此而起。但是，「舊者因噎而廢食，新者歧多而亡羊，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變」，終其所至，將使「舊者愈病新」而「新者愈厭舊」，「學者搖搖，中無所主」，而「邪說暴行，橫流天下」矣。所以他以爲，「吾恐中國之禍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內」。爲了補救新舊兩種思想的偏敝，他提出了「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主張，希望能將中西思想與新舊兩種思使中國在接受近代文明的洗禮時，能有中西之長而無中西之弊。從這一觀點看張之洞所撰的勸學篇，立論中正，觀點正確，理應是當時思想界的一大創見。可是，我們如果進一步研究張之洞寫作此書時的眞正動機，對于他的思想內容，便不免抱持若干懷疑不信的態度了。

勸學篇的內篇第一章，名曰「同心」。他認爲當此世變日亟，國步艱難之時，全國上下，必需同心一致，以保國家、保聖教、保中華種族爲最主要的目標。「夫三事一貫而已矣，保國保教保種合爲一心，是爲同心」。他所謂的「教」，卽是我國的儒家學說；所以「保教」的意義卽是尊儒崇經，以期激發忠義思想，講求富强之道，尊朝廷而衞社稷。在闡明這一意義之後，接着就要「教忠」了。他以「教忠」列爲第二章，是因爲第一章必須開宗明義，說明全書各章的次第；若是沒有這開宗明義的第一章，則「教忠」必爲第一。所以，這一章纔是他寫此勸學篇的主要用意。

他在「教忠」一章的開頭部分便說：「自漢唐以來，國家愛民之厚，未有過於我聖清者也。」接著他就一一列舉大清列朝皇帝愛民仁政的實際內容凡十五項，自輕徭薄賦以至減貢戒侈，愼刑

戰兵，凡可以證明大清皇帝之勤政愛民，惠養黎元者，細大不遺。這就是他在序言中所說的：「曰教忠，陳述本朝德澤深厚，使薄海臣民，咸懷忠良以報國也。」勸學篇的對象並非革命黨人，張之洞爲什麼要首先揭櫫大清皇朝的愛民仁政以喚起讀者之注意呢？顯然可見，其主要目的，實在是要與內篇第六的「正權」一章相呼應，以闡明他的反民權思想。這只要看他在「正權」一章中所說的話，便可知道。

張之洞在勸學篇的序文中曾說，他寫作「正權」一章之目的，是在「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權之亂政也。」照他的看法，「方今中華，誠非雄強，然百姓尚能自安其業者，由朝廷之法維繫之也。使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且必將刼掠市鎭，焚毀教堂，吾恐外洋各國，必藉保護爲名，兵船陸軍，深入占踞，全局拱手而屬之他人。是民權之說，固敵人所願聞者矣。昔法國承暴君虐政之後，舉國怨憤，上下相攻，始改爲民主之國。我朝深仁厚澤，朝無苛政，何苦倡此亂階，以禍其身而併禍天下哉？」照他的這種說法，提倡民權就是鼓勵愚民作亂，不但足以禍及一身，而且可以造成亡國。所以他以爲「若强中禦外之策，惟有以忠義號召天下之心，以朝廷威靈，合九州之力，乃天經地義之道，古今中外不易之理。」於是，他所歸結的論點，仍然只是全國一心擁戴大清聖君，以求達到保國保教保種之目的而已。這與他在「教忠」一章所說，「當此時世艱虞，凡我報禮之士，戴德之民，固當各抒忠愛，人人與國爲體。凡一切邪說惡行，足以啓犯上作亂之漸者，拒之勿聽，避之若凩，惡之如鷹鸇之逐鳥

雀。大順所在，天必祐之」等等的話，前後呼應，其重點無非在申明，大清皇朝的統治權必須被絕對尊重，犯上作亂的「民權」思想決不可有。作勸學篇而慫慂教人以尊戴帝室，感一再力斥民主自由的思想爲邪說暴行，這纔是值得特別注意的地方。

張之洞作勸學篇，爲什麼要在書中竭力宣揚這種忠滿清而排斥民主的忠君思想呢？要瞭解這個問題，還得先從當時的政治環境說起。

自甲午戰爭中國慘遭敗績之後，朝野上下，都瀰漫了自强維新、報仇雪恥的發奮洞身爲中國人的一份子，當然也不例外。這時的張之洞，已經在武昌做了五、六年的湖廣總督了。爲了自强雪恥，他曾經奏請訓練自强新軍，聘請德國教練來實行西法訓練。又在督時，創設儲才學堂及陸軍學堂、鐵路學堂於南京。及至回任湖廣，又積極興辦鋼鐵廠及京漢鐵路，對于促進中國現代化的各種措施，甚爲努力。而在這一片自强維新聲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則是康有爲與他的學生梁啓超。康有爲主張維新變法，始於甲午戰爭以前。及甲午戰敗，康梁適在北京參加會議，曾聯合十八省的應試舉人一千餘名，是卽有名的「公車上書」。其後康有爲又摘取奏疏中的變法主張而加以引伸，另成一書，詳述富國、養民、教士、練兵等等辦法，呈由都察院代爲奏達皇帝。光緒得之，意尚猶豫，其說亦未行。但在經過了這一連串的請願，上書之後，康有爲的大名，已經傳佈中外，很多人都以爲他是有思想有學問的改革家。張之洞在此時，亦曾與康有爲有所來往。這在張之洞的年譜及其他有關資料中，

都有記載可尋。

許同莘所編的張文襄公年譜卷五頁六，光緒二十一年十月內一條云：「康祖詒來。」其下另有小字附註，云：

「祖詒在京師創立强學會，朝士集者百數十人。是月十一日來見，旋赴上海設分會，請公列名。公覆電云：『羣才薈集，不煩我，請除名。捐費必寄。』乃助會款五百兩，撥公款一千兩。」

康祖詒卽爲康有爲的原名；「有爲」二字，乃是後來所改。康有爲在上海創立强學會的分會，致電請求張之洞捐助經費。張之洞電覆允捐會費，而要求康有爲將他從贊助發起人的名單中刪去，想必康有爲當時已經在報端所刊載的贊助發起人名單中，未得張之洞的同意而先行擅自列入了。張之洞允捐款而不肯列名，這是他的聰明之處。他大概已從二人的會晤中看出康有爲是一個言大而夸的激烈份子，對於他的言論與作爲頗具戒心。但康有爲却在並未事先徵得其同意之前，擅自將張之洞的名字列入了發起或贊助人的名單之內，這就使張之洞大感不安了。張之洞當然也贊成中國應當力求自强維新，他在湖廣總督及署理兩江總督任上，就先後做過許多自强維新的改革措施。只是，張之洞的維新與改革，都是以朝廷疆吏的身份在爲清政府効力，其立場不能越出忠君愛國的範圍；若是倡導自强維新而越出忠君愛國的範圍，既有悖於他的政治認識，亦決不是他所敢做的事。張之洞最初與康有爲相識，或許尚未察覺他們之間，存有政治立場與思想的差異。及後，他察覺到這種差異的嚴重性，於是乃迫使他驅求洗清他與康有爲之間的關係，以免

遭受到康有爲的牽累。

張之洞與康有爲之間的關係，前述年譜資料所透露的只是極小一部份；其眞實的情形，目前已很難知道。黃濬所撰的花隨人聖盦摭憶，曾經載有張之洞親信之一，梁鼎芬寫給張之洞的一些信，其中頗曾透露了一部分康、張二人間的交往關係，乃是極珍貴的史料，值得注意。關於這方面的梁鼎芬來書，共計兩件，其一云：

「比聞公傷悼不已，敬念無既。今思一排遣之法：長素健談，可以終日相對。計每日午後，案牘少清，早飯共食，使之發揮中西之學，近時士夫之論，使人心開。……壺公前輩左右，鼎芬頓首。」

另一書云：

「長素於世俗應酬，全不理會，不必區區於招飲。鼎芬可先道尊意與近事，渠必樂從。如可行，今日先辦。或欲聞禪理，兼約禮卿，使之各樹一義，粲花妙論，人人滌頤，連日皆如此。康、膚二子，深相契合，兩賓相對，可以釋憂。比中弢病苦，鼎芬忙苦，此舉可支五日。五日之後，中弢可愈，鼎芬卷可少清，便能接續矣。尚書足下，鼎芬頓首。」

此信中所說的「壺公」與「尚書」，都是張之洞。因爲張之洞在「孝達」與「香濤」這兩個常用的「字」以外，另有「壺公」之號；而張之洞官湖廣總督之後，他的官銜，已歷陞至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稱之爲「尚書」，正是他的官稱。至於「長素」，就是康有爲的別號；「禮

鼎」，則是康的友人酬光典。這兩封信雖然都沒有記明作書的時間，但由其內容推測，便可知道當在光緒二十一年的十月間。因爲康有爲於這月由北京南下，曾於十一日謁見張之洞於南江總督衙門，張之洞年譜卷五葉六中已有記載。而張之洞年譜卷五葉六中已有記載。而張之洞時亦隨張之洞居於江寧督署，忽然於九月二十日半夜裏墮溺於督署花園中的池塘，竟致殞命，張之洞爲此痛悼萬分，至於時時涕泣。梁鼎芬在信中說：「憂能傷人，況涕泣乎？」爲了替張之洞解憂，他乃想出了這麼一個極妙的辦法：請康有爲和酬光典二人到總督衙門來陪張之洞談學說禪，「桑花妙論，人人解頤」，「兩賓相對，可以釋憂。」看梁鼎芬信中所說的話如此具體，可以知道，康有爲光緒二十一年十月的南京之行，必定與張之洞有過一段不短時間的盤桓交往。張之洞年譜說，康有爲在進謁張之洞以後，「旋赴上海設分會」，這「旋」字所代表的時間意義就極爲含混，頗有意存隱諱的可能。

張之洞與康有爲之間的關係，由於有此事實可資證之故，相信在當時必定彰彰在人耳目。何況康有爲在上海創設强學會的上海分會，張之洞的親信梁鼎芬，更是赫然有名的創始人之一哩！在這種情形之下，不管張之洞怎樣表明他本人並非上海强學會的發起人或贊助人，總無法擺脫他與康有爲之間，「往來頗密」的說法。至於他何以在戊戌政變發生以前就極爲重視此一關係，亟亟地謀求洗刷辨白之法，則顯然與康有爲此時所發表的言論有關。

康有爲的言論，在刊布了他的兩部名著「新學僞經考」與「孔子改制考」之後，已被當時的

上層知識份子認爲是洪水猛獸一般地心存叵測之人。新學僞經考的成書時間較早，分激烈；「孔子改制考」刊行於光緒二十三年，其主要內害係以所假託的孔子學說凡西洋近世所有之民主政治及民權思想，均爲中國所固有，中國如在此時實行西子之遺制。由于此書顯然寓有鼓吹民權及非議專制政治的意圖，所以自刊行以來，所受到的謗議及攻擊極多。湖南巡撫陳寶箴以爲其書「流爲偏宕之辭」，「傷理而害道」，奏請飭下康有爲自行銷毀。協辦大學士孫家鼐更直攻康有爲之學術不端，心術不正，請皇帝卽依陳寶箴所奏，將孔子改制考一書完全銷毀。康有爲的政治思想在當時所遭致的反對與攻擊如此强烈，不必等到戊戌政變的發生，已可意識到其將來的前途必定極爲惡劣。而康有爲全部開辦費祇一千五百兩銀子，悉出自張之洞的捐助。這一件事，更不免使人贊成康有爲的變法維新派人物了。爲了自行表襮他對滿清皇室的忠，及澄清他的政治立場，於在上海創辦强學會的上海分會誤會張之洞亦是，他撰成「勸學篇」一書以自明。清史稿張之洞傳，對于張之洞避，頗多皮裏陽秋的譏諷文字。關于這一件事，張傳云：

「二十四年，政變作，之洞先著勸學篇以見意，得免議。」

其言外之意，顯然便以爲張之洞卽是因意存趨避而作此書的了。張之洞宦術甚工，這又是第二件可資證明的具體事例。揆其用心，總以保全自身功名富貴及迎合慈禧意旨爲原則。由康、梁二人後來爲慈禧所痛恨的事實看來，張之洞借勸學篇以表明他反對康梁的政治思想，確實具有先

見之明。而且他不僅是撰著勸學篇而已，由於梁啓超曾經著有「中國六大政治家」一書，將宋朝的王安石亦列爲偉大政治家之一，讚譽備至之故，於是，連張之洞自己一生所崇尚的臨川詩派，也必需加以詆毀，藉以表示他與梁啓超之立場絕對不同。關于這一個問題，黃濬所撰花隨人聖盦撫憶一書中亦有論述，轉引如後：

「吾讀廣雅詩，覺其時有口是心非處。南皮詩最佳者絕句，純學王荆公。其弔袁爽秋詩：『江西魔派不堪吟，北宋清奇是雅音。雙井半山今一手，傷哉斜日廣陵琴。』其尊荆公甚至。然其集乃再三非難臨川，皆顯然不肯認此法乳者。細求其故，殆由于南皮先曾保康、梁，爲之延譽甚力。及戊戌變起，乃亟亟印勸學篇以自明。任公時著。大政治家王安石』一書，南皮則亟詆之。吟咏之不足，又躬自注釋，以明其宗尚正大。此中矯揉，皆爲逢迎西后，正爲自全一念驅使之。今觀其詩，晚年諸絕句，實宗北宋，尤學半山，豈可諱乎？」

「廣雅」詩即張之洞詩，「臨川」、「荆公」、及「半山」，則皆指王安石而言。張之洞詩學臨川，祇是爲了政治上的原因，反而對王安石詆諆備至，這種作法，實在也有欠光明正大。然而這尚不過祇是這些事件的一、二端而已，類此事例，正尚有之。最明顯的，還可以舉出下述三事。第一，是他在張佩綸失職閑居以後，對待張佩綸的態度。第二，是他在戊戌政變以後，對于維持光緒皇帝的地位一事所持之立場。第三，是他在庚子拳亂以後，附和慈禧太后遠避西安的主張。今先舉第一事。花隨人聖盦撫憶云：

一清流中以張繩菴最爲風厲。南皮雖與繩菴善，傳聞豐潤南皮，晚年頗有違言。南皮移督兩江時，以繩菴適寓江寧，夙爲西后所嫉，與之往還，又失故人之誼，乃陰諷繩菴大怒，謂我一失職閑居之人，何至並南京亦不許我住耶？其後聞南皮又使人先容，微服往訪，至於相對痛哭。此事發老時已有所聞，故繩菴之歿，特千里唁之。南皮時督鄂，聞發老至寧，要約其遊廬山。而發老自言：『吾爲弔喪來，非遊山也。』謝不往。今廣雅堂詩有題云：『江行望廬山，約陳伯潛游不至』，是此事也。」

上文所說的「張繩菴」與「豐潤」，俱指張佩綸；繩菴是其號，豐潤則其籍貫。「發」老即發菴，指陳寶琛。張佩綸、陳寶琛與張之洞，當年都是清流黨中的顯赫人物，交誼甚篤。後來張佩綸與陳寶琛則在會辦南洋軍務期間丁憂，後因所保薦的廣西巡撫徐延旭、雲南巡撫唐炯二人僨事失律，追究及于原保薦之人，奉旱實降五級，亦不再出仕。只有張之洞一帆風順，居然身任兼圻，又由湖廣總督調署兩江，居然成了張佩綸的「老父臺」。張佩綸此時雖然住在南京，以舊時的交誼而言，偶一過訪，亦是人情之常。即使慈禧太后當年曾經討厭過張佩綸，此時亦早已事過境遷，並不一定始終懷恨在心。而張之洞對于這些事情却是特別敏感，凡是慈禧所嫉惡之人，一概避之如恐不及，雖是自己的當年至交，亦不例外。爲了個人的功名利祿而寧願犧牲朋友，未免有見利忘義之嫌。陳寶琛在福建聞張佩綸之喪，千里赴弔，正是對張之洞的極大諷刺。他之所以拒絕與張之洞同遊廬

山，更是明顯不過的事實。

關于戊戌政變時慈禧欲將光緒廢黜一事，張之洞當時所持的態度如何？可由徐一士所撰的凌霄一士隨筆，及胡思敬所撰國聞備乘二書中見之，惟二說頗有不同。徐書云：

「之洞既深自結於西后，故對光緒帝不滿。帝謚曰『景』，廟號『德宗』，聞出之洞主張。或謂陰擬唐德宗、明景泰帝。取『信用奸邪』，及『不當立而立』之義也。昔西后欲廢帝，慮人心不服，徵之洞及劉坤一意見。坤一再力爭，之洞則效徐勣之口吻，謂權在太后，非疆臣所得干預。固見之洞之軟滑，亦以方厚結后黨，不願持異議也。當帝行新政時，之洞奉行頗力，時共以玩視新政，明詔申斥。而至政局一變，乃二人態度如是。故士論稱坤一之有守，無愧大臣風節，非之洞所及焉。」

以上是凌霄一士隨筆中的記述，至于國聞備乘中的記述，則是：

「戊戌訓政之後，孝欽堅欲廢立，榮祿諫不聽，而恐其同負惡名於天下也，因獻策曰：『朝廷不能獨立，賴衆力以維持之。疆臣服，斯天下莫敢議矣。臣請以私意先覘四方動靜，然後行事未晚。』孝欽許之。遂以密電分詢各省督臣，言太后將謁太廟，爲穆宗立後。江督劉坤一得電，約張之洞合爭。之洞始諾而中悔，擱已發矣，中途追擱弁回，削其名勿與。坤一曰：『香濤見小事勇，見大事怯，姑留其身，以竢後圖，吾老朽何憚？』遂一人挺身獨任，電覆榮祿曰：『君臣

之義至重，中外之口難防，坤一所以報國者在此，所以報公者亦在此。』道員陶森甲之詞也。榮祿以坤一電入奏，孝欽懼而止。逾年，乃建東宮。聞粵督陶模亦有電諫阻，其詞則佚之矣。」

比較徐、胡二人的說法，除了兩江總督劉坤一表示反對的部分，二說無異外；關于張之洞的立場，徐說以爲張之洞初時願與劉坤一同時覆奏爲光緒爭帝位，後乃中悔，至於追回奏摺，劃去己名不書。姑不論二說之孰是，張之洞在這一件事情上，不肯與劉坤一同樣地表示強硬意見，以求維護光緒之帝位，當是不爭之事實。所以然之故，亦無非因爲立場強硬則將招致慈禧之不滿而於己不利，所以他決不能與劉坤一那樣地力申「君臣之義」。如果說，劉坤一在這件事情上的有守有爲，乃是「無愧大臣風節」，那麼，張之洞的軟滑，就顯得太沒有風骨了。

關于張之洞在庚子拳亂時贊成慈禧太后遠避西安的事，見於張之洞自撰的抱冰堂弟子記，原文如下：

「庚子七月中旬，京師危急。聞兩宮意將西幸，合肥李相糾合各督撫力阻聖駕，並未先商，已電山東請發摺，然後電知。乃急報項城，謂此議大謬，萬不可行，鄂斷不會銜。如已發，當單銜另奏。乃撤去鄂銜。幸此摺到京之日，畿郊已大亂，疏未達而乘輿已行，不然，大局不堪問已。合肥又有聯銜疏，請駕留山西，勿赴陝。亦駁之。」

上文所說的「合肥」，即李鴻章，時爲兩廣總督；「項城」，則袁世凱，時爲山東巡撫。庚

子之亂，八國聯軍破北京，慈禧及光緒倉皇逃至太原，再往西安。當北京未破之時，慈禧已有西逃的打算。李鴻章以爲如此則聯軍入京後沒有了議和的對象，必將使戰爭延長而議和困難，以後所增加的賠償亦更多，所以亟亟聯合各省督撫，力勸慈禧不可離京。張之洞素來以慈禧之意旨，聽說慈禧意欲逃離京師，而李鴻章聯合各省督撫上奏力阻，自己的湖廣總督名義亦在借用之列，急電袁世凱勿列己名。及後慈禧欲由太原再往西安，李鴻章又倡議聯銜奏諫，則張之洞又去函與之辨駁。總而言之，則李鴻章不贊成皇帝及太后離京遠逃，各省督撫亦多附和李鴻章的主張，所不贊成的，只有張之洞和他的姊丈，江蘇巡撫鹿傳霖，兩人而已。瘦公跋抱冰堂弟子記，曾有一節論及此事，說：

「按兩宮在太原時，江蘇巡撫鹿傳霖以勤王師至，力請幸西安，遂降入陝之旨。江督劉坤一聯合督撫電奏，言：陝西古稱天府，今非雄都，又與新疆甘肅爲鄰。新疆近偪强俄，甘肅尤爲回敝，內訌外患，在在可虞。又云：各國曾請退兵回鑾，不佔土地，正可藉回鑾之說，以速其撤兵之議。倘西幸愈遠，拂各國之請，阻就款之忱。朝廷徒局偏安，爲閉關自守之計，以偏僻影敝之秦隴，供萬乘百官之糧，久將不給。等語。當時若仍駐太原，聯軍亦斷無逼駕之事，回鑾較速，和議亦較易成。乃入陝經年，糜費數千萬，至臣工屢次籲請，乃議回鑾。雖由孝欽之懼逼，亦傳霖啓之也。」

鹿傳霖當時已年逾七十，其怯懦衰庸，不足深責。可怪的是，張之洞素來號稱通達有識見，

在保守派人物中又素來被視爲是前進份子，而在這一事件上竟然也與鹿傳霖一樣地贊成慈禧遠避西安，他的外交知識，是否眞要比李鴻章、劉坤一、袁世凱等人差得遠呢？這是一個不容易解答的問題。只是，鹿、張乃是郎舅至親，鹿傳霖因倡爲西幸之說而大得慈禧之歡心，隨即擢爲兩廣總督，入值軍機，由此扈從西安，晉位尚書大學士，宦途甚爲得意，當然是張之洞所知道的事。然則鹿傳霖倡議於先，張之洞附和於後，無寧正可視之爲他在得悉慈禧意旨之後所採取的將順行動，事實也是很明顯的了。而且不僅此也，當慈禧駐蹕西安之時，行宮百物缺乏，陝西又素稱貧瘠，宮中日用，未免窘迫，因此各省疆吏，多有進貢。張之洞此時，專門選擇慈禧所喜愛而爲陝西所缺乏的物品，陸續由湖北輦致西安，大爲慈禧所喜。隔了四、五年之後，張之洞在湖廣總督任內被命入覲，召對之時，慈禧還特別提出此事來當面誇獎一番。廣雅堂詩集中收有關于此事的紀恩詩一首，云：

「敢道滹沱麥飯香，臣慙倉卒帝難忘。艱難險阻親嘗到，天使他年晉國强。」

其下有注云：

「述西幸在陝時，湖北貢品，豐足濟用。」

由上面這些文字紀錄，儘可以使我們看出，張之洞在慈禧太后心目中的「簪眷」，確實甚爲優隆。有了這些事實，自然儘可以使他長被寵倚，久任疆寄，之後並且入閣拜相，以大學士兼任軍機大臣，成爲實際上的宰相。

張之洞在晚清時代，有「賢督撫」之稱。他之成功，固然得力於他之善於結納當時的最高統治者——慈禧；其才能與操守，亦是不可或缺的條件。操守方面，前文已經約略說過他的平生清節之一斑；才能方面，當然就是他在出任督撫以後的各種實際政績了。張之洞首次出任山西巡撫，在光緒七年十一月，至十年四月調陞兩廣總督。據清史稿張之洞傳所說，他在山西巡撫任內，「當大祲後，首劾布政使葆亭，冀寧道王定安等黷貨，舉廉明吏五人，條上治晉要務。未及一年，移督兩廣。」可知他在山西巡撫任內的治績，因任期過短而來不及有多大的展布。張之洞奏議卷四頁一，載有他到山西接任巡撫所上的一通謝恩摺，中云：

「身爲疆吏，固猶是瞻戀九重之心；職限方隅，不敢忘經營八表之略。」

味其文義，大有侷促一省，難展其經營八表的揮霍長才之意。那末，我們就看看他在調陞總督以後的「經營八表」長才吧！

清代中葉以後的總督，總數只有八個，即直隸、兩江、湖廣、兩廣、閩浙、陝西、雲貴、四川。其中直隸總督與四川總督只轄一省，兩江總督轄三省，其餘各轄兩省。到了光緒末年，方纔增加了一個東三省總督，亦轄三省。以較早時的八個總督額缺而言，直隸總督爲疆臣之領袖，地位最尊，兩江總督則轄地最廣而財賦最多，號爲大缺。再往下數，比較大的缺分，就要算是兩廣總督張樹聲等小缺，而是兩廣大缺，顯然可知他的與湖廣了。張之洞由巡撫擢總督，所得的不是陝甘、雲貴等小缺，而是兩廣大缺，顯然可知他的遷擢非出尋常。所以然之故，則因當時正當中法兩國因越南問題發生戰爭，原任的兩廣總督張樹

擊出身淮軍，與湘軍出身的欽差大臣彭玉麟相處不洽，清政府恐因此而有僨事之虞，乃將號稱通達時務的清流翹楚張之洞由山西調去，使之輯睦將帥，捍禦外侮。果然，張之洞到了廣東之後，由于處置得宜，不久就得到諒山大捷，使得驕橫的法國侵略者暫時戢止其侵略野心，戰爭亦得以在不賠款、不割地的有利條件下結束。諒山之捷，奠定了張之洞的事業基礎，他後來之得謚「文襄」與得賞花翎，也都由于諒山之捷的功勛。至于諒山之捷的原因，則應當歸功於張之洞的善於選擇統將。

張之洞未到兩廣以前，越南方面的清軍前敵主帥，是廣西巡撫潘鼎新。廣西軍敗，潘鼎新被免職，接統其軍的是廣西提督蘇元春。其時清軍屢敗，士氣不振，法軍則由北圻深入，漸次侵入粵邊，形勢至爲岌岌。張之洞到廣東後，目睹情勢危急，知道若非有宿將元戎出而振奮士氣，鼓勵軍心，戰事將愈趨不利。因此他禮聘在籍的前廣西提督馮子材重新出山，自募一軍，以當勁敵。由于馮子材的出山，清軍始有諒山之捷。趙鳳昌所撰惜陰堂筆記曾說：

「諒山大捷，是爲中國與外兵交鋒始稱戰勝之一次也。同時滇邊覃修綱，在臨洮府亦獲大勝，法國因此次戰敗而更換政府，立向我要求停戰議和矣。當日奏報，僅可述戰勝之迹，不及論戰勝之理。戰勝之理，全在統領得人。其人必德優於才，廉能服衆，始能駕馭部將，保衛士民。」

照此說法，諒山戰役之所以獲大勝，完全在於統帥之得人。當時的統帥，即馮子材。關于馮子材在諒山戰役中短衣帕首，赤足草履，以七十衰暮之年奮身陷陣，殊死搏戰，以致所部將士人

人感奮效命，終獲大捷的情形，清史稿馮子材傳記中敍之甚詳，可以參看，這裏無須多贅。所值得提出來一說的是，馮子材因年老退職家居，息影已久，這時何以能如此效命搏戰，矢死不顧呢？據趙鳳昌所記，乃是得力於張之洞的禮遇與識拔之故。惜陰堂筆記記此云：

「馮任廣西提督最久。土匪李揚才等擾邊多年，馮率部三次進剿，至關外及越境以平之。撫循地方，邊民越族，同深愛戴，均以馮爺爺呼之，表尊而且親之意。自西提乞病，在欽州本籍，因越事奏辦團練。甲申十二月，忽接粵督南皮遣員賫書，並餉銀五萬兩。書中聲明，一面奏聞，不及公牘，先此函達，速募練成軍，迅赴桂邊。馮謂南皮係巍科名流，乃能識我，越事已急，我允之矣。隨即招募部署，赴鎮南關。……」

我們中國人向來重視「知遇」，故而有所謂「士爲知己者死」的話。對於一個富感情而重然諾的節義之士來說，忠臣廉吏的知遇，尤其能使人感激奮勵。張之洞中遇解元、探花，以翰林學士出任巡撫總督，清望素著，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都認爲是極其高貴的人物，一旦能得其盼睞，無不認爲是極大的榮寵。馮子材當時，便是在這種心理狀態下感激奮起，毅然出而效命疆場的。這在張之洞來說，誠然是意想不到的事。官運亨通的人，往往富貴逼人而來。爲張之洞奠定後半生功名富貴的涼山大捷，竟然在這種情形之下出現，實在可說是機緣湊巧。張之洞一生，機緣湊巧之事頗多。這是值得指出來的一件。

張之洞做兩廣總督，前後凡六年。清史稿本傳在敍述涼山之捷後，接敍其此後的政績大概，

說：

「之洞恥言和，則陰自圖强，設廣東水陸師學堂，創鎗礮局，開礦務局，疏請大提專款購兵艦。復設廣雅書院，武備文事並舉。十二年，兼署（廣東）巡撫，於兩粵宜，輒多更置，著沿海險要圖說上之。在粵六年，史稱張之洞「蒞官所至，必有興作，務宏大，不問費多寡」，在此時已可見其端倪。許同莘所撰的張之洞年譜記此，則云：

「在任六年，始則經營戰守，繼則整飭吏治，培養民生，講求立國自强之道。凡用款率取之清釐中飽。閻文介在樞府日，與公內外同心，有所奏請，輒蒙報可。十四年，文介去位，樞府不愜於公。賴醇賢親王一意扶助，遇事奏請特准。」

閻文介即閻敬銘，乃是當時管戶部的軍機大臣；醇賢親王，則是光緒的生父，老關于奕譞特別照顧張之洞的事，張之洞自撰的抱冰堂弟子記中亦曾有敍述，云：

「己丑庚寅間，大樞某、大司農某，立意爲難，事事詰責，不問事理。大抵粵省政事，無不翻駁者，奏咨字句，無不吹求者。醇賢親王太爲不平，乃於襄所議奏各事，一一皆行，且事事皆極口稱獎。並作手書與樞廷諸公曰：『公等幸勿藉樞廷勢恐嚇張某。』言曰：『如張某在粵有虧空，可設法爲之彌補，不必駁斥。』其實粵省報銷款固無所謂虧也，然賢王之意，則可感矣。」

己丑乃光緒十五年，庚寅則十六年。當時在樞廷的各軍機大臣，除禮王世鐸外，依次爲額勒和布、張之萬、許庚身、孫毓汶。上文所謂蓄意與張之洞爲難的「某大樞」，竟不知所指何人。至於「大司農某」，則可以確定爲當時的戶部漢尚書翁同龢；因爲張之洞詩集中曾有明白的記載，說到翁同龢當年作戶部尚書時，曾經「一意傾陷張之洞，至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這也是無法解答的謎題。而醇賢親王在此時毅然出來代抱不平，並爲多方調護關照，對張之洞的方便就太大了。奕譞之爲人，志大而才疎。他之所以特別看重張之洞，無非覺得張之洞做兩廣總督，既不要錢，又肯爲國家任勞任怨，乃是不可多得的有用人才。的雄心壯志，然而他所具備的知識與學問，却實在不足以在歐美文化劇烈衝擊而來的當時，擔當起自強維新的建設大業。他不具論，單以他在兩廣總督任內所倡議籌設的煉鐵廠而言，在我國的工業建設史上，就是一個很大的笑柄。

張之洞奏議卷二十七，收有他在光緒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所上的「籌設煉鐵廠摺」，說：

「竊以今日自強之端，首在開闢利源，杜絕外耗。舉凡武備所需鎗礮軍械、輪船礮臺、火車電線等項，以及民間日用，農家工作之所需，無一不取資於鐵。兩廣地方產鐵素多，而廣東鐵質尤良。前因洋鐵充斥，有礙土鐵，經臣疊次奏請開除鐵禁，暫免稅厘，復奏免爐餉，請准任便鑄鐵，以輕成本，而敵侵銷。多方以圖，無非欲收已失之利，還之於民。查洋鐵暢銷之故，

用機器，鍛煉精良，工省價廉。察華民習用之物，按其長短大小厚薄，預製各種料件，如鐵板、鐵條、鐵片、鐵針之類，凡有所需，各適其用。若土鐵則工本既重，鎔鑄欠精。生鐵價值雖輕，一經煉爲熟鐵，反形昂貴。是以民間競用洋鐵，而土鐵遂至滯銷。……」

以下他列舉廣東各口岸洋鐵入口及土鐵出口之數，並以光緒十二年的貿易册所載爲例，說明洋鐵之入超，一年中達銀二百三十萬兩，爲一百八十萬兩。爲補救計，亟應自行設廠，購買外洋新式機器，照西法煉製洋鐵，以期斷絕洋鐵之內銷。他並且在摺中說明，業經託由出使英國大臣劉瑞芬，與英國諧塞德公司訂立契約，即由該公司代製鎔鐵大爐二座，日出生鐵一百噸，並隨附煉鐵、煉鋼、壓板、抽條、及製作鋼軌等項機器，共價英金八萬三千五百鎊。該項機件，約定分五次運粵，十四個月交清云。這一個計劃中的煉鐵廠，原定設於廣州城外的鳳凰岡。但在機器運回之前，張之洞業因奉旨籌辦蘆漢鐵路之故而調爲湖廣總督，繼任的兩廣總督李瀚章奏陳廣東產鐵不多，不便建立煉鐵廠，於是又由張之洞的報移設於湖北，亦就是後來的漢陽鋼鐵廠。就漢陽鋼鐵廠設立以後的情形來說，張之洞的建廠計劃，笑話實在太多了。

在上文所引的「籌設煉鐵廠摺」中，張之洞曾說：「兩廣地方產鐵素多，而廣東鐵質尤良。」照此說法，他似乎已曾對廣東廣西二省的鐵礦蘊藏情形作過一番勘察調查，並已瞭解礦質情形；事實何嘗如此。根據民國三十四年的估計，廣東廣西二省的鐵礦蘊藏量，只有六百餘萬公噸，遠

不及遼寧、湖北、察哈爾、福建等省。煉鐵需煤，而廣東廣西却又所藏甚少，廣西居全國之第十五位，廣東居二十六位，可稱貧乏。由李瀚章後來奏報廣東不宜設廠的情形看來，張之洞對於當時歐美所用的煉鐵方法一無所知，就貿然地買回兩座煉鐵爐來，完全不知道所買的煉鐵爐是否合於煉鐵之用，看起來就更加使人覺得可笑又復可憐了。凌霄一士隨筆引述中國鐵礦志一書中所載，某地質學家對于此一段往事所說的話，略云：

「張之洞任廣督，議建煉鐵廠以爲製鋼軌之用，因委駐英公使薛福成在英訂購機器。廠主謂須先將煤焦及鐵砂之樣品寄英化驗，始可視其品質決定設計煉鐵用之機器。薛以告張，張曰：『中國之大，何處無佳煤佳鐵？但照英國所有者購辦一份可也。』於是英國梯特賽廠遂依英國所用酸法煉鐵，設計色廂爐二座運華。其時張之洞已由兩廣移督兩湖，而大冶已發現鐵礦。有議廠宜設於大冶者，張曰：『大冶路遠，照料不便，若建於漢陽，吾猶及見鐵廠之烟囪也。』於是乃在龜山之麓建廠，地址狹小而一帶水田，斥巨貲以經營之。又於各處徵詢煤礦，最後得馬鞍之煤，灰磺並重，實不適於煉焦，煉得生鐵，實不合用。而鋼軌更無論矣。」

這一段話，說大冶之鐵不適於使用色廂爐冶煉，及馬鞍之煤不適煉焦，更不適於煉鐵等，以與近人全漢昇氏所撰的「漢冶萍公司史略」一書相參看，可知其大致不錯。漢冶萍公司即是漢陽鋼鐵廠的擴大。此公司後來因生產成本太重而經營困難，以致鐵廠停止冶煉，年年只以所採掘的

礦砂低價運售日本償付所欠債務，說來極可痛心。我們若留心探究，漢陽鋼鐵廠的以會高得迫使該廠無法支持冶煉的工作，便可知道，此正是先天性的因素，其根本原因在張之洞籌建此廠之初便已種下，所以到後來纔會成了無法醫治的痼疾。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西洋人所研究成功的煉鋼法共有兩種，一是以酸性冶鍊的是以鹼性冶鍊的西門士馬丁法。這兩種煉鋼法的區別，貝色廠法，一此不適宜用於含磷較多的鐵礦；反之，西門士馬丁法恰恰沒有此一缺點，如果鐵礦就應採用西門士馬丁法煉鋼。英國的梯特賽廠在接受張之洞的委託時，曾要求張之洞將礦砂及焦煤的樣品先寄英國化驗，目的就希望能够確定，煉鋼廠所需的冶爐，應該根據那一種煉鋼法來設計。張之洞當時既未尋得鐵礦，自然無從知道鐵廠冶爐應用何種型式。何況他當時也根本無此認識，能够知道不同煉法的問題。他只是以他揮霍宏闊的作事氣派，大言炎炎地以爲這乃是品質的礦砂需要採用不同煉法的問題。任令英國廠商自行決定冶爐的設計。這一次，不大湊巧，梯特賽所設計的貝色廠式煉鋼爐，並不適於後來的煉鋼廠。

從英國訂購的機器及附屬設備，於光緒十七年間運到中國。張之洞爲了照顧方持要在漢陽的大別山麓建廠。那裏的地勢低窪而潮濕，必需大規模的填高地基，方便的理由，堅結果，建廠的工作要先從填高地基做起，所填的厚度達一丈一二公尺之譜，計填土能建立工廠。銀三十餘萬兩。這括購買機器及運輸回國的運費在內）三百萬

兩之中，已佔去了十分之一，差不多相當於在英國訂購機器的價格。雖然張之洞的手面宏闊，對于用錢向不計較，但這筆賬總是要算到鐵廠的生產成本裏去的。

湖北省的大冶有豐富的鐵礦，那是盛宣懷就正好把大冶鐵礦賣給了他。此礦的鐵砂蘊藏量極爲豐富，當時僅就露出地面的部份作一概略的估計，數目就有二千七百餘萬噸之譜。如以每年開採一萬噸爲率，應該說是運氣很好的了。但是此礦的最大缺點，是礦砂中的磷質較多，煉成的生鐵，含磷在百分之零點二五左右。如果煉鐵廠的冶煉根據西門士馬丁法設計，這當然不是問題。但成問題的是，煉鐵廠的機器乃是根據貝色麻式煉鐵法設計的，對于鐵中的磷質無法除去。於是漢陽鋼鐵廠所製成的鋼鐵，就因磷質不能除去之故，而容易脆裂折斷，無論用于鍛製或鑄造，都不合適。即使只用來鑄製鐵路用的軌條，亦仍然因容易斷裂而不適用。光緒二十年，漢陽鋼鐵廠的製品開始應市。當時，進口的洋鐵在上海的售價是每噸銀三十餘兩，漢陽廠的製品，祇能賣到每噸銀二十三兩，猶且乏人問津。產品的價格低而銷路滯，當然會增加鐵廠經營的困難。而其根本原因則在于鐵廠的煉鐵設備不適宜。這是張之洞在建廠之初所種下的先天缺陷，無法補救，終於使他的一腔熱忱與滿懷的壯志，也都成了鏡餅。

鋼鐵工業的基本原料是煤與鐵，而鐵礦與煤礦很少能够毗連在一起。爲了節省運輸費用，現

代的鋼鐵工業，都需要視運輸條件的利便，或以鐵就煤，或選擇煤鐵二者的中點，作爲建立鋼鐵工業的地點。反觀張之洞所辦的漢陽鐵廠，其地既不產煤鐵，亦不是煤鐵二礦的交通中點。鐵礦日出鐵百噸計，需支付鐵砂運費六十餘元。湖北的馬鞍山雖然產煤甚多，但因所含的灰分與磺質太多，需要搭用開平焦煤或外洋焦煤，方能用於煉鐵。而開平焦煤與外國焦煤的來路都極遠，運到漢陽，每噸要賣白銀十六、十七兩。把這些生產成本加起來算，即使不包括員工薪金及外國顧問的巨額薪酬在內，已經超過上市產品所售得的價格，何況這些產品的銷路還是十分呆滯，賣不出去！所以漢陽鋼鐵廠開辦甫經半年，就已明白看出其虧折。到了光緒二十四年，虧折的累計數已經達到一百餘萬兩。

張之洞到了這時，也慌了手脚，知道這種賠本生意不能再做下去，急欲設法脫去此一累墜不堪的包袱。於是乃有後來的盛宣懷接辦之事。

胡思敬國聞備乘卷一，有關于盛宣懷接辦漢陽鐵廠的一段記事，說：

「盛宣懷辦洋務三十餘年，電報輪船礦利銀行，皆歸其掌握，攬東南利權，奔走效用者徧天下，官至尚書，貲產過千萬，亦可謂長袖善舞矣。其始起推挽，由李鴻章。鴻章內召，王文韶繼爲北洋大臣，倚之如左右手。北洋京畿左輔，爲洋務總滙之地，湖廣總督張之洞忌之。是時薑漢鐵路議成，南端由之洞主政，北端由文韶欲保用宣懷，恐之洞不從，遣宣懷私詣武昌，探

其意旨。之洞辦武昌鐵政，虧空過百萬，方窘迫無以爲計。宣懷至，許爲接辦，任彌補。之洞大喜，遂與文部合疏，保薦宣懷爲督辦蘆漢鐵路大臣。……」

以上所述，乃是關于張之洞如何將漢陽鐵廠交與盛宣懷接辦的一種說法。而據另一種非正式的記載，盛宣懷當時似曾涉及某一貪污案件，爲人所參劾，有旨交與湖廣總督張之洞查辦。張之洞爲他開脫洗刷，故而盛宣懷亦答應張之洞的要求，允爲接辦漢陽鐵廠。不論那一種說法對或不對，張之洞因漢陽鐵廠虧折太重，無法經營，不得不將之交予盛宣懷經營，由初期的官辦改爲此時的商辦，當是不爭之事實。

盛宣懷對于經營實業，有他的特殊長才。他接辦鐵廠以後，深知由遠道去買開平焦或洋焦到漢陽來煉鐵，絕對不是辦法。所以在接辦以後，就積極從事煤礦的探勘。後來在江西萍鄉尋得豐富的礦藏，煤質又極優良，就大量投資開發，以鐵路及船隻接駁運輸之法，運到漢陽鐵廠來煉鋼，降低了很多的生產成本。到了光緒末年，又把原有的兩座煉鐵爐拆除，新建日出生鐵二百五十噸的西門士馬丁式煉鐵爐二座。自此以後，漢陽廠的產品中不再存有化煉未盡的磷質，品質純粹，聲譽日起，產品亦可遠銷歐美。到了歐戰結束以後，漢冶萍公司雖因歐美列强的競爭而再度陷於經營困難，那也已經是後來的事。至少在盛宣懷接辦以後，已將張之洞當年所留下的病根，設法除去了許多。至于漢陽廠地址選擇的錯誤，使得鐵廠與鐵、煤二礦分別位於相隔遙遠的三個地方，以致原料轉送的成本始終無法降低，那是誰也無法改變的事。這一筆賬，當然只有記在張

之洞的頭上了。

張之洞任湖廣總督，前後歷時十七年之久，所辦的各項工商業建設，極多。清史稿張之洞傳說：

「海軍衙門奏請修京通鐵路，臺諫爭陳鐵路之害，請停辦。翁同龢等請試修邊地，便用兵。徐會澧請改修德州濟寧路，利漕運。之洞議曰：『修路之利，以通土貨、厚民生爲最大，徵兵轉餉次之。今宜自京外蘆溝橋起，經河南以達湖北漢口鎮。此幹路樞紐，中國大利所萃也。河北路成，則三晉之輸接於井陘，關隴之驂交於洛口，自河以南，則東引淮吳，南通湘蜀，萬里聲息，刻期可通。其便利有數端：內處腹地，無慮引敵，利一；原野廣漠，墳廬易避，利二；廠盛站多，役夫賈客，可舍舊圖新，利三；以一路控八九省之衝，人貨輻輳，足裕餉源，利四；近鑛有事，淮楚精兵，崇朝可集，利五；太原旺煤鐵，運行便則開採必多，利六；海上用兵，漕運無梗，利七。有此七利，分段分年成之，北路責之直隸總督，南路責之湖廣總督，副以河南巡撫。一得旨報可，遂有移楚之命。大冶產鐵，江西萍鄉產煤，之洞乃奏開煉鋼廠漢陽大別山下，資路用，兼設槍礮鋼藥專廠。又以荆襄宜桑麻菜而饒皮革，設織布、紡紗、繅絲、製靴革諸局，佐之隄工，通之以幣政，由是湖北財賦稱饒，土木工作亦日興矣。」

這一段話，概述張之洞由兩廣總督調爲湖廣總督的原因，是由于奉旨興辦蘆漢鐵路，負責南段工程，及在湖廣從事各項工商建設的情形，敍次大致不錯。所交待欠明的，乃是開辦漢陽鐵廠

的部分。因爲張之洞計劃籌備煉鋼廠，並不始於到湖廣之後；及至建廠完成，尚只有大冶之鐵礦而不知何處有合用之煤。這些情形，前文已有敍述，今不再贅。至于鐵廠以外的槍礮、鋼藥、織布、紡紗、繅絲、製靴革等廠，以及鑄造銀元的工廠，種類繁多，具可見張之洞辦理新政的局面之大，與氣度之宏濶。張之洞素來以「經營八表」自負，他在湖北的各種設施，庶幾可以配稱。但後人對于張之洞的論述，除了他在鐵路問題上所發表的意見甚爲正確，能得後人之稱道外，其他各項工商業方面的建設，則對之多有微詞。如清史稿本傳就以「由是湖北財賦稱饒，土木工作亦日興矣」的話，來譏諷張之洞的好興作。花隨人聖盦摭憶的作者黃濬，對張之洞的這一番作爲，乃能有較爲正確的估量。

黃濬評許同莘所撰張之洞年譜，關于他在光緒二十年至二十二年署理兩江總督期間的施爲行事，論云：

「以南皮之聲譽，兩江總督之地位，其所獻替，所左右者，宜若洪鉅非常。今觀其舉措，似側重鋪張應付，專力爲物質上之角逐者。不知政治思想苟不更張，人民智識苟不增進，則一切建設，盡成逐末。四十年間，懸崖轉石，前此所恃爲富國强兵之要政，及今思之，無量黃金，何莫非擲於虛牝耶？唯緣本原不立，故創造適以資弊。清史稿南皮傳，出桐城馬通伯先生手筆。傳中所云：『蒞官所至，必有興作，務宏大，不問費多寡』，不能不謂爲紀實也。然南皮所造端諸事，皆極有關係，亦皆近代設備所必不可少者。如有廉鍥之性行，與精銳之專家，繼續爲之數十

年，非不能資以興國．所惜者，當時人才缺乏，一切皆以官僚充任。設一局所，祇爲候補道增一差使，遂寖成弊藪。予按許君是書，頗似李瀚章之曾文正公年譜。蓋其心目所景仰者，若甚龐大，落筆遂甚敬謹，取材不得不狹隘。凡舊日官文書所表現者，大人先生，往往如是，未可爲許君病也。其實南皮之事功不如文章，意存建樹而力希忠寵，故有創而鮮穫。……」

以下續論許撰張之洞年譜所未諦之處，文長不錄。黃濬此文，除了評論許同莘編撰張之洞年譜的態度及取材問題俱極中肯以外，對于張之洞的批評，尤其入木三分。按，中國在清代末年所推行的洋務運動，早在甲午戰爭以前，就已著著進行。見於具體設施的，如創辦新式兵工廠自造洋鎗大炮，建立新式海軍艦隊，及派遣各項專門人材赴歐美留學等均是。其時北洋艦隊的噸位居世界第四，中國的國威，一時大有隆盛氣象。但是也有一些具有遠見的外國人士說，日本維新，係從改革教育、政治、社會、軍事，及工商建設等全面着手，遠比中國單從事軍備方面的改革爲澈底而有效。將來中日兩國如果一旦發生戰爭，中國必非日本之敵。這一番預言後來在甲午戰爭中果然完全得到證實，而清朝中國所推行多年的洋務運動，至此亦完全暴露其缺點。甲午戰爭以後，清朝中國如果澈底瞭解洋務運動之何以失敗，及日本維新之何以成功，便當首先從革除窳敗的政治習慣、轉移社會風氣、健全國民教育、培養愛國精神等根本工作做起。倘仍不此之圖，依舊只是從造鎗礮、練軍隊、興實業等等方面力求富國强兵，雪恥報仇，就不免要如黃濬所說，「唯緣本原不立，故創造適以資弊」的情形了。即使規模濶大，耗財無數，最後仍然是「無量黃

金，何莫非擲於虛牝」，說來實堪惋惜。張之洞是否不能懂得這一番道理？很難知道。不過我們當然瞭解，清代末年的政治腐敗，政風汚濁，其本源來自掌握政權的慈禧太后與當朝權要。欲言改革，首先便會遭遇到這些力量的反對與阻撓。以張之洞的聰明，當然不致於見不及此。然則他之不肯輕易談論這些，顯然亦與他爲官的作風表裏一致，不足爲怪，亦無足深責的

近人柴萼所撰的梵天廬叢錄，對于張之洞亦有類似的批評，說：

「論者謂，使文襄生於乾嘉全盛之時，論思獻納，潤色鴻業，則必能於阮、紀兩文達之間占一席地位。即不生於太平時代，而終其身爲文學侍從之臣，亦必能於潘文勤、翁文恭而後，主都下風雅之壇坫。昔人恨王荊公不作翰林學士，而惜褚彥同之作中書而後死，以爲『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予於文襄亦云。」

前文所說的「阮、紀兩文達」，指乾隆嘉慶之間的學者名流阮元與紀昀；潘文勤卽潘祖蔭，翁文恭卽翁同龢，則同治光緒間有名的文壇泰斗也。柴萼以「恨王荊公不作翰林學士」與「惜褚彥同之作中書而後死」，顯然也與黃濬所說，張之洞「事功不如文章」的論點相同，以爲張之洞實在不應該外放督撫，再入軍機，以致文章既不能名世，事功又甚遭謗議，說來實在可惜之至。

通觀張之洞一生的宦途及建樹，對於這樣的批評，亦不能說是持論過苛。因爲他在湖北所作各項工商建設，由於經費無著之故，曾以膨脹通貨的方式以爲生財之道，其結果則對清末以迄民國以來的物價上漲，發生了極爲不好的領導作用。這一點，對於當時的無數斗升小民，都曾受到很大

的拖累。若以社會經濟的觀點而言，所留下的後遺症，亦是很不好的。

近人瞿宣穎所撰人物風俗制度叢談甲集，引錄筠連曾所撰之文，述及宣統三年辛亥與民國十四年乙丑之物價比較情形云：

「昔者辛亥也，今者乙丑九月也，皆以制錢計。銅幣一枚合制錢十文。物價之以升計者，米昔六十，今六百。苞穀三十，今四百。以斤計者，麥麵昔二三十，今四百。火酒昔四十，今七百。。菜油昔七八十，今五百。牛肉昔四十八，今四百。。桐油昔五十，今六百。紅糖昔四五十，今五百。豬肉曰和身滾，昔七十四；曰淨肉，今七百四十八，今六百。猪曰帶頭，今六百四十；曰淨肉，今七百四十八，今六百。。……工資之以月計者，耕種昔八九百，今七八千。女傭昔七八百，今二千。以日計者，縫工昔八十，今九百。泥瓦匠昔六十，今七百。木匠昔八十，今三百。」

根據上文的記述，自宣統三年清祚告終至民國十四年，十四年之間的物價上漲率，大約是十倍之譜。由於物價上漲之故，各種勞工之薪酬，亦相繼上漲，但其比率則顯有不同。大致縫工、泥瓦匠、木匠等均上漲十倍或十倍以上，相當於一般物價之上漲比率。農耕者之工資上漲率只八九倍，已較物價之上漲率稍見落後；至于城市中的女傭，則其工資的上漲率只三倍尚且不足，比之物價的上漲率，瞠乎其後矣。自遜清末年至民國十四年，物價的上漲何以有十倍之多？這不是此文所要討論的問題，不過在這裏提出來作一參考比較而已。後文所引述的，則是另一項關於物價上漲的參考資料。

徐珂可言卷十四：

「百物之貴，始於清庚子拳亂以後。自是而繼長增高，閱二十年，有數倍之者。西夏秋之交，滬之物價騰踊，穀類益貴，每石米銀幣十二圓。銅幣益賤，一銀幣易銅幣百五十餘枚，當制錢一千五百數十文。於是，日得傭值數百錢之數米爲炊者，啼饑號寒，日夕恐吝，而以銅幣之濫鑄，稻米之出洋，歸獄於官吏矣。」

據此云云，可知民國初年穀價之貴，一個原因是米穀出洋，另一個原因是官方濫鑄銅幣。當時所謂銅幣，指面值當制錢十文的「當十銅元」而言，其制度始於湖北，主其事者卽爲湖廣總督張之洞。胡思敬國聞備乘記此云：

「錢幣之制，必鑄本與錢價相埒，乃可取信於民，久行無弊。古未聞以圜法爲利者。自厘金興，所收制錢，每緡重至七八斤。外人潛運出口，消化爲銅，中國始憂錢荒。偷爲一切取巧之計者，乃倡議改鑄銅元。始行於湖北，每枚重二錢七分，當制錢十文。較其贏絀，六倍其利不止。各省仿效行之，銅元餘利，遂爲入款大宗。端方張之洞皆藉此以濟新政，於是局所增至二十餘處。奸商結黨盜鑄，或更從海外輸入。幣日益多，銀日益漲，每銀一兩，易錢至二千，商業大窘。物價既昂……」

據徐珂可言所說，當銅元未鑄之前，由于制錢缺乏之故，每銀一兩約易制錢八、九百文。如果鑄行銅元以後，銅元的幣值不跌，則每銀一兩應該只能兌換銅元八、九十枚，伸合制錢八、九

百文。在這種情形之下，幣值穩定，物價也就不致因而引起波動。但是後來所見的情形則是，由于銅元一枚的重量不過只有二錢七分，而一枚制錢的重量約爲一錢，銷毀制錢三枚改鑄銅元一枚，可獲七文之利，是卽胡思敬所說的，「較其贏絀，六倍其利不止。」大利所在，自然會促使主事之人不復顧及銅元增多之後所引起的通貨膨脹問題，濫鑄不已，終於引起銅元貶值，物價上漲。影響所及，則就是徐珂可言一書中所說的情形：

「物價以銅幣充斥而日增，購物者苦之，而販夫販婦亦苦。蓋市井細民之日入皆計錢，雖工資漸增，究不能與物價之增同其速率，購買力乃銳減，銷路自隘。此販夫販婦之所以咨嗟太息也。」

同書又說：

「物價日貴，由于銅元之充斥。鑄造銅元，爲官營業之一，主其事者利其有可朘削，乃濫鑄不已，非盡內國外國奸商之私鑄也。」

由上面這些記述，可知民國初年物價上漲之所以十倍不止，除了米穀出洋等等的因素外，最主要的原因，乃是官方所辦的銅元局，將舊有的制錢銷毀改鑄銅元。銅元充斥市面的結果，舊日以制錢作爲計價單位的物價，逐漸改以銅元計價，於是由一變十，物價之上漲乃以十倍計。因鑄銅元而使清末以來的物價上漲至于十倍，這其間所發生的影響，當然很大。胡思敬說，此事之始作俑者爲湖北，乍聽之下，以爲像張之洞那樣處處以福國利民爲己任的朝廷重臣，當不致於目光

淺短，孳孳爲利，至於如此地步的罷！然而事實上的情形，眞令人難以想像。凌霄一士隨筆引蘭隱齋筆記，云：

「福建陳石遺孝廉衍，詩才清俊，庚寅之秋，與余同在上海製造局，後又與余同在張文襄幕府。時正苦庫儲匱乏，石遺建議改鑄當十銅元，謂二錢之本可得八錢之利。余謂此病民之策，何異飲酖救渴，決不可爲，君他日亦必自受其害。石遺撫頭不答。文襄欣然從之。未幾，各省紛紛效尤，民生自此益蹙，不免災害並至矣。哀哉！」

這一段記述，如以陳衍年譜中所記的資料互相證明，可信其確爲事實。侯官陳石遺先生年譜卷四，光緒二十八年壬寅秋間記事云：

「首議鑄銅幣。初，廣雅讀家君所著貨幣論一書十餘篇，欲創鑄當十紫銅元，恐其終不能通行，未決，匆匆移鎭。至是，撫部又疑之。家君又著論，與反覆辨說。乃以停鑄一兩器試鑄之。至年底，不及四閱月，估計工料，已贏餘利五十萬銀圓。明年，乃大開小計六十處。並大派學生留學日本。次年一年，贏利二百萬銀圓，而廣雅同任矣。」

張之洞於光緒二十八年九月初六日奉旨署理兩江總督，湖廣總督由湖北巡撫端方兼署，至翌年二月，方交卸兩江總督，回湖廣總督本任。上文所說的「移鎭」，卽指此事而言；「撫部」，卽是端方。按張之洞年譜光緒二十八年記事，亦有：「八月，設銅幣局」的記事。可知湖北之議鑄銅元並設局籌辦，卽在光緒二十八年，獻議者卽是陳衍。陳衍後來被張之洞保舉爲經濟特科的

人才，想來便是因爲他在創議鑄造當十銅元一事上的特殊貢獻，甚得張之洞的欣賞之故。石遺年譜卷四，光緒三十年壬寅春間的記事，續記此云：

「廣雅歸，益用家君言，盛鑄銅元。前後數年，獲餘利一千四百萬銀元。用以百廢俱興。漢陽兵工廠添造快鎗，由每日五枝至五十枝而未已，子彈稱之。武健諸軍外，練成第二鎮新軍，礮隊營、輜重營等俱備。以外派遣各種學生留學日本，士官爲盛。卒成武昌革命之局，非廣雅所及料矣。」

民國前一年陰曆八月十九日，武昌新軍發動革命起義，由于軍械庫所存儲的鎗械彈藥極爲豐富，所以，新成立的軍政府得以迅速擴充軍力，由一鎮變成四鎮，後來便以此作爲抵抗南下清軍的武力基礎。追本溯源，張之洞之功不可沒。但張之洞當年在湖北竭力經營軍備，其目的固不僅在爲革命鋪路。總由張之洞乃是一個好大喜功而又務爲規模宏大的人，所以他不論是在教育文化、工商實業、以至政治軍事等方面，都喜歡以大量金錢從事規模巨大的建設，不如此不能愜心悅意。然而湖廣所轄只湖南湖北二省，財賦所入有限，而滿清政府又因財政困難之故，不能給予大量金錢的支援，以致凡所興作，都不免因經費支絀而不如理想。陳衍所創議的鑄造當十銅元之法，使他能「以二錢之本而得八錢之利」，數年之間，就得到贏利一千四百萬銀元，於是積久以來的財政困難問題，亦迎刃而解。這在張之洞來說，自然是極妙不過的利源了。殊不知道，一人作俑而他人紛起效尤，輒眼之間，舊時所行用的制錢都變成了銅元，最小的貨幣單位由面值一文

的制錢變成面值十文的銅元，如之何不使一般物價在一二十年之間，暴漲至于十倍呢？由這一件事情來說，張之洞因謀興利源而鑄銅元，致使幣制紊亂而使社會廣大民衆因通貨脹膨而飽嚐物價上漲之痛苦，所造成的不良後果，不能說不大。縱使如此，倘使社會民衆在支付了如此巨大的代價之後，能夠得到國富民强的效益，則這種代價也仍然值得。而試一檢討張之洞耗費如此大量金錢在湖北所從事的建設事業，對于國家的進步及人民的生活究竟有些什麼裨益？這就實在難說了。黃濬說：「不知政治思想苟不更張，人民智識苟不增進，則一切建設，盡成逐末。」張之洞的建設事業，其成績正是如此。然則他所造成的通貨膨脹及物價上漲，其結果不是也太沒有意義了麼？

近代國家常不免有因政治目的而從事人爲的通貨膨脹手段，藉以促進消費、刺激生產、繁榮社會。利害相權的結果，常是利多於害。所以近世以來，大家對于通貨膨脹一事，早已耳熟能詳，見慣不驚。但若膨脹通貨的目的只在增加政府收入，對于人民生活方面的影響不能同時兼顧，這樣的通貨膨脹手段，就大有可議了。陳衍不明白鑄造當十銅元足以造成通貨膨脹，以此作爲開闢利源的奇謀秘計，張之洞亦不知其中利害，欣然加以接納，此不但足以證明張之洞本人的經濟學知識所知太少，他幕下的所謂「人才」如陳衍者，也實在太不高明。胡思敬以爲張之洞「閣於知人」。所以然之故，一方面是由于他缺乏新思想與新知識，以致對于人才之賢否，沒有鑒別的能力，自更談不上知人善用；如誤信陳衍之言，便是一例。第二方面，則因張之洞對人常多

偃蹇無禮之態度，又好謾罵，以致人多畏之。這種情形，在國聞備乘一書中多有記述，引述兩條於後：

國聞備乘卷二：

「張之洞以內閣學士出任山西巡撫，後遂連綰疆符。自負才地，多作度外之事，規，年愈邁而氣愈驕，自享太平五十年，俯視一切，蓋以爲天下莫己若矣。湖北提學一人爲學堂監督，已札委矣。之洞聞而怒曰：『汝今作學司，當受督撫節制；不比提命馳節而來，可稱欽差也。』紹箕垂頭喪氣而出，自是悒鬱不伸。未幾，得疾卒。直內用，皆欣欣有喜色，合八府三州京官，張宴於湖廣會館，徵集名優，衣冠濟濟，極之洞收束已三日，屆時催者絡繹載道，卒託故不往。鹿傳霖、徐世昌忍饑待至二更散。聞其性情怪僻，或終夕不寐，或累月不薙髮；或夜半呼庖人具饌，稍不愜卽呼行坐內廳宣淫；或出門謝客，客肅衣冠出迎，僵臥輿中不起。其生平細行大節，鮮不乖，張之洞的性行怪僻及驕蹇無禮，清末以來的筆記小說亦多有之，今中所說的「聞之洞內用」，指的是他在光緒三十三年以體仁閣大學士管湖廣總督的職機大臣之事。清代以入軍機爲拜相，張之洞在此以前雖已陞授大學士，但因未兼軍機並不能算是眞宰相。此時由湖廣總督內召，算是眞的做宰相了，他的直隸同鄉京官們爲了歡迎他，纔定期會集在湖廣會館公讌，以表慶賀之意。誰知他初時則並不拒絕，到時却托故不去，累

得大學士兼軍機大臣鹿傳霖以下的一班同鄉京官，「忍饑待至二更」，仍是「掃興而敗」，還樣的作風，亦未免偃蹇之甚了。同書卷三又云：

「之洞自領封圻以至入參樞政，推轂人率不過道府、丞參而止，故小人有才者不甚附之。又性驕好諛，士踵門求見者，或七八往不一延接；或引至花廳，歷數時不出；或出見，略詢數語，卽欠伸，呼茶欲退。幕僚侍立白事，小有失誤，訶責之聲達於戶外。故君子亦望風遠避。平時所識拔者，只一二浮華淺露之士而已。」

這一段話，則又說張之洞由于缺乏含容之量與不樂爲人援手，故而不但小人不附，卽君子亦不敢親近，其結果則所識拔者僅只一二淺露浮華之士，所可以舉得出來的，大約卽是梁鼎芬與陳衍。陳衍之才識，在他建議鑄造當十銅元一事中已可略見一斑。至于梁鼎芬，則本是張之洞的翰林後輩，因參劾李鴻章而落職。張之洞做兩廣總督，把他請來主講端溪書院及廣雅書院；及調湖廣，又請他主講兩湖書院。由于梁鼎芬逢迎有術，張之洞後來保他署理武昌知府，歷陞至湖北按察使，與張之洞的關係甚爲密切。凌霄一士隨筆曾經記述梁鼎芬與張之洞的軼事，說：

「文襄秉性，自以爲吾素賞識之人，苟措事不衷於理，惟吾方能詆毀之，而他人必不可附和。蓋人之昨是而今非，昔賢而玆不肖，吾自有辨之之術在，他人程度，殆不足以及此。且不特不可附和已也，又必爲之湔祓而曲原之，以見大帥平日賞識之誠不謬，此遭不過偶爾失誤，而無損於

大帥知人之明。清季高官，盧憍之氣皆類此，而文襄爲尤甚。梁從文襄久，習之有素。一日，文襄召梁會食，文襄素重其才，委辦宜昌士藥局，忽措置大不洽文襄之意。席中偶談及惠之，文襄嚴詞遙責之不台。此時文襄，實深有憾於惠之，意念與平日大異，而梁不知也，猶以故態測之，起而言曰：『不然。朱道平素辦事穩健，頗知大體，此次舉動，或別有用意，或偶然不檢。君子不以一眚掩大德，幸吾師曲宥之，而勿加以苛責也。』文襄大怒，曰：『吾任封疆，閱人多矣。乃吾所謂非，而汝是之，吾所謂不肖，而汝賢之，是吾於是非賢不肖之辨，尚不如汝之眞確也，吾將此座讓子！』言畢而喘。梁戄觫萬狀，同席皆失色，不歡而散。明日，梁晤蘇龕，猶戰慄而言曰：『昨日天威咫尺！』蘇龕哂之，梁急改易其辭曰：『帥威咫尺！』可謂窮形極相，而張氏之虛憍自用，亦自可見。梁爲人丰骨峻峻，示人若儼然不可犯。獨對于文襄，則遇事迎合其心理，視於無形，聽於無聲，猶孝子之事親也。」

看了這一則故事，對于梁鼎芬之畏懼戄觫，固然覺得可憐，對于張之洞的帥威不測，也很使人不敢領教。所謂「君子亦望風遠避」者，在這種情形之下，何得不然？其結果所致，是張之洞雖然歷任封疆達二十餘年，幕府人才，却只有梁鼎芬、陳衍、鄭孝胥之流，說來實在可憐！從前曾國藩開府兩江，幕中人才輩出，有很多人後來都歷仕至督撫專閫之寄，在同治中興的業績上作

出了貢很多的獻。張之洞的幕府人才寥落如此，他本人
參樞機，必將有無人可資臂助之歎。後來的情勢發展，不幸而正是如此。

光緒三十三年七月，張之洞內召爲軍機大臣。據胡思敬國聞備乘等書所說，慈禧太后所以要在此時將張之洞用爲軍機大臣，乃是因爲慶王奕劻與袁世凱二人的勢力太大，爲了制衡奕劻與袁世凱的勢力，好作爲載灃入軍機學習行走，又將張之洞調回京來與載灃合力，以載灃爲攝政王輔立溥儀。爲了預防奕劻之反對，事先將奕劻遣往普陀峪驗收工程。一等奕劻回京，即刻宣布此一立嗣大事，明顯地將奕劻與袁世凱二人排除在參與密謀的決策人士之外。在這一重要關頭，假如張之洞有適當的得力幫手可爲臂助，必可在此時發揮重大作用——乘慶、袁勢力排除以後的空隙，組成有能力的政府，既可一洗昔日慶、袁貪污弄權的局面，亦可刷新光緒末年頹廢萎靡的積弱情勢。但因張之洞此時只是孑然一身，無人爲之羽翼，他本人又無法使攝政的小醇王載灃聽從他的安排指授，所以在這重要關頭上竟然發生不了作用。終於，在慶、袁勢力被排除之後，圍繞在攝政王載灃周圍的皇族親貴，紛紛起而攘奪政柄，國家大事越發變得不堪聞問。慈禧召張之洞入軍機，目的在希望他能與載灃協力，共維大局。却不料後來的情勢發展如此，這當是慈禧生前所不及料的吧！

張之洞死於宣統元年十二月，據說其死因是由于他在親貴典兵的問題上，與監國的攝政王

澧發生爭執，載澧對於張之洞的反對意見堅拒不納，以致張之洞發憤嘔血而死。陳衍事云：

「是冬，廣雅薨於位，卽日定謚文襄。先是，載澧爲攝政王，專用親貴。滿州人既長陸軍，濤貝勒又長海軍。滿漢而見排於親貴，率多解體。洵貝勒又將以某市倡爲京卿。廣雅力爭，以爲不可，爲載澧所斥。歸寓，搥胸嘔血曰：『今始知軍機大臣之不可爲也。』遂寢疾不起。」

「洵貝勒」卽載洵，「濤貝勒」則載濤，皆載澧之弟。所謂「某市儈」，似指唐紹儀。胡思敬國聞備乘卷四，「張之洞抑鬱而死」一條，曾有關于這方面的記述，說：

「及袁世凱既罷，無人掣肘，自料可伸己志。已而親貴盡出攬權，心甚憂之。軍諮府之設，借英債，皆之洞爲政。紹儀因浦鐵路，之洞不可，紹儀聞是嗾美使詰路事以撼之洞。之洞生平多處順境，晚歲官愈高而境愈逆，由是鬱鬱成疾。」

以上述兩條記事互相對照，當可知道，張之洞之死，實由于監國攝政王載澧遇事不肯接受張之洞的諫諍，在親貴典兵之外，又欲以唐紹儀督辦津浦鐵路，之洞力爭，反爲載澧所斥，由是氣憤難堪，嘔血而病。所謂「軍機大臣不可爲」一句，尤其值得玩味。蓋張之洞自從由山西巡撫調任兩廣之後，歷任總督凡二十餘年，早已養成了他頤指氣使的驕慢習性。清代末年，督撫權重，

總督兼轄二省，爵高位尊，倨見屬僚，儼如皇帝，尤其不可一世。相傳張之洞由湖廣總督內調爲軍機大臣後，仍遙控湖北之政。當時的說法，有所謂：「溥頤爲載振管家，津鄂爲張袁外府」。奕劻之子載振先爲商部尚書，被劾去職後，溥頤繼之，事事皆請命載振而後行。故而人稱溥頤雖爲商部尚書，其實只是前任尚書載振的管家。至於「津」與「鄂」，一指直隸總督，一指湖廣總督。直督袁世凱與鄂督張之洞均已內調軍機，繼袁者楊士驤，繼張者趙爾巽。楊士驤爲直隸總督，一切秉承袁世凱之指授行事，每年以巨額經費聲致袁宅，供其上下交際結納，常在百萬以上，故而人稱直督所駐之天津，實爲袁世凱之「外府」。張之洞之於湖廣，情形亦復彷彿。後任總督趙爾巽未經先行關照，就先加撤換，大爲發怒，立將趙爾巽調往四川，而另調江蘇巡撫陳夔龍前往接任。其把持湖北省政，視爲個人禁臠的情形，一如袁世凱之於直隸。胡思敬所謂「之洞生平多處順境」，即指他外任督撫時期的一呼百諾，風行草偃的情況而言。一旦內調軍機，權位雖尊，亦祇可以挾王命之重，脅持外省督撫，對於當國的攝政王，却全然無可奈何。此又所謂「晚歲官愈高而境愈逆」也。

由于張之洞的死因，是由于監國攝政王不肯接受他的諫諍，以致氣憤嘔血而死，而清祚不久即亡於親貴之專恣跋扈及袁世凱之陰謀篡奪，於是在清亡之後，又有人對張之洞深致懷念，以爲假如張之洞不死，當不致出現袁世凱陰謀竊國之事，其實這又何嘗有此可能。他不具論，即以張之洞入爲軍機大臣以後的施爲行事看，就可知道此說決不能够成立。

清史稿張之洞傳綜述張之洞在清代末年的重要建豎，曾說：

「（光緒）二十六年，京師拳亂。時劉坤一督兩江，（李）鴻章督兩廣，袁世凱撫山東，要請之洞，同與外國領事定保護東南之約。及聯軍內犯，兩宮西幸，而東南幸無事。明成，兩宮回鑾，論功加太子少保。以兵事粗定，乃與坤一合上變法三疏。其論中國積弱不振之故，宜變通者十二事，宜采西法者十一事。於是停捐納、去書吏、考差役、恤刑獄、計、裁屯衞、汰綠營、改定礦律商律路律交涉律、行銀圓、取印花稅、擴郵政，其尤要者則設學堂、停科舉、獎游學，皆次第行焉。二十八年，充督辦商務大臣，再署兩江總督。有道人金二十萬爲壽，請開礦海州，立劾罷之。考鹽法利弊，設兵輪緝私，歲有贏課。明年，和議經濟特科閱卷大臣，薦定大學堂章程畢，仍命還任。陛辭奏對，請化除滿漢畛域，以彰聖德，過亂萌。上爲動容。三十二年，晉協辦大學士。未幾，內召，擢體仁閣大學士，授軍機大臣，兼管學部。三十四年，督辦粵漢鐵路。德宗暨慈禧太后相繼崩，醇親王載灃監國攝政，之洞得，移疾遂卒，年七十三。朝野震悼。贈太保，謚文襄。……」

由上文所述可以知道，張之洞爲史傳所稱道的具體建豎，都是他在入爲軍機大臣以及入爲軍機，反而碌碌無所表見。如果要說有，那就是他與慈禧太后密議立溥儀爲幼帝，以載灃監國攝政，及在載灃監國攝政之後，共同密謀排去袁世凱這兩件「大事」了。關于這兩件「大

事」的內幕情形，清史稿張之洞本傳及張之洞年譜均未記載，惟因此二事關係於清末政局變革及張之洞個人者太大，殊有必要加以說明，庶足以瞭解其中的內情眞相及後來變化。先說立溥儀之事。胡思敬國聞備乘云：

「孝欽臨危，張之洞請定大計，孝欽頷之。翌日，出奕劻勘易州陵工，密召世續及之洞入內，諭以立今上爲穆宗嗣。今上，醇親王載灃子也，生四年矣，視德宗嗣位尤弱。國難方殷，連三世臨以幼主，世續之洞恐皇后再出垂簾，因合詞奏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不如徑立載灃。』孝欽戚然曰：『卿言誠是，然不爲穆宗立後，終無以對死者。今立溥儀，仍令載灃主持國政，是公義私情兩無所憾也。』之洞曰：『然則宜正其名。』孝欽曰：『善，可兩用之。』之洞又『前明有監國之號，國初有攝政王之名，皆可援以爲例。』孝欽曰：『善，可兩用之。』之洞曰：『卿言誠是，然不爲穆宗立後，終無以對死者。今立溥儀，仍令載灃主持國政，是公義私情兩無所憾也。』之洞曰：『然則宜正其名。』孝欽曰：『古有之乎？』之洞曰：『前明有監國之號，國初有攝政王之名，皆可援以爲例。』孝欽曰：『善，可兩用之。』之洞又后默不言。良久，目之洞曰：『凡事不必泥古，此事姑從汝請，可卽擬旨以進。』策既定，電召奕劻回京，告以謀。奕劻叩頭稱善。遂以十一月某日，頒詔明告天下。」

張之洞死後，宣統的御祭文中，曾有所謂「自兩宮之奄棄，彌臣職之憂勞。七內不驚，共球無恙」的褒獎之語，所指的當卽是此密謀「定策」之事。關於去袁之事，亦見於胡思敬國聞備乘，云：

「太后之病亟也，已屬意今上，恐爲奕劻所撓，命勘陵工，密召之洞世續夜半定策，不及世

凱。世凱既不與定策功，意頗快快。載灃監國之初，推心以任之洞。之洞與監國密商處置世凱事，累日不決。其子君立洩之於御史趙炳麟，炳麟曰：『是可憾也。』猶恐勢孤不勝，復邀陳田，兩人同日各具一疏參之。疏上，世凱果罷。」

此所云張之洞既不像袁世凱那樣地機詐猛鷙，在這種情形之下，自然也只有勸載灃不可驟加刑戮。於是，袁世凱款段出都，施施然地回到河南洹上老家，去等候再度出山的機會了，後人論此，亦常咎張之洞爲婦人之仁，以爲「縱虎歸山，禍將不測」，日後袁世凱之陰謀篡奪，禍機卽伏于此。其實則就當時之客觀情勢而言，北洋兵柄，盡在袁世凱及他所培植的嫡系將領掌握之中。殺袁不難，所難者在殺袁之後勢將引起北洋將領之兵變，有誰能尸其咎？屆時又有何策可以善後？然則張之洞主張不加殺戮而放袁歸里，未始不是無辦法中的辦法。假如政府有能，在去袁之後再而張之洞在袁世凱未有不軌之心以前，既不能收攬之以爲己用，在去袁之後逐漸翦除袁之羽翼，袁世凱後來就不可能有再度出山的機會，篡奪之禍，自亦可以潛消於無形。又不能把握此千載一時的機會刷新朝政，坐令袁去之後，親貴並出，國事益非，身爲輔相而一籌莫展，則張之洞卽使不死，對滿清的國祚又有何裨益可言？所以，要說張之洞之早死是滿清政府的不幸，事實並不正確。比較有可能的，倒是袁世凱當年對張之洞極爲欽佩，假若張之洞那時能

對袁假以詞色，虛心籠絡，則滿清末年的政治演變，也許不致如後來的模樣。但因自大，終於連這一種可能也沒有能够出現。這一點，到現在仍是很有事實根據可尋的。

據野史相傳，張之洞於光緒二十九年由武昌北上入覲時，路經保定，其時袁世凱方爲直隸總督，由于平素對張之洞的聲望及科名均極爲欽佩之故，至時遂盛設筵席招待，奉爲上賓。詎料正當北洋名流畢集，袁世凱躬親爲張之洞奉巵上壽之時，張之洞却已鼾鼾而睡，以致袁世凱以爲張之洞存心輕侮，自後遂不願與張之洞相結交。徐樹錚堪。惱怒之餘，有「致馬通伯書」，所論卽爲袁張之會對于後來政局的影響，引述如下：

「通伯先生道席：南皮公傳稿，諦誦數四，裁剪嚴絜，愜心貴當，重事輕舉筆，運以曲致，諷譽相孕，抗墜在心，殆合取龍門六一之神髓，別襲貌似者也。惟鄙見以爲有清中興以來，自合肥李公逝後，柱國世臣，資望無逾公名中人，仰公如神。其時公果涵造新妍，而不，共憂國是，項城不憤親貴之，盡其材畫，戮力中朝，公雖前卒，而武昌之。詎公與相遇，殊形落寞，項城執禮愈恭，則愈自偃蹇以作老態。權直隸總督，請閱兵。既罷，張謙節府，樹錚恭侍陪席，親見項萬態誅約，滿座屏息，無敢稍懈。而公欹案垂首，若寐若寤，呼吸之際，似盡盡然隱齁動矣。蓋公去後數月，項城每與僚佐憶之，猶爲耿耿也。一色息之細，不能稍自節束，以

籠絡雄奇權重之方面吏，徒使其心目中，更無可畏可愛可敬之人生與並世，漸滋其驕譎之萌，致力於拒納之術，以遺後世憂。當日袞袞諸公，何人曾足語此？此亦清室興廢一大關鍵，而春秋責備之義，所不容獨嚴於公也。鄙見以爲，宜於傳中微書數言，俾後世之讀史者，有所考而知所以自處之道也。」

馬通伯乃是北洋軍閥中的重要人物，其所見所聞，當屬可信。據此云云，則袁世凱在光緒二十九年前後，對清朝政府尚沒有跋扈不臣的野心。如果徐樹錚所說的日長其驕慢譎詐，馴至有問鼎輕重之野心。如果徐樹錚所說的日長其驕慢譎詐，馴至有問鼎輕重之野心，則因舉目朝中有一個張之洞可以籠絡而駕馭之。假如張之洞亦如當年的曾國藩，品德純粹而盡是自嗆以下的碌碌庸才，不敢爲張之洞的道德學問所鎮懾，不萌生其狼子野心。但張之洞此時的偃蹇作態，對于袁世凱本還不錯，則當時還只是清朝的不幸。

又據另外一種傳說，袁張保定之會，袁世凱所推誠待人，則袁世凱或許眞有可能一味以袁世凱之粗魯不學爲可鄙，不肯輕假詞色，終於也使袁世凱看輕了他，從而失去了這惟一可以籠絡駕馭的機會，說來實在是袁世凱的不幸，也是清朝的不幸。

當時率部屬，將領之外，更有司道各官陪會。當時

的直隸藩司楊士驤，乃是光緒十二年丙戌科的翰林，算是張之洞的翰林後輩。張之洞因爲楊士驤亦出身翰林之故，引爲同調，座間惟與楊士驤娓娓而談，於袁世凱若無視。所談者又皆翰林故事，袁世凱枯坐一旁，至不能贊一詞。士驤敏於應付，甚爲之洞所贊賞，出語人曰：「不意袁慰庭作總督，藩司乃有楊蓮府！」袁聞此事，謂士驤曰：「君既受香帥知遇，何不請其奏調湖北，俾可日常相處？」士驤笑曰：「縱使香帥有此意，司裏亦不願伺候這種上司！」

清代的督撫，通稱「大帥」；「香帥」，卽指張之洞。楊士驤雖蒙張之洞賞識，却不願作張之洞的部屬，雖則是對袁世凱而說的場面話，其實亦是實情。前文所引國聞備乘的記述，已曾說到張之洞對于所部，「小有過失，訶責之聲達於戶外」。而其性行怪僻，起居無節，又都是遐邇皆知的故事。這樣的上司，當然爲一般人所不願伺候。更何況袁世凱最善于籠絡人才，慣以國家的爵祿名位和金錢，大量作爲收攬人心之用，如之何不使一般稍有才幹之人，在感念之餘，樂爲之效力奔走呢？在這些地方，已可看出袁世凱之所以能够成爲北洋首領，而張之洞所以無羽翼相助的道理。身居宰輔之位而人情之向背如此，亦儘可以看出他們在實際政治上所發生的影響爲何如了。早在張之洞由兩廣總督調任湖廣不久，大理寺卿徐致祥具疏參劾，就曾老實不客氣地批評他說：

「統觀該督生平，謀國似忠，任事似勇，秉性似剛，運籌似遠，實則志大而言誇，力小而任重，色厲而內荏，有初而鮮終。徒博虛名，無裨實際，殆如晉之殷浩；而其堅僻自是，措置紛

更，有如宋之王安石。方今中外諸臣，章奏之工，議論之妙，無有過於張之洞者。此人外不宜於政地，惟衡文校藝，談經徵典，是其所長。昨歲該督祝李鴻章壽文，極意諛頌，末有自述語云：『度德量力，地小不足以回旋。』夫以兩湖幅員之廣，畢力經營，猶恐不足，而顧嫌其地小，夷然不屑爲耶？何其狂誕謬妄若此之甚也？」

這一段話，；但如以張之洞一生的行事施爲來衡量，則其中所說的許多事情，的性格與作風，可說在他五十多歲時早就定了型，也無怪乎他此後又彷彿都很貼切。然則張之洞的一連袁世凱這樣的一世之雄也不放在眼中了。張之洞於光緒宣統之間，在滿清中央居有舉足輕重的關鍵地位。只因其闇於知人而又應付無策，終於不能使他的資望與地位在實際政治上發生制衡的力量，說來自然可惜。然而此正是張之洞之所以爲張之洞，我們讀史論人，除了深致惋惜之外，事實上也正是無可如何的。

綜括起來看，張之洞的一生事功，以在教育方面的貢獻較多，除此之外，殊不足稱道。徐致祥以爲張之洞外不適於封疆而內不宜政地，與柴夔之深惜張之洞未能永爲文學侍從之臣，俱極有見地。對于張之洞的評價，大概亦只能作如是觀。

劉銘傳

「仗英雄三尺劍，橫掃中原，却東國旗，麾西土旄，豎南天柱，任北門鎖，開聲破膽不言勳。但萬里留題，處處輕紗籠勝跡。」

「披居士六朝衣，來尋舊雨，吟梁父詞，賭謝傅棋，顧周郎曲，策韓王蹇，拜爵抽身纔及壯。勞九重垂念，年年優詔問元戎。」

上面所錄，乃是清人全椒薛時雨撰贈劉銘傳的一副對聯。據說當年劉銘傳對這副對聯十分滿意，懸之廳壁，寶愛無比。就事論事，此聯對劉銘傳的一生功績與事業，未免諛頌過分。如上聯所說，劉銘傳一生的戎馬戰功，遍及東西南北各處邊疆，事實何曾如此？而下聯所引的幾個典故，「梁父吟」指諸葛亮，「謝傅棋」指東晉時大破苻堅八十萬兵的謝安，「周郎曲」指三國時之周瑜，「韓王蹇」指南宋時的中興名將韓世忠，因爲他在解甲歸老之後終日「策蹇」（卽騎驢）湖上，十分悠閒之故。凡此俱所以形容劉銘傳在壯年封爵之後便急流勇退，不熱衷於功名利祿，而其勳業又足以與這些有名的歷史人物相比擬，所以一一搬舉出來作爲襯托。其實則劉銘傳雖有戰

功，若要與諸葛亮、周瑜、謝安、韓世忠等人相比，恐怕其間的距離還遠得很。從前張居正在明神宗初年做內閣首輔，振衰起敝，弼成萬曆初年的治績，功在國家。就因爲有人送過他一副諛頌過分的對聯，曰：「上相太師，一德輔三朝，功光日月；狀元榜眼，二難登兩第，學冠天人。」而張居正竟亦「欣然懸於廳事」，纔使人覺得此張居正也是一個驕矜自誇的人，從而減低了他在歷史上的評價。劉銘傳的功業不如張居正而驕矜則似之，就此而論，已可依稀想見其爲人。不過，若是將他在整個清代歷史上貢獻如何的問題撇開不論，而專就他在臺灣歷史上的影響而言，劉銘傳這個人，仍是值得稱道的。

要評論一個人在歷史上的是非及功罪，自然得先從他的一生事蹟說起。劉銘傳雖然在臺灣歷史上的影響很大，但他在臺灣的時間前後不過七年，而劉銘傳享年六十，七年的時間不過他一生中的八、九分之一而已。所以要討論到劉銘傳這個人，仍得從頭說起。以下先介紹劉銘傳之生平，然後逐次論述其事功。

劉銘傳，字省三，安徽合肥人，與淮軍創始人李鴻章是小同鄉。合肥地當皖北平原，生活環境困難，民風素稱強悍。清文宗咸豐二年太平天國亂起，很快就由廣西蔓延到了湖南湖北，又逐漸及於江蘇安徽。皖北地當南北衝衢，形勢重要。而當政府的統治力量漸見薄弱之時，地方上的惡勢力，亦乘機蠭起。當地人民爲了保家保身，相率建築堡寨，團練鄉民，以求自衞。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朝代，每逢到了這個時候，社會秩序必定日趨混亂。而擁有武裝力量的人就可以據地自

雄，獨霸一方了。劉銘傳生於清道光十六年，到這時正是十八歲。初生之犢不畏虎，不爲代父報仇一事而一舉成名，在這種割據混亂的局勢中開始嶄露頭角。

劉銘傳的家鄉，在合肥縣西鄉的大潛山下，地名蟠龍墩。當劉銘傳十八歲的那年，淮河平原一帶，已因倡辦團練之故而紛紛建築堡寨。一時之間，合肥西鄉也出現了許多互爭雄長的鄉里大豪，在據地自雄之外，並向附近人民派糧徵銀，以發展他們自己的勢力。劉銘傳家世代務農，向來是紳糧大戶的魚肉對象。這時當然也只有遵照命令，按時繳銀納糧，不敢抗違。某一次，不知是爲了什麼原因，劉銘傳的父親，沒有能夠按照規定限期將糧米送去繳納，即刻就招來了里中大豪的侮辱。桐城馬其昶撰劉銘傳墓誌銘敍次此事云，某日，此一大豪途經劉家所居村莊，呼劉父至馬前，「責供給不時至，訶罵而去」。陳澹然撰劉銘傳墓碑文，則說是：「年十八，土豪假團練虐其父。」推想當時的情形，此一鄉里豪紳對劉父的訶罵凌辱，必定十分難堪，否則當不致招來劉銘傳的極大反感。陳文說：

「豪去，公（指劉銘傳）自書塾歸，怒謂諸兄曰：『丈夫當自立，安能耐此辱哉？』徒手蹴豪馬，請決戰。豪顧狂笑曰：『孺子！敢當我哉？吾授若刀，能殺我，則壯士也！』公喜，手豪刀徐斬之。乘其馬，手其頭，登高大呼曰：『某豪虐鄉里，吾斬之，能從吾者當保吾里。』壯士大喜，歸者數百人，遂築堡寨爲其長。」

這一段話敍述劉銘傳因報父仇而手刃里豪，並號召村中壯士，自築堡寨保衛鄉里，及自爲之

長的情形，極爲明晰。劉銘傳身高不過中人，十八歲的年齡，看起來應該不過只像一個大孩子，所以這個橫行鄉中的豪紳十分藐視他。却不料這個外形不過像個大孩子的年青人，不但行動果決，而且作起事來十分有擔當。所以此豪紳不但因此而被劉銘傳所殺，他的地位，也旋卽爲劉銘傳所取代。不久之後，劉銘傳就憑藉了他所號召起來的這支鄉里自衞武力，屢却强敵，並響應當地政府的號召，出來征討賊寇，建立戰功，從此一步步地走向創立下他一生的事業前途，說來實在太使人感到突兀了。

清朝政府在咸豐、同治之間，對外則有英法聯軍的侵迫，內部則先後遭遇到太平天國及捻軍之亂，軍事上屢遭敗績，綱紐解體，幾將不國。幸而有曾、左、胡、李等一班中興名臣先後出力討平亂事，國家大局，方纔轉危爲安。其時，清政府舊有的滿洲八旗及綠營軍隊，已經喪失了作戰的能力，代之而興的，是曾國藩、左宗棠所統率的湘軍，與李鴻章所統率的淮軍。而太平天國之亂既定，曾國藩把大部份的湘軍都解散歸農，所以淮軍在後來更成了清朝政府所倚畀的主要武力。劉銘傳崛起於這一場千載難逢的風雲際會之時，憑藉了他的聰明才智，終於建立起一番不尋常的功業。淮上自古爲英雄生長之鄉，劉銘傳出生在這樣一個好地方，他之能够建立非常之功，並不使人感到意外。所使人感到意外的是，劉銘傳所生存的時代，乃是重文輕武的清朝末年。劉銘傳以一個不爲社會所重視的武人出身，而居然能够不畏環境的阻礙，建立起如此不尋常的功業，那就太使人感到意外了。

說到這裡，我們應該轉過頭來，先談談劉銘傳的出身問題。

清朝的政治制度，以從科舉考試中得到功名出身的人稱爲正途。科舉考試所經過的階段有三：縣試、鄉試、會試，其功名出身依次稱爲生員、舉人、進士。進士是科舉考試中的最高階層，考起來最難，而且名額也少，每三年只取二、三百人。舉人在科舉考試中次於進士，其取中名額依省分之大小及與試人之多寡而定，自二、三十人以至八、九十人不等，其時間則亦是三年一次，名曰鄉試。至於生員，俗稱秀才，以一府及一縣爲單位，定有名額，約自二、三十人至六、七十人，必需有缺額方能考補。秀才之下，無功名的，就是童生了。所謂童生，是指書讀得差不多了，自覺有希望可以考取秀才了，那時，就可由家長爲他到縣裡去報名應考，並由州縣衙門登記其姓名，承認其應試資格。一個報名應試過的童生，即使一生中不曾考上一個秀才，政府仍然承認他是讀書人，這亦就是科舉制度中所謂的「文童」。但如只讀書而不曾到州縣衙門裡去報名應試，那就連童生的名義也沒有，政府也不承認他是讀書人。這種是讀書人還是非讀書人的身份，在文武官員的出身中分得極爲清楚，對各人的此後發展尤其重要。這在劉銘傳的身上，也可以明顯的看出來。

清代中葉以後，重文輕武，文武官的地位相去懸絕。一個武職正二品的總兵官，甚至不敢跟文職正四品的兵備道分庭抗禮；而武職三、四品的遊擊都司，更連文職七品官的知縣還比不上。

這雖然是湘淮軍興以後綠營軍隊的情形，而自湘淮軍代興以後，情形亦復如此。

湘軍初起，一般是以文人領軍。湘軍大帥如曾國藩、左宗棠、彭玉麟、楊岳斌、鮑坤一等人，均以文官職銜領兵打仗，漸陞而至巡撫總督之後，湘軍將領，仍然視之爲主帥。淮軍初起，略仿湘軍，但亦兼用武職。淮軍將領中較有名的如張樹聲，最後官至總督，其出身係以廩生（有月糧可領的生員）從軍，帶兵時期的最高官職的是道員。其次如吳毓蘭，以監生身份參加淮軍，在軍中時以戰功由道員屢保至布政使，後授天津兵備道。再如在劉銘傳軍中自領一軍的劉盛藻，係以俊秀投效，歷保至布政使銜，後官直隸按察使。以上這幾個人，是文職身份領軍的實例，一是以「開軍」爲名的領軍主帥程學啓，其人本係太平天國降將，官職係武階的記名提督。二是以「銘軍」爲名的領軍主帥劉銘傳，初起時官不過武職中的末秩——千總，漸因功陞至都司、參將，最後陞至提督。劉盛藻的出身是「俊秀」，而所謂俊秀也者，其實只是一個沒有「功名」的文童而已。但文武兩途的出身之別，也就在這一點些微之差別上。——即使僅僅只是一名文童，由於他也算是讀書人之故，一樣可循文職之途出身；如果連文童也不是，那就只好改循武職一途了。劉銘傳開始加入淮軍時的官職是千總，而並非文職微員的巡檢、主簿一類，可知他連文童的出身資格亦沒有。表面上看起來，這似乎與他在淮軍中的領軍職務並無關係；而在他一旦晉升到最高職位時，這種重大的差別便顯示出來了。

經過了太平天國及捻、回等無數次的重大戰亂之後，湘淮軍將領之中，因戰功而保陞至武職最高階的，多至不計其數。據清末的稗史小說所記，左宗棠、曾國荃在南京做兩江總督時，總督

衙門中的差弁，都是得過黃馬褂與保至提督、總兵職銜的一二品武職大員。武職官品的提督，也不免被一般文職視爲地位卑微的「武弁」。劉銘傳在此，即使是從一六歲時參加李鴻章所練的淮軍，官階是千總。不過三年的時間，他就因戰功而陞至穿黃馬褂。實缺的直隸提督，賞職官的發展，已經到此爲止，再往上，就沒有官可陞了。雖說劉銘傳在同治七年因爲男爵，但爵與官是兩回事，爵位雖尊而官職依舊，自不免使功名之士爲之氣沮。方可以看得出來，劉銘傳乃是一個有抱負有大志的功名之士。他很希望能夠做出業，以期對國家有所貢獻。無奈他的出身限制了他的發展，使他無可作爲。及到後知道了他的意願所在，命他以提督而兼巡撫銜，又正式任命他爲臺灣建省以後的第一任巡撫，總算打通了他在仕途上求發展的阻礙，可以改循文職去另行發展了。而偏在此時，朝北之爭與新舊黨派之爭，劉銘傳不幸而捲入了黨派傾軋的漩渦，於是又迫使他不得仍舊走上他在此以前一再引疾求去的道路。我們若是從他的志業及抱負來看，這種很違背他自己之本意的。至於他因出身武職之故，而屢遭出身文職的同僚或屬吏之輕視，以致生出很多乖張齟齬的不當行爲，亦可說是一種原因的兩種反應。

以上的分析，尚須在他以後的思想及行爲中列舉事實爲證。以下且先說他在軍功業。

王樹枏撰劉銘傳傳云：

「同治元年，江蘇巡撫李鴻章募淮勇東征，銘傳以千總率所部從。至上海，獨立一幟，號曰銘軍。戰降南滙賊首吳建瀛劉玉林，以其衆來屬。別賊吉慶元寇南滙，擊却之。克川沙，連破奉賢、金山衞，累功擢參將，予驃勇巴圖魯名號。再踣野鷄墩，解四江口圍，擢副將。二年，會攻福山，驅常、昭之賊，升總兵。楊庫汛者，沿江要隘也，悍賊密布營壘爲死守計。銘傳會水師攻之。戰六日，江陰援賊屢受創，不得逞。而僞忠王李秀成渡江率五僞王水陸軍數十萬分道來援。銘傳合諸軍迎擊，大破之。乘勢克江陰，取無錫、金匱，蘇州之勢遂孤。詔以提督記名，賞頭品頂戴。既大軍克蘇州，降賊皆見殺，僞護王陳崑書死守常州不下，而程學啓又戰死嘉興，鴻章亟檄銘傳特將一軍，攻常州。銘傳遣將壁奔牛嶺，降賊渠邵小雙，即令扼丹陽賊援，而躬率敢死士攻城，破賊十餘壘，降萬餘人。僞章王犯奔牛，牽我師，李秀成復鼓輪舶濟師，礮擊奔牛，餉且絕。銘傳聞之，宵驅五百人襲賊後，內外夾擊，呼聲震天地，剗賊壘三十餘座，斬馘十萬，燈諸江。三年，遂拔常州，賞穿黃馬褂。」

淮軍在太平天國之戰中的戰績，至克復常州爲止，暫時告一段落。原因是李鴻章要把克復南京的首功讓給曾國藩、曾國荃兄弟，所以故意使淮軍在打下蘇州常州二府之後頓兵不進，好讓湘軍成其大功。於是，劉銘傳在這一時期內的戰功，也只好暫且停頓一時。不過我們從這裡已經不難得到一些粗淺的概念，即是劉銘傳不但善於作戰，而且在勇猛果敢之外，更長於以寡擊衆。

試看劉銘傳在蘇常血戰時所遭逢的大敵，動輒數萬，而他所統率的銘軍以至十數萬，而他所統率的銘軍不過數千而已。王樹枏所撰劉銘傳傳中就曾說過：「銘傳善用兵，能以少擊衆，與程學啓齊名將五百人，稍增至七千，常敵賊數十萬。討捻，勇敢當然不够，其主要原因，則由于：「其用械器益騎兵合萬二千人。」以七千敵數十萬，單靠功。」由于劉銘傳在這些克敵致勝的戰果中體認到西洋新式槍砲的厲害，所以他後悉改泰西新式。戰髮賊、撻捻匪，卒以此收效法西洋，造鐵路，造船艦大砲，以及革新內政，以求自强。至于他後來在剿捻之法，則又因地制宜，與此並不一樣。

湘淮軍進攻據守城池與堡壘的太平天國軍，所進行的是陣地戰與要塞爭奪戰。平天國軍那樣地憑堅而守，他們所用的是流竄戰術，常常是打了就跑，而且跑得極快，原因是他們的馬騾極多，一晝夜可奔馳數百里，很像是明朝末年的流寇。清政府最初以僧格林沁親王所統率的蒙古騎兵全軍覆沒之後，換了湘軍與淮軍上來接棒。他們不像蒙古騎兵那樣擁有大批的馬隊，可以在戰場上與捻軍奔馳追逐，所以打起來比蒙古騎兵更難取勝。但李鴻章後來受命爲總領剿捻大軍的主帥時，所恃以制勝捻軍呢？除了火器精良這一大部分都是步隊，究竟憑什麼能軍只有少數騎兵，項因素之外，就是善於奔走，能以徒軍的速度來彌補馬隊不足的缺點。這在有關劉銘傳的傳記資料中，亦是有

記載可資佐證的。

陳澧然撰「書劉壯肅公碑陰」說，劉銘傳率軍討捻，幕中士有名朱景昭者，合學多奇識，銘傳甚敬禮之。討捻之師久不效，銘傳向朱景昭問計。朱曰：「捻如馬步武勝之，如何哉？惟以捻制捻耳。」銘傳聞此言，大領悟。「卽日焚短香，置巨營三匝，首至者取此。軍士皆樂奔，最後至有刻寸香繞十四營三匝者。故捻颱疾如風雨，銘軍亦風雨赴之。卒以成大功，名天下變，並不拘泥一格。他之所以能夠以軍功建立功名，在這裡當可見及一斑。但能够視需要而制機之善戰。因爲捻軍本來以流竄起家，最善於鑽李鴻章剿捻之所以終於能够成功，也並非專靠銘軍縛乘隙，避實擊虛。如銘軍也像僧格林沁所統率的蒙古騎兵一樣，跟蹤捻軍之後窮追猛打，卽使兩敗俱傷。所以，劉銘傳所發展的，祇是剿捻的戰術，若要希望終成大功，仍需有賴於正確的戰略指導。而戰略之擬訂與運用，就是主帥李鴻章的責任了。

在李鴻章之前，擔任剿捻主帥的是曾國藩。曾國藩當時就已想出一個辦法——「以有定之兵」，來「制無定之賊」。他選定了黃河、運河、潁河、賈魯河、沙河之間的廣濶地區作爲預定的戰場，打算利用此一地區四周的河道障礙，限制捻軍的奔馳。所以他除了挑濬河道，構築防堵工事之外，更在徐州、周家口、濟寧、及臨淮關四地設置重兵，以備防堵，另外則用鮑超、劉銘

傳二軍作爲「游擊」部隊，負責追剿捻軍，驅之進入防堵圈內，然後待機將之擊殲及完成此一戰略部署，就把主帥的職位讓給了李鴻章。李鴻章接任之後，雖然作更，戰略原則則仍照此進行，最後終於將捻軍驅迫到黃河以南運河以東的狹隘地帶殲滅。由於此一戰略原則之確立，當時的湘淮軍劉捻，一方面固然仍舊隨捻軍之所向擱截窮追，另一方面也始終未曾忘記統帥所交付他們的指導決策——儘量擾亂捻軍之流突方向，在不知不覺中將他們驅入預定的圍剿地區中去。雙方面如此的巧妙配合運用，終於使李鴻章完成了平捻之大功。所以我們固然不可忽視劉銘傳在平捻戰爭中所立的戰功，但也不必過信若干傳記作者的誇張描寫，以爲捻亂之平，悉由劉銘傳之勇猛善戰所致。至於他在剿捻戰爭中所受到的重大挫折，關係及於他此後的事業前途甚巨，更需特加注意。

尹隆河之役，發生在同治六年之正月。關於此一戰役，有關劉銘傳的各種傳記作者的誇張不提，惟有同時人薛福成所撰的「書霆軍銘軍尹隆河之役」詳記其事。這一篇記載翔實的重要史料，見於薛福成所刊印的庸菴全集中。全篇的文字雖繁，但因對劉銘傳的個性及人品都有極眞確的反映，非常重要。不憚辭費，爲之擇要轉引如下：

「同治五年冬，捻賊僞魯王任柱，僞潧王賴汶光，僞衞王李允等，糾合步馬精銳，由河南趨湖北，緣道驅脅衆逾十萬，盤旋德安、安陸之間，謀以一枝越襄河，瞷蜀疆，一枝屯湖北爲聲援，一枝闖武關，聯西捻張總愚。十二月辛卯，松軍統領提督郭松林被圍於沙岡集，受傷突走，

其衆大潰。丙午，樹軍統領總兵張樹珊戰死於楊家河。是時賊騎數萬，雲翔風馳，勁疾懔悍。常以前隊挑戰，別選健騎繞出官軍後路以輜之。官軍畏避其鋒，輒憑村堡自固，罔敢與遘，遘之愈不挫者。賊勢張甚，連陷應城、雲夢、天門。旋棄城去，屯踞臼口、尹隆河以窺安陸。於是浙江提督一等子鮑武襄公超，總統霆軍二十二營，合萬六千人，今福建臺灣巡撫前直隸提督劉公銘傳，總統銘軍二十營，合萬人，皆從南陽南下，銘軍由隨、棗，霆軍由襄、樊，分路進剿，迭有斬擒。……」

以上這一段文字，概述尹隆河戰役發生之前的雙方軍事情勢，由清軍之屢敗及捻軍之屢勝，可以看出捻軍之強。其中所說到的「松軍」及「樹軍」，均是淮軍系統中的各支；霆軍是超所統率的湘軍。捻軍因屢獲勝捷之故，暫時由流竄改爲定駐，由此可知捻軍的戰術亦是隨時在改變的，所謂遇强則走，遇弱則攻，並非一味的流竄奔突。由於捻軍定駐於臼口及尹隆河一帶，於是乃有同治六年正月鮑超、劉銘傳二軍約期會攻捻軍之事。薛文紱此，續云：

「六年春正月，霆軍銘軍會於安陸。賊走踞楊家垇尹隆河等處。於是霆軍駐臼口，銘軍駐下洋港，期以庚午日辰刻，進軍夾擊。先是，劉鮑二公意氣不相下。鮑公自謂宿將，殲勁寇，功最多，劉公後起，戰績不如霆軍遠甚，乃亦比肩爲總統，意稍輕之。劉公謂鮑公勇而無謀，僅一戰將才耳，顧聞其威名出己上，尤邑邑不怡。然此時鮑公志在協力剿賊，無他意也。劉公召諸將謀曰：『度我軍之力，可以破賊。若會合霆軍而獲捷，鮑軍必居首功，人且謂我因人成事。不如先

一時出師，俟翦此寇，使彼來觀，亦當服我銘軍之能戰也。』乃於庚午卯刻，秣馬港逼尹隆河。賊隊盡在隔岸，劉公分五營留護輜重，躬率馬步十五營渡河擊之。……」

以上這一段文字，敍述劉銘傳在與鮑超約定，庚午日辰刻兩軍會師合攻尹隆河因爲他希望要自建大功之故，竟然不遵約定，提前一個時辰，由銘軍先行發動攻擊。以此時清軍實力加以衡量，捻軍衆逾十萬，雖然中多裹脅而來的老弱婦孺，估計其精銳則何致連敗松、樹兩軍，又在霆、銘兩大勁旅先後來到之時，猶敢屯踞不去呢？霆銘二軍合計，戰兵之數約二萬六千。由於兩軍皆曾屢當强敵，其戰鬪力甚强，翦此巨寇，當無問題。但銘軍與霆軍分駐東西，雙方面加起來的實力雖可勝過捻軍，若是分割運用，就不一定能穩操勝算。戰史上常有劣勢一方藉各個擊破之法打敗優勢一方的往事，這其間極爲微妙。劉銘傳久經行陣，諳熟兵法，當然知道在强敵當前，勝負未分的重要時刻，不可爲敵方製造各個擊破的機會。然而他竟然低估敵方的實力，要想藉銘軍獨自的力量，以十五營兵力，去擊敗七千五百人的捻軍，他所犯的錯誤實在不可原諒。果然，以後的情勢就是朝着這一方面而發展的。捻軍太强而銘軍數寡，以寡擊衆的戰爭，變成了以弱攻强，其後果當然不堪設想。

「任柱以馬隊撲右軍，牛洪撲右軍，賴汶光李允合撲中軍。左軍劉盛藻五營先遇賊騎，不能支，敗退渡河。任柱來攻中軍，甚急，惟右軍唐殿魁擊退牛洪，來援中軍，中軍亦亡敗退矣。羣

賊萃於右軍，唐殷魁及其營官吳維章、田履安等力戰，死之。殷魁，銘軍之良也。師大奔，賊益縱，渡河追擊，銘軍崩潰。」

此時的戰敗情形，據薛福成在此文的末後所說，是這樣的：

「余遇銘軍將士，及隨從劉公之僚友，皆云，尹隆河之戰，一敗塗地，總統營官與幕僚等，俱脫冠服，坐地待死。」

幸而此時的時間已到了與霆軍約定會攻的辰時，霆軍適時踐約而來，「勢如風雨，張兩翼以蹴賊。酣戰良久，呼聲震十餘里，大敗賊衆。斬殺八千有奇，殺賊萬餘，奪獲馬騾五千匹，救拔劉公及劉盛藻等於重圍之中，毀楊家垛、拖船埠，尹隆河賊館數百，生擒老賊」銘軍之敗，使獲勝的捻軍亦亂了陣脚，於是乃爲突如而來的霆軍製造了輕易得勝的機會。何況捻軍久戰而疲，更難敵有如出柙之虎一般的霆軍。亦正由於有此一情況存在，所以銘軍雖然敗得很慘，而對於霆軍之勝，劉銘傳仍是很不服氣的。

劉銘傳尹隆河之敗，除了薛福成的記述外，徐宗亮歸廬談往錄中亦有一段記錄，說：

「開軍之後，惟銘軍爲勁。東西捻之役，功冠諸軍，號淮軍第一大支。其始賴唐忠壯殿魁，劉厥訪盛藻二人爲之左右。唐之調度，劉之訓練，合爲兩美，又得劉省三中丞爲帥，以故虎步一時。其部下驍將，著稱者頗多，大率蘇滬降將，更事老練。忠壯陣亡於鄂，銘軍奪氣，然後亦未有大敵矣。忠壯之亡，事由厥訪。時各統一軍，分左右兩翼。捻氛甚惡，忠壯請以守爲戰，力主

持重。帥意不然，廉訪又急求見功，帥益怒忠壯爲怯。及戰，劉軍先馳，遽敗走，帥隨之。忠壯急往援，深入賊中，不見帥，復出至河干。有誤報帥亡者，忠壯奮勇陣死，一軍盡覆。賴鮑軍門率霆軍繼至，帥以下得收軍立營云。」

以這一段紀錄與薛福成所記參看，除了證實薛文的正確性之外，更可知道劉銘傳在戰事未曾開始以前，竟不肯接受他部下大將唐殿魁力主持重之見，一意要行險徼功，而劉盛藻又從而附和之，終於造成這一場重大的挫敗。由這些地方可以看出，劉銘傳尹隆河之敗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他不應違約先攻，以致蹈犯爲捻軍製造各個擊破的重大錯誤；二、是他不省本身實力，又剛愎拒諫，及至發現錯誤，則已爲時無及。至於劉銘傳何以會蹈此兩大錯誤而不自覺呢？其根本原因，當由於他的不健全心理及高傲之氣性使然。

我們如能着眼於尹隆河戰役發生之前，劉銘傳與其高級將佐會商的情形，便不難發現，在劉銘傳的性格中，實在存有不肯服人的高傲氣性。在劉銘傳的心目之中，他的學識，他的戰功，以及他在作戰統馭方面的才能，每一樣都比鮑超强過許多倍。鮑超只不過是一個有勇無謀的武夫，憑什麼得到百戰百勝的光榮，以致自己的聲光顯得反而不如鮑超？爲了要跟鮑超比一個高低，所以他要在大敵當前之時一展他平昔以寡擊衆之長，好教鮑超從心裏佩服他的本領！由於他這種不健全的心理狀態，不但使他對捻軍的實力完全估計錯誤，更不肯接受僚屬的建議，不自知事涉行險徼倖，蹈犯了兵法之大忌。終於，他在鮑超面前丟盡了顏面。若不是霆軍及時來救，他與他

的殘餘部隊，更勢必要在捻軍的四面包圍之下悉數被殲。使氣任性的結果如斯，實在令人可悲。

而鮑超雖然在劉銘傳生死存亡的重要關頭救了他的命，劉銘傳對於鮑超，似乎並不感激。不僅如此，劉銘傳後來的所作所爲，看起來更像是對鮑超「恩將仇報」。這種作風，不但使劉銘傳的人格掃地，也嚴重地影響到他此後的事業前途，說起來也誠然是很不幸的。

劉銘傳在尹隆河的戰役以後如何對鮑超恩將仇報？這在薛福成「書霆軍銘軍尹隆河之役」一篇文章中有詳盡的記述。因爲原文太長，不能詳細轉引。其大致內容是說劉銘傳在戰敗之後，自覺難免損軍折將之重咎，在與僚屬商量了一番之後，竟將失敗的責任推在鮑超身上，說是事先與霆軍約定黎明會攻，霆軍失時未至，銘軍孤進，幾爲捻軍所乘。賴銘軍奮戰不退，會合霆軍迎擊，遂轉敗爲勝。這一個虛僞不實的戰報由劉銘傳報經李鴻章轉報到皇帝那裏後，鮑超的報捷奏章隨後亦到了。軍機處看了兩方面互不相合的奏報，以爲鮑超虛張戰功，言多不實，擬旨科以失期及虛飾之罪，嚴加申飭。這時鮑超正在棗陽唐縣一帶追擊敗逃的捻軍，忽然接到清廷的申飭諭旨，方纔曉得爲劉銘傳所出賣，一氣之下，急怒攻心，引動舊傷，百病俱發，全身痿痺不仁。曾國藩爲他代上奏章，請求開缺調理。於是霆軍步騎兵三十二營之中，只留下步兵十四營交給曾國荃管帶，其餘一律遣散。霆軍既散，劉銘傳的銘軍又新遭敗衂，捻軍沒有了敵手，從此轉危爲安，又再度猖獗起來了。

捻軍在由打運動戰改爲陣地戰，又在尹隆河之役中一敗塗地之後，本來已很有可能被一舉聚

殲。只因劉銘傳恩將仇報，李鴻章又左袒劉銘傳之故，憑空把剿捻最爲得力的霆軍弄得瓦解，纔使淝於危殆的捻軍能够從死裏逃生。就事論事，劉銘傳的自私行爲，不但對不起救回他性命的戰友，更對不起國家人民。而霆軍既散，李鴻章所可資倚畀的大將，只剩下一個劉銘傳，自然更非得支持他，提拔他不行。於是，劉銘傳的殘餘銘軍，在經過一番補充訓練及新購器械之後，重新成爲强大的勁旅，在此後的剿捻戰爭中發揮了重大的作用。不過，那已是後來的事。何況李鴻章的剿捻戰略既已確立，捻軍的前途也已被判定了非失敗不可，劉銘傳只不過是感恩圖報，努力地執行了李鴻章所交付給他的任務而已。所以，這以後的事，便沒有什麼值得提出一談的價值了。

倒是鮑超，經此一番重大挫折之後，心灰意懶，並不想認眞爲清政府出力賣命。而據陳衍所撰的劉銘傳別傳說，鮑超在四川原籍病故時，皖人劉秉璋方爲四川總督，借事興獄，多方鍛鍊之，不但抄沒其家產，超妻亦因此而死。假使這一段記載果眞確實不訛，那末，淮軍將領對鮑超的怨毒實在可說太深，而劉秉璋也與劉銘傳一樣，是淮軍中的大將。鮑超死後興獄，恰恰發生在劉秉璋手中，而劉秉璋更借此從旁煽焰，這其中的痕跡，自然十分明顯。但是，劉秉璋爲什麼要代替劉銘傳尋仇報復？劉銘傳對鮑超的仇恨，又究竟因何而怨毒至此呢？推想起來，當然仍是尹隆河戰役所種下的禍根。

薛福成「書霆軍銘軍尹隆河之役」一文，記述鮑超在尹隆河戰役之後對待劉銘傳的態度，說

，霆軍既救拔劉銘傳劉盛藻等人於重圍之中，更奪還銘軍所失洋槍四百桿，號衣數千軍械輜重，暨劉銘傳所陣失之紅頂花翎，俱於翌日送還銘傳營中。不僅如此，霆軍於命之恩，而鮑超在與劉銘傳相晤時，猶復「強自抑，無幾微德色。」鮑超是被劉銘傳夫的粗人，而他在這件事情上的表現，居然如此謙抑知禮，實在令人欽敬。在這種情銘傳當然沒有理由懷恨鮑超。只是，他此後的捏飾戰報，諉過霆軍，雖然使鮑超因此而倒了大霉，而悠悠之口，畢竟難以盡掩，有如薛福成所寫的那篇文章，便十足暴露了劉銘傳的使他從此不理於世人之口。陳澹然撰「書劉壯肅公碑陰」中說，「當告歸時，清流論率訾議，獨閩人陳閣學寶琛奏議中一語推重之。厥後公撫臺，陳適罷，貧甚，公恒以其肝膽如此。」劉銘傳在討洪楊與討捻的戰事中軍功卓著，他所爲人訾議的，除了這汚點之外，更沒有什麼。然而，僅這一件品格上的汚點，就使他在李鴻章的屢次保舉中受到難堪的訾議，以致嚴重影響到他事業前途，追源禍始，如何不令他將一腔怨毒都發洩到鮑超的身上？這大概便是鮑超死後得禍的原因了。從另一方面看，劉銘傳後來與淮軍人物的關係極是受了此一事件的影響。

劉銘傳於同治八年在直隸提督任上因病奏請開缺，得旨照准。翌年七月，李鴻章奉旨督辦陝西軍務，專責清剿陝西回匪。旋因直隸發生教匪事件，李鴻章被調爲直隸總督，督辦陝西軍務的欽差大臣一職，就因李鴻章之保奏而落到了劉銘傳的身上。所謂欽差大臣，在從前大都出於朝廷

之特派，其地位即使不致高過地方的封疆大吏，至少亦與之相當。劉銘傳以武職出身的前任直隸提督膺此大任，而且出於李鴻章的保薦，可以知道李鴻章對他的照拂程度如何。此時，湘軍出身的前任閩浙總督左宗棠，亦以「欽差大臣督辦軍務」的名義統率大軍，在甘肅前線與反清的叛回艱苦作戰。同治十年二月，左宗棠麾下的大將劉錦棠，在長時間的圍困之後，打下了叛回的堅強堡壘金積堡，殺掉很多投降的回民首領，又把大批回民遷徙到固原平涼等地方安置，在當地曾引起很大的騷動不安，因此影響了他繼續向西進軍的日程，陝甘軍務，看來亦因此而更難結束。清政府爲了顧慮兵餉難籌，曾降旨詢問劉銘傳對此事的意見。劉銘傳遵旨覆奏，乘機對左宗棠放了一支冷箭，說左宗棠所統率的大軍，在攻克金積堡之後，「諸將星散，至今尚無進剿之期。賊騎肆掠鄰秦之間，如入無人之境。兵貴乘勢，乃有虛聲，抑或猛攻，乃見實力。今特遷延歲月，不計虛糜，賊勢未衰，兵氣已散，揆度形勢，既恐戡事無期，叛勇降回，猶恐發生意外。」這些話不但足以影響清政府對左宗棠的倚信，也大大貶低了左宗棠在陝甘剿回的戰績。於是，左宗棠對劉銘傳極度不滿。

左宗棠平回，在清代歷史上是值得大書一筆的勳業。當時若不是左宗棠憑着其過人的才智與堅忍的毅力獨任艱巨，從陝西帶兵一直打到新疆，則今日的甘肅新疆一帶，早已不復是中國的領土。左宗棠安內攘外的功績如此卓越，劉銘傳爲什麼要撫拾浮言，動搖清政府對他的倚信？關於這一問題，我們可以看看陳灊然對此的說法。

陳澹然撰劉銘傳奏議集卷一「出處略」序，中云：

「綜其生平，自始戰江蘇訖臺灣，凡五進，而辭退乃十有八焉。乞退之疏，存者十有五，按其歲月，皆在橫，不可一世，喜勞惡逸，樂任人所難，尤以奉節度，擁虛名爲深恥。當其提督畿疆，授封五等，中原大定，千里謳歌，斯亦武臣之至勞矣。脫令優游蠡下，坐擁節旄，疇復能議此者？獨念風塵無警，上將虛糜，左武右文，已成風氣，提臣雖貴，展布莫由，故決焉舍其官而不屑。其督陝軍也，異軍特起，專達朝廷，不復見制文吏，斯亦上將之殊遇矣。然關中既靖，終類虛糜，詔出新疆，更憂餫饋，而西陲經略，又非可共功名，絕塞蹉跎，且將牾牴，故決焉舍符節而不居。……」

這一段話的最後幾句，極可玩味。所謂「西陲經略」，指的當然是督辦甘肅軍務的欽差大臣左宗棠。何以左宗棠不是一個可與劉銘傳「共功名」的人？這句話中的問題最大。我們知道，左宗棠素來自負才智，好以管仲及諸葛亮自比。也許他根本看不起這個武夫出身的劉銘傳，居然也來與他同作欽差大臣。也許他因爲尹隆河之役的緣故，更把劉銘傳的小人作風看得一文不值。以二人的名位及功業而言，劉銘傳跟左宗棠自然差得太遠。左宗棠平素連曾國藩、李鴻章等比肩共事的人都不大看得起，如今怎會把劉銘傳看在眼中？但此時的劉銘傳，却也是一個鄙武夫而不屑爲，一意想在學問和政治事業上力爭上游的人。他的好勝心愈强，愈是不高興人家看他不起；而

他的感覺，在這些地方也最爲敏銳。如今左宗棠却偏偏正是這麼一個人——不但眼高於頂，慣好使氣罵人，而且視劉銘傳如無物，如何不使劉銘傳爲之氣結難堪。陳衍撰劉銘傳別傳，據其幕客劉宗海相告之言，謂銘傳「素惡左宗棠，督辦陝西軍務，卽奏劾之。」由劉銘傳奏議集見之，銘傳到陝西就任督辦軍務的欽差大臣一職，是在同治九年的十一月初八日。他所上「密陳左宗棠軍情」的那一個奏片，則上於同治十年的四月廿四日。到了這年的七月初九日，他就藉口「頭風肝氣，坐臥難安，漸入秋寒，愈增羸劇」，奏請給假回里調治。至九月初九日，又再以「痼疾難瘳」爲由，奏請續假三月，自此卽離陝長往，一去不復再返的了。由這些奏疏年月可以知道，劉銘傳攻訐左宗棠，並不是一到陝西就上此密奏，而是在隔了五個半月之後方纔發生的事。既是隔了五個半月之後方纔使左劉二人的關係正式惡化，那亦可以知道，左宗棠與劉銘傳之間，並不是早就有了惡感，而是在劉銘傳到陝將近半年之後，因感事事受制於左，處處遭其白眼，不但心中難堪，而且亦已意識到無法在此與左宗棠共建功名，所以纔借事上此密奏，然後脫屣而去的。瞭解了這一層關係之後，我們當可知道，劉銘傳之就任督辦陝西軍務的欽差大臣，原本抱有極大的心願，只因無法與左宗棠共處，所以纔不得不藉病求去。就事論事，這既不是劉銘傳的高蹈，也並非他之見機而作，事實上倒正是他在尹隆河戰役作了一次小人所種下的惡果。

劉銘傳是淮軍系統下首屈一指的大將，雖屈居武職而才具縱橫，素爲李鴻章所賞識。李鴻章爲了培植他的幹部人才，及儲備後繼之選，也很希望劉銘傳能由武轉文，及出任疆圻，漸膺大

任。所以他每次遇到機會，總要爲劉銘傳引薦推轂。所以他不但在此時推薦劉銘傳出軍務的欽差大臣，後來又使他以直隸提督的原官，而加兼巡撫職銜，到臺灣來督辦軍務，無非希望能由此遞遷左劉交惡，遂以爲由武改文之漸。李鴻章的努力，在同治九、十年間本已頗有實現使然。王樹枏撰劉銘傳的傳記，說他：「自始出兵，訖居方鎭，凡五進，而乞退之疏而作，不俟終日，銘傳庶幾近之。」這種說法，未免概括籠統而且涉於傳之五進五退，每次的原因都不同。如此混沌不分的敍述，實在不是良史之筆。

劉銘傳於同治十年辭去督辦陝西軍務，中間相隔了十三年。這十三年之中，他一度因中俄外交關係緊張撫衙督辦臺灣軍務，經由李鴻章之保薦而被命由原籍來京，「以備任使」。到京以後，知道政府已經決定與俄國言和，故而仍復藉病請假回籍。除此之外的絕大部分時間，他都住在南京。那裡有他在秦淮河畔所築的水榭，精美爲一時之冠。居常則與文人墨士相往還，吟詩爲文，詩中並常作白樂天邵康節之恬淡疎放語。他所作的詩，今存者惟有「大潛山房詩鈔」一卷，所收錄的都是同治六年以前領軍作戰時期所作的舊詩，我們也仍然可以從中看出劉銘傳的一些思想與性格來。但即使只是同治六年以前所作的大潛山房詩鈔葉十七「感成」：

「武夫如犬馬，驅使總由人。我幸依賢師，天心重老臣。上官存厚道，偏將肯忘身。國事同家事。誰看一樣真。」

又葉二十二「陳州防次」，

「盜賊東西流，士卒奔馳久。陳州中原地，息兵且防守。軍中消閒事，只有詩棋酒。一日不相離，三者是吾友。客兵遠道來，鄰封交不厚。官場賤武夫，公事多掣肘。我生性不羈，欺侮亦甘受。濟世重經綸，自慚無抱負。日誠甲夜士，努力滅羣醜。一朝洗甲兵，還鄉為田叟。……」

像這類「官場賤武夫」、「武夫如犬馬」的詩句，在其他篇什中尚有，不必枚舉。由此不難看出劉銘傳雖然升到一品的提督大員，何以不願永居武職之故。而所謂「濟世重經綸，自慚無抱負」也者，亦是皮裏陽秋之筆，正所以反映他以武職而空懷濟世抱負的不平之慨。詩鈔葉十九，有「送金太守鐵珊入都詩」，云：

「客路逢秋雨滿天，故人一見雨歡然。行程往返三千里，別後睽違五七年。才大君應思報國，寇平我已望歸田。入都朋友如相問，只說寒蟬不足傳。」

仗馬寒蟬，乃是一個很老的典故，用來比喻一個人之尸位素餐，無足輕重。劉銘傳在平洪楊及平捻亂的戰爭中卓著軍功，如何是尸位素餐之人？所以然之故，則因他對自己的武職一途，早

已心灰意懶，只望在戰事平定之後解甲歸田，此後將不再有所表見，故以不鳴之寒蟬自況耳。劉銘傳譽人則曰「才大君應思報國」，譽己則以伏馬寒蟬之典自況，其內心之思想如何，由此當不難想見。詩鈔葉二十一有「告歸」一首，云：

「中原欣且定，解甲覓歸途。去就不關繫，還鄉退守愚。」

平寇立功，勳名方立，何致于「壯志折磨盡」，而「憔悴剩微軀」呢？從這些詩句中，我們當可看出劉銘傳的眞正意向與他的中心苦悶了。凡此俱可與本文前曾述及的進退出處原因互相參看，今不多贅。

劉銘傳出身武職而官居一品，他所究心的應該是韜鈐武略與節制統馭等等的方法。然而在他的詩中，却從不見有關于這方面的吟咏；常被提到的，反而倒是文人還士所最擅長的詩酒雅事。陳衍撰大潛山房詩鈔序，亦說：「余年十有幾，即聞中興諸將，邁迹行伍者，惟合肥劉公省三能詩文詞。」身爲中興名將，不樂武事而惟好詩文，這所顯示的意義又是甚麼呢？很明顯的，劉銘傳是希望要在這些地方讓人知道：他是不同於一般平常武夫的風流儒將；他的平生志業，除了武功方面的建樹之外，尚有更高一層的政治抱負。亦正因爲這一原因，所以他不但嚮往於改武就文的政治事業，更看不起胸無點墨的武人。由此更進一層，他更以爲所謂中興名臣如左宗棠者，其學問文章，亦不過爾爾，於是更不免因自己不能與之比肩等夷而心懷不滿，甚至不免遇事與之牴牾了。平心而論，他在戰場上的表現確實够得上勇敢善戰之稱，至於他在兵法韜略方面的造詣，

究竟是否可與左宗棠並駕齊驅，實在難說。倒是因爲他出身淮軍，久知西洋船艦槍砲之厲害，因而體認到中國欲圖自强禦侮，非效法西人，在教育文化及實業建設等方面痛下功夫不可，這種見識，似又遠勝於當時一般士大夫階層之人物。

清光緒十年，中法兩國因越南問題交惡，逐漸走上以兵戎相見的道路。法國人積極增援他們部署在遠東方面的軍力，他們的軍艦，並有窺伺臺灣進而加以佔領的意圖。爲了防患未然。清政府亦必需加强臺灣方面的防務。於是，劉銘傳有了再次出山的機會。王樹枏撰劉銘傳傳敍此云：

「光緒九年，法人奪越南，擾閩越，窺臺灣，扼我南洋門戶。十年，上命奎軍，不之應。閏五月，法事岌，詔給巡撫銜督臺灣軍。乃强起，條上海防十事。」

至於陳衍所撰的劉銘傳別傳，則對此又有更明白的敍述，說：

「甲申，朝命督辦臺灣軍務。銘傳時已不屑爲欽差大臣，欲爲督撫。廷寄下，故挾數姬遊杭州西湖。鴻章急遞促之，不顧，寄語曰：『非封疆，勿相溷也。』鴻章爲婉陳，加巡撫銜，始受命。」

欽差大臣督辦軍務的職銜雖榮，但祇有兵權而無籌餉之權。陳澹然論此，謂：

「昔者粵寇之亂，曾文正以侍郎督師湖南北江西之間，所至督撫祇牾，州縣抗其威令，崎嶇奔走，卒以父喪逕謝以歸。故胡文忠抗疏力陳，謂非督撫身任地方，不能治兵討賊。文正卒得江督，乃展其才。厥後左、李分師，皆授舆、越撫臣，始得各行其志。」

這些話的目的無非旨在說明，督兵之人如無疆吏身份，必難收臂指之效。這誠然是清代末年的實在情形。證以劉銘傳到臺以後，臺灣道劉璈對他的桀驁不馴態度，亦可知此說之不謬。但劉銘傳之必欲得巡撫而不願爲欽差大臣，還却並非主要的原因。前面已曾說過，劉銘傳本是一個很想有一番作爲的功名豪傑之士。只是他的武職出身限制了他的前途，而欲改文職，則又爲政府的制度規章所限，窒礙難行，以致心中每引以爲恨。所以愈到後來，他愈加認定，非改文職，決難以展布抱負。於是，逢到政府有意徵用他，他就要藉此要挾一番。他的借事要挾，在最初都不能達到目的。而漸漸到後來，情況漸有變更。原因是崛起于咸、同中興期間的一班宿將元戎，都已逐漸凋零，清政府可資倚畀的得力重臣，祇剩下李鴻章一個。而李鴻章自己手下，又沒有什麼能幹的幫手。在這種情形之下，李鴻章既然要竭力爲劉銘傳援手，清政府最後也只好賣李鴻章的面子了。劉銘傳多年以來鬱結在心的願望，此時總算達到，其內心之快慰，可以在他自己所撰的謝恩疏中明顯地看得出來。

劉壯肅公奏議卷一，光緒十年十一月十二日所上「補授福建巡撫謝恩摺」，其中說：

「伏念臣猥以謫陋庸材，渥荷生成知遇。南征三載，提督神畿，北討五年，忝邀僻秩，養痾田里，謬拜督師關陝之榮，久臥江干，屢邀奉詔入都之寵。凡荷聖慈之曲逮，輒慙圖報之無從。今夏督師臺疆，尤切枕戈達旦。祇以才非遠猷，莫由展效涓埃。屢迫孤軍困守之難支，上煩聖主憂勞之遠系，深宵繞泣，徒喚奈何！玆復仰被恩綸，畀以封圻重寄，承命戰慄，莫知所爲。竊念

我朝武臣中，如趙良棟、岳鍾琪，楊遇春等，皆以遇……蠟丸奉表，彌深犬馬依戀之忱，戰壁拜恩，矢圖頂踵捐糜之報。……」

按，同書同卷，同治九年十月劉銘傳所奏「督師陝甘請訓摺」，亦即他在奉到第一道奏摺，其性質亦略如謝恩之疏，但其中却祇說：「謹陳感悚微忱，無任企切之命後所上的兩相對照，便可知道，劉銘傳由督辦陝西軍務，是康熙年臺灣軍務的提督加巡撫銜正式被快慰程度爲何如！謝恩疏中所提到的趙良棟、岳鍾琪，由提督改任總間的事；楊遇春由武改文，亦是嘉慶年間的事。在康熙年間，文武兩途的地位還相當平等，即使在嘉慶年間，又特別强調他們之由武改文，係由于「非常勳烈」而始「特簡專圻」，然則他之由提督而轉爲比，更是得之不易了。他在任巡撫，更是得之不易了。他在之後，旋因建議臺灣設立行省之故而被改爲臺灣建省以後的第一任巡撫。在職期間整頓稅收，建設省會，剿撫生番，又陸續舉辦鐵路、電線、煤礦等項新設施，逐漸立基礎，其政績俱彰彰在人耳目。凡此，俱可說是他在得遂改任文職之願後，一力業上有所建樹的具體表現。若非如此，他就決不會在臺灣軍務告一結束之後，又在至七年之久的希望在政治事了。

劉銘傳到臺灣督辦軍務以後的作戰情形，有關明計，摘引王樹枏所撰傳記中的有關文字一段如下劉銘傳的傳記資料中都有極明白的記述。爲簡

「行抵基隆，臺北府六十里，而巡視礮臺，僅存五礮，不能軍。居七日，法來犯基隆，臺立碎。基隆南距省治曉乘大霧，選驍將獅球嶺橫亘萬山之中，法既毀臺，乃更築堅壘，置巨礮。銘傳移軍基隆山後，率精卒百人，潛入壘旁空屋，出其不意，猝以礮擊壘，近陴者半傷死；別以鎮兵出儳道，超敵後，鼓譟薄之。敵驚潰，爭赴舟，多墮水死。是役也，斃法酋三人，斬馘數百，奪纛二，他兵械數十，遂復基隆。事聞，上嘉獎，出帑銀三千兩犒軍。銘傳念滬尾爲瀕海要區，距臺北僅三十里，軍資餉械皆萃臺北，死守基隆，敵且襲後路制吾命。且敵船駛海上，我無艦以應之。而江督以三輪舟濟師，輒敗返。此絕域也，不舍基隆咯敵，避艦攻，致陸戰，直坐斃耳。乃徙軍滬尾，留將卒二百人扼獅球嶺。明日，法果以巨艦十二載師至基隆，而別分精卒襲滬尾，毀壘而進。我以贏卒誘近大軍，戰移時，別將張李成伏兵突出叢箐中，腹背夾擊，殊死鬬。敵大潰，蹙至海濱，斬千人。時法人毀我礮臺殆盡，我軍全恃肉搏。銘傳每當陣一呼，將士皆奮躍致死。法人既三犯滬尾不得志，月眉山之戰，將士忍饑冒雨，誓死拒，營將跣足往來督戰，無不一當百。法人益驚慴，自此不敢輕試。……」

文中所說的「滬尾」，即今之淡水；「月眉山」則在基隆附近暖暖地方之對河。劉銘傳當年在臺灣指揮兵餉不足而又無後援的孤軍奮戰，力保臺疆，其偉大戰績將與臺灣的歷史同垂不朽。

不過，他因作戰指揮的關係而與當時的臺灣兵備道劉璈弄得很不愉快，在他正式當上了福建巡撫之後，就借事加以報復，一直把劉璈送上了充軍新疆的道路，這種作法，也爲他自己帶來很多不

利的批評。

陳潘然爲劉銘傳的奏議集卷十「懲暴略」作序，略云：

「臺灣之暴，莫大於劉璈，而彰化盜次之；兵上海也，始至處上海絕地。上海道吳煦參布政使攝餉，權勢蓋與劉璈等。相國曰：『君司蘇餉，月出納幾何？其可飽乎？』一夕，單騎岸幘入吳廨，談謔甚歡。瀕行，微問之，曰：『君司蘇餉，月出納幾何？其可飽乎？』一夕，單騎岸幘入吳廨，談謔甚歡。瀕行，微問之，曰：『猝難遽罄，明旦返君其簿帙可一覽觀乎？』吳坦然出帙示之。相國一瞥，其可飽乎？』一夕，單騎岸幘入吳廨，談謔甚歡。瀕行，微問之，曰：『猝難遽罄，明旦返君其簿帙可一覽觀乎？』吳坦然出帙示之。相國一瞥，其可飽乎？』一夕，單騎岸幘入吳廨，談謔甚歡。瀕行，微問之，曰：『猝難遽罄，明旦返君其簿帙可一覽觀乎？』吳坦然出帙示之。相國一瞥，其可飽乎？』一夕，單騎岸幘入吳廨，談謔甚歡。瀕行，微問之，曰：『猝難遽罄，明旦返君其簿帙可一覽觀乎？』吳坦然出帙示之。相國一瞥，其可飽乎？』一夕，單騎岸幘入吳廨，談謔甚歡。瀕行，微問之，曰：『猝難遽罄，明旦返君其簿帙可一覽觀乎？』吳坦然出帙示之。相國一瞥，其可飽乎？』一夕，單騎岸幘入吳廨，談謔甚歡。瀕行，微問之，曰：『猝難遽罄，明旦返君其簿帙可一覽觀乎？』吳坦然出帙示之。相國一瞥，其可飽乎？』一夕，單騎岸幘入吳廨，談謔甚歡。瀕行，微問之，曰：『猝難遽罄，明旦返君其簿帙可一覽觀乎？』吳坦然出帙示之。相國一瞥，其可飽乎？』一夕，單騎岸幘入吳廨，談謔甚歡。瀕行，微問之，曰：『猝難遽罄，明旦返君其簿帙可一覽觀乎？』吳坦然出帙示之。相國一瞥，其可飽乎？』一夕，單騎岸幘入吳廨，談謔甚歡。瀕行，微問之，曰：『猝難遽罄，明旦返君其簿帙可一覽觀乎？』吳坦然出帙示之。相國一瞥，

奉詔以治斯獄，終乃調停左相，舉刑恩守謨兩罷之，而因斥絕守謨示不用以彰其罪，瑮則遣戍，以畢其事。故公辭臺撫，一年內幾不復與軍事。……」

這一段文字中所說到的李相，即左宗棠，亦即劉璈之「故帥」；楊勇愍，則是前任陝甘總督，而與刑部尚書錫珍同時奉旨至福建，審訊劉璈爲劉銘傳所奏劾一事的欽差大臣楊岳斌。至於朱守謨與李刑恩，本是劉銘傳到臺灣時所帶的兩名部屬，朱守謨是候補道職銜，李刑恩則是知府。朱守謨到臺灣以後，因爲生活奢侈，暮氣太深，而爲劉銘傳所不喜。李刑恩任滬尾通商委員，則因辦事認眞，肯負責任，而甚得劉銘傳信任。朱守謨因此遂遷怒及於劉銘傳，值法軍來攻之時，請假規避，又在繞道臺南回至福州之時，沿途散播謠言，謂基隆未敗而退，乃是李刑恩得銀數十萬賣於法國人之故。當時左宗棠在福州督辦軍務，聽了這項謠言以後，不辨眞僞，便卽刻據以上聞，於是有旨嚴責劉銘傳收復基隆，並將李刑恩革職查辦。在這中間，由于劉璈本係由左宗棠幕府出身，是否亦曾從旁添加言語，以堅定左宗棠對謠言之信任程度，則不能完全知道。至於劉璈，則以臺灣兵備道的職銜駐守臺南，在當時乃是臺灣全島的最高行政官吏，兵餉大權，悉在其手。據陳漚然文中所說，劉璈當時曾藉口種種理由，將他自己所掌握的二百多萬軍餉勒捐不發，完全不管劉銘傳之因缺餉而無法作戰。以上種種，乃是出於劉銘傳一方面的說法。如果參看其他方面的記述，則其中情形，似又頗不一樣。

陳衍撰劉銘傳別傳，亦曾述及劉銘傳與劉璈交惡的情形，說：

「初，福建巡撫未移臺，全臺專政於兵備道，遙受督撫節度。時臺道湖南人劉璈，號稱才幹。何璟爲總督，兼巡撫事，儒；璈專橫，事皆先行後白。璟偶指駁，輒惡聲相向。素輕銘傳武人無所知，非眞巡撫，臺北又挫劍，臺南天險，法人不至，自謂有設備，視銘傳如無物，事事與忤。和議定，銘傳實授巡撫，使湘人提督李定明查璈臟巨萬，及姦淫諸不法事，列款嚴劾。且關說軍機處，必置死地。朝旨逮問下獄，年餘，將定讞繯首。璈有貲，傾家營救，乃效力軍臺，死戍所。」

還一段文字，不說劉璈之貪贓及姦淫不法等罪狀是否實有其事，却以「使湘人提督李定明查璈贓巨萬及姦淫諸不法事」的筆法寫了出來，使人感覺到這似乎是一種「故入人罪」的「羅織」。參以下文所說，「關說軍機處，必置死地」云云，則劉銘傳對劉璈的借事報復行爲，更是十分明顯的了。劉璈號稱有才，又係出身左宗棠幕府。有才之人，常不免恃才傲物而不能容人，如劉銘傳自己，就是如此。劉璈與劉銘傳之間，本來就因彼此不能相容而勢難並立的了，偏偏劉璈又是從左宗棠幕府中出來的人，而左宗棠此時恰又以「爵相」之尊，駐在福州督辦軍務，仗腰有人，自不免更不把劉銘傳放在眼中；何況劉銘傳當年與鮑超之間，還有那麼一段不愉快的恩將仇報之事，劉銘傳又如何能令劉璈對他發生景仰服從之心呢？所以，「視銘傳如無物，事事與忤」，自是必有之事；借事勒捐兵餉不發，以陷劉銘傳於困境，也是可能有的事。至於婪贓及貪淫諸罪，那就是不可知之數了。看劉璈所著的巡臺退思錄，他在臺灣擔任兵備道期間的凡所措置，俱有規

模，「有才」之說，當屬不虛。最不應該的，是當劉銘傳放棄基隆，專防滬尾，以求鞏固臺北之後路時，劉璈不應運用他擔任臺灣兵備道可以向皇帝「專摺言事」的權力，直接向皇帝奏上一本，對劉銘傳有所指責，這就不是部屬事上官之體，而且有借事傾陷的嫌疑了。

劉銘傳後來之羅織報復，上面所說之事，當是最明顯可見的導火線。就事論事，劉璈之得罪，誠然是自取其咎，而劉銘傳之報復，亦未免過分。從前薛福成論劉銘傳尹隆河之敗，已曾說過：「議者於是歎劉公始終不肯讓人，其氣盛不撓，固不可及，而以怨報德爲已甚也。」由於劉銘傳之氣盛不撓，不肯下人，報德尚且以怨，其報怨自然亦必更甚了。由這些地方，我們可以充份看出劉銘傳的眞正性格。

劉銘傳在出任福建巡撫以後，因鑒於臺灣地位重要，福建巡撫難以兼管，建議立臺灣爲行省，得旨允准，並即以劉銘傳爲臺灣建省以後的第一任巡撫。綜觀劉銘傳一生的建樹，當以他出任臺灣巡撫以後的種種設施，最有貢獻。王樹枏撰劉銘傳傳，對此頗有簡明扼要的說明。摘錄一段如下：

「於是斟酌舊制，奏增府一，曰臺灣；縣三，曰臺灣、雲林、苗栗；廳一，曰基隆。改舊臺灣府爲臺南府，臺灣縣爲安平縣，卑南廳爲臺東直隸州。增設布政司一，澎湖鎭一。臺灣之立行省，自此始。生番窟宅於臺南北七百里，與民居犬牙相錯，歲戕民千餘，盜賊出沒其間。土豪假防番釀金募士，抗官吏，違號令，賦稅不以時至。銘傳撤將吏分路剿撫，時親督大隊入山，威懾

惠懷，南中北三路及前後山諸番皆薙髮歸化。又念足兵必先足食，於是丈田畝，清糧賦，四年溢經額三十六萬三千三百兩有奇。其諸所創土田，茶鹽、金、煤、林木、樟腦之稅，充羨府庫。始至，歲入金九十萬，後至三百萬。因築礮臺，購火器，設軍械局、水雷學堂，要以興造鐵道爲綱紐，輔之以電線、郵政。穴山梁水，闢巨道七百里以通南北，臺防益固。」

這雖然只是短短三百餘字的概述，却能大致勾畫出劉銘傳出任第一任臺灣巡撫以後，在臺灣所做的各種新政治與新建設。臺灣在未曾建立行省以前，歲入賦稅祇九十萬，尙不敷各項行政及軍事方面的開支，有賴福建的財政支援。財政方面如果不能自立，一切建省以後的建設事業，便事事無從談起。劉銘傳深知臺灣賦稅之少，其眞正的原因完全在於大戶之逃漏與官吏之浸漁，所以他首先辦理田畝清丈，俟實地清丈完畢，完全掌握了各項田地山蕩的數目之後，然後視地畝之肥瘠，訂立課賦的準則，頓時就使年徵賦銀由舊時的十八萬兩增至七十萬兩。其他如清理關稅、厘捐、鹽課等等，所用的方法亦大率類此，「蓋其術皆奪豪强私利入之官，故賦溢而民不病。」（劉壯肅公奏議清賦略序）劉銘傳在剛到臺灣之時，卽曾說過，「關全臺自有之利，養全臺自守之兵」，並非難事，後來果然證明他所說不錯，足見他對當時的吏治民生，認識極爲清楚，所以纔能以大公無私的精神，堅貞不屈的毅力，力掃姑息頹風，創立面目一新的革新局面。這種切實負責的態度，在當時的官場中已經極爲難得，如果再從他在臺灣所推行的各種實業建設來看，其識見之卓犖與氣魄之偉大，在當時的中國，更沒有人可以與他匹敵！

劉銘傳在臺灣文獻專刊第四卷第二期「劉銘傳特輯」內曾有詳細的論列，遺裏可以無需多贅。所值得提出一述的，乃是他在未巡撫任內所作的種種政治革新前的光緒六年，就曾向清政府提出他心目中的全盤革新計劃，其內容與他後來在臺灣出任巡撫時期的種種興革措施，若合符節。可知在劉銘傳的心目中，對于如何革新自強，以求湔雪國恥的想法，早就有了一套完整的觀念，只是當時尚沒有這樣的機會使他充分發揮而已。劉銘傳當年的計劃，見於劉壯肅公奏議卷二，光緒六年十一月初二奏上的「籌造鐵路以圖自強摺」。其時清政府以對俄外交關係緊張，恐有發生戰事可能，爰因李鴻章之推薦，召劉銘傳入京以備任使。抵京以後，銘傳覘知政府已無用兵之意，乃奏上此摺，另附一片，以目疾未癒爲理由，請假就醫。此摺原文甚長，但其意甚爲精闢，值得注意。今摘錄其對于「急造鐵路」所持之理由，請及行旅、釐捐者，不可殫述。而於用兵一道，尤爲急不可緩之圖。中國幅員遼闊，北邊綿亘萬里，毗連俄界，通商各海口又與各國共之。畫疆而守，則防不勝防；馳逐往來，則鞭長莫及。惟鐵路一開，則東西南北呼吸相通，視敵所趨，相機策應，雖萬里之遙，數日而至，雖百萬之衆，一呼而集，無轉輸艱阻之虞。且兵合則强，分則弱。以中國十八省計之，無徵調倉皇之慮。兵非不多，餉非不足，然各省兵餉主於各省，督撫此疆彼界，各具一心，遇有兵端，自顧不暇，雖詔書徵餉調兵，無力承應，雖詔書切責，無濟緩急。若鐵路造成，則聲勢聯絡，血

張貫通，節餉裁兵，併成勁旅，防邊防海，轉運銃礮，駐防之兵卽可爲游擊之旅，氣，一兵可抵十數兵之用。……」

他這種基於軍事學上的觀點，認爲鐵路最便於調動軍隊及機動作戰，對于幅員北動輒數千里的我國情形來說，可謂切中時弊。所以他心目中所擬造的鐵路，以爲道三條，俱以京師爲樞紐，東邊則至瀋陽，南面則一由山東至清江浦，一由河南至今之北寧路，後者卽今之津浦路與平漢路，俱是縱橫南北的鐵路大動脈。劉銘傳時，李鴻章亦曾提議將唐山脊各莊間的一條運煤鐵路向東西展築，東面築至山海關津，由于反對之人太多，一直遲遲未能實現。除此之外，則當時的中國可說尚沒有建設。劉銘傳在舉國上下如此閉塞保守的環境中，能夠有如此高瞻遠矚的識見，實陳瀅然撰劉銘傳神道碑，其中就曾說到：

「同治間，士大夫方詠太平，競黨爭，詬西法，公獨謂非罷科舉，火部案、才，不出十年，中國將不可問。及伊犂事起，獨抗言開鐵道，通國脈，使兵餉出朝牽制，然後天下事可爲。今事敗乃踐公謀，患且不可治矣！」

陳瀅然說這些話的時候，已是中日甲午戰爭以後，中國因軍事上一敗塗地而割恥辱了。到此時方纔追想起劉銘傳在三十年以前有此遠見，足見劉銘傳在軍事與識，確實高人一等。然則他在出任臺灣巡撫以後，所以要亟亟在臺灣革新政治，振

事各項軍事、經濟等方面的建設，也正可說是他平素政治主張之實踐。假如當時的政府不對他所做的種種革新措施加以不合理的掣肘限制，以致劉銘傳因自感不能貫澈其理想而中途離去，則臺灣的建設事業，必定早有可觀。臺灣的建設事業成功以後，以此作爲榜樣，推而及於全國，則中國之自強維新，在光緒二十年以前亦必已有成效可覩。然而當時的清朝政府，朝中則因黨派傾軋而舉棋不定，國內的知識份子則目光短淺，識見鄙陋，竟沒有人爲劉銘傳作隔海之聲援。於是，劉銘傳只好在這種擾攘傾軋及憒憒昏沉的環境下黯然去職，上距他之受任爲臺灣巡撫，不過只有六年的時間而已。

劉銘傳因不能安於其位而請辭臺灣巡撫之職，究竟是由于什麼樣的可見原因？據現在所能看到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基隆煤礦的官辦抑商辦問題。

基隆煤礦原係官辦，資金祇十二萬兩銀子。由于礦質不佳及經營不善等雙重原因，賠累不堪，轉眼卽將難以爲繼。劉銘傳請來一位外國工程師實地前往堪察，這工程師隨後提出報告，謂非另選地點新開礦井，不能起死回生。而開新礦井則需購新機器，加上償還舊礦的資本，非一百萬兩的資金不能敷用。他建議新礦由官商合辦，而英商范嘉士願承乏其事。奏上，總理衙門奏駁不准，並責令另選本國商人合股。此案於光緒十六年六月奏上，奉旨交由戶部會同總理衙門核加經營，則已另選賢員，仍由官辦。銘傳以官本短絀，仍當由官商合辦爲便。如洋人不便令其參議。由於部議遲遲未覆，而招到的商股已約定在七月間開始接辦礦局。到了八月間，戶部及總理

衙門會商仍舊不准，劉銘傳則在七月間已經先行同意了官商合營的辦法，並實際進行開礦事宜，至是據實奏上，旋即奉到嚴詞譴責的上諭一道，說：「劉銘傳以特旨勅令另議之件，並不奏明請旨，輒即議立章程，擅行開辦，尤非尋常輕率可比。劉銘傳着交部議處。」吏部遵旨議處的結果，是：「著加恩改爲革職留任」，但一葉落可知天下秋，劉銘傳已經清清楚楚地認識到負責辦事之難。於是，他覺得不適宜再繼續做下去了。

爲什麼劉銘傳因此一事就深深瞭解他不能再戀位不去？這有兩種原因存在。第一，自然是他在臺灣所做的種種革新與建設事業，在當時的中國都顯得格調太高，很少人能瞭解其重要性。而一般文墨之吏，動輒以迂徐緩慢的辦事程序及陳腐的法令規章來約束他，已經使他感到動輒得咎，縛手縛脚，無法盡力施展。第二，是朝中南北黨爭的主要人物翁同龢、潘祖蔭等人，都與李鴻不睦，常欲借事中傷。劉銘傳是李鴻章的得力臂膀，打擊劉銘傳即所以打擊李鴻章，於是劉銘傳成了他們的目標人物。即以基隆煤礦一事而論，奉旨核議其事的戶部，掌權的漢尚書正好是李也鴻章的對頭翁同龢。劉銘傳將基隆煤礦交由官商合辦，原是視實際需要的權宜措施，只要其後效可期，儘可假以時日，徐觀其成。然而翁同龢却要以劉銘傳故違詔旨爲言，責之以專擅，處之以革職，顯然是小題大作，公報私仇。一事如此，諸事可知；小事如此，大事可知。情況如此，如之何不使劉銘傳心懷警惕而生及早抽身之計呢？清代末年的朝政傾軋，不知道悞了多少國家大事。現在，劉銘傳也成了被犧牲的人物。這種但論恩怨而不問是非的惡劣作風，誠然不免令英雄

氣短。而一個朝代到了這個地步，距離它的末日也就不遠。所以這也正是無可奈何的事啊！

據史傳所記，劉銘傳任臺灣巡撫之日，「嘗登滬尾砲臺，東望日本，欷歔嘆曰：『即今不圖，我爲彼虜矣！』」銘傳哨然嘆息曰：『人方慕我，我乃自抉其籓籬，亡無日矣！』」鴻章爭之不得，未幾，醇親王薨，鴻章孤立。戶部忽奏請：『天下海軍，十年內毋增艦砲。』

去。去四年而朝鮮之亂作。」中國在清代末年，缺乏有遠見的政治家和軍事家，而劉銘傳恰是少有的這種人才。有人才而不能容其有所展布，又任令無識之人顚倒簸弄，國家大事，豈復堪能聞問！由這些事實，追念我國在甲午戰爭以前的種種政治措施，更加可以使人體認，處進退，對於國運之隆衰具有何等密切的關係！劉銘傳的性格雖然高傲，他的人品雖然亦有不光明的一面，但在清代末年，劉銘傳確實是一個有識見、有抱負、與有擔當的人。人珍瘁，我們在今天追論當年的史事，誠然不免爲劉銘傳之不能竟其才思致其惋惜。然而，這不就是歷史演變之契機麼？

咸豐、慈禧與恭王

鴉片戰爭發生以後的七十年間，中國歷史所發生的變化最大也最劇烈。由於帝國主義侵略者在鴉片戰爭中戳破了中華帝國虛弱而又老大的紙糊外壳，一連串的外國侵略接沓而來，使得一向自居爲天朝上邦的中國，逐漸淪落成爲各國列强所共同角逐的次殖民地。這七十年，正是清代咸豐、同治、光緒、宣統四個皇帝在位之時。宣統祚短，而同治光緒兩朝的實際統治者則是大名鼎鼎的慈禧太后。所以，要追溯中國歷史在這七十年中具有最大影響力量的統治人物，無疑當數咸豐皇帝及慈禧太后這兩個人。

慈禧在最初是咸豐的貴妃，後因其子載淳繼立，而被尊爲皇太后。清史后妃傳後有一段文字論斷慈禧在清代歷史上的地位與影響，說：

「文宗末造，孝貞、孝欽兩皇后躬收政柄，內有賢王，外有名將相，削平大難，宏贊中興。未久而穆宗卽世，孝貞皇后崩。孝欽皇后聽政久，稍稍營離宮，修慶典，視聖祖奉孝莊皇后，高宗奉孝聖皇后，不逮十之一，而世顧竊竊然有私議者；外侮迭乘，災祲屢見，非其時也。不幸與德宗意指不協，一激而啓戊戌之爭，再激而成庚子之亂。晚乃一意變法，怵天命之難諶，察人心

之將渙，而欲救之以立憲。百端並舉，政急民煩，陵土未乾，國步遂改。綜一代之興亡，繫於宮闈，亦一異也。」

上文所說的「文宗」，卽咸豐；「穆宗」，卽同治；「德宗」，卽光緒，「孝欽皇后」，卽慈禧。這一段話，直以爲晚清同治光緒兩朝的興亡關鍵，繫於慈禧一人之身，然則慈禧太后這個人在晚清歷史上的關鍵影響，當可想見了。

慈禧是同治皇帝的生身之母，亦是咸豐皇帝的「懿貴妃」。如果不是她生了同治皇帝的緣故，她當然做不了皇太后，干涉不了晚清末年同治光緒兩朝的政治，也不會導致中國歷史在這兩朝中發生了如許惡劣的悲慘事故。但如果不是咸豐皇帝因得到他父親道光皇帝之寵愛而致登上皇帝寶座的話，這一切的事情，當然也都沒有發生的可能了。又假如咸豐在做了皇帝之後不因躭於酒色而致早戕其生，及在他自己崩駕之時，不因猜忌之故而使他的親弟奕訢不能居於輔政的地位，亦不會造成慈禧之盜竊國柄。然則追本溯源，道光之選立咸豐爲帝，以及咸豐之兄弟不和，無一切事故演變之張本了。奕訢卽死後被謚爲「忠」的恭親王，亦卽是前引后妃傳論中所說到的「賢王」。本文以「咸豐、慈禧、與恭王」爲題，旨在以此三人的相互關係及重要事蹟，來解釋咸豐、同治、光緒三朝中的政局變化何以如此而非如彼的道理。由此自不難看出，清代末年中，中國歷史所受於這三個人的影響，是怎麼一種情況。

首先要敍述的，是咸豐皇帝的得位經過，以及他的性格、嗜好、與所信用的人物。這其中當

然還要說到他與恭王手足參商的經過，及慈禧當時所處的地位。

咸豐名奕詝，乃是道光皇帝的第四子。按，道光共有子九人。長名奕緯，和妃出，年卒。次名奕綱，靜妃出，道光七年卒。三子奕繼，五子奕誴，六子奕訢，亦均靜妃出。其餘三子奕譓、奕詥、奕譞，則均爲莊妃所出。清代自康熙一朝發生皇太子悖逆不孝的事件之後，歷朝相承，均不預立皇太子。只由在位的皇帝暗中選定一個可以繼位的皇子，親筆寫下詔書，分貯在兩個金盒之中，一存乾清宮正大光明殿匾之後，一貯皇帝寢宮。俟病重將死，方宣示遺命，由侍奉在側的王公大臣會同請出鐵盒，啓視無訛，然後立爲嗣皇帝。咸豐雖是皇后之子，但如未能被道光所選中，並不一定能够成爲下一任的皇帝。而照當時的情況來看，他之能够被選中，也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機會而已。其原因則由于道光當時所屬意的繼位人選共有二人，一是奕詝，另一人則是奕訢。

如奕訢被道光所選中，則奕詝雖爲嫡出，一樣只好屈就做個親王。這是清代立嗣制度勝於前代的地方——立嗣以賢不以嫡。而由當時的事實而言，咸豐被選中的機會，實在不大。

清稗類鈔宮闈類中一則云：

「宣宗倦勤時，以恭王奕訢最爲成皇后所寵，嘗預書其名，置殿額內。有內監在階下窺伺，見末筆甚長，疑所書者爲奕訢，故其事稍聞於外。宣宗知而惡之，乃更立文宗。」

此一說以爲道光本意在擇立奕訢，後因其事外洩，始改立奕詝。此事之眞相如何雖不可知，

然而奕訢有寵且有希望繼立爲君，當是事實。另據清宮遺聞所述，則情況亦復相似，但最後之變化係由于奕訢之師傅教導得當，故而終於影響到道光的決心。據說當時奕訢和奕訢各有師傅教之讀書，奕訢之師爲杜受田，奕訢之師則是卓秉恬。道光晚年，體衰多病，對立嗣問題頗難有所抉擇。一日，召奕訢奕訢二子親加垂詢。二人皆向師傅求教。卓秉恬教奕訢對道光所詢之事均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杜受田則知奕訢之才學不如奕訢，如係條對時政，必定屈居下風；因教之以如聽道光自言老病不久人世，即當伏地流涕，以表孺慕，而不必自逞才智。奕訢如教行事，果得道光歡心，因之得立爲嗣。這是前說之外的另一種異聞，雖稍有歧異，却能相輔相成。至若由清史杜受田傳中考之，則杜受田的教導，又是另一種形式。傳云：

「尋充上書房總師傅。文宗自六歲入學，受田朝夕納誨，必以正道，歷十餘年。至宣宗晚年，以文宗長且賢，欲付大業，猶未決。會校獵南苑，諸皇子皆從，恭親王奕訢獲禽最多，文宗未發一矢。問之，對曰：『時方春，鳥獸孳育，不忍傷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悅，曰：『此眞帝者之言。』文宗立儲遂密定，受田輔導之力也。」

將三種記載合起來看，當可知道，道光之初意本欲立奕訢爲嗣，一則因事機外洩而引起道光之不快，再則杜受田所教導的奕訢一再以慈孝仁愛的方式表現他性格中的高貴特性，終於影響了道光的抉擇，然則奕訢之得立與奕訢之不能得立，實在可說是有幸與有不幸的了。

就奕訢與奕訢二人的性格與才具而言，奕訢在那一方都要比奕訢強得多。這可以在奕訢與奕訢

訝的後來表現上，明白的看得出來。奕訢在清末有「賢王」之稱，不但才具開展，而且思想敏，勤於國事。不比奕訢，做了皇帝之後不久，就因內憂外患之交相煎迫而變得消極頹廢，沉湎酒色，不能振拔，最後終於因酒色戕身，只活了三十一歲就短命而死，把一片殘破的江山丟給了他六歲的兒子載淳，徒然爲野心勃勃的慈禧製造了竊柄弄權的機會。因此，道光之誤立奕訢，實在是導致晚清歷史走向積弱腐敗的重大原因。如果他所立的是奕訢，此後的情勢當然不致如此。他不具論，最少，清代歷史上不會出現慈禧太后垂簾聽政的局面，不致以一個淺薄無識的婦人而一手握定中國的命運達四十餘年，當可斷言。

咸豐在位十一年。這十一年中的具體政績如何？清人林熙春所撰的國朝掌故輯要一書中曾有論列，云：

「上誕膺天命，四方多事，旰食宵衣。每日披覽章奏，引對臣工，指示周詳。軍興以來，所授機宜，無不愜當。建元之初，詔免天下錢糧千有餘萬。歲一不稔，捐租緩徵，無不如疆吏之請。被賊之區，思施尤渥。命儒臣繕寫朱子全書及貞觀政要，朝夕講求。幾餘洒翰，或述志以示廷臣，或手詔以褒直諫，莫非夙夜緝熙所見端也。進退臣工，明而善斷。正位之初，即頒手詔正穆彰阿、耆英之罪，偏諭臣僚，改平素因循取巧之習。飭內外大臣保舉人才，不拘資格，一秉大公。是故兵不足而兼用勇，漕不繼而改海運，餉不足而更製大錢。改口岸以整鹺綱，輸米石以實倉庾，裁河員之冗浮，減京餉之成數。凡此新章之改革，無不與時爲推遷。在熱河時，未嘗一日

忘宮闕。辛酉仲春，有詔回鑾，而聖躬不豫，浸至大漸，亦聖心初不自料者。普天之下，見升遐素詔，莫不奔走號呼，若失怙恃也。」

就事論事，在咸豐一朝之中，內憂外患，紛至沓來，無論軍事、政治、經濟、財政，都呈現出一片分崩離析之象。若不是有英明果斷的君主維持於上，賢明幹練的文武大臣匡濟於下，要想度過危局，再造邦家，當然很難。所以，咸豐在即位之初所表現的幹濟果斷之才，確實頗有可稱。但曾幾何時，由於太平天國的亂事日見擴大，失陷的地區日見增多，稅源短絀，財用日見困難，將帥無能，馴至無兵可用。在這種江河日下的情況中，咸豐負擔不了精神上的沉重壓力，不知不覺地走向逃遁避匿的道路。清稗類鈔中有一條說：「咸豐季年，天下糜爛，幾於不可收拾，故文宗以醇酒婦人自戕。」身爲一國之主，而當時局十分艱難困苦時不思竭力支撐，竟至以醇酒婦人自戕，這不是逃避責任的懦怯行爲麼？反觀奕訢，在同治光緒之間雖迭經挫折、飽嘗憂患，却始終不曾有過這種逃避責任的表現。即此而論，奕訢的才具和性格，自應優於奕詝。至於同治一朝賴以戡平大難的一班中興名臣，如曾、左、胡等人，其進用雖始於咸豐之時，而其所以能得到大用之故，據近世史家的論述，多歸功於軍機大臣文慶與肅順二人的主持，並不能視爲咸豐之知人善任也。

近世史家，頗有稱咸豐爲好色之徒的。好色必有事實，這在官書正史中當然沒有記載，但在野史中則頗有之，摘引數條，以見一斑。

滿清野史三編中有一種名爲「圓明園總管世家」，專敍管園大臣文豐如何迎合咸豐之意旨爲皇帝搜求美女的情形，說：

「文宗因東南太平軍起，中心憂焦，頗懷信陵君醇酒美人意，常居園內，命宮監四出覓漢女，充下陳。文豐有心腹奴二，皆漢人也。一走維揚，一去金閶，購得民女四人，皆絕艷，或云取自妓家。文宗爲特設四院以處之。亭館崇宏，隔垣相望，複道屬焉，即世所傳杏花春、武林春、牡丹春、海棠春亦新自金閶來，文宗益樂甚，爲詩以賞文豐之能，賜賚重疊。未幾，心腹奴又獻牡丹春。女亦蘇人，善媚工歌舞。文宗嘗携那拉妃聽歌，妃頗賞之。其後寵眷愈隆，妃遂嫉忌，別遣心腹至粵江選花，得珠兒之麗者，以間牡丹之寵，即武陵春是也。四春爭妍鬬媚，由文豐進者實居其三。故文宗朝文豐寵貴，比於內府。」

咸豐所寵幸的圓明園四春，在清代頗負盛名。但此書所說四春之名爲杏花春、海棠春、牡丹春、及武陵春，在他書中又頗有異名。如許指嚴所撰的「十葉野聞」一書，則除了牡丹、海棠、杏花三春之名相同外，武陵春之名作陀羅春，謂係北京某浣衣女子，爲咸豐所自見而以重金羅致入宮者，與前說差異，不知何者爲是。四春以外之有寵者，則是後來的慈禧太后，當時的懿貴人，亦即前引圓明總管世家中所說到的「那拉妃」，因爲此便是慈禧的姓氏之故。

慈禧太后本係葉赫部族的那拉氏人，小名蘭兒。父名惠徵，曾爲江南省的徽寧池太廣道。慈

禧自幼隨同父母服官江南，熟悉南方人的生活習慣，又善唱南方小調。由於她天生艷麗聰明，所以在咸豐初年挑選秀女時得以被選入宮，得幸後被册封爲懿貴人，據說她之所以得幸，也還是因爲她所唱的吳歌及所扮的漢女裝束，深爲咸豐所喜愛的緣故。咸豐喜愛漢女，「十葉野聞」一書中有甚多記述。此書的卷上「豹房故智」中有一則云：●

「文宗眷漢女，其目的所在，則裙下雙鈎是也。窄娘新月，潘妃蓮步，古今風流天子如一轍哉！」

中國人最爲世界所詬病的纏足惡習，自古以來，不知道曾經顚倒過多少色情狂的男人。如今咸豐也成了這嗜痂成癖的一份子，自然要多物色蘇揚佳麗以充後陳了。

於是，纖肢如筍，腰支嫋裊之圓明園四春先後被羅致而來，嬌媚容悅，寵之專房，而懿貴人則苦矣。懿貴人之美，並非不及圓明四春，吃虧的是滿洲婦女天生不纏足，所以即使懿貴人明艷初雖也曾寵冠一時，而一等到圓明四春先後入園之後，她就很快地被冷落了。慈禧之爲人，胸懷褊隘而心狠手辣。爲了遭受皇帝的冷落，她也曾試圖以習畫、作文、學字等方法來排遣心中的寂寞，及以代替皇帝批答章奏的辦法來引起咸豐對她的注意，最後當一切希望都不能成功之時，她的一腔仇恨報復之心，就愈來愈强烈而難以忍受了。所見於表面的，便是她對於咸豐的蓄意頂撞及借事弄權。●近人黃濬所著花隨人聖庵摭憶引述惜陰老人所談端肅遺事，中間有關於慈禧的記

事，云：

「李芍農侍郎文田，最喜蒐拾掌故，鈎稽秘聞。晚年，厭其專權。文宗最喜肅順，言無不盡。一日，故事，文宗濡遲不忍。亡何，又以醉恚漏言，西后聞之，啣肅次骨，後遂有大獄。芍農蓋聞於內廷舊監，談此祇勿妄泄，此外間所莫知也。」

所謂鉤弋故事，即漢武帝鉤弋夫人的故事。鉤弋夫人生子有寵，武帝將立爲太子，恐主少母壯，女主專恣淫亂，遂藉故賜死，而立其子爲太子，亦即後來的漢昭帝。肅順請咸豐用鉤弋故事，意思就是請皇帝仿照漢武帝處置鉤弋夫人的辦法，殺母而留其子。慈禧之子，當然就是後來的同治。咸豐在位十一年，所生皇子，止此一人。慈禧之所以敢於頂撞咸豐而借事弄權，當然亦因爲恃子而驕之故。肅順預見慈禧將來必定驕恣難制而請皇帝行鉤弋故事，這是肅順的識見遠大之處。只因咸豐之濡遲不決，遂爲大清江山留下了無窮的禍根。而肅順自己，亦因此而與慈禧結怨，言出禍隨，種下了他日後的殺身之禍。

這且暫時不談，現在再來看咸豐晚年的情況，以及慈禧當時所處的地位。

慈禧生子，在咸豐六年。這在咸豐皇帝來說，乃是莫大的喜事。因此慈禧亦由懿貴人晉封爲懿妃，再晉封爲懿貴妃。按照清宮的規制，皇后之下爲皇貴妃，皇貴妃之下爲貴妃，去皇后兩等，在宮中的地位雖高，尚不足以比擬皇后。但是她後來何以又能被尊爲皇太后，

與咸豐的皇后鈕祜祿氏同時垂簾聽政呢？說起來，還還是明朝萬曆初年張居正所創下的惡例。在張居正以前的歷朝制度，一個皇帝死了以後，皇后可以由繼位的嗣皇帝尊爲皇太后。如果嗣皇帝並非皇后所出，則因嫡庶有別之故，嗣皇帝的生母只能晉封爲太妃，而不能與皇后同樣地被尊爲皇太后。當年張居正擁立幼主，爲了博取皇帝生母的歡心，創下了此一「兩宮並尊」的惡例——皇帝的生母則尊爲「聖母皇太后」，皇帝的生母只能晉封爲太妃，而不能與皇后同樣地被尊爲皇太后。當年張居正擁立幼主，爲了博取皇帝生母的歡心，創下了此一「兩宮並尊」的惡例——皇帝的生母則尊爲「聖母皇太后」。這就使得後來凡是誕育嗣皇帝的妃嬪，都有希望做到眞正的「母以子貴」，其先朝的皇后不分嫡庶，比肩並尊，同爲皇太后。自明朝出現此一前例之後，清代亦遵此例不改。所以清世祖時也同時有兩個皇太后——孝端皇太后與孝莊皇太后，一係嫡母，一則生母。康熙乾隆兩朝的情況，亦復如此。咸豐皇帝在咸豐十年八月間因英法聯軍侵入北京而避難前往熱河，至咸豐十一年七月，就因斷傷過度而致一病不起，崩於熱河行宮。據說，當咸豐自知不起時，亦曾預見慈禧將來必定要當上皇太后，而咸豐的皇后鈕祜祿氏仁厚柔弱，屆時恐無法制馭慈禧之怙勢專權，因此預先立下一道詔書，付與皇后鈕祜祿氏收存。詔書內說：

「西宮援母以子貴之義，不得不並尊爲太后。然其人絕非可倚信者。即不有事，汝亦當專決。彼果安分無過，當始終曲全恩禮。若其失行彰著，汝可召集廷臣，將朕此旨宣示，立即賜死，以杜後患。」

這一詔書之有無雖不可知，而咸豐之對慈禧深有戒心，當係事實。只可惜咸豐當機不斷，在

他自己生前既不願行鉤弋之事，在他死後，又留下了近支親王與顧命大臣之間的政爭嫌隙，於是反爲慈禧製造了攫取政權的機會，而咸豐生前所憂慮的事實，也終於出現了。這實在可說是咸豐之「人謀不臧」，也可說是中國之不幸。

這裏所說到的，咸豐死後所留下的近支親王與顧命大臣之間的政爭嫌隙，即是清末有名的「辛酉政變」。要說到這件事，還得從咸豐的遺命及政爭各主要人物說起。

辛酉政變的主要政爭人物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咸豐遺命爲嗣皇帝輔政的「顧命八大臣」；另一方面，就是咸豐的親弟，恭親王奕訢。奕訢乃咸豐之親弟，而顧命八大臣中乃並無奕訢之名。這個問題，實與咸豐與恭王間的手足參商有關。

咸豐之母鈕祜祿氏，即清史后妃傳所稱之「孝全成皇后」。於道光十一年生奕訢，二十年崩，時奕訢年方十歲，由恭親王奕訢之母博爾濟吉特氏代爲撫育，故奕訢與奕訢雖非同母，却親愛逾於他兄弟。奕訢繼位後，即命奕訢入軍機，以示恩禮。咸豐初年，迭授爲都統，右宗正、宗令，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寵遇有加。至咸豐五年七月，奕訢生母康慈太貴妃薨，咸豐遽降旨譴斥奕訢，責其禮儀疏略，罷軍機大臣及宗令都統等職，仍在內廷行走，上書房讀書。這其間的內情，王闓運的「祺祥故事」中曾有記述，引述一段如下：●

「恭忠王母，文宗慈母也，故與王如親昆弟。即位之日，即命王入軍機，恩禮有加，而册貴妃爲太貴妃。王心慊焉，頻以宜尊號太后爲言，上默不應。會太妃疾，王日省視，帝亦省視。一

曰，太妃寢未覺，上問安至，宮監將告，上搖手令勿驚。妃見牀前影，以爲恭王，問曰：『汝何尙在此？我所有盡與汝矣，他性情不易知，勿生嫌疑也。』帝知其誤，卽呼『額娘』。太妃覺焉，回面一視，仍向內臥不言。自此始有猜，而王不知也。又一日，上問安入，遇恭王自內而出。上問病如何？王跪泣言：『已篤，意待封號以瞑。』上但曰：『哦，哦。』王至軍機，入上書房，而減殺太后喪儀，皆稱遺詔減損之。自此遠王，同諸王矣。」

奕訢之母，初尊爲康慈皇貴太妃。奕訢於康慈太妃臨終時必欲咸豐尊之爲皇太后，竟不待俞允，卽傳旨令所司具禮儀以進，於是造成了咸豐的不快，也種下了兩人間的嫌隙。咸豐十年，英法聯軍入犯，北京不守，皇帝北狩熱河，而令恭王留京與英法議和。及咸豐在熱河行宮病重，在側者祇御前及軍機處諸王大臣，而奕訢及奕譞等雖爲咸豐親弟，反不在扈從及侍疾之列。奕訢知咸豐病重，具奏請由北京前來熱河省疾。咸豐時已支離不堪，猶强起倚枕，手批奕訢摺尾，曰：「相見徒增感傷，不必來覲。」據說，當時頗有謠傳，說奕訢在北京留守，頗有不臣之心，因此咸豐更不願見他。但由此亦可知道，咸豐與奕訢之間的嫌隙，自咸豐五年至今六載，不但仍無化解之跡象，反而好像更加嚴重了。在如此這般的情形之下，咸豐的臨終末命，當然也不會考慮將奕訢列入顧命之列的了。而以當時的情況看，咸豐所最倚任的親信人物，共有三人，後來被稱爲「三奸」或「三凶」。三人之中，又以恭王端華之弟肅順。這三個人，後來被稱爲「三奸」或「三凶」。三人之中，又

以肅順的才智能力最爲高明，所以咸豐所最倚任的人，實際又當以肅順居首。

奕訢於咸豐十一年七月十七日丑時崩於熱河行宮之烟波致爽殿。當彌留之際，慈禧曾抱載淳入見咸豐於病榻，泣問事當如何？咸豐瞑目不答。復告以兒子在此，奕訢始張目答曰：「當然立之爲君。」當時儲位未定，咸豐既作此言，自然就是決定繼位之人的「聖旨」了。於是，應召前來的御前及軍機大臣寫來述旨，即請皇帝親寫硃諭，立載淳爲皇太子，以便繼位爲君。咸豐時已不能執筆，命軍機大臣寫來述旨一道，曰：

「軍機大臣承寫。當即由軍機大臣承寫諭旨一道，曰：

雖然載淳已被立爲皇太子，但載淳時年只有六歲，童騃無知，無法行使皇帝權力，一旦皇帝崩駕，載淳如何繼立爲君？這也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據說，咸豐在當時還曾經口授遺詔，指派載垣、端華等御前及軍機八大臣贊襄政務，盡心輔立皇太子，這就是所謂顧命八大臣的由來。這一個顧命及贊襄的遺詔，由於亦是軍機大臣所承寫之故，後來由慈禧奕訢等人加以否定，謂係出於載垣端華等人所自加。這當然是政爭敵對一方面的「讐口之言」，不足爲信。但因咸豐當時已經不能自行執筆，自軍機大臣當時曾經另外承寫了此一諭旨，御前大臣載垣、端華、肅順、景壽，及軍機大臣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等一共八人，就因爲詔書有名之故，而成爲輔佐皇太子的「贊襄政務王大臣」，亦即「八顧命大臣」了。這八個人，是辛酉政變中與恭王奕訢處於敵對方面的。政變之

後，慈禧與慈安以兩宮皇太后的身份垂簾聽政，恭王入領軍機。此亦卽是清史后妃傳後所說的，「孝貞、孝欽兩皇后躬收政柄」的內幕情形。揆之當時事實，戊豐不欲女后干涉朝政，而指派他所親信的御前及軍機八大臣輔立載淳，贊襄一切政務，原已將國家政柄畀予此顧命八人。而辛酉政變一舉推翻此一爲咸豐本人所親自安排的政權行使方式，反稱之爲「孝貞孝欽兩皇后躬收政柄」，其爲違背咸豐意旨的篡奪政權，不問可知。當時，慈安既柔懦無能，慈禧又只是一個無兵無權的女流，她有什麼能力可以從八顧命大臣手中將政柄奪回呢？這就得靠恭王的全力協助了。恭王在清末歷史上之所以成爲關鍵性的人物，發軔於此。

黃濬所撰花隨人聖盦摭憶，曾將上海涵芬樓當年得自私人收藏的十二通有關端肅遺事的密札，全部加以轉載，因此使我們得以窺見當年辛酉政變的幕後眞相，可謂珍貴的秘辛。這項密札中的第十二信，乃其時行朝軍機章京某人寄與其京中某友人的黃紙密札，未署姓名。以時間而論，此信乃十二封書札中之最早者。信中述咸豐病卒時之景況說：

「十六午後暈厥，囑內中緩散。至晚甦轉，始定大計。子初三刻見時，傳諭清楚。各位請丹毫諭，以不能執筆，著寫來述旨，故有承寫字樣。」

此卽載淳立爲太子及八大臣輔導贊襄之由來。其下續云：

「八位共矢報效，極爲和衷，大異以前局面。兩印均大行所賜，母后用御賞印，印起，上用同道堂印，印訖。凡應用硃筆者，用此代之。述旨亦均用之，以杜弊端。諸事母后頗有主見，垂

簾輔政，蓋兼有之」

這一段所敍，即是咸豐死後，載淳繼立初期的八大臣以皇帝名義頒行的一切諭旨，皇帝不能親閱，慈禧乃以防杜八大臣壟斷專擅爲慈安皇太后的同意之下，想出了這麼一個辦法：在贊襄王大臣所擬呈的諭稿上，首尾二印，即上文所說的「御賞」印，一印起，一印乞。至於上文所說的「母后頒有主見」，此「母后」即指慈禧而慈安與慈禧二人之中，慈禧有才識，凡裁決庶政及諮詢利弊，悉中竅要，而慈安則言事不願多所過問。按照咸豐所親自安排的政權行使方式，皇帝年幼，政事委於顧命八大臣，則顧命八人實負有行使政權的全部權力，又何須皇太后核閱諭旨稿件，並在上加鈐印章以示認可之意呢？顧命八大臣在一開始時就未能防止慈禧之借事干涉，已啓此後垂簾聽政之漸。此即是「垂簾兼輔政，蓋兼有之」，亦即指此而言。然而即使顧命八大臣對兩宮太后曾作如此重大的讓步，似乎仍未感到滿足。因爲在此以後，慈禧與顧命八大臣之間，曾爆發一場極爲激烈的爭執。

爭執的焦點，即是「垂簾兼輔政」抑或「只垂簾而不輔政」的問題。這在涵芬樓所藏端肅遺事十二札中，曾有明白的記述。如十二札中之第一札（套格密札）中云：

「玄宰摺請明白的記述。如十二札中之第一札（套格密札）中云：

「玄宰摺請明降垂簾旨，或另簡親王一二輔政，發之太早，擬旨痛駁，皆桂翁手筆。溯上，

摺旨俱留。又叫有雨時許，老鄭等始出，仍未帶下，但覺怒甚。次早仍發下。復探知是日見面大爭，老杜尤肆挺撞，有『若聽人言，臣等不能奉詔』語。太后氣得手戰。發下後，怡等笑聲徹遠近。此事不久大變，八人斷難免禍，其在同城乎？密之，密之。」

此信未署年月，發信與受信者亦俱無名。由內容推測，當亦係在熱河之軍機章京發致京中某友人信。與前引第十二札不同的地方是，前信之發信者係肅順一黨中人，此則是反肅黨者，觀其語氣可知也。信中多用隱語，如「玄宰」隱「董」字，所指卽御史董元醇奏請皇太后垂簾聽政之摺。「桂翁」隱焦佑瀛，因焦佑瀛字桂樵故。「老鄭」指鄭親王端華，「老杜」卽禮部右侍郎杜翰，皆當時掌握政權之顧命王大臣。董元醇的奏摺，係於咸豐十一年八月初十日奏上，這不但見於清穆宗實錄及同治東華錄等書，由十二密札中的第四札亦可考見。此札係咸豐十一年八月十三日署名「守墨道人」者寄與署名「結一廬主人」者，內云：

「千里草上書，初十日未下。此處早人上去，要留看。夸蘭達下來說：『西邊留閱。』心臺冷笑一聲。十一日叫，見面說寫旨，下來叫寫明發痛駁。夫差擬稿尚平和，龐翁另作，諸君大讀。『是誠何心？尤不可行』等語，原底無之。遂繕眞遞上。良久未發下（他事皆發下），並原件亦留。另叫起，耳君怒形於色。上去見面，約二刻許下來。（聞見面語頗負氣）仍未發下，云留著明日再說。十二日上去，未叫起。發下早事等件，心臺等不開視（決意擱車），云：『不定是誰來看。』日將中，上不得已，將摺及擬旨發下照抄，始照常辦事，言笑如初。如二四者，可謂

渾蛋矣。夫今日之事，必不得已，仍是垂簾，可以遠禍，可以求安。必欲獨攬其權，是誠何心？鄙意如不發下，將此摺淹了，諸君之禍尚淺。固請不發，擱車之後不得已而發，亦不見聽，徒覺多事耳。昔人云：『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吾謂諸君之禍肇於擱車矣。高明以爲何如？……聞西邊執不肯下，定要臨朝，後來東邊轉灣。雖未卜其意云何，大約是姑且將就。果如此行，吾不知死所矣。……」

將此信與前引第一信互相參看，當時兩宮皇太后爲董元醇奏請皇太后垂簾聽政一事，與顧命八大臣之間所發生的爭執，已可使人看得十分清楚。此信中亦多隱語，如「西邊」指慈安，因慈安與慈禧在當時被通稱爲東宮皇太后與西宮皇太后之故。「心臺」指怡親王載垣。「夫差」指初次擬旨駁斥的某吳姓軍機章京，後來另擬一稿而加入了許多嚴厲文字的「廝翁」，卽焦佑瀛，因焦佑瀛面廳，在當時被稱爲「焦大廳子」之故。「耳君」隱鄭字，所指卽鄭親王端華；「二四」隱「八」字，所指卽顧命八大臣。而所謂「夸蘭達」，所謂「明發」卽「明發諭旨」。至於「叫起」，則指皇帝傳旨召見而言。

從這兩封信中所能看出的當時情形，可知在咸豐初卒之時，顧命八大臣雖已由受遺詔輔政作了適當的讓步，變爲請皇太后看摺核稿方式的「垂簾兼輔政」，在慈禧方面，似仍未感滿足，因爲董元醇上了這一建議之摺，遂欲乘機卽行垂簾之事。但顧命八大臣以爲咸豐遺詔只命顧命八人

輔立皇太子爲君，並贊襄一切政務，請皇太后看摺核稿，已屬過分，如果再有明明白白的垂簾聽政，豈不是顯然違背了咸豐的遺命？何況此摺中又有另簡一二親王輔政的話，更寓有擅議國家大政，排斥顧命八人的意圖在內，尤其是他們所不能容忍的，所以立意要擬旨痛予駁斥。殊不知慈禧因對肅順懷有宿怨之故，對於另簡一二親王輔政及皇太后垂簾聽政之說，深覺合意，對於所擬駁斥之旨，甚不願照擬發出。所以當旨稿呈進之後，並原摺亦留中不發。翌日召見軍機，遂因此事而大起爭執。據政變以後皇帝降旨處分八大臣的詔書中語，有「載垣等非獨擅改聖旨，並於召對時，有伊等請皇太后看摺，亦係多餘之語」，見薛福成所撰庸庵筆記卷一。由於顧命八人應對時的立場如此，慈禧無辭可駁，所以纔因此而「氣褥手戰」。但此日之爭執並無結果，奏摺及旨稿亦均未發下。再越一日，已是八月十二日了。八大臣入內上值，太后跟着發下的摺件中仍無董摺及旨稿，以「擱車」的形式抗議皇太后的此一舉措。因爲此八人掌握了推行政務的軍機處，一旦「擱車」，所有政務勢將俱皆不能推行。皇太后不得已，始將董摺及擬旨發下照抄，八人亦遂照常辦事如初。此信所中說，摺旨發下之後「始照常辦事，言笑如初」，而據十二札中的第一札，尚有「怡等笑聲徹遠近」之語，可知此一回合更爲驚駭險惡的政爭密謀，早已在暗中進行了。

「守墨道人」在原信中說，「昔人云，蠹氏之鬨，萌於駿乘，吾謂諸公之禍肇於擱車矣」。此雖爲旁觀者之言，所見却極爲清楚。只是，考之

當時事實，政變之肇端，並不由此事而起，此則是身處局外者所不能瞭解的。

清人薛福成撰寫咸豐十一年「辛酉政變」的歷史考證，頗以爲恭王奕訢在後來幫助慈禧發動政變，一舉而廢黜顧命八大臣，並明頒皇太后垂簾聽政之旨，完全推翻咸豐生前所作的政權行使安排，其動機卽由於慈禧不堪顧命八人的抗命而起。涵芬樓所藏有關端肅遺事的十二密札，第七札係署名「樵客」者致與署名「黃螺主人」者，發信日期爲九月一日，起首卽云：「恭邸今日大早到」。若以此信所記恭王到熱河的日期與前述政爭發生時間相參看，自八月十二日至九月一日，中間相隔十七、八日之久。若是恭王到熱河的日期果爲九月一日，則恭王之來，便很有可能是出於慈禧的招致了。按，王闓運所撰的祺祥故事中，亦頗有相似的記述，引敍如下：

「於是軍機三日不視事。孝貞問，則對以前摺未盡下。於是孝貞涕泣自起，檢奏與之。越日大臨，后見醇王福晉而泣。醇王福晉，孝欽妹也，孝貞亦妹之，故相親善，訴其事曰：『欺我至此，我家獨無人在乎？』福晉言：『七爺在此。』孝貞喜，曰：『可令明晨入見。』及明，醇王入直廬，肅順訪問何爲？對曰召見。肅順咂曰：『焉有此？』斥令退。王退立外階。俄宮監來窺直房，旋去，而軍機至晏竟不叫起。叫起者，召見分班，一見則一起，軍機則皆同入，爲頭起。此日不召頭起，先召醇王。宮監來窺者三，終不見醇王。至三至，乃自語曰：『七爺何不來？』醇王在外聞之，卽應曰：『待久矣。』遂引王入。肅順在內坐，不能阻。既對，孝貞訴如前。醇王言：此非恭王不辦。后卽令往召恭王。醇王受命，馳還京，三日，

與恭王至●……」

如果王闓運祺祥故事所記不差，則慈禧因爲顧命八人發生政爭而召來恭王謀行政變，此往召之人，卽是恭王之弟醇郡王奕譞了。但這一段記事與薛福成庸庵筆記同樣有一極大的錯誤，卽是八月十二日政爭以後的事，而是八月十二日政爭發生之前的事。由於此一錯誤，遂使後人對於這一事實的瞭解，完全走入了錯誤的境地。

史學家吳相湘先生撰「王湘綺錄祺祥故事正誤」，曾引翁同龢日記及咸豐十一年的內奏事檔爲證，考明端華肅順遺摹十二札中的第七札——樵客致黃螺主人札的發信日期，乃是咸豐十一年的八月初一日而非九月一日。因爲此信的第一句就說，「恭邸今日大早到」，所以恭王到熱河的日期，亦應該是八月初一日而非九月初一日，其說甚是。其實則恭王到達熱河的日期是八月初一日，原信中就有明白的證據，殊不必費力從翁同龢日記及奏事檔中去探索，試爲論之如下。

密函第七札●「恭邸今日大早到，適趕上殷奠禮，伏地大慟，聲徹殿陛，旁人無不下淚。蓋自十七以後，未聞有如此傷心者。」此函所云，恭王到達熱河時適爲咸豐死後的殷奠之期，則查考殷奠之期在何日，便可知恭王何日到熱河了。同治東華錄卷一，有關于此方面的記述，云●

「咸豐十一年八月癸卯朔，上詣大行皇帝几筵前，行殷奠禮。」

八月朔日卽八月初一，此日爲咸豐死後的殷奠禮舉行之期，與樵客所記內容相合，可知「九

月一日」乃「八月一日」之誤。按，此函亦曾爲吳慶坻收入他所撰著的「蕉廊脞錄」之中，發信日期作八月一日，不知涵芬樓在刊佈這批密札時，何以將日期寫作九月一日，以致爲後來的史家帶來如許困擾。這八月與九月之間的差別，雖祇一字之差，其間的出入可就大了。因爲慈禧與顧命八人發生爭執在八月十二，如恭王之來熱河在後，當然與慈禧之招致有關。但恭王之來，其實乃是小叔爲寡嫂「料理家務」的心理了。（由祺祥故事所記慈安太后對醇王福晉語，恭王之應召前來熱河，可以看作是「料理家務」，除去抗命不服之「奴才下人」。）按，咸豐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其時尚無政爭發生，則恭王之協助慈禧發動政變，其動機便不會是出于替慈禧「料理家務」一的關係甚大。此年的九月三十日，兩宮皇太后與幼帝載淳由熱河返抵北京，召見恭王奕訢及大學士桂良、周祖培、賈楨、侍郎文祥等一班留京大臣，歷數肅順等跋扈抗命諸罪狀，即時決定罷免顧命八人的贊襄政務大臣職務。第二日，恭王入軍機直廬候召見，昨日已有罷斥伊等贊襄大臣之旨，而恭王則已預行布置侍衞人員，待有旨將載垣端華肅順等三人革去爵位拏交宗人府，立命侍衞將二人擒下交送宗人府，同時另派睿親王仁壽及醇郡王奕譞馳往擒囘亦交宗人府。這就是造成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局面的「辛酉政變」，自密雲，在途中將肅順開始以至結束，首尾不過兩天。這一場政變在清代歷史上的影響極爲深遠，如非事先早有周密的布置安排，事實上不可能在皇太后及幼帝囘到北京的當天，就能將罷斥八顧命大臣及改變政體的

重大決策，在極短時間之內就排除了反對方面的一切阻力，迅速地作成周詳完密的決定。更因在政變之後，恭王以議政王領袖軍機的身份執掌國政，更可知道此一政變之發生，實出于慈禧與恭王的密謀安排，故能于還京之時，即在俄頃之間作成決定。然則恭王的熱河之行，顯然便是他與慈禧達成協議，並商定政變密謀之時了。在此也就連帶地引出了一個問題——既然皇太后與八顧命大臣之間此時尚未因意見不協而發生政爭，垂簾而兼輔政的形式，在當時又頗能順應時勢而恆服人心，那麼，恭王與慈禧爲什麼又要亟亟以罷黜八顧命大臣爲急務，必欲易輔政爲垂簾的局面呢？還個問題所牽涉到的，便是慈禧與恭王的政治野心與權力慾望了。

恭親王奕訢自咸豐五年七月退出軍機，直到咸豐十一年七月奕訢在熱河病故，前後歷時八年，一直未能與聞國家的決策大計。像他這樣一個自負聰明才智，而又希望有所作爲的人，當然不甘心長時期處於淡泊寂寞。至於慈禧，在咸豐未死之前，就早已看出她將是一個難於制馭而好怙勢弄權的人。而在前引端肅遺事諸密札中，亦已明明有人說到，慈禧必欲垂簾聽政，只有慈安知道事機尚未成熟，力主暫時妥協。可知由輔政之變爲垂簾而兼輔政，然後又欲由垂簾而兼輔政的局面，必欲再變爲完全垂簾，皆是慈禧一人在那裏出花樣，拿主意，慈安太后不過是爲她所利用的幌子而已。

既然慈禧在咸豐晏駕之後就想以皇太后的身份垂簾聽政，而肅順又是她務欲殺之而後快的大仇，那麼，她之主謀勾結奕訢，利用奕訢與八顧命大臣之間的敵視態度發動政變，當然便是很可

能的事了。她們之間的協議，在慈禧一方面，當然是變輔政爲垂簾的政體改變；在奕訢方面，慈禧必曾以授予實際政權的條件作爲交換，否則奕訢當不致如此熱心爲她出力效勞。政變成功之後，奕訢被授爲「議政王」，食親王雙俸，其生母康慈皇太后特予加上尊謚及升祔太廟，其長女被賞封爲固倫公主，視同中宮皇太后所生。凡此異常之恩寵，均於咸豐十一年十月以後的一兩個月之間，先後以皇帝的上諭形式見諸施行，其作用顯然在酬庸政變之功。這也就是更明白的證據，說明慈禧之勾結奕訢，正是辛酉政變發生的主要原因。但慈禧與奕訢雖爲此一政變之主謀，若無在京王大臣之全力支持，要想發動政變以推翻咸豐臨死以前所作的政權行使安排，仍然會有極大的困難。此不但因咸豐的遺命難以顯然違背，而母后臨朝，更是清代歷朝皇帝所視爲大忌之事，雖有慈安慈禧二人之意旨，仍難得朝臣之完全支持也。在這種情形之下，奕訢在傳達太后意旨之後，自大學士桂良、周祖培以下的一班在京王大臣，居然都樂於遵奉行事，這裏面的道理何在？倒也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

辛酉政變的失敗一方是顧命八大臣，其領袖人物是肅順。要瞭解這個問題，當先從研究肅順這個人入手。

肅順在後來是被指爲奸臣的人物。據清史肅順傳所記，肅順恃咸豐恩寵，與其兄鄭王端華及怡王載垣相互結納，務爲攬權立威，排斥異己之事。因之數興大獄，以致廷臣咸側目，輿論久不平。辛酉政變之後，肅順則被處斬。「就刑時，道旁觀者爭擲瓦礫，都人稱快」

云。凡此記述，因爲是出于政變勝利一方的手筆，免不了政治恩怨的影響，因此不能視爲眞實的信史。但由「廷臣咸側目」一事看來，肅順當時，或曾因某種革新措施過于激烈之故，招致朝中頑固守舊份子之不滿。滿清野史續編第十三種「奴才小史」，有關于肅順的如下一段記載，說：

「肅順秉政時，待各署司官，眦睚暴戾，如奴隸若。然惟待滿員則然，待漢員頗極謙恭。嘗謂人曰：『咱們旗人渾蛋多，懂得什麼？漢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支筆厲害得很。』故其受賄，亦只受旗人，不受漢人也。漢人中有才學者，必羅而致之，或爲羽翼，或爲心腹。如匡源、陳孚恩、高心夔，皆素所心折者；曾國藩胡林翼之得握兵柄，亦皆肅順主之。惟最不理於人口者，則咸豐戊午順天科場案發，柏葰以宰輔主試，竟遭刑戮，實肅順一人有以致之也。刑部定案後，行刑之日，各犯官皆赴菜市口，候駕帖一到卽行刑。是日柏葰照例冠摘纓冠，衣玄色外褂，同赴市口，先向闕謝恩，同候駕帖。時謂其子曰：『皇上必有恩典，我一下來，卽赴夕照寺候部文起解，爾回家，速將長途應用之物趕緊送來。』蓋向來一二品大員臨刑時，或有格外恩典，柏意謂非新疆卽軍臺，故云至夕照寺候起解也。乃言甫畢，見刑部尚書趙光一路痛哭而來，尚書蓋在內廷候駕帖者。柏一見，云：『完了，完了，皇上斷不肯如此，此必肅六從中作祟。我死不足惜，肅六他日，亦必同我一樣』，云云。聞是日趙光候駕帖時，文宗持硃筆頗遲疑，並云：『罪無可原。』肅順在旁對曰：『雖屬情有可原，究竟罪無可逭。』上意猶未決，肅順卽奪硃筆代書之。趙光一見，卽痛哭出宣武門矣。」

這段話有兩處地方很可注意。一是肅順之斥責旗人而敬禮漢人，可知當時必有很多旗人痛恨他。二是大學士柏葰之獄本爲肅順所一手促成，欲置柏葰於死地而後當行刑之日，咸豐有意從寬免其一死，而肅順必

清朝野史大觀中一條云：「肅順極喜延攬人才，邸中客常滿，如陳孚恩、匡源、焦佑瀛、黃宗源等，皆肅所胡塗不通，不能爲國家出力，惟知要錢耳。故其待滿人不如其待漢人之厚，滿人深惡之。」這一條與前引奴才小史的內容頗相似，但此云肅順不喜滿人之惡肅順，事實上恐尚不僅因肅順之不喜滿人而然。清史肅順傳中說：「肅順攬權立威，數興大獄，與論久不平。奏減八旗俸餉，尤府怨。」旗人即滿人。其生計，則其怨恨之情，必非泛常者可比。這兩種情形，構成了甚多旗人對肅順切齒痛恨的旗人痛快的人當中，必定就有因本身利害關係而對肅順之所以如此作，究竟是爲公爲私？更不能分得清楚，肅順之倒臺，乃是因爲堅守「祖宗成法」與文宗「遺訓」之故，而被慈禧視爲眼中之釘，不拔不快。然則同看熱鬧，並向之拋擲瓦礫以發被處斬之時出來「意」了。這是第一點當注意的地方。

柏葰之獄，起因於考試舞弊。清代的科舉考試號稱至大至公，而自乾隆嘉慶以來，就已弊端

叢生，至道光咸豐以後而更甚。其中最大的弊竇，卽爲「關節」。咸豐八年戊午科順天鄉試，大學士柏葰充主考。風聞在考試尚未舉行之前，應試舉人就已紛紛各尋門路，暗通關節。當時所通行的方法，是「遞條子」。何謂條子？薛福成庸盦筆記中曾有解釋，說：「條子者，截紙爲條，訂明詩文某處所用之字以爲記驗。凡與考官房官熟識者，皆可呈遞，或輾轉相託而遞之。房考官入場，凡意所欲取者，憑條索之，百不失一。」薛福成對此曾有極深的嘅嘆，說：「蓋自條子興，而糊名易書，本是試舞弊的方法。「糊名」之法使閱卷者不能知道此卷是何人所作，「易書」之法則是在考生交卷之時，另由考場專雇的謄錄人將考卷重抄一遍，那就連考生的筆跡也認不出來了。然而自有條子之法暗通關節，俗語所謂「錢到公事辦，火到猪頭爛」的說法，就一點都不錯了。通了關節的人，卽使文義惡劣，亦有取中的機會；不通關節，則一旦關額滿，卽使文章美若珠璣，也必定有滄海遺珠之憾。關節之弊竇如此，自然足以屈抑眞才而使科舉考試失去公平競爭的精神。而自乾隆嘉慶以來，此風日盛，主試之人，皆視爲當然，所影響及於政治社會者，就不是小事了。柏葰之獄，適起于肅順當權之時。爲了整肅官常及消滅貪污風氣起見，他建議皇帝從嚴懲辦，甚至不惜以處死一個位高望重的當朝宰輔，以爲嚇阻其他貪官污吏之用，其用心不可謂之不善。而時論必以皇帝有意從寬而肅順一力主殺之說，來作爲肅順的主要罪狀，無寧也是很不公平的。

花隨人聖盦摭憶的作者黃濬，曾經根據清史肅順傳及其他有關資料的記載，竭力爲肅順辯護，以爲「肅順治事之猛，識別之精，不避權貴，尤不顧八旗貴胄，故宗室旗人，恨之尤甚。其實史傳之所謂功者，固灼然爲功；而所謂罪者，又何莫非守法律、繩貪懦之善政乎？」這些話對肅順一生事蹟之批評，可說極爲中肯。但成爲問題的是，肅順所生的時代，乃是泄沓成習而貪汚成風的清代末葉，其時政治風氣的錮習已深，肅順欲以猛烈的殺戮手段加以矯正，自難免遭致同時在朝的八旗貴胄及滿漢官吏之反對。咸豐信重肅順甚專，當咸豐在位時，這種反對派的力量處於被壓制的地位，無法抬得起頭來。却不料朝局發生變革，肅順的新主人，換了一個與他處於敵對地位的慈禧太后，這些反對勢力既能有適當機會容許他們對肅順行使報復，又怎肯坐失這千載一時的大好機會呢？因此，當周祖培、桂良等一班留京王大臣在奕訢轉達之下，得悉兩宮皇太后意在垂簾聽政，而垂簾聽政所必須除去的作梗之人，又正是以肅順爲首的八顧命大臣時，他們當然樂於從命，即使明知此事有違「祖宗遺訓」與「先帝遺命」，亦在所不顧。更何況事成之後，兩宮皇太后與他們處於利害一致的地位，他們的政治利益，必然會有更確實的保障，因此也更足以堅定他們對此事的興趣與信心。政治上的事，往往只講恩怨利害而不顧是非公理，說來實在可嘆。然而，影響及於晚清五十年的朝局變革，就在這種心理狀態之下在順利進行，最後並且見諸完成了，這豈不是更可嘆的事麼？

說到這裏，我們應當回過頭來，看看這一場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具有如此深遠影響的辛酉政

變，究竟是以什麼樣的形式上演的。

薛福成庸菴筆記卷一，「記咸豐季年三奸伏誅事」云：

「兩宮俟恭親王行後，即下回鑾京師之旨。三奸力阻之，謂皇上一孺子耳，如必欲回鑾，臣等不敢贊一辭。兩宮曰：『回京後設有意外，不與汝等相干。』立命備車駕。三奸又力阻，兩宮不允，乃議以九月二十三日派肅順護送梓宮回京，上恭送登輿後，先奉兩宮間道旋蹕，載垣、端華皆扈從。」

上文所說的「三奸」，指八顧命大臣中的載垣、端華、與肅順。這一段話，說明兩宮皇太后在恭王離開熱河之後所採取的第一個步驟，是不顧肅順等人的反對，決定回鑾北京。肅順等雖爲贊襄政務王大臣，握持政柄，對于皇太后之決意帶同小皇帝回鑾京師之舉，却苦於無法阻止。這與王闓運祺祥故事中所說，「恭王至，軍機前輩也。至則遞牌入謁梓宮，因見后。后訴如前。恭王對：非還京不可」的話互相參看，可以知道恭王與兩宮太后商定的政變計劃，首先必需回京，然後方可置肅順等人於恭王的控制之下。肅順等人未能遏阻皇帝與太后之回京，顯然在一開始便落入了對方的預謀計劃之中。而肅順護梓宮，端華與載垣則扈從皇帝及太后，三個人分作了兩路，作爲三人小組之靈魂的肅順，又因靈車的行程緩慢而落在車駕的後面，形勢更見不利，然而他們却未曾覺察到其中的作用。這以後，庸菴筆記即記述留京大學士周祖培、賈楨與尚書沈兆霖、趙光等人所聯名奏上的一疏，援漢晉宋遼以來的垂簾故事，敦請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以免

大權無所專屬，而致人心驚疑，文長不錄。此疏奏上的日期，恰在車駕已離熱河之後，兩宮太后及皇帝一到北京，便可據以行事，而肅順等三人分爲兩路，肅法及時商議應付對策，在時間上最爲合宜。此後的記述，是：

「十月朔，車駕至京師。將至之日，諸大臣皆循例郊迎。兩宮對大臣涕泣縷述三奸欺罔之狀。周祖培奏曰：『何不重治其罪？』皇太后曰：『祖培對曰：『彼爲贊襄王大臣，可徑予治罪乎？』太后曰：『善。』乃詔解贊襄王大臣八人之任，以恭親王奕訢爲議政王，從民望也。垂簾典禮，令在廷大小臣工集議以聞。先召見議政王大臣，上南面稍東席地坐，兩宮亦南面坐稍北。皇太后面諭三奸跋扈諸不法狀，且泣下。上顧恩，卽斫頭可也，請勿悲。』遂與王大臣密定計，卽另派大學士桂良、侍郎文祥、右侍郎寶鋆、鴻臚寺少卿曹毓瑛爲軍機大臣。」

這一段話，說明了兩宮皇太后甫抵北京，便乘留京王大臣循例郊迎的機會，立決大計。其內容分爲三點，第一，降旨罷斥顧命八大臣的贊襄政務王大臣之職，褫奪其所握政權；第二，決定了垂簾聽政之制；第三，任奕訢爲議政王，由他負責組成新的軍機處。

這是兩宮太后與恭王發動政變的第二步驟，成立新的行政中樞以執行垂簾聽政的意旨。此一舉措，由於有在京王大臣的擁護而得以順利遂行。至此，以肅順爲首的顧命八大臣，顯然已註定了失敗的命運，然而他們却並不知道。薛文記此，續云：

「初二日，恭親王率周祖培文祥等入朝待命。載垣等已先至，尚未知解任之信。蓋三奸解任之旨及召見王大臣等，已在初一日之申酉間特命辦事處勿知會怡鄭二王，故二王皆不知，然已微有所聞，見恭親王等，則大言曰：『外廷臣子，何得擅入？』王答以有詔，復以不應召見呵止王。王遜謝，却立宮門外。俄詔下，命恭親王將載垣、端華、肅順革去爵職，拿交宗人府，會同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嚴行議罪。王捧詔宣示，載垣端華二人厲聲曰：『我輩未入，詔從何來？』王命擒出，復呵曰：『誰敢者！』已有侍衞數人來前，褫二人冠帶，擁出隆宗門，尚顧索肩輿及從人等。或告已驅散矣，遂踉蹌擁至宗人府，幽之。肅順方護送梓宮，次於密雲，逮者至，遂械至京，亦繫宗人府。」

清代自雍正以後，政權漸移至軍機處。舉凡一應國家大政及重要人員的黜陟進退，皆由軍機處承旨擬稿，然後以皇帝的名義頒發上諭行之。顧命八大臣之中，有四人是軍機大臣，亦即是掌握行政中樞的宰輔大臣。唐朝的制度，皇帝聖旨，必須經由中書門下二省的簽署，方得以詔書名義頒發。所謂「不經鳳閣鸞臺，何謂聖旨？」所指即此。清朝中葉以後的情形，亦與此相彷彿。皇帝的聖旨，從沒有不經由軍機處的擬呈而直接發出的。端華與載垣不知道恭王在前一天已經組成了以他爲首的新軍機處，猶以爲我尚未入軍機處上直，就不可能出現對我不利的詔旨，簡直可說是昏憒糊塗已極，不敗何待？情勢發展到了此一地步，顧命八大臣所憑以與兩宮皇太后抗逆顏行的政權已被剝奪，雖然他們確有咸豐皇帝臨終授命的旨意可憑，然而死的皇帝敵不過活的太

后，更何況溫和派與守舊派都已甘心歸附太后，肅順等人所領導的改革派孤立無援，事實上亦非失敗不可。一場關係中國近代歷史極爲深遠的辛酉政變，至此落幕。咸豐身爲皇帝，却無法防止他的小老婆在他死了之後竊奪政權，實在是十分可悲的事。然而，這又能怪得了誰呢？

檢討此一局面的出現原因，其中的關鍵性因素甚多。第一當然是道光之誤以咸豐爲嗣，乃是造成此後一切錯誤之根本。其次是咸豐之不知以國事爲重，酒色自戕，造成了他的短命早死，也造成了慈禧得以乘機出頭的機會。第三就是咸豐之疏遠奕訢，使得慈禧在意圖藉垂簾之名竊奪政權時，得以利用奕訢以打擊其政敵，初步達到其專恣弄權之目的。至於慈禧，則天生是一個權力慾望極強的女人，其政治手腕之高明，在當時更幾乎沒有敵手。這樣的一個危險人物，咸豐在位時既然當斷不斷，未曾早爲採取防範措施，一旦咸豐早死，政治上既然沒有更大的權力可以對她發生壓制作用，又如何能阻止得了她以皇太后之尊出面干涉朝政呢？以上的這些關鍵性影響因素，關係於咸豐一身的，最大而且最多。所以我們也很可以這樣說，由于咸豐之自悞而且悞國，機會使慈禧以皇太后的身份掌握實際政權達四十餘年之久。然則咸豐一身所關係於中國近代歷史的命運，當然也就太大了。

自咸豐辛酉政變，中國出現了新的皇太后垂簾聽政局面以後，滿清政府的實際政權，就落入了慈禧之手。此後歷同治一朝十三年，光緒一朝三十四年，直到光緒三十四年十月，慈禧與光緒先後賓天爲止，慈禧主宰中國政治的時間，一共有四十七年之久。雖然這其間也有同治親政與光

緒親政的兩段時間，曾使慈禧暫時交還政權，但一則其時間甚爲短暫，二則慈禧始終未曾完全放棄她的政治權力，所以她在政治上的主宰地位也始終是隱然存在的。由于此一緣故，我們也很可以說，晚清五十年的中國歷史，始終是在慈禧支配之下的。

在滿清二百七十餘年的歷史中，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可稱盛世。這三朝的皇帝，在清代歷史上都有赫赫的聲名。慈禧以母后臨朝，歷時將五十年，在清代歷史上也赫赫有名。在她的統治之下，中國由一度頗有希望的中興局面，日益走向衰破沒落，終且淪爲西方列強的次殖民地。所以，慈禧當政的五十年，在清代歷史上——只是此赫赫之名由衰破沒落而來，比諸康熙雍正乾隆之盛世，恰爲强烈之對比，如此而已。

在慈禧統治之下的晚清五十年，何以會由最初頗有希望的中興局面，日益走向衰破沒落呢？要瞭解這個問題，就得由她當政以後的一切重大舉措談起。

概括一點說，慈禧當政的前後五十年，約略可以區分爲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起自辛酉政變以後，歷同治一朝而至光緒十年。在這一時期內，恭王爲軍機領袖。其初政局頗有清明氣象，其後漸見偷惰苟安，於是乃有光緒十年的朝局變革，恭王出軍機，軍機亦全班盡撤，代之者乃禮親王世鐸。第二個時期起自光緒十年的恭王退出軍機，以至光緒二十六年的庚子拳亂，中歷甲申年的中法越南之戰，甲午年的中日戰爭，戊戌政變，以至由義和團所召致的八國聯軍之役。在此一時期內出領軍機的王大臣，初爲禮王，後爲榮祿。禮王其實是醇王奕譞與榮祿二

人均爲慈禧所驅策使令之人，均不足以匡正慈禧的錯謬措施，所以中國的開明知識份子在國家迭遭屈辱挫敗之餘，雖欲藉自强維新運動以資振作，亦以不能見容於慈禧之故，而慘遭殘酷的壓制，終且因仇視洋人而將中國帶上與舉世列强爲敵的危險道路，幾導致亡國之禍。第三個時期起自辛丑回鑾，迄於光緒末年慈禧之死。在此一時期之內，榮祿已死，貪污無能之慶王奕劻繼見柄用，因之清代的政治急速趨向貪污腐化。政以賄成，貪黷者嚮用而梗直者遭黜，因之袁世凱得以運用財賄伸張其權勢。到了慈禧身死之後，小醇王載灃監國，除了袁黨人物以外，舉朝皆是庸懦無能之輩，無一人可與袁世凱相抗衡。武昌革命事起，袁世凱乘機取得政權，而滿清亡於袁世凱之手矣。以這三個時期所經歷的時間而論，第一個時期歷時二十三年，第二個時期減至十六年，第三個時期則更只有短短的八年。這三個時期的歷史久暫，恰與晚清中國的國運由復興而走向衰微，由衰微而趨於沒落的過程相同，其進行的速度亦相同。所代表的意義，即是慈禧的統治能力，愈到後來，愈顯得是梗短汲深，肆應無力，所以整個政治局勢愈變愈糟，如治絲之益棼，不至完全瓦解不止。但在這整個五十年中，慈禧個人的治事能力，只能因經驗之積累而日見增進，決非因年紀之老邁而顯見退化，然則她在第一時期內之所以表現頗爲不惡，正是由於別的原因使然了。此一別的原因是什麼？檢討起來，正應當歸功於恭王奕訢與慈安皇太后之同心謀國，協力維持之故。

咸豐十一年十月的辛酉政變，達成了慈禧以皇太后身份干預朝政之目的。但此時以皇

參垂簾聽政的，除了慈禧，尚有以同治嫡母稱爲慈安皇太后的鈕祜祿氏在；時稱之爲東太后，以別於亦稱爲西太后的慈禧。慈禧與慈安雖同爲皇太后，以在咸豐朝的地位而言，慈安係皇后，慈禧係貴妃，此亦與人家妻妾之分嫡庶，慈禧雖因係皇帝生母之故而得爲太后，在地位上仍應遜慈安一步。假如慈安亦如慈禧一樣，是一個精明强幹的女人，那麼，這兩個同爲皇太后的嫡庶二母，勢必會有一番權力鬪爭發生。在這種情形之下，身爲政府領袖的恭親王奕訢必難免要有左右祖。以名分而言，慈安係奕訢之嫡嫂，兼之性情寬厚，奕訢也必然容易與之合作。然則慈安與慈禧二人之間如有權力鬪爭，慈安因能取得奕訢合作之故，必定較易得到勝利，則慈禧欲圖攬取政治實權，恐怕亦不一定能够遂願。然而慈安太后不但性情寬厚，其處事才能亦遠不及慈禧，兼因其凡事不樂與人爭執而言詞木訥，於是使得一人間的關係，由最初期的推誠合作，逐漸演變爲慈安之凡事退讓，而慈禧則遇事包攬。因之，漸到後來的情形是，慈禧在政治上的權力與影響與日俱增，慈安則相反地日見退縮。這種情形，首先破壞了兩宮太后與恭親王所共同維持的政治安定，最後更因慈安之暴死而使慈禧獨攬政柄，終於連奕訢亦被削奪政權，逐出軍機，而大權全歸於慈禧一人。再以後，便是慈禧皇太后獨裁專制的時代了。

奕訢在清史上頗著賢聲。他在辛酉政變後出任政府領袖：與當時的軍機大臣文祥、賓鋆及後進軍機的沈桂芬等人同心輔政，朝局一新。在用人行政方面，他頗能繼續肅順的遺規，重用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漢人，並賦予適當的權力。所以在同治一朝之間，太平天國、捻亂及陝甘

回亂等內部叛亂均先後削平，舉國喁望太平，一時亦頗有中興之象。清史諸王列傳對恭親王評，贊語中說他：「綢繆官府，定亂綏疆，罷不生懟，用不辭勞，有純臣之度。」可是沒有中興一個忠勤賢能的近支親王出任政府領袖，當時的同治皇帝雖然年幼，只要垂簾聽政的皇太后對奕訢始終尊禮信任，清朝的國運，未始不有再振的希望。但曾幾何時，不但恭親王的銳氣日見挫折，朝中亦出現了黨派傾軋的局面，國侵略接沓而來，國事日非，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聲望與地位也急遽下降，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黃濬所撰花隨人聖盦摭憶，有一段論恭親王的話，說：

「恭親王奕訢，爲同光間握政柄最久之親王，其舉措進退，有關於清社之運特大事者，一味貪婪之慶王不同，不可不記。恭親王之生平，有兩大事，三見黜，俱極有關係。兩爲英法聯軍之役，怡親王載垣佯與英法議和，而忽執法國公使巴夏禮，與戰。戰不利，而自請議處。此一大事，則爲與兩后定計，殺端華、載垣、肅順，詳已見前。三見黜者，一爲同治四年三月，兩太后諭責王信任親戚，內廷召對，時有不檢，罷議政王及一切職任。尋以惇親王奕誴、醇郡王奕譞、及通政使王拯、給事中廣誠等奏請任用，廣誠語尤切，兩太后命仍在內廷行走，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入謝，痛哭引咎。兩太后復諭：王親信重臣，相關休戚，期望既厚，責備不得不

嚴，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此卽湘綺所記蔡壽祺等事，揆其實際，殆西后小弄玄虛，意在褫其議政王一職，以恣所欲爲，非眞有仇隙也。二爲同治十二年正月穆宗親政，十三年七月上諭，責王召對失儀，降郡王，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並奪載澂貝勒。翌日，以兩太后命，復親王世襲及載澂爵。此爲穆宗之輕躁妄動，起訖才兩日。三爲光緒十年中法越南之役，王與軍機大臣不欲輕言戰，言路交章論劾，太后諭責王等委靡因循，罷軍機大臣，停雙俸，家居養疾。此次家居十年，至光緒二十年中日之役，始再起，至二十四年四月薨於位。綜計三黜中，以光緒十年甲申之出軍機，最爲有意義。」

恭親王奕訢之三遭黜責，首尾相去二十年。由于前後相隔的時間甚長，中間所歷的事故甚多，非簡單文字所能概括。今且據有關方面的記載分別敍述於下，然後再一一加以討論。

發生在同治四年的革去議政王及一切職任事，王闓運祺祥故事中曾有記述，云：

「恭之任事，委權督撫，朝政號爲清明。頗采外論，擢用賢才能，特達者不爲遙制。然宮監孌索，親王密邇，時有交接，輒加犒賚，則不足於用。國制，王貝勒不親出納，俸給莊產，皆有典主者，率資侵以自給。及入樞廷，需索尤繁，王恆憂之。福晉父，故總督也，頗習外事，則以提門包爲充用常例。王試行之，而財足用。於是府中賕賂公行，珍貨猥積，流言頗聞，福晉亦患之，而不能止矣。王既被親用，每日朝，輒立談移晷。宮監進茗飲，兩宮必曰：『給六爺茶。』一日召對頗久，王立御案前，擧甌將飲，忽悟此御茶也，仍還置故處，兩宮哂焉，蓋是日偶忘命

茶。而孝欽御前監小安方有寵，多所宣索。王戒以國方艱難，宮中不宜求取。小安不服，曰：『所取爲何？』王一時不能答，卽曰：『如瓷器杯盤，照例每月供一分，計存者亦不少，何以更索？』小安曰：『往後不取矣。』明日進膳，則悉屏御瓷，盡用村店粗惡者。孝欽詗問，以六爺責言對。孝欽慍曰：『乃約束及我日食耶？』於時蔡御史聞之，疏劾王貪恣。他日詔王曰：『有人劾汝。』示以奏，王不謝，固問何人？孝欽言：『蔡壽祺。』王失聲曰：『蔡壽祺非好人。』於是后積前事，遂發怒，罪狀恭親王，有曖昧不明，難深述之語。舉朝大驚疑，而外國使臣亦詢軍機諸臣事所由。用是得解，復召見，王痛哭謝罪，復直如初。」

王闓運說，恭王因被太監安得海所譎構，以致慈禧心中久懷不滿，及至御史蔡壽祺參劾恭王貪墨恣肆，恭王又不自檢點，應對失態，以致觸發慈禧之新仇舊恨，乃有降旨罷黜議政王及軍機大臣事之舉，其說雖似可信，實際則尚未探及內中之隱情。吳相湘先生所撰的晚清宮廷實紀，曾將故宮博物院所藏同治四年罷黜恭王的慈禧親筆硃諭一件，製成圖版，弁於卷前。由此推測慈禧眞正用心，庶幾或可探出其中之內情。硃諭原文，別字連篇，不加改易，僅在錯字下註明不應寫錯的文字，錄載如下：

「諭在廷王大臣等同看。朕奉兩宮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據蔡壽祺奏，恭親王辦事徇情貪墨，驕盈攬權，多招物議，種種情形等弊。嗣（似）此重情，何以能辦公事？查辦雖無實據，是（事）出有因，究屬曖昧知（之）事，難以懸揣。恭親王從議政以來，妄自尊大，諸多狂放（

傲），以（倚）仗爵高權重，目無君上，看朕冲齡，諸多挾致（制），往往諳（暗）始（使）朕不可細問。每日召見，趾高氣揚，言語之間，許多取巧，滿口胡談亂道。嗣（似）此情形，姑免深究，方知朕寬大之恩以後何以能辦國事？若不卽（及）早宣示，朕歸（親）政之時，何以能用人行正（政）？嗣（似）此情形，不准干預公事，方是朕保全之至意。特諭。」

由慈禧親筆所寫的此一硃諭眞蹟，可以知道慈禧此時所加予奕訢的罪名有二。一是辦事徇情而貪污恣肆，雖屬查無實據，而事出有因。二是從議政以來，妄自尊大，狂傲挾制，目無君上，應對言詞，尤多胡言亂道。這兩項罪名中的第一項，出于蔡壽祺的參劾。因爲查無實據，只能以「曖昧難知」的說法，强加以莫須有的罪名。第二項罪名，則純出于慈禧之主觀觀念，亦正是奕訢爲慈禧所不滿的眞正原因所在。但所謂妄自尊大，狂傲挾制，暗使離間，胡言亂道等等，歸結起來，無非是恭親王遇事好自作主張，或是對慈禧的主張不肯事事接受之意。這種情形，若是兩宮太后對他能始終倚信而不加掣肘，則恭王的作法無寧正是負責盡職的表示，無可厚非。但目前的情形是，慈禧亦有其自己的主張，而遇事復好弄權力，那末，她對於恭王之不肯絕對服從其驅策而好自作主張，無疑便是「目無君上」與「狂傲挾制」了。由此可知，朱諭硃批以要被慈禧降旨罷黜，正是由于二人間的權力衝突，其醞釀已非一日，只是恭王未曾察覺而已。

安得海之讒構，加深了慈禧對奕訢之厭惡；蔡壽祺之參劾，與奕訢之應對失態，恰好給予慈禧借

此予以嚴譴之藉口。由於這些緣故，乃造成了同治四年三月恭親王的初度蹉跌。此事後來雖然由于在廷王大臣之竭力諫爭而由兩宮太后降旨寬免，恭王亦獲准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其眞正原因，亦是由於慈禧當時尚無法以一人對抗舉朝的反對力量，不得不藉此轉圜之故。另一方面，則慈安太后不願因此而失去一個可以倚信之人，亦是奕訢不致一蹶不起的另一個主要原因。但因爲有此一事，已可使奕訢意識到慈禧之手段厲害，在以後的應對與行事方面，必需要凡事小心，以免再觸忌諱。王闓運運祺祥故事說：「恭王自是益謹」，此當是事實。然而，影響及於實際政治上的，就是很不利於國家大政的了。

關於奕訢如何因行事小心而致影響及於國家大政的問題，留待後面再說。現在且續記奕訢生平的第二次見黜——同治十二年正月，穆宗降奕訢爲郡王，並將奕訢之子載澂亦一併革去貝勒之事。

清朝野史大觀卷一「清宮遺聞」，「恭忠親王諫復建圓明園」一條云：●

「圓明園起於雍正朝，事成於乾隆，宏敞壯麗冠中國。清制，宮中祖制嚴，興居有時，飲食服御有常度，帝恒苦之，時巡幸熱河。林清變後，則罕幸熱河，而常駐園，后暨妃嬪皇子悉侍焉。咸豐末年，英法聯軍入京，內閣中書龔自珍之子龔橙，導之燬園。穆宗御極，洪金田事敗，張樂行賴汶光先後斃，內外頌承平。慈禧穆宗思所以爲樂者，於是重建圓明園之說起。時交涉日棘，庫無儲蓄，諫言不行，恭忠親王坦然力爭之。一日，叩宮門請見。穆宗知爲園事也，曰：『

亦來爲阻建園乎？朕志已決，亦何必拂太后意？（太后謂慈禧）且朕居彼，與爾等討論國事，亦甚便。』恭王叩首言：『當今內患雖平，外難日亟，庫藏無存蓄。圓明園憲、純兩廟所修，當時財力遠過今日。且純廟諭旨，後世子孫勿得踵事華飾。今建園簡陋，無以備翠華之臨幸，復舊則國帑不足。以某之愚，不若少緩便。』穆宗默然良久，臥榻上。王更言祖制不可失，歷數所以訓儉者。時穆宗好著黑色衣，謂曰：『爾熟祖訓，於朕事尚有說乎？』王曰：『帝此衣卽非祖制也。』（宮中制色衣無黑黑色）因誠穆宗勿微行，引白龍余且事釋之。穆宗曰：『朕此衣同戴澈一色，爾乃不誠澈，而來諫朕！爾姑退，朕有後命。』旋召大學士文祥入，且坐正殿，曰：『朕有旨，勿展視，下與軍機公閱，速行之。』文祥知其怒，拆視則殺王詔也。文祥碰頭再三請，終不懌。文祥退，叩太后宮泣訴之。太后曰：『爾勿言，將詔與予。』殺王之事乃寢。」

這一段話，敍恭親王因諫阻修復圓明園一事，爲穆宗所惡，所記頗爲詳盡。但其後並非降奕訢爲郡王，並革去載澈之貝勒，而乃是降手詔欲將奕訢處死，賴文祥叩訴於慈禧太后，將所降詔收去而得免，其內容頗不合當時實情。關於這方面的情形，又以桐城吳汝綸日記所記的最爲正確，亦轉錄於後，以資比看。

桐城吳汝綸先生日記，同治十三年九月五日記云：

一見都下某官與某中丞書，言停罷園工之事云：七月十八日，政府親臣，聞大內將於二十日園中演戲，十餘人聯銜陳疏。復慮閱之不盡，乃先請召見。不許，再三而後可。疏上，閱未數

行，便云：『我停工何如？爾等尙何嘵舌？』恭邸云：『某所奏尙多，不止園工一事，請容臣宣誦。』遂將摺中所陳，逐條讀講，反覆指陳。上大怒，曰：『此位讓爾，何如？』文相伏地一慟，情急幾絕，乃命先行扶出。醇邸續復切諫，至微行一條，堅問『何從傳聞』？醇邸指實時地，乃怫然語塞，傳旨停工。至二十七日，召見醇邸，適赴南苑驗礮。復召恭邸，復詢微行一事，聞自何人？恭邸以臣子載澂對，故遷怒恭邸，並罪載澂也。又某樞言：『二十七日原旨中，有跋扈弄權，欺朕年幼，著革去一切差使，降爲庶人，交宗人府嚴行管束』語。文相接旨，卽陳奉旨復奏，請暫閣一日，明日臣等有面奏要件。比入，犯顏力爭，故諭中有『加恩改爲』字樣。過午，九卿皆已退直，惟御前及翁傅。直入弘德殿，兩宮垂涕於上，皇上長跪於下，謂『十年以來，無恭邸何以有今日？皇上少未更事，昨諭著卽撤銷』，云云。」

這一段記載，因爲是得自京中官員的傳述，其內容當然要比野史之類爲可信。若與當時的官書記載相比較，則官書所諱言的部分（如兩宮傳見王大臣，皇帝長跪地上等），尤可於日記中見之，更可視爲翔實的信史了。黃濬論及此事，已曾指爲同治帝之輕躁妄動，與慈禧之蓄意罷黜奕譞次的被譴諸人中，尙包括有醇王奕譞在內，亦可知道其事非慈禧之本意。至于光緒十年甲申之黜退恭王，其情形就不一樣了。

前面曾經說過，最初是罷議政王，並一切差使俱皆革去。後因

在廷王大臣之極諫，兩宮太后難違公論，慈禧一人更不便堅持到底，故復降旨仍令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恭王入謝，則又仍令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其事權盡復，只是議政王的頭銜則未再恢復。這對于奕訢，是一個不小的打擊。昔人有所謂，「趙孟由我貴之，亦可由我賤之」，用在這裡作爲比喻，正甚適當。由此可使奕訢懍然有所警惕，知道議政王的頭銜雖然尊貴，而予奪之權操在人手，稍一不愼，就會遭遇不測之禍。自有這一次的經驗，奕訢開始意識到慈禧雖爲女流，其個性之剛毅堅强與手段之狠毒。則不可測度。爲了不希望再遭致類似的難堪與挫折，他必須更加寅畏小心，以免再觸慈禧之忌。於是，在此後的行事舉措上，便隨處可以看出恭王之遇事模稜而缺乏負責精神，與他在此以前之毅然擔當而直前不顧，大異其趣。關于這一點，可以在他的推行洋務運動一事上明白的看出來。

自從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被削平之後，清朝的士大夫與知識份子間，頗有人主張效法洋人的練兵製器之法，以爲自强維新之計。咸豐十一年辛酉政變之後恭王柄政，既奏准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爲對外交涉之用，又奏准設立同文館，招收生徒，肄習西學，以爲效法西人改革軍備及提高戰力的長遠打算。其後，李鴻章、左宗棠等一班中興名臣，先後在上海福州等地設立機器製造廠及造船廠，竭力提倡西法。恭親王因於同治五年之十一月，奏請在同文館內增設分館，招收舉人、貢生等較高級知識份子入學，肄習天文算學，以爲學習製造外國鎗炮輪船之本。這一主張假使能得順利通過，中國的全盤西化運動必可在此時肇其端倪。然而，由于守舊派知識分子的全

力反對，新成立的同文館只有寥寥數人前來應考，多數人則對之極爲藐視，甚至出於不屑的態度，假如恭親王在此時握有足够的權力可以壓制守舊派知識份子的反對，他們的態度或者不敢如此囂張；又假如慈禧能够給予恭親王充分的支持，恭親王亦不致依違兩難，徬徨不安。這是他在推行洋務運動方面所遭致的挫折，雖由于守舊派知識分子的阻力太大，亦因爲他無復當年的勇氣與決心，不敢力排衆議，全力貫澈其主張的退縮態度有以使然。光緒初年，李鴻章致郭嵩燾書云：

「西洋政教規模，弟雖未至其地，留心諮訪考察幾二十年，亦略聞梗概。自同治十三年海防議起，鴻章卽滙陳煤礦鐵礦必須開採，電線鐵路必應仿設，各海口必添洋學格致書館以造就人材。其時文相（指文祥）目笑存之，廷臣會議皆不置可否，王孝鳳于舫蓮獨痛詆之。曾記是年冬底赴京叩謁梓宮，謁晤恭邸，極陳鐵路利益。邸意亦以爲然，謂無人敢主持。復請乘間爲兩宮言之，渠謂兩宮亦不能定此大計。從此遂絕口不談矣。」

既然兩宮皇太后于自强維新之事「不能定此大計」，則正應委權責於能定大計之人，方是謀國之道。但因兩宮太后雖無定大計之才識與能力，却仍攬持權力，不肯輕易授人，而恭親王又深恐越權遭忌，不肯多作主張，於是對于國家前途具有如此重大影響的自强維新大計，終因無人爲之主張之故，而只好付之「絕口不談」，說來該是多麼可痛之事？然而，此亦正是慈禧多方打擊恭王，又復不肯賦予充分權力之結果。誰實爲之？孰令致之？回溯當年的這一段歷史，我們實在不能不爲清代中國的國運感到惋惜。

郭則澐所撰十朝詩乘卷二十，收有清人吳圭盦所作的「冢婦篇」及「小姑篇」各一，下附註釋，云：

「冢婦謂恭忠親王，小姑謂沈文定。恭邸當國久，春秋寖高，倚文定若左右手。文定厚貌深情，廉介自託，而大事難於匡正，故圭盦望湘陰入政府，助樞邸以整飭朝綱。」

此文中所說的「沈文定」，即沈桂芬；「湘陰」，則左宗棠。按，沈桂芬乃同治光緒間的軍機大臣，於同治六年以禮部侍郎入軍機，歷升至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仍在軍機，於光緒六年十二月病卒，在軍機大臣任上首尾凡十三年。沈桂芬在軍機，甚得恭王之倚信。其時文祥已前卒，沈桂芬以熟悉外國事情之故，遇事獻替可否，即慈禧亦深知其人之幹練有識。但因其處事過於愼重，故人多謂其謹飭有餘而難以匡正大事。吳圭盦之所以希望由左宗棠接沈桂芬之遺職，以期對恭王多所翼贊輔助，即此之故。其時之軍機大臣，多有若干朝士與之依附結託。沈桂芬是江蘇吳江人，附之者稱爲南黨；另一個漢軍機大臣李鴻藻籍貫直隸高陽，附之則稱爲北黨。南黨與北黨，在當時的政治上頗曾發生若干影響力量。尤其是在沈桂芬死後，江蘇常熟縣籍的翁同龢入軍機，繼爲南黨領袖，與李鴻藻不能相得，彼此隱相齮齕，所產生的後果就是很不好的。

胡思敬國聞備乘卷二，有一條記述李鴻藻的北黨人物，說：

「李鴻藻好收時譽，諸名士皆因之以起。光緒初年，臺諫詞垣，彈章迭上，號爲清流，實皆鴻藻主之。惟鄧承修，邊寶泉無所依倚。鴻藻每入見，凡承旨詢問事，不即對，輒叩頭曰：『容

[illegible]細恩」。退朝，即與諸名士密商。計既定，不日而言事者封章紛紛上矣。南皮張之洞、豐潤張佩綸，尤爲鴻藻所器重。……」

光緒初年，號爲清流黨的人物，以張之洞、張佩綸、宗室寶廷、黃體芳、鄧承修等最著名，彈擊人物，評騭時政，幾無虛日。他們之所以要這樣做，一方面固然由于目擊恭王所領導下的政府因循保守，雖處於外國列強的侵迫之下，仍然一味退縮苟安，不敢輕言主戰，因而感到極度的不滿，另一方面，亦由于李鴻藻在軍機處中居於劣勢地位，他自己的發言既然得不到恭王的重視，自然亦只好利用清流黨的力量來督促恭王力求振作。再從另一方面來說，慈禧雖然很討厭清流黨人的干涉國家大政，但她也深深知道，這是一種可以用來壓迫恭王的力量，所以她一方面雖然也在時時謀求對付清流黨人之法，一方面也希望暫時利用清流黨人的言論來讓恭王應付爲難。因爲，這時慈安太后已死，恭王已失掉了一個對他比較同情支持之人，而慈禧積多年以來對恭王的厭惡，此時亦已到了可以讓她放手幹去的時機。因此之故，恭王的處境，自然要愈來愈爲困難的了。慈安太后之死，清代野史中多有紀述，但其內容多涉於誇誕，頗不可信。比較中肯一點的，乃是胡思敬國聞備乘的紀載，引述如下：

「先是，文宗北狩得疾，知不起，察孝欽（即慈禧）悍鷙，異時抱子臨朝，恐不可制，欲效西漢鉤弋故事，未忍發，以遺詔密授孝貞（即慈安），令謹防之，即有過宣詔賜死，毋滯游移。同治初，誅鋤八大臣，賴孝欽剛斷以濟。孝貞仁賢，遇事咸推讓之。後聞其不謹，甚憂懼。一日，

東宮傳旨召西佛（宮人稱孝貞爲東佛，孝欽爲西佛），西佛嘻嘻而往。入門，見孝貞盛服珠襦，宮人佩刀森然侍立左右，大駭。孝貞指御案遺詔示之，默誦一過，伏地痛哭請死。孝貞曰：「汝斷，略責讓數言，下席引與同坐，勉以好語，隨取案上遺旨引火焚之，示毋他意。孝欽回至宮中，五日夜不寐。李蓮英進密謀，越數日，孝貞暴崩。廷臣入臨者，見十指俱紫黑，不敢言。李蓮英自此擅權，寵之終身。」

慈安之暴崩，事在光緒七年三月。自此以後，慈禧集兩宮之權於一身，凡事俱可獨斷獨行，不復再有其他的顧慮。情勢發展到了此一地步，恭王的地位，當然也就更加岌岌可危了。

慈禧與恭王之間的怨忿，由來已久。同治四年三月恭王初次被黜，雖然他本人不無過失，但衡情而論，究竟是功大過小。而且以一個秉持國政位居議政王之尊的近支親王，一旦有言官論列，即使罪狀不明，亦遽降罷黜之嚴旨，無論中外古今，可以說都沒有這樣的事例。所以恭王心中也十分明白，這無非是慈禧皇太后在那裡播弄是非，藉事生風而已。祇因誼屬君臣，尊卑有別，所以即使明知是慈禧在居中生事，亦只好徒呼負負。但事有湊巧，到了同治八年的七月間，慈禧派太監安得海駕坐船隻，由運河一路南下，欲往江南織辦龍衣錦緞。安得海雖爲慈禧之親信，依清代祖制，太監私出都門者，立斬。當時的山東巡撫丁寶楨，乃是一個硬直而廉介的人。安得海及其隨行員役等嚴密監視，一面具摺奏報。據說，當丁寶楨的奏摺遞送到京時，慈禧正在觀劇，並不知有此事。恭王即請晉見慈安，力言太監不得

出都門，祖訓昭垂，此非立卽正法不可。遂與慈安商定，擬諭旨發下山東，命丁寶楨迅速遴派幹員查拏，拏獲後卽審訊，立卽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飾。於是，慈禧身前甚得寵信而屢次藉事弄權的安得海，在慈禧毫無辦法可救的情形下，眼睜睜地看着他被恭王與丁寶楨用祖訓二字作爲招牌，就在山東被殺掉了。這在恭王而言，可說是對慈禧與安得海報復了當年的一箭之仇；但若由慈禧而言，對恭王更進一層的，則是光緒五年太監違禁携帶物品出宮，爲護軍攔阻，以致發生互毆的事件。黃濬花隨人聖盦摭憶紀此云：

「清代故事，凡殺之，賴大理寺少卿安憐而允之，立交刑部，並面諭兼尚書房行走之刑部尚書潘祖蔭，必擬以斬立決。時論大譁，右庶子張之洞，左庶子陳寶琛疏力爭之。祖蔭到署傳旨，訊得實情，護軍無罪。秋審處坐辦四員，提調四員，皆選自各司，最精於法律者也，時有八大聖人之稱，同謂：『交部卽應依法，倘太后必欲殺之，則自殺之耳，本部不敢與聞。』祖蔭尚正直，卽以司官之言覆奏。慈安轉告西后，乃大怒，力疾召見祖蔭，斥其無良心，潑辣哭叫，捶牀村罵。祖蔭囘署，對司官痛哭，於是曲法擬流。自是閹人携帶他人，隨意出入，概無門禁。迨慈安歿後，則刑部一聽閹人歸告西后，謂護軍則妹不顧復活。慈禧時見爾時對于法猶知尊重。當時西后遣閹至太平湖之舊醇王府。凡閹人出入，例由旁門，不得由正門，值日護軍依例阻之。閹恃勢用武，護軍不讓，閹人請慈安太后臨其宮，哭訴被人欺侮，謂不殺此護軍則妹不顧復活。慈禧時見爾時對于法猶知尊重。當時西后遣閹至太平湖之舊醇王府。凡閹人出入，例由旁門，不得由正門，值日護軍依例阻之。閹恃勢用武，護軍不讓，閹人請慈安太后臨其宮，哭訴被人欺侮，謂不殺此護軍則妹不顧復活。慈安憐而允之，立交刑部，並面諭兼尚書房行走之刑部尚書潘祖蔭，必擬以斬立決。時論大譁，右庶子張之洞，左庶子陳寶琛疏力爭之。祖蔭到署傳旨，訊得實情，護軍無罪。秋審處坐辦四員，提調四員，皆選自各司，最精於法律者也，時有八大聖人之稱，同謂：『交部卽應依法，倘太后必欲殺之，則自殺之耳，本部不敢與聞。』祖蔭尚正直，卽以司官之言覆奏。慈安轉告西后，乃大怒，力疾召見祖蔭，斥其無良心，潑辣哭叫，捶牀村罵。祖蔭囘署，對司官痛哭，於是曲法擬流。自是閹人携帶他人，隨意出入，概無門禁。迨慈安歿後，則刑部一聽

宮中嗾使。光緒二十九年，湖南沈北山入獄，時在夜半，宮中傳出片紙，天未明而明年，王照入獄，即居沈之屋，粉壩有黑紫暈迹，高至四五尺，沈血所濺也。獄卒有官來，太后傳諭，就獄中杖斃，令獄吏以病死報。沈體極壯，羣杖交下，偏身傷連擊兩三點鐘，氣始絕。」

黃濬的記述，說明了慈禧是敗壞清代司法制度的罪人。而據另一種記述，則在的爭執中，恭王亦會站在潘祖蔭的一方，因之更引起慈禧的極端憤恨。金梁清宮外錄云：

「一命下之日，盈廷騷然，張之洞陳寶琛且上封奏力言。恭王亦以爲不可，致后曰：『汝事事抗我，汝爲誰耶？』王曰：『臣是宣宗第六子。』太后曰：『我革了你！』王曰：『革了臣的皇子。』太后無以應。」

話雖然如此說，這畢竟還是慈安太后在世時的事。若是當時慈安已死，恐怕恭但總因爲二人之間的嫌隙已深，加上恭王在後來愈加變得因循保守，深爲輿情所不滿，於是慈禧頂撞了。遂因左庶子宗室盛昱之奏劾，一舉而將恭王奕訢及軍機四人全班罷斥，造成了清代末年繼辛酉政變之後的另一場重大政治變革。盛昱的原奏，在他自己所編的意園及光緒東華錄中亦均不載。近年以來，始因吳相湘先生的留心搜尋，得以在故宮檔案中發現。由於這一奏摺直接關係到軍機大臣的全班進退，對於清朝光緒十年以後的政局影響

甚大，有必要加以引錄，以資瞭解此奏的眞正內容及原來涵義如何。原奏的開頭部分如下：

「奏爲彊事敗壞，責有攸歸，請將軍機大臣交部嚴加議處，責令戴罪圖功，以補救事。竊越事失機，議者皆謂咎在雲南撫臣唐炯徐延旭坐誤事機，其罪固無可逭，而樞臣之蒙蔽、廣西撫臣徐延旭，現已奉旨拏問。奴才謂唐炯徐延旭坐誤事機，其罪固無可逭，而樞臣之蒙蔽，皇上陳之。……」

由這一段話，可知盛昱之參劾軍機處諸人，原是由於自恭王以次的諸軍機大臣，在中法兩國因越南問題而起的交涉中，自始卽未能把握時機，早決和戰大計。而軍機大臣所安排在廣西雲南二省擔任領兵作戰的巡撫大員，則又都是虛憍無用的唐炯徐延旭之輩，以致軍不能法人來攻，卽刻潰敗相繼。其下續論唐徐二人乃張佩綸與李鴻藻所保薦，是爲輕信濫保，失人僨事。更以恭王以下的其他各軍機大臣俯仰徘徊，坐觀成敗，其罪實應與李鴻藻同科。但在失律僨事之後，太后及皇上雖有旨將唐徐等人革職拏問，而軍機處並不擬頒明發諭旨，欲使天下之人不知有此失律逮問之事，其粉飾蒙蔽之罪，實不可恕。所以他最後的論點是：

「該大臣等參贊樞機，我皇太后皇上付之以用人行政之柄，言聽計從，遠者廿餘年，近亦十數年。乃餉源何以日絀，兵力何以日單，人材何以日乏？卽無越南之事，且應重處，況已敗壞於前，而更蒙蔽諉卸於後乎？有臣如此，皇太后皇上天下？惟有請不加顯責，何以對祖宗？何以答天下？惟有請明降諭旨，將軍機大臣及濫保歷人之張佩綸，均交部嚴加議處，責令戴罪圖功，認眞改過，諱飾

素習，悉數湔除。迅將拏問唐烱徐延旭及更調各省撫臣之諭旨即行明發，並責令將沿邊各督撫堪勝任，孰是替人，於五日之內和衷商榷，公同保奏，將來即以此數人之功罪為該大臣等之罪，一有敗衂，刑即隨行。倘復互諉，即予罷斥，以專責成。當今之要，無過於斯。……」

看了盛昱的這些話，可知他上此奏摺的主要意思，是要請皇太后及皇上嚴厲責成恭王以次的全班軍機大臣，在僨事失律之後速謀補救之法，並革除舊時的因循粉飾之習，力圖振作革新之意。奏摺的原意如此，照一般情形來說，恭王及其他各軍機大臣勢必要被降旨嚴譴，亦不過責令他們改過補救，斷不致於即予全班罷撤。而慈禧之處事，正有使人難以逆料之處。幾天之後，內閣大學士靈桂等接到以慈禧皇太后名義所頒降的一道懿旨，對盛昱的劾奏有了明白的處分。旨意的內容，是這樣的：

「現值國家元氣未充，時艱猶鉅，政虞叢脞，民未敉安，內外事務，必須得人而理，而軍機處實為內外用人行政之樞紐。恭親王奕訢等，始尚小心匡弼，繼則委蛇保榮，近年爵祿日崇，因循日甚，每於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謬執成見，不肯實力奉行。屢經言者論列，或目為壟斷，或謂昧於知人。本朝家法綦嚴，若謂其如前代之竊權亂政，不惟居心所不敢，亦實法律所不容。祇以上數端，貽誤已非淺鮮，若不改圖，專務姑息，何以仰副列聖之貽謀？將來皇帝親政，又安能諸臻上理？若竟照彈章一一宣示，即不能復議親貴，亦不能曲全耆舊，是豈朝廷寬大之政所忍為哉？」

其下就是宣佈對奕訢以下全班軍機大臣的處分：●恭親王奕訢開去一切差使，家居養疾；寶鋆，原品休致；李鴻藻及景廉，降二級調用，退出軍機；翁同龢，革職留任，退出軍機。此外的門面話尚有許多，不贅述。

將盛昱的原奏與前述諭旨互相參看，就可發現，盛昱的奏摺，恰好被慈禧用來作爲罷撤全班軍機大臣的藉口，而並不問其原奏的主意何在。諭旨中所說的壅蔽、委靡、簠簋不飭、昧於知人等等指責的話，俱都是一些若有若無之事，但現在居然作爲罷黜降革的口實，說來便未免强辭奪理，罰重於罪了。照清代晚期的政治制度，皇帝所降諭旨，悉出於軍機處的擬呈。當年慈禧爲了要罷黜恭王，由於無法假手於軍機之故，而不得不親筆寫了一道錯字連篇的硃筆上諭，交由內閣發出。由上面所引的這道諭旨看，不但立言有體，而且文字甚爲冠冕堂皇，應當不是慈禧的手筆。那末，這一道罷黜恭王並斥退全班軍機的上諭，又是何人爲慈禧所代擬的呢？由恭王等人被黜，新發表的軍機大臣人選中推敲，主謀之人似爲醇王奕譞，而草擬諭旨之人則似爲醇王的親信孫毓汶。

徐梧生白醉棟話中有一則關於甲申朝局變更的掌故，說：●

「光緒甲申三月，恭王屏出軍機，而以貪庸之禮王繼之，朝局日非，遂如江河之日下矣。是年退出軍機者，爲恭王及大學士寶鋆、李鴻藻，尚書景廉、翁同龢；新入軍機者，爲禮王世鐸，尚書額勒和布、閻敬銘、張之萬，侍郎孫毓汶、許庚身。樞臣全行撤換，爲前此所未有，且新樞

臣中惟閻文介差負清名，其餘非平庸即貪黷，不孚衆望。相傳孝欽屢欲與修離宮阻，即蓄意予以罷斥；而醇親王奕譞亦與恭王不洽，授意孫毓汶密先擬旨，遂成此領樞府，仰承意旨，以海軍經費移充頤和園工程。外人知我無備也，越十年，遂有者以爲，甲午之外侮，先肇於甲申之內訌。仲堪此舉，國之亡徵，洵不爽矣。」

按，醇王奕譞即光緒帝之本生父，醇王福晉又是慈禧的親妹，彼此間的關係比奕訢爲親寒。奕譞當同治在世時，對政治就很有興趣。只因當時是恭王柄政，醇王的才具又以只好長時期的屈居槽櫪，未能一騁所長。等到光緒繼立之後，奕譞身爲帝父，不更加需要隱退了。然而他對於實際政治的興趣始終不滅當年，不得已，就只好乘着度不滿的時候，以禮王世鐸作爲他的替身，隱居幕後，暗執朝權。清史孫毓汶傳說：

「毓汶權奇饒智略，直軍機逾十年。初，醇親王以尊親參機密，不常入直，疏謂之過府。諭旨陳奏，皆毓汶爲傳達，同列或不得預聞，故其權特重云。」

又，胡思敬國聞備乘卷一，「兄弟不睦」一條云：

「恭王在文宗時已出參樞政。穆宗中興，兩宮並出垂簾，封爲議政王，內外多賴其調護，天下稱爲賢王，醇王雖嫉之，莫能擠也。及德宗立，醇王之勢漸張，趨附者益衆，日攻之，遂有甲申三月十日之諭。恭王雖罷，醇王以太上之尊，不便徑入樞府，乃援大臣。毓汶人甚狡詐，曾充醇邸蒙師，既得志，倚勢驕橫。每入對，班在後而發言最先。孝欽嘗

目之，見毓汶如見醇王也。醇黨多小人，稍通賄賂，皆毓汶等從中主持，而國勢駸駸弱矣。」

看了上回這些記載，就可知道，慈禧之所以要罷斥恭王而改用禮王與醇王的原因。蓋恭王守正而醇王依阿取容，禮王又爲醇王之傀儡，孫毓汶則狡詐而好弄權通賄，凡此諸人，俱較恭王爲易於驅使也。軍機隨人聖盧撫億的作者黃濬論此，曾經很感嘅的說：

「所謂去賢任佞，以至於亡國敗家，皆由於婦人之攬權與縱欲之敗度，有史以來數千年至。鑒之哉，鑒之哉！」

清末時事，因甘聽宮廷之驅使，則慈禧自可爲所欲爲，其在實際政治上的影響，當然也就如可以道盡其中的消息。

慈禧罷斥奕訢，充分達到她收攬權力於一身之目的以後，在清末歷史上究竟造成一些怎樣的後果？這個問題，且留待後面再說。這裏應當先來看看奕訢在被黜以後的心理狀態，又是如何？

奕訢的文才頗佳，所撰「樂道堂全集」八種，其內容爲：廣獻集一卷，岵屺懷音一卷，廣四時讀書樂詩試帖一卷，國風咏一卷，正誼書屋試帖詩存二卷，古近體詩二卷，文鈔五卷，萃錦唫八卷。這其中的前七種，大都是他在作皇子時的應制之作，沒有什麼特殊的意義；後一種則是他

在光緒十年至十六年間遭投閒置散之後，集唐人詩句所作之詩，一名唐唫萃錦，其中頗能透露一些他在此一時期中的思想與感情，因此值得注意。

萃錦唫的卷前，有奕訢自撰的序文一首，中云：

「光緒甲申，閒居多暇，嘗閱樂天長慶等集以自娛。適樸庵七弟以灰韻小詩二絕見示，即率集白句；依韻奉答。覺吟興頗饒，因取唐詩置諸案頭，信手拈吟，以消永日。每於花晨月夕，體物緣情，偶一開卷，即有所得，如與詩人相對，藉以陶冶性靈，勝於牧猪奴戲多多矣。……」

此文中所說的樸庵七弟，即醇親王奕譞；樂天，長慶等集，則是唐代大詩人白居易、元稹等人的詩集。奕訢在罷政之後閒居無事，多讀唐詩，適奕譞來訪未遇，留詩二首，遂依原韻集白詩爲答。繼而又覺用集句之法作詩，頗饒別趣，因之遂愈作愈多。除了與奕譞及寶鋆二人的唱和之作甚多外，亦間有「無題」、「即事」、「寄興」等題，則是因事感興之作，甚可從中看出他當時的思想與感受。由這些詩中可以看出，奕訢在光緒十年突遭罷黜之後，內心甚爲憤慨，往往觸景生情，便發爲不平之鳴。及後閑居無聊，心情苦悶，則又多感觸舊事之語。直到最後，他的情趣於穩定，對世事的看法也變得恬淡寧靜了，所作的詩，纔能顯露出超然物外與無所縈懷的坦蕩胸襟。抄錄一些可資代表的作品於後，藉以覘其一斑。

萃錦唫卷一，繼和答奕譞諸詩之後，即是題名「春殘」的五言律四首，「秋殘」五言律四首，「無題」五言律二首。因爲此正是他放廢初期的詩作，所流露的感情，便最足以代表他此

一時期內的思想。如「春殘」的前二首云：

「又是春殘也，流年一擲梭。曙陰迎日盡，草木得陽和。花氣酒中馥，林幽鳥作歌。天高雲物薄，山色上樓多。」

「一霎清明雨，風翻浩蕩波。眼看春色老，坐久落花多。對酒都疑夢，吟詩似有魔。香醪小瓷榼，佳會亦蹉跎。」

又「秋殘」的第一、二兩首云：

「又是秋殘也，涼風落木初。齋心曾養鶴，放性或觀魚。閒坐饒詩境，閉門成隱居。超然無俗事，身外滿牀書。」

「見句朝忘食，家人笑著書。形骸寄文墨，日月互居諸。致逸心逾默，神超興有餘。偶然成一醉，來飯野中蔬。」

又「無題」第二首云：

「白髮催年老，顏因醉暫紅。有時閒弄筆，無事則書空。縹緲晴霞外，筋骸藥白中。一緘藏世界，直似出塵籠。」

這些詩作，雖然都由集唐人詩句而成，但却能渾然概括，情景相生。在這些詩作中，我們彷彿看到一個寄情山水而未能忘却世情的失意之人，雖然竭力想在讀書作詩之中排遣情懷，而每逢春去秋來，觸因時而生感觸，回憶往事，都已成夢，長日無聊，則未免書空咄咄。這種情形，在

他此時所作的「自嘲」及「遣悶」等詩中顯示得更爲清楚。如「自嘲」一首云：

「就日移軺輕榻，金罍暖更添。水流心不競，情盡口長箝。元律葭灰變，歲徂凱露嚴。檢方醫故疾，詩冷語多尖。」

又「冬夜病中遣悶」一首云：

「怕風誰忺夜，寒入五更衣。壯志隨年盡，曉懷生道機。自哀還自樂，無是亦無非。病眼嫌燈近，琴樽俗事稀。」

又「寄賓佩蘅相」國一律云：

「紙窗燈燄照殘更，半硯冷雲吟未成。往事豈堪容易想，光陰催老苦無情。風說，月挂虛弓露露明。千古是非輸蝶夢，到頭難與運相爭。」

這些詩句，雖然也曾小心掩藏他內心的不滿思想，但到底也從「詩冷語多尖」、「壯志隨年盡」、「往事豈堪容易想」，「到頭難與運相爭」等句子中流露出來了。這樣的感情，在他甲申年所作的詩篇中顯現得最多，乙酉、丙戌以後較少。但即使如此，在乙酉、丙戌年所作的各詩中，也有甚爲露骨的表示。如乙酉年所作的「遊西山岫雲寺」一首云：

「春去春來有底憑，雨餘楊柳暮煙凝。世情已逐浮雲散，山色牽連著履登。仙境應無取，願得身閒便作僧。」

此詩以「仙樂拍終」致嘅於舊事之難再，以「思騰騰」喻中心意興之難以壓抑，意義甚爲明

綴。所以儘管他在表面上有所謂「世情浮雲」之說，仍然難以掩飾內心的眞正感情。又如丙戌年（光緒十二年）元夕「寄懷寶佩蘅相國」一律云：

「秋將茶蘁代雲就，竹鴈無塵水檻清。金紫滿身皆外物，文章千古亦虛名。因邊淚景關住宴，自趁新年賀太平。吟寄短篇追往事，一場春夢不分明。」

此詩的後二句，分明是因追懷往事而生無窮的感慨，要說此不是在表示他內心的鬱勃難堪，似乎無人能信。（寶佩蘅卽寶鋆）所以他在乙酉年所作的「積感深於海，拋杯瀉玉缸」，第四首的「眼看過半百，心事竟難知」，第九首的「蘆葦聲兼雨，孤燈點夜齋，眼看人盡醉，直道事難諧」，第十首的「新詩久不寫，往事只堪哀」等，俱此之類。這種感情，俱是他在罷職家居初期所顯示的思想形態，一直要到幾年之後，方纔逐漸有了轉變，其時間則大約在光緒十五年以後。

萃錦唫卷八所收各詩，俱是奕訢在光緒十五、十六兩年所作。十五年卽己丑，此年正月，慈禧舉行歸政大典，凡中外宣力諸臣，俱有恩賚，寶鋆亦蒙賞食全俸，曾有詩紀慶，奕訢因亦作詩紀之。詩云：

「今春喜氣滿乾坤，當殿羣臣各拜恩。自愛此身依樂土，最思同醉落花村。雖居世網常清靜，難得儒翁共討論。更買太湖千片石，坐看庭木長桐孫。」

又，同卷「樸庵弟再約與心泉弟奉陪佩蘅相國小酌於邸園桃隖，卽席賦贈」一首云：

「人來何處不桃源，碧樹濃陰護短垣。陶景豈全輕組綬，嵇康惟要樂琴樽。歡娛節物今如此，無限詩情待細論。學取青蓮李居士，更容相彷莫辭喧。」

又，同卷「山莊閒步」一首云：

「繁華穠艷竟如何？應伏流鶯為唱歌。飽食暖行新睡覺，桃蹊柳陌好經過。山深春晚無人賞，雨後花容淡處多。屋小有時投樹影，但留風月伴煙蘿。」

以上乃光緒十五年所作。至十六年所作的，又可舉出「喜閒」一首爲證：

「超然塵事外，已得六年閒。欲契真如義，情生造化間。澄心坐清境，深戶掩花關。味道能寫出一個習於悠閑而樂道忘憂的太平之人，如何地在卽景趁時，安享山林之福，而不復存憂患得失之心。大概幾年以來的閑散生活，已頗使他的思慮趨於澄澈，感情趨於平實。昔日的恩怨，既已隨時間之消逝而歸諸消散，則此心明淨，已無復罣礙，正可翛然物外，靜觀世態，而自得其樂。這樣的心理狀態，正是絢爛之後復歸平靜的至高境界，人生至此，可謂圓滿而成熟。只是，以一個身負國家大計的極有用的人才，而任令他如此歸結，也總是國家社會的損失吧！

以上所說，只是就萃錦唫所收奕訢各詩，就其文字所見的內容分析。此書在清末曾經一再刊刻，流傳頗廣。但據後來的傳說，此書在刊刻之時，由於其中若干詩句嚴重地觸犯忌諱之故，曾

經加以改削。因此，刊刻流傳以後的萃錦唸，並不能眞正代表奕訢的思想。其他不能詳知，單就前面曾經引敍的那首「元夕獨酌有懷寶佩蘅相國」詩，就有過很明白的刪改。

前引「元夕獨酌有懷寶佩蘅相國」詩，作於光緒十二年丙戌，原文已曾引敍於前，爲了容易瞭解起見，再在下面複述一次：

「祇將茶蘜代雲觥，竹隖無塵水檻清。金紫滿身皆外物，文章千古亦虛名。自趁新年賀太平。吟寄短篇追往事，一場春夢不分明。」

逢淑景開佳宴，

據文廷式所撰的閒塵偶記所說，此詩末兩句的原來文字，乃是：「猛拍闌干思往事，一場春夢不分明。」若果如此，原詩所顯示的情感，就大可玩味了。

細味全詩，奕訢在罷政之後二年元夕燈下獨酌，因感觸舊事而懷想當年同參朝政的寶鋆（佩蘅），故而寫詩一首，由追維往事而表達寫詩時的感想，原是非常自然的事。首兩句自述當時的生活情況，酒易爲茶，居處寂寥，顯示他在擺脫繁華生活之後的寧靜洒脫。三四句說明爵祿與浮名皆屬空虛，表示他的心中對這些都已完全勘破。五六句寫當前之年節佳景。全結末兩句，則因對景生情而有感觸，故寄詩寶鋆，重提當年舊事，末句的「一場春夢不分明」雖看似突兀，但因全詩語意尚能貫串，所以也並不令人感到十分顯眼。但若原詩的文字乃是「猛拍闌干思往事，一場春夢不分明」，則所顯示的意義，就並非單純的懷舊思昔，而是中懷憤懣，思想甚爲激動，顯示他當時乃因感觸舊事而生極度懊喪尤悔的光景了。此詩既因感時而發，而他在政

治生涯上遭受重大挫折的原因，又由慈禧的惡意打擊而起，那末，他之所以要悔恨莫及的，自然亦就是與慈禧相關之事了。慈禧之能够崛起，由於垂簾聽政。這在八顧命大臣稟承咸豐遺命輔政時，曾因此而與慈禧發生激烈的衝突。若不是奕訢與慈禧合作推翻八顧命大臣，則他自己雖然未必能執掌政柄，慈禧亦不能以太后的身份干涉朝政。正因爲當年曾有此一念之差，誤信了慈禧的甘言蜜語，幫助她從八顧命大臣手中奪得政柄，纔會種下今天的禍根。此正是俗語所說的，「一著錯，滿盤輸」，追念及此，怎不令人腐心切齒，痛恨自己當年何以如此糊塗不明，竟致幫助慈禧作出如此損國害己的事呢？「猛拍闌干」所追悔的，正是此事。所以自無怪這一句關係重要的文字，後來要被改爲輕描淡寫的「吟寄短篇追往事」了。然而，亦可以使我們明白地看出，奕訢當年幫助慈禧奪得政權，乃是他晚年所痛切悔恨的一大錯誤。此事在清末歷史上的影響極大，但其關係却只在少數幾個關鍵人物的一念之間，說來實在可嘅！

奕訢與慈禧的關係敍述至此，已可作一結束。原因是奕訢自此不再在清代政治上居有關鍵性的影響力量。雖然他在光緒二十年甲午戰敗之後，又因朝中親貴大臣之一再薦舉，以致慈禧不得不勉强再任命他爲領軍機的重臣，但他在此時一則由於年已老耄，二則亦久已洞悉慈禧的攬權私心，所以他的態度也愈加變得模稜圓滑，凡事委蛇因循，以致朝野上下都對他失望之極。其實，這根本怪不了奕訢。因爲慈禧的專制權威到了此時，早已根深蒂固，而她的頑固自私思想又不是任何人所能影響得了的。奕訢既不能對她發生任何影響力量，則除了將順承命之外，又還能做得

了什麼呢？

清人方濬頤所撰的夢園雜說，有一段論人才的話，說：

「郭筠仙（即郭嵩燾）中丞一日與予論天下事。中丞曰：『人必才識相兼，始足以當大任。予對曰：『監司守令，貴乎有才；若膺疆寄者，則不貴有才而貴有識。知人善任，虛己求賢，則集衆才以爲才，雖無才不害其爲有識也。』……」

這段話論封疆大吏不貴有才而貴有識，用來論述作爲一國領袖人物的統治者如慈禧，亦可說是非常合適。慈禧極有才幹，也極有手段，只可惜她祇是一個未嘗學問而權力慾望極强的無識女流，所以雖有人才如奕訢，亦仍然因與她的權力慾望相衝突之故，必欲去之而後快。有人才而不能用，所樂於引用的又只是醇王禮王之流的庸才，如之何不使朝政日非，國事日壞呢？自奕訢罷斥之後，醇王當政。醇王之後，則是榮祿與慶王。榮祿尚稱小有才，至於慶王奕劻，則是標準的貪官汚吏。清代末年的政治，因此便一天天地走向腐敗沒落的道路。

奕訢之遭罷黜，是光緒十年三月的事。自此以至光緒三十四年十月光緒與慈禧先後賓天，中間相隔二十四年之久。這二十四年，乃是慈禧的統治權力達於最高峯的時代，雖有光緒在位，不過祇是形式上的傀儡皇帝而已。在這二十四年之中所發生的重大事件，略舉如下：

光緒十二年——開始經營頤和園。

光緒十四年——頤和園建成。

光緒二十年——中日兩國因朝鮮問題開戰。
光緒二十一年——馬關條約，臺澎割讓予日。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變法，甫六十日而敗，光緒被幽禁於瀛臺，慈禧再出訓政。
光緒二十五年——立溥儁爲大阿哥，欲行廢立。
光緒二十六年——義和團之亂，八國聯軍入北京。
光緒三十年——日俄戰爭，兩國以我之東北爲戰場。

以上所述，看起來好像祇是一些單獨的事件，彼此並無關係；其實則後一事都由前一事所牽出，彼此之間的關係極爲密切。如慈禧在黜退恭王之後凡事俱可獨斷獨行，不虞掣肘，即以歸政之後需擇地頤養爲名，耗海軍經費二千餘萬，修頤和園。由於海軍經費大部分挪用於頤和園，日人知我軍備窳劣，因此而生侵侮之心，遂藉口朝鮮問題掀起戰爭，因而有甲午之敗。此一敗衂，使全國上下憬然而知外侮之日亟，於是光緒乃因康有爲之進言而思變法維新。不料守舊派擁慈禧反對變法，維新失敗，光緒被幽，慈禧更欲扶立溥儁以廢黜光緒。只因此舉受外國列强之干涉而不能實現，慈禧因之而極端仇外，欲圖藉義和團之力一舉驅出外國勢力，爲雪恥報仇之計。却不料神拳不敵洋人槍炮，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慈禧倉皇間率同光緒遠遁西安，翌年，乃訂立苛刻無比之辛丑和約，幾置中國於萬刼不復之地。自經此亂之後，慈禧畏洋人如虎，清朝之國際地位亦一落千丈，馴至日俄兩國爲爭奪我之東北而發生戰爭，以我國之領土爲戰場，完全無視中國之主

權，清政府亦噤無一言。情勢演變至此，中國幾將無以立國於世界。然而這都是慈禧獨專國柄之後一連串錯謬行爲所造成的結果。將這種情形與她垂簾聽政前二十三年間的情形相比，理亂之分，判若黑白。前二十三年卽是恭王領軍機的時期，由此亦可知道，恭王柄政，比慈禧實在强得太多。

慈禧獨專國政的二十四年間，清代的政治情勢好像以滾球下山的速度急遽走向下坡，而其禍亂之始，則全在修頤和園一事。因此，我們應該先從修園這件事情上談起。

修園之事

。其時由於恭王以下的極多臣僚都竭力諫阻之故，同治未得遂其意願。但卽使如此，修園的動機仍未消除，亦隨時可以提出。祁敬怡所撰的谷亭隨筆，有一段說：

「山東游滙東侍郎百川，同治壬戌翰林，由御史給事外放，數遷至順天府尹，擢倉場侍郎，同光間進階最速者也。有直聲，尤諳河務。同治末葉，游在御史任，曾疏諫停止圓明園工程。穆宗召見，厲聲曰：『汝亦有父母，豈有父母所欲，而故爲違抗者？』意蓋指孝欽之命也。游稱：皇太后政暇頤養，不如就近增飾西苑，以爲臨幸之地，用帑不鉅，易復舊觀。穆宗可其請，而未知西苑所在。游復申奏，卽南北中三海，近在宮掖。穆宗命具疏以聞。無何，穆宗升遐，事遂寢。光緒中，乃復議修此，且修頤和園，以海軍儲款移作園工，大開報効之途，極爲冒濫，有斜封墨勅之誚焉。」

由同治訓斥游百川的話，可知同治末年之修圓明園，其意念亦動於慈禧，同治爲其親子，故知之詳而持之堅。只因當時的反對力量太强，以致半途而止。光緒初年，慈禧亦曾數次向恭王表示意見，恭王仍不贊成，所以在恭王未被黜退之前，修園之事，仍然只是空中樓閣。清稗類鈔中有一條記此曰：

「光緒初，恭王當國，謹守繩尺。三海小有殘破，亦未修。孝貞、孝欽兩太后奉帝等幸海時，恭王必從。孝欽輒曰：『此處宜修矣。』恭王正色厲聲而言曰：『是。』孝欽不再言。孝貞及孝貞賓天，恭王出軍機，以醇王繼任。於是迎合孝欽者，先修三海，包則曰：『無錢奈何？』及孝欽不豫，始修頤和園。（原注：金鰲玉蝀，橋名也。自國初以至光緒乙卯，皆在大道旁城西，爲赴後門之大道。橋旁卽承光殿，俗呼圓殿，又名團城子。）然猶西苑在城中，山水之趣，不及郊野，乃又有重修圓明園之議。其後以圓明園荒蕪歲久，水道阻塞，不如萬壽山昆明湖水面廣闊，施工較易，乃輟圓明園工而修萬壽山，且賜名爲頤和園。

據此可知，頤和園之修，乃是恭王出軍機而醇王當國以後的事——若不是恭王出軍機，頤和園始終修不成，慈禧太后亦沒有這麼豪華奢侈之園林山水可供「頤養天年」之用了。萬壽山昆明湖在北平城西五十里，其地本爲乾隆時的清漪園，英法聯軍之役，與圓明園同被兵燹所毀。至是，因迎合慈禧太后的願望，而以巨款修復。此園的大致情形，柴萼所撰的梵天廬叢錄中曾有簡略的介紹，引述如後：

「頤和園在京師西北萬壽山麓昆明湖畔，慈禧太后以百萬之資，就清漪園舊址改築者也。園枕山襟湖，天然邱壑，朱簾垂地。再進則爲德宗燕寢處，掀簾而望，御座陳設，赤舄玉椅，輝煌炫目。由殿左向，則長廊一線，如鴛長虹。過此則曲徑通幽，引人入勝。離宮別館，皆翠蓋登臨之地，楹聯額，皆詞臣華藻之筆。臨湖正殿，額曰排雲。由殿上向，則最高之佛香閣在焉。從殿而左，至後山上，有畫中亭。亭旁兩閣，一曰愛山，一曰借秋。由曲徑繞道至山下，則池沼楊柳，流泉冷冷。山石壁立，石上刋有仙鳥松風等字，爲太后御筆，摹寶重鈐，猶留鴻爪。復出，有文昌閣，昆明湖。湖隄長二里餘，隄邊有銅牛一，跪伏石磴，乃圓明園中故物也。湖廣十餘里，眞世上仙境。今則野有蔓草，室無居人，梧桐葉落，西風露冷，不禁有黍離麥秀之思矣。」

此文記述頤和園的大概情形，頗易使人瞭解。只是其中說到慈禧以「百萬」之費修成此園，就錯得太厲害了。清稗類鈔說，自頤和園修成，每年三月以後，慈禧常率同光緒帝后居於園中，園內設電燈廠，小鐵道，小輪船等，僅每日的開支，就需要用到一萬二千兩銀子，區區百萬之數，如何能修成此園？民國間，毗陵張懷奇曾作頤和園詞，並有自註。詞云：

「朱甍天際集鳳凰，九乘避暑離宮涼。御龍阿母昇雲上，玉階瓊樹凋秋霜。圓明園火頤和起，西控都門五十里。聞說鑾輿送內家，慣看禁馬馳中使。雲欄玉樹似南朝，班扇當樓擁百僚。六曲屏風雲母飾，九間殿柱水晶雕。鳳亭廻護仙霞紫，昆明池館翡翠巢。年年禮佛愛山莊，春老役靈移

海市。碧水縈洄繞畫廊，新荷五月出池塘。中書奉詔趨偏殿，學士承恩出尚方。月滿桂花珠露重，龍涎細熱御罏供。玉敕還宮正賜宴，金瑞返蹕誰陪從？鷹犬年年進九重，度支計靈仰司農。……」

原詞尚長，但這一段下的註釋則甚爲重要。原註云：

「朝邑閻文介公敬銘，以大學士長戶部八年，爬羅梳剔，遇事撙節，歲得羨餘百餘萬。及光緒中葉，幾盈千萬。文介欲儲此款不他用，以待國家正用。自頤和園工程起，內務府經費歲增數百萬。每咨取時，文介輒力拒之。慈禧固知部中儲有巨款，一意提用，而文介一日在位，必不能遂其志，於是眷文介寖衰。文介知無可爲，遂稱疾去職。文介去，而戶部儲款數月間立盡。此句蓋指其事。」

據此云云，則閻敬銘長戶部時所辛苦搜積的羨餘銀一千萬兩，就是因慈禧之修頤和園而用盡的。千萬之於百萬，已是十倍之數。而修頤和園的實用之數，尚不止此。清宮遺聞中有一條說：

「修頤和園款多出之海軍經費，聞約計三千萬兩。」

此所云「約計三千萬兩」，當是所費之總數。其中除去戶部所儲羨餘銀一千萬兩，出於海軍經費的應爲二千萬兩。其時正當中法戰爭失敗之後，北洋大臣李鴻章極力呼籲建設海軍，却不料名義上作爲建設海軍之用的購船經費，大半都被挪用於修建頤和園。因此，自光緒十四年以後，海軍就沒有再增添一艦。甲午戰役發生前，定遠、鎮遠二艦請求增購十公分口徑的德製克虜伯快炮十二尊，以備制敵，部議以時方進備爲慈禧皇太后舉行六十大壽慶典，支費太多，無款可供買

炮之用，駁覆不准。修園重於建軍，祝壽重於備戰，時尙不知中國的戰備空虛，勝戰無望，仍一力贊成李鴻章以强硬態度應付日本的挑釁。於是，中日甲午戰爭發生了，海陸兩軍都一敗塗地，由此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如果要問甲午之戰何以會失敗得如此之慘？當然可以舉出很多的原因。但其中的一項主要原因，則是當時的國防經費都被慈禧太后拿來修了頤和園了。爲了個人的樂遊享樂，而可以置國家的安危於不顧，統治者之所爲如此，豈不是太令人灰心失望了麼？

惲毓鼎崇信傳信錄云：

「甲午遼東喪師，上憤外難日迫，國勢阽危，銳欲革新庶政，致富强。環顧樞輔大臣，皆憒憒玩惕，無足與謀天下大計者。南海康有爲，甲午公車一再上書，上固心識之。戊戌四月，常熟（卽翁同龢）罷去，朝局漸變。張閣學百熙、徐學士致靖先後疏薦有爲，召見，以日本改制維新之說進，上大悅。是時，二品以上大員黜陟，皆須詣頤和園取進止，上不得自專，故康僅以工部主事在總理事務衙門行走，其門人梁啓超，僅領譯書局，而樞輔閣部大臣，固無力去之也。其時廣開言路，庶民皆得實封言事。禮部主事王照疏陳四事，請上游歷東西洋各國，尚書懷塔布許應騤等抑不爲代奏，堂司交閧，事聞於朝。上正思藉事黜一二守舊大臣以厲威而風衆，聞之震怒，特詔革禮部六堂職，破格拔少詹事王錫蕃、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署左右侍郎。舉朝知上意所在，望風而靡。懷妻素侍頤和園宴遊，哭訴於太后，謂且盡除滿人。太后固不善上所爲矣。會上特

擢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參贊軍機事，專理新政，時謂之四貴，樞輔咸側目。譚、楊憤上之受制，頗有不平語。上手詔答之，大略謂：『頑固守舊大臣，朕固無如之何。然卿曹宜調處其間，使國可富強，大臣不掣肘，而朕又上不失慈母之意。否則朕位且不保，何有於國？』於是蜚語窸聞西朝。御史楊崇伊龐鴻書揣知太后意，潛謀之慶親王奕劻，密疏告變，請太后再臨朝，袖疏付奕劻轉達頤和園。八月初四日黎明，上詣宮門請安，太后已由間道入西直門，車駕倉皇而返。太后直抵上寢宮，盡括章疏攜之去，召上怒詰曰：『我撫養汝二十餘年，乃聽小人之言謀我乎？』上戰慄不發一語，良久，囁嚅曰：『我無此意。』太后唾之曰：『癡兒，今日無我，明日安有汝乎？』遂傳懿旨，以上病不能理萬歲爲辭，臨朝訓政。凡上所興革，盡反之。」

這一段話，概括敍述出光緒二十四年的戊戌維新，係直接受甲午戰敗的刺激而起。但因光緒無實權，而守舊派頑固份子又竭力反對維新，慈禧太后乃得以利用此一情勢，收奪光緒皇帝名義上的政權，由她自己再出垂簾「訓政」，自此一直到光緒三十四年。一般的史書，對于戊戌維新及其後的政變經過，大致亦作類似的記述。事實上則光緒無實權，固如上述，而慈禧與光緒之間的感情惡劣，並不始於戊戌維新；慈禧之謀廢光緒，亦不自戊戌維新而起。這一點，則是必須加以澄清的。

光緒之皇后，乃慈禧之姪女，都統桂祥之女，於光緒十五年正月立爲皇后。後稱爲隆裕皇太后。當選立皇后之時，初選合格者共有五人，一爲隆裕，另外則是江西巡撫德馨之二女，及吏部

侍郎長敍之二女。光緒屬意於德馨之女，慈禧則因隆裕是她的姪女之故，必欲光緒立之爲皇后。光緒不敢違拗，不得已勉强照慈禧之意行事。於是隆裕被立爲皇后，長敍二女封爲珍、瑾二妃，德馨二女則被擯斥。但因光緒對于隆裕並無好感，慈禧則以爲光緒之所以不喜隆裕，乃是珍瑾二妃從中作梗，因又遷怒二妃，待之甚苛。這種情形，清代野史中多有記載，這裡可以無需多贅所需要指出的，則是因光緒與隆裕之感情不睦，而致慈禧懷恨光緒的情形。

光緒東華錄中有一條貝勒載澍忤旨革爵的記載，說：

「二十三年春三月，貝勒載澍忤太后旨，命革去貝勒，交宗人府重責八十板，於空屋永遠監禁。載澍乃孚敬郡王之子，其妻乃太后之姪女。載澍有妾生子，妬殺之，爲載澍所詰責，憤而訴於太后。太后遽下詔，謂載澍平日不孝於母，若不從嚴懲辦，殊乖孝治之意。遂獲嚴譴。詔下後，福晉昏暈於地。」

此「太后之姪女」，亦是桂祥之女，隆裕之妹。王照撰方家園雜詠紀事詩中曾紀此事，謂慈禧之所以重懲載澍，目的在震嚇光緒，所謂「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也。原詩下有註釋，云：

「隆裕胞妹，爲貝勒載澍妻。載澍者，景皇之嫡堂弟，孚郡王之子也。當隆裕不禮皇上之日，澍與爭，桂祥妻來責孚王福晉曰：『爾子欺吾女，爾何以不管？』福晉怒曰：『你是不管哪？』祥妻曰：『彼小夫妻房中口角，你我作老人的，何必干預？』福晉曰：『我不管。』登輿去，譖諸太后。太后召恭王，欲致死

澍。恭王苦求，始允從輕褫辭奪府，杖一百，永遠禁宗人府獄。明發上諭，謂澍忤逆不孝。恭王遵諭回軍機處擬旨，面青手顫，久不能語。從來宗人府行杖，但擧杖作虛勢，口呼一二三四而已。及杖澍，桂祥妻遣人監之，言杖不力則復奏。澍受杖流血昏暈，及入獄，藍衫單褲粘於血肉，脫不能下。太福晉避居孚王墓地小屋。獄中不許人入視，惟有兩餐糙米飯。及庚子洋兵放獄，澍往從太福晉於墓地，遂家焉。某司官，亦宗室也，壬寅春養疴於湯山，與趙先生詳言其事。且曰：『澍貝勒加罪之重，乃所以震嚇皇上。故恭王當日之顓，不僅痛胞弟孚王之斬祀也。』庚子幽匪瀾漫之日，守西陵貝子奕謨，告逃難至西陵之齊令辰曰：『我有兩語賅括十年之事——因夫妻反目而母子不和，因母子不和而載漪謀篡。』謨貝子，成皇之胞姪也。

載漪謀篡，即光緒二十五年慈禧以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儁爲大阿哥，欲謀廢光緒而以溥儁爲繼之事。載漪謀篡，已在戊戌政變之後。而慈禧之積不快於光緒，不必等到戊戌政變，即在光緒二十一年時，便已十分表面化。除了前述光緒隆裕夫妻反目一事外，其他可以徵見的，尚有斥逐文廷式及杖責珍妃之事。花隨人聖盦摭憶敍此，云：

「文道希革職驅逐一事，實爲戊戌政變之先聲，當時帝后齟齬中一大公案也。由今觀之，德宗必挫，事機之危，瞭然有數，惜當時袞袞諸公熟視無睹耳。以予所聞，道希被革，出於那拉后授意。其時后與帝不相容，已如水火。道希當日，則於外交內政，已極有主張。緣督廬日記●『光緒二十年九月八日，道希木齋約赴謝公祠，議聯銜奏阻款議，及邀英人助順。又道希主稿，請

聯英德以拒日。』此可見常熟一系當日之政策。又某筆記載：『德宗臨朝，上書房總師傅翁同龢，亦頻以民間疾苦外交之事誘勉德宗。德宗常言：我不能爲亡國之君。語侵慈禧，而廢立之說興焉。時坤宮與德宗不睦，頻以讒間達慈禧，故事機益迫。甲午清兵潰，軍艦被擄，吳大澂魏光燾督師關外，劉坤一督師關內，李鴻章議約多損失，幾定約焉。翰林學士文廷式習聞宮中諸事，知內憂外患交乘，國將覆，往見坤一，請力爭約款。坤一未會意，謂弱國無權利可言。廷式請屏左右，以廢立之說相告，且謂宮中蓄謀久，慈禧有所作，每詢疆臣等意思若何？是宮中所忌者疆臣。疆臣資高負宿望者今惟君。某知爭約必不成，俾內廷因斷斷爭約，知廢立之難實行，則曲突徙薪之效見焉。坤一囑廷式代起草，而廢立之謀以止。』據此，道希爲德宗謀不爲不忠，從權應變不爲不智，西后必去之心，已躍然愈急。論者乃以大考通關節事，並誣其才，非知言也。」

此文中所說的「文道希」，即文廷式，「大考通關節事」，即野史所謂甲午年大考翰詹，光緒親以文廷式卷授閱卷大臣，拔置第一，因之超擢侍讀學士，實則其女弟子珍妃爲之關說於光緒之故也云云。關節之說，即後來文廷式革職驅逐之罪名，其事由慈禧作主，與珍瑾二妃被降爲貴人，情形相同。

「光緒二十年十月二十九日，太后召見樞臣於儀鸞殿，次及宮闈事，謂瑾珍二妃有祈請干預事，降爲貴人。帝意正爾。」

如果罰降二妃之事果係出于光緒之意，則儘可由光緒自召樞臣而自宣諭旨，又何必由慈禧爲

之代庖呢？何況慈禧自光緒十五年皇帝親政以後，即已明降諭旨，歸政頤養，不過問朝政的了。觀此種種，則不但朝廷大臣之進退須請示慈禧，而光緒事事聽其鈐束，正是極明顯的事。而光緒則不但顯違慈禧之意願，而且欲實行新政，盡黜守舊派的頑固份子，是不啻欲侵奪慈禧之政權，非爆發最後之政爭不可了。凡此種種，已有革責載澍、罰俸二妃、及黜退文廷式諸事作爲警告的序曲，而光緒帝及康梁諸人竟然全不警覺，遭就註定了光緒非遭遇悲慘的命運不可。由修頤和園至爆發中日甲午之戰，再演變而爲戊戌政變，其中的因果邏輯關係，極爲明白。

戊戌政變之後，光緒被幽於瀛臺，政無大小，仍由慈禧自操其柄。但這不過是慈禧欲另立新皇帝的步驟之一，其最後目的，並不就是讓光緒繼續保有這傀儡皇帝的形式。溥儁之被立爲大阿哥，便是廢立之前奏。但因發之過早，外爲各國列强所反對，內有李鴻章劉坤一等人之異議，以致廢立之事不能成功，慈禧以此遷怒洋人，遂召來義和團之亂。胡思敬國聞備乘記此云：

「康黨既敗，太后再出垂簾，外人頗有違言。上海各國領事，因欲聯盟逼太后歸政。江蘇道員羅嘉杰聞其謀，密告政府。電稿爲端郡王載漪所見，懷以奏太后。太后大惡之，噤不敢發。及已亥謀廢立，英公使私探其情於李鴻章，鴻章力辨其誣，因留之飲酒，徐試之曰：『頃所言，僕實毫無所聞。設不幸而中國果有此事，亦內政耳，豈有鄰好而肯干人內政乎？』英使曰：『鄰國

固無干與之權，然遇有交涉，我其認定光緒二字，他非所知。』鴻章以告榮祿，爲太后所知，益恨之次骨。此庚子拳禍之所由來也。」

這裏所提到的上海各國領事欲聯盟逼慈禧歸政，及英國公使表示祇承認光緒爲中國皇帝之說，是否眞有其事，抑或祇出於羅嘉杰的誤傳或李鴻章的飾詞？都大有問題。但李鴻章之不贊成廢立，言外之意，亦顯然可見。至於兩江督臣劉坤一之公然表示不贊成，則王照的方家園雜詠紀事詩中亦有記載，說●●

「戊戌八月變後，太后卽擬廢立，宣言上病將不起，令太醫揑造脈案，偏示內外各官署，並送東交民巷各國使館。各使偵知其意，會議薦西醫入診，拒之不可。榮祿兼掌外務，自知弄巧成拙。又嘗以私意陰示劉忠誠公（卽劉坤一），忠誠復書曰：『君臣之義已定，中外之口難防。坤一爲國謀者以此，爲公謀者亦以此。』榮祿悚然變計，於是密諫太后，得暫不動。」

因謀廢立不成而遷怒洋人，因遷怒洋人而思欲藉義和團神拳之力盡殺洋人以爲報復，這在稍有政治常識的人看來，都是匪夷所思的事，然而當時的慈禧竟然有此思想，實在使人爲之大惑不解。清稗類鈔載有慈禧對于此事的自述回憶一則，錄之於後，亦可以使我們稍稍得以瞭解，慈禧對于庚子拳亂一事，究竟作何說辭。原文如下●●

「予最恨人言庚子事。予乃最聰明之人。嘗聞人言英女王維多利亞事，彼於世界[illegible]始不及予之半。予事業尙未告成，亦無有能逆料者，或尙有可使外人震驚之事，或尙有過異於前之事，

均未可知。英爲世界最强國，然亦非維多利亞一人之力。英多賢才，各事皆由巴力門（國會）議定，彼惟畫諾而已。我國大事，皆予獨裁，雖有軍機大臣，亦惟贊襄於平時，皇帝更何知？庚子以前，予之名譽甚佳，海內晏然，不料有拳匪之亂，爲夢想所不及。綜計生平謬誤，卽此一擧。予本可隨時諭禁拳匪，而端（卽端王載漪）瀾（載漪之弟載瀾）力言拳匪可信，爲天所使驅逐洋人者，蓋卽指教士而言。予固最恨耶教，當時聞言默然。後亦知端、瀾所行太過。一日，端王率領拳匪頭目至頤和園，召集太監，在殿前查驗頂際有無十字。既而端王謂●有二監信教，當如何辦理？予怒斥之曰：『未發詔旨。何故擅領彼等入宮？』端王謂其權力甚大，可以殺盡洋人，有諸神保護，不畏鎗礮，曾經試驗，鎗打並無傷痕。因擅將二監交與拳匪頭目辦理，予亦允之。旋聞二監被殺於園。次日，端瀾又帶拳匪頭目入宮，令太監燒香，爲非教徒之證。自此遂逐日進宮，授太監法術，謂京城人民大半已習拳矣。第三日，宮監皆作拳裝，坎肩包巾皆紅色，褲獨黃，予之左右皆然，心甚不悅。時軍機大臣榮祿方請一月病假，一日，忽報病癒，明日卽須入宮，知其必有要事言也。及榮祿至，則謂拳民煽惑百姓殺洋人，恐國家受害。予問應如何辦理？榮祿大爭，今京城已成義和拳之世界矣，若與反對，彼必殺盡居民，大內亦難幸免。董福祥已允助攻使館。余至是大懼，知大事已去，立召榮祿，並留端王在側。榮祿至，顏色憔悴，告以端言，大驚，請立發一諭，聲明拳會爲秘密會黨，謂此諭果下，拳必入宮大肆誅戮。余不得已，飭步軍統領悉逐其在京者。端大怒，

而從端言。端去，榮祿言拳必爲禍，端喪心病狂，必助其圍攻使館。拳民未嘗讀書，以爲祇有在華之些少洋人，殺之卽爲無事，不知各國如何强大，若將在華者殺之無遺，必將報仇。洋兵卽殺一百拳民，毫不費事，請余飭聶士成防守使館。余卽允之，又令榮祿就商於端、瀾。一日，端、瀾進宮，請諭飭拳民先殺使館洋人，再殺其他。余却其請。端謂事急不能再延，拳已備明日攻使館。余怒，令監逐出。端臨行，言我當代發諭旨，不問爾之願否。既出，卽矯詔行事，於是遂死無數生靈。及後，端見拳不可恃，洋兵將至，始勸余等離京。余之名譽，遂隳於一旦。此事由於前無主意，鑄此大錯，誤信端王，皆爲彼一人所害也。」

這一段話，縷述慈禧在庚子拳亂之前名譽甚好，只因「前無主見」而「誤信端王」，纔會造成義和團之亂，成爲白璧之瑕，說來甚爲娓娓動聽，若細按其內容，實多遁飾之辭，其目的無非在將釀亂致禍的責任，諉之於端王而已。試看清政府在庚子拳亂期間所發一切保護拳民及與各國宣戰的上諭，卽使曾有人提出反對意見，亦一切置之不顧，便可知所謂「矯詔」之說，全是一派謊言。而且端王志在篡奪，其先決條件必須有慈禧之全力支持，又如何敢顯違慈禧之意，而擅自帶兵入宮呢？王照的方家園雜詠紀事詩中，亦曾有一段記述拳匪入宮之事，云：

「太后召大師兄入宮，令其徧視妃嬪宮女，以察是否二毛子。（所謂二毛子，指信奉耶教之人。）太后平日甚聰明，亦不惡洋教，此則佯爲迷信，實陰令拳匪預識宮中部位路徑，以備臨時

作用也。」

王照的記述，顯然揭破了慈禧的兩項謊言。第一，慈禧並無厭惡耶教之說。第二，拳匪入宮，並非端王之擅作主張，而是出於慈禧之授意。其目的乃在藉此令拳匪識熟宮中路徑，必要時可以指使他們謀殺光緒。（當時拳匪心目中之必殺者，有所謂「一龍二虎」；「龍」即光緒，「虎」則李鴻章與榮祿。慈禧很希望能假手拳匪，除去光緒，故王照之說如此。）慈禧聽信端王的意見，想利用義和團來殺盡洋人之目的既如此，其縱令拳匪入宮，意在謀殺光緒之目的又加此，現在居然要把一切責任推卸予端王載漪，而只以「前無主見」與「誤信端王」爲辭，實在也太厚顏了。就事論事，慈禧在釀成庚子拳亂一事中的責任，可以稱之爲「無識」與「荒謬」，與端王同屬一類之人，自謂「誤信」，無乃避重就輕。

不過，慈禧的這一段自我供白之辭，雖多謊言，其中也頗可看出若干眞事，如她之自矜才智聰明及獨裁專政，亦適足以反映她之缺乏眞知灼見。英國的兩黨政治，在這時已相當成功。女王根據全國選舉的結果，任命得票最多的政黨領袖組織內閣，深深合乎選賢與能的宗旨。所以國家的政治日新月異，產業發達，生產進步，隱然成爲世界最强之國。慈禧不懂得英國政治何以優良成功，猶以爲中國在她的獨裁統治之下，將來尙可有使外人驚異的奇蹟出現，豈不是自欺欺人之談嗎？慈禧誠然聰明而有才，無如她却並無遠大見識，又不願信任有才幹的人，終於使政府之中充滿了無識的

庸才，她自己既不能收臂助之用，國家政治亦因之而日見敗壞而莫救。在如此情形之下，猶復侈談其英明獨裁，說起來也太可悲了。

說到慈禧的才能，確實有其可資自誇自矜之處。綜括起來看，慈禧的統治術，很有可稱。她之所以能够成功，得力於三項要素。第一是心狠手辣，合乎「只問目的，不擇手段」之原則。第二是善於把握情勢，當機立斷，決不讓機會錯過。第三是懂得培養政治上的敵對勢力，以達到其操縱駕馭之目的。一個成功的領袖人物，所需要的成功條件當然尚不止此。不過，處在當時的中國，慈禧既已有現成的皇太后身份可資憑藉，只此三點，亦就足可供其鞏固地位與把持權力之用。今試就此三點分別舉例說明於後。

王照的方家園雜詠紀事詩中，曾經引述榮祿的話，說：「皇上性暴，內實忠厚；太后心狠，令人不測。」榮祿是慈禧的姪輩，光緒二十四年以後，柄政達六年之久，乃是慈禧所十分寵信的心膂重臣。榮祿對慈禧的批評如此，其說法當然有其根據。試就慈禧的種種行事看，黜恭王、幽光緒、斥革載澍、毒死慈安太后，乃至庚子之亂時將珍妃投於井中溺死，均是其心狠手辣的明證。政治是現實而冷酷的，政治家往往只問目的而不擇手段，慈禧雖爲女流，其所作所爲，却都能合於此一原則。所以她纔能打擊政敵，排除異己，成爲獨攬大權的最高統治者，有如當年的武則天皇帝。

慈禧之善於把握情勢，利用機會，在咸豐十一年辛酉，與光緒十年甲申的兩次政變中，都可

以明白的看出來。辛酉政變以前，政權在顧命八大臣之手，慈禧雖有攬權之心，苦於八顧命之不肯從命。恰好恭王亦有復出之意，慈禧遂利用此一機會，取得恭王的合作，一舉推翻八顧命大臣輔政的局面，以垂簾聽政的形式出而干預政治，由此逐漸達到其收攬大權之目的。至於光緒十年的甲申政變，亦是慈禧巧妙地利用了盛昱的劾疏，將恭王爲首的諸軍機大臣全班撤換，開清代史無前例的變局，由此使此後的繼任者全都是慈禧的俯首聽命的奴才與庸臣，於是慈禧的權力愈見鞏固，凡所作爲，亦可任意而行，不必顧慮其他的反對勢力了。

最後一點，是關於慈禧如何培養政治上的敵對勢力，以達到其操縱駕馭之目的。這方面的事例較多，對於實際政治上所發生的影響也很大，必須逐一舉例爲之說明。

第一個例子，是慈禧利用清流黨的力量牽制恭王，及恭王既倒，又復摧殘清流，使其不能爲害於己之事。

前面曾經說過，清流起於光緒初年，其起因由於政府軟弱而時政多故，故而一般具風骨之清流黨人喜激昂言事，自朝政國計以至彈劾權貴，無不有之。慈禧本人，未嘗不討厭這些清流黨人之倡言無忌，以致行事多礙。但因覺得這一股力量頗可以用來制衡事事好與自己抗爭的恭王一黨，因此一直聽其自然，不加干涉。等到恭王被清流攻倒之後。慈禧也就對清流黨人採取了行動。清流諸人中，張之洞、張佩綸、宗室寶廷、陳寶琛等最負盛名。張之洞聰明而善於鑑貌辨色，覘測慈禧之意向所在，發言多知所避忌，故而最早以推陞山西巡撫去，以後且一直陞至總督、大學

士，官運亨通，亦不爲慈禧所惡。張佩綸鋒芒最露，甲申政變後，與陳寶琛同奉會辦軍務之命，張福建，陳南洋。文人治軍，必多貽誤，慈禧之目的，便是在借此摧折。果然，閩江一役，張佩綸聞砲而逃，水師及造船廠盡燬，慈禧降旨嚴譴，革職充軍新疆，從此一蹶不振。寶廷以侍郎充福建鄉試主考官，察見情勢不利，在歸途中納江山船女爲妾，上疏自劾，借此罷官求去。陳寶琛知張佩綸之所以得罪由於慈禧之有意伺機行譴，亦藉病請辭。煊赫一時的清流黨，在短時間之內先後摧折殆盡。可知慈禧若有意加以摧挫，本非難事，只是她先要用清流黨人來牽制恭王，所以直到恭王被黜之後，纔對清流展開行動。其機心之深與運用之妙，可見一斑。

第二個例子，是她用崔玉貴來對付李蓮英之事。

民國以來的野史，多稱李蓮英爲慈禧最用事的得寵太監，舉凡一切竇官黨僻、通賄舞弊、及悖逆凶殘之事，俱是李蓮英爲之主謀，至有所謂九千歲之說。這話恐怕未必盡然。王照方家園雜詠紀事詩云，慈禧曾遣醇親王赴煙臺閱視海軍，懿旨賜乘杏黃轎。醇王不敢乘，又恐慈禧未即知，乃力請於慈禧，派李蓮英同往，意在爲之作證。蓮英怵於安得海之禍，布鞋布衣，每日爲醇王執長桿煙筒及大皮煙荷包，侍立王側，見客則爲之裝煙，客退則入王之夾室中，不見一人。直魯二省官員欲乘機逢迎大總管者，皆大失所望。此一行也。醇王之左右及李蓮英，皆一介不取而歸，醇王大贊賞之。由此一事，可見醇王與李蓮英二人，都是藉恭謹爲固寵之計，而絕不敢有僭越擅權之嫌。故其後在慈禧宮中得寵擅權的太監，乃是有二總管之名的崔玉貴，而並非大總管李

蓮英。後來袁世凱爲直隸總督，誤信市井傳言，以爲李蓮英乃慈禧最寵信之人，事事趨奉獻媚，以爲結好太后之計。蓮英有妹夫名白壽山，旗人，官內務府郎中。袁世凱爲了討好李蓮英起見，擬欲奏保壽山爲幫辦練軍大臣，壽山屢辭，不肯就。袁世凱乃派候補道唐小山入京見李，請李蓮英代勸壽山同意。李云：「歸告宮保，壽山不敢違命，乃我教之也，萬勿再囉嗦。」至是，袁世凱始知李蓮英並無他志，因此改走崔玉貴的門路，終於達到他獻媚固寵之目的。

崔玉貴之所以得勢，據方家園雜詠紀事詩所說，乃是慈禧用來抵制李蓮英的手法。王照說：

「太后用某親王以抵制慶王，亦如任崔玉貴以抵制李蓮英。蓋凡老臣老奴，皆務妥愼，對於干犯禮義之端，不敢有一字唯諾。故太后皆防其鑿肘，而預制之也。」

此所謂「某親王」，蓋卽老醇王奕譞之子，小醇王載灃，光緒之親弟也。慈禧如何利用籠絡的手法收服小醇王，使之成爲制衡慶王的工具？還在王照的書內亦有敍述，云：

「榮祿女早有豔名，太后常召之入宮，認爲養女。某親王先已訂婚，係勳舊將軍希元之女。太后勒令退婚，改訂榮女。某王之太側福晉入宮哭求太后曰：『我之兒婦已向我磕過頭，毫無過失，何忍退婚，教人家孩子怎麼了？』太后堅執不許，希公女聞而仰藥死。某親王既被此牢籠，惟視太后爲聖明，日見親任。」

由這些地方可以知道，慈禧太后如果要培養一個人作爲某人的政敵，每每不吝以爵祿、財富、美色等等手段，盡力籠絡，必使其人感恩圖報，竭忠盡力而不敢有所背叛。慈禧的統治手法

如此高明，其運用之妙，可謂極致。亦正因爲這些緣故，所以她即使在光緒十五年宣佈歸政，實際上仍可隱操大權。因爲凡是在朝的高官顯爵，無不出於慈禧之豢養提拔，人人心目中但知効忠慈禧，光緒雖名爲皇帝，事實上却一事不能爲。至於慈禧後來之扶植端王以圖制衡光緒，以及在袁世凱勢力日漸膨脹之後，又引用張之洞爲軍機大臣以爲抵制袁世凱之計，所用的亦是同一手法。所以袁世凱雖然是一代奸雄，對慈禧太后仍然敬畏有加。只可惜在慈禧身死之後，繼爲皇太后的隆裕與攝政王載灃都無此才具，所以袁世凱纔能以他的權謀機詐，篡奪清朝的天下於孤兒寡婦之手。若是慈禧尚在，袁世凱決不敢萌此異心，當可斷言。

以上所述，乃是因慈禧之舉措失當而造成的召侮致禍，其結果是使得中國的國際地位一落千丈，國運亦將瀕於絕滅。至於她在國內政治方面所留下的不良後果，則是她的貪財黷貨所造成的惡劣政風，其影響之深遠，直到北洋政府時代的民國，猶復流風不絕。追源禍始，此一幕往事，亦值得在此一說。

王闓運未刊遺書中，間有記述清末掌故時事者。花隨人聖盦摭憶嘗輯錄其數則，載於書中。其一則云：

「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大臣不貴廉也，能守法立法，無不廉者。道光末，穆相（穆彰阿）最爲貪黷。其門生勞文毅巡撫寧道入見，臨別，餽五十金。穆辭不受，云：『汝宦不及此，再入則可送矣。』當時非陛見人員，無由謁軍機也。其後肅相（肅順）受浙藩餽，亦止五十金，

轉以贈余。同治以後，府道州縣皆得見政府，初遺百金，後乃千萬鑒賂，近廿年遂至三五十萬，以多相誇。」

此一則下有花絮：

「道咸間賄賂始行，雖以穆彰阿肅順之貪，於外省人員，皆只五十金。證以光緒中葉孫毓汶等受餽祇百金，可見其層次之遞進。湘綺所云『近年遂至三五十萬』者，指光緒之末年李蓮英等用事之市價也。」

李蓮英通貨賄，清末以來之野史多記之。然李蓮英雖慣以賣官鬻爵爲常事，其所得賄款，並非全入於己。方家園雜詠紀事詩中就曾說過，「慈禧賣各色肥缺，以爲常事。」由於慈禧好以海關監督、織造、鹽政等肥缺懸價而賣，李蓮英又適爲之居間用事，外間相傳，遂指目爲李蓮英通賄竊官，其實則所得多歸於慈禧。

清稗類鈔中曾有一條，說慈禧在甲午中日戰爭以前，就積有私蓄折值英金一千五百萬鎊。此巨額金銀，在庚子拳亂時曾埋藏於地，辛丑回鑾，則已曾被人發掘，所餘只九百餘萬。因又續以聚斂搜括爲事，至光緒末年，再積至折值英金二千五百萬鎊之數。世所謂慈禧遺產者，即指此而言云。光緒末年的英金二千五百萬鎊，折值白銀，不下七、八千萬兩之數。此鉅額之現銀，一方面固由賣官而來，另一方面則得於各省督撫大臣及朝中權要之進奉。如當時以貪污著名之慶王奕劻，胡思敬國聞備乘說：

「厭雀之風，起自寧波沿海一帶，後漸染於各省。孝欽晚年，亦頗好此戲。奕劻宴客，各有賞犒，每月非數萬金不足供揮霍。又自西巡以後，貢獻之風日盛，奕劻所獻尤多。孝欽亦頗諒之，嘗語人曰：『奕劻死要錢，實負我。我不難去奕劻，但奕劻既去，宗室中又誰可用者？』蓋奕劻貪婪之名，上下皆直言不諱，言路以此參之，宜孝欽付之一笑也。然孝欽既知其弊，不急罷貢獻，猶縱兩格格入宮，以博奕歡弄爲事，則未免累於嗜好矣。」

慶王奕劻是繼榮祿之後的領軍機大臣，權勢赫奕，最得慈禧之寵信。根據上文的記述，則奕劻雖以貪黷著名，其實却曾得到慈禧之默許，以故言路雖屢有彈劾，奕劻的權位却能維持不倒，其原因蓋在此。清代末年，官可價得，政以賄成，還在「官場現形記」及「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譴責小說中俱有生動而具體的描寫。假如我們不瞭解清末宮廷間的黷貨情形，我們一定以爲這些小說中的描寫未免誇大失實。但事實上所見的情形，則是自皇太后以至親貴王大臣及各省疆吏，無不以搜括貪污爲能事，自無怪上下成風，紀綱蕩然的了。奕劻的貪污所得，一部分需要灌輸入於宮廷。而奕劻的貪污來源，又得自內外官吏的苞苴進奉。在這種轉輾輸納的情況之下，如之何不使政治風氣敗壞至於極點呢？然而這一切情形，又都是在光緒中葉慈禧獨專政柄之後所逐漸發展成熟的。是則慈禧之成爲清代中國的亡國禍首，又正是十分明白不過的事了。

由咸豐同治光緒三朝的歷史總述至此，敍事已極爲繁複，所費篇幅亦已甚多。綜述這三朝之

中五十餘年的歷史，因革變化雖多，實際只造就了一個晚清歷史上的女獨裁者——慈禧。由於慈禧雖有才具而實無見識，所以晚清中國的國運，繪會在她手中變得衰敗沒落，終至有亡國滅種之虞。慈禧的母家，住在北平朝陽門內的方家園。那裏是慈禧和隆裕兩朝皇太后的誕降之地，亦是晚清中國的禍胎所在。恭王奕訢當年就曾很感慨的說過：「我大清宗社，乃亡於方家園。」證之史實，這話誠然一點不錯。但若換一個角度看，如果不是慈禧之斷送滿清宗祚，那也就不會有現在的中華民國。所以王照撰方家園雜詠記事詩，又嘗戲稱慈禧爲推倒滿清之先鋒。其語雖謔，意實愴痛。慈禧在清代歷史上的定評，正當作如是觀。●